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的变迁逻辑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CHANGING LOGIC OF THE PHILIPPIN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赵婉^{1*}

Wan Zhao^{1*}

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¹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 Zhao, E-mail: 1370902545@qq.com

摘要: 教师教育在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菲律宾也不例外。菲律宾是一个具有 90 多个民族以及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家。菲律宾的教师教育政策历经几十年的发展，随着国家民族的构建成长起来，旨在建立较为科学、专业化、适合菲律宾国情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但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经济、政治、社会背景的不同，基础教育发展遭遇瓶颈，教师群体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梳理了自西班牙时期以来菲律宾教师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变迁历史，探求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中的经验教训与启示，有助于加深对菲律宾教师教育的认识，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菲律宾的教师教育交流合作。

关键词: 教师教育 菲律宾教育 教师教育政策

Abstract: Teacher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country's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Philippines is no exception. The Philippines is a country with more than 90 ethnic groups with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s. 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growth, aims to establish a more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suitable for the Philippine conditions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has encountered bottlenecks,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teachers'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 the article comb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Philippine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explor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enlightenment,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serv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Philippines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Policy.

引言

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菲律宾经历了殖民统治，每当一个新的征服者强行控制菲律宾时，菲律宾的教师教育在目标、重点和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不同殖民统治者在价值观、取向和哲学上存在差异，这对菲律宾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菲律宾独立以来，教育部门的财政状况使教学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职业。菲律宾新闻调查中心(2003)报道称，教学只吸引了较低的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更糟糕的是，那些最没有能力的学生。没有多少人愿意接替未来几年即将退休的 126,900 名教师。一名公立学校教师的最高工资是 1 万英镑。根据国家经济和发展局(NEDA)的数据，这低于平均家庭生存所需的 16710 英镑。教师不仅很难满足他们的基本家庭需求，而且还经常被迫购买教学材料。教师无疑是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他们接受的培训和教育以及待遇和地位等方面还有很多有待提高的空间。进入二十一世纪，菲律宾教育体制观念的发展与改革发展以及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激发了菲律宾国内教育体制改革向多元开放的改革发展。本文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梳理了自西班牙时期以来菲律宾教师教育的发展路径，研究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变迁历史旨在探求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1.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新的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它强调时间、顺序和路径依赖如何影响制度，并塑造社会、政治、经济行为和变化。与功能主义理论和一些理性选择方法不同，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强调许多结果是可能的，小事件和侥幸可能产生大后果，行动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历史制度主义”一词在 1990 年代初期引用最广泛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是彼得霍尔、保罗皮尔森、西达斯科波尔、道格拉斯诺斯和凯瑟琳塞伦等人。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采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全方位视角分析^[1]，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强调以时间坐标为基础、以制度迁移为着眼点，剖析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土壤和养分。历史制度主义构建了一个“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全方位分析框架，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强调以时间为轴、以制度为变量，解析制度产生与变革的机制和条件。

路径依赖的概念对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路径依赖性，制度可能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粘性，即使在制度导致次优安排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保罗皮尔森提到路径依赖意味着在关键节点触发反馈机制的负面或正面，加强特定模式在未来的重现。因此，路径依赖性使得一旦采取了特定路径就更难逆转，因为从路径转换的成本增加。雅各布·哈克和保罗·皮尔森认为，过去的政治和政策遗产塑造了政治行为者的利益、激励、权力和组织能力。

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相关症结在于时间序列很重要：结果取决于与特定制度配置相关的外生因素。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可能通过政策反馈、“锁定”效应和粘性来巩固某些权力分配或增加权力的不对称性。

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对研究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变迁及其逻辑具有较强的適切性。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的变迁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方面深入探索，有助于提取菲律宾教师教育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加深对教师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菲律宾的教师教育交流合作。

2. 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从单一到多元

2.1 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萌芽时期(1863-1898年)

自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建立了学校制度起，菲律宾教师教育就受到当局者的重视。但作为殖民地，菲律宾一直未有独立完整的教师教育体系。1863年12月20日西班牙当局才颁布了第一次有系统的培训菲律宾教师一项皇家法令，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组织设立一所培养男教师的初等师范学校。1871年11月30日，女教师的教育始于马尼拉市立学校。培养男女教师的学校均由教会管理及组织，并执行“传播天主教信仰、母语和初级生活知识”的殖民政策和为此目的来培养有能力的教师，教师的西班牙语能力以及维护西班牙统治成为这一阶段教师教育工作的重心。

西班牙统治末期，菲律宾在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较为落后，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由天主教来管理及组织且数量极少，主要集中在马尼拉地区，教师主要由神父和牧师承担。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教育经费短缺，适龄儿童仍有一半未入学，中等和高等学校实际上所招收的只是西菲混血儿和当地的贵族子弟。此外，教师教育机构呈现出“重宗教轻世俗，师范缺乏”之态。为改变这种承袭于西班牙封建殖民地的旧教育政策和师范教育单一形态的状态，服务于美国的文化殖民政策，美国自占领菲律宾之初就开始由单一的小学教师的培养转向中学及以上教师的培养，由宗教课程为主转向世俗课程为主，教学语言由西班牙语转向英语，进行师范教育的全面改造。

2.2 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发展时期(1898年-20世纪末)

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发展时期历经了美国殖民统治时期、自治时期以及菲律宾独立后三个阶段，各阶段不同的教师教育政策反映了教师教与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第一阶段：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的以遵循美国教育原则为主的教育政策

1898年，西班牙三百余年的殖民统治最终瓦解，同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最终占领菲律宾^[4]。美国十分重视教育在菲律宾殖民政策中的作用，早在军政府时期，美军就在其占领地区开办学校，每所学校配一名英语老师，士兵成为美国最早在菲律宾的教师。军事当局在菲律宾开办的学校大约有1000所，到1900年9月1日注册学生约10万人。1901年1月21日，菲律宾委员会通过了74号法案，规定建立公共教育制度并设立公共教育局，要求教会与学校分离。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为美国管理下的公立学校的系统组织奠定了法律基础。自此，菲律宾的教育发展主要遵循美国的教育原则。美国的文化殖民政策要求在菲律宾建立免费的初级英语教育系统，并大量引进美国教师。美国殖民阶段的师范教育制度的发展轨迹以教育机构的演变为载体。1901年9月1日，菲律宾师范学院在马尼拉建立，菲律宾师范学校最初提供为期2年的教师培训来培养中学及以上的教师。随后，省级师范学校也在全国不同地区建立，比如Bayambang师范学校、Lryte师范学校和Albay师范学校等。1917年以来，陆续开办了多所师范学校来培训足够的教师，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师资，教师教育的设施不足以满足公立学校系统的需求。1902年美国当局颁发了525号令，把起初菲律宾群岛的10个学区重新划分为36个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共37个学区，各个学区有权聘任在本区学校任教的菲籍教师。但直到1910年，大部分的菲律宾教师只能教小学和中学，高中教师的正式准备工作是在1908年菲律宾大学成立之后才开始的。1911年，菲律宾大学文学院成立了一个高级学部，在两年的基础文科课程增加了一年，为未来的高中教师设计了一些特殊课程。为了更好地培养未来的教师，1913年9月29日菲律宾大学通过该学院正式组织专业课程。教育学院的目标是“联系和汇集大学的所有力量，为高中教师的全面准备。”此项为期三年的培养计划规定，除了普通教育之外，还为未来教师提供选定的中学科目、中学教育问题专业研究、教学原则以及教育管理的培训。如果学生在文理学院完成三年预备课程，就可以进入教育学校。1915年，教育学院将该课程扩展到四年，学生可获得教育科学学士学位。1918年3月8日，董事会将教育学校提升为学院，并于1918年7月1日生效。不仅仅是在菲律宾大学，而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高中教师教育项目的开始、成长和发展，都与学院第一位院长弗朗西斯科·贝尼特斯的生活密切相关。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通过教师教育计划，奠定了高中教师教育的基础(Lacuesta, 1981)。贝尼特斯院长提倡所有师范学校和教育学院的标准化，这样从任何一所师范学校和学院毕业都将是教学水平的合理保证。菲律宾大学的课程为菲律宾公立和私立教育学院的中学教师设置了课程

的基本模式。由于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继续扩大师资。这一时期菲律宾教育的一个重大事件是 1925 年成立的门罗委员会对菲律宾教育系统进行的调查，俗称“门罗调查”。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最终被公共教育部用作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基础。为了实现公立学校制度的宗旨和目标，需要在教师培训机构中培养更多具有必要的教学学历的教师。教师教育机构采取措施，提供通识教育课程，使未来的教师了解主要的人类活动，以帮助他们了解其环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了解其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的基本要素。在专业教育领域，越来越重视心理成就。为了促进心理测试作为改进教学的一种手段，教育学院开设了测试和测量课程。未来中学教师的主要教学领域包括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经济学、图书馆学、家政、西班牙语和体育。另外，参加教学课程的女生人数越来越多是教师教育机构出现的一个显著趋势。

此次对于菲律宾教师教育的调整虽然改变了重宗教轻世俗，以及师范短缺的状况，建立了美国教育体系为背景的师范教育学校，但由于过于重视英语作为教师教学用语的地位，合格的教师培养较慢，资金和师资的短缺使得该阶段的师范教育不足以满足免费初等教育背景下的公立学校系统对于教师需求。另外，在这一阶段师范教育课程也随着当局者的利益而有所侧重。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由美国主导的师范教育全面改造的推进，蕴含着不同政府利益主体对师范教育机构的数量和性质、教学语言和文化、以及师范课程侧重点的差异，菲律宾师范教育体系自此确立下来。

第二阶段：自治时期的教师教育政策

在这一过渡时期，菲律宾自治时期对政府和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学院和师范学院试图扩大和改善教师教育机构，使教师教育更接近社区和公立学校。在教师教育的政策方面，所有教师准备机构将与教育局密切合作，准备未来的教师条件的基础上在小学和中学，并成立咨询委员会建议和建议规章制度，以确保这些机构的更高的效率。1935 年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后，民族意识普遍觉醒，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问题，菲律宾需要扩大和完善师范教育机构以及课程，使其更好的为社区学院和公立学校服务。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驱动下，师范教育课程强调对菲律宾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继承。1936 年 2 月菲律宾通过 19 号行政法令创建了国家教育委员会，进行教育改革，以新的教材和参考读物代替美国殖民当局统治时通行的旧教材，在课程设置上以菲律宾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教育群众等。日本占领期间（1942-1945），师范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几近中断。

第三阶段：菲律宾独立后的教师教育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菲律宾于 1946 年独立。菲美战争后，美国在菲律宾推行政教分离政策，菲律宾独立后仍然延续了这一政策。^[4] 考虑到上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合格教师的短缺，以

及国家复兴的迫切需要，高校开设了教师教育项目，以满足对合格教师的需求。在教师教育的机构的数量方面，20世纪末，大约有815个机构提供各种类型的教师教育项目，全国每个地区至少有15个教师教育机构。超过60%的教师教育机构提供硕士水平的研究生课程，约15%提供教育学博士课程^[5]。关于教师教育机构的类型，大约85%的机构是私立的，其余的是国家资助的。经私立学校局的批准，私立大学和教育学院可提供的两年师范课程，两年的家政课程以及三年的综合课程和家政课程。在教师教育的政策方面，1949年6月18日，菲律宾国会通过了第416号共和国法案，将菲律宾师范学校转变为菲律宾师范学院，授权其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这种发展有助于提高小学教师的地位，统一教学职业。菲律宾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提供教育学学士、教育学学士、家庭经济学士学位、体育学学士和成人教师证书等课程。教育、文化和体育部于1953年6月发布了第二十六条规定对教师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定了具体的规章和标准，标志着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从以立法形式初见雏形到追求本土化、标准化以及制度化的转变。这是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它规定了基础教育学士学位课程的指导方针，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专业课程组成部分的课程和单元的分配。该命令还提供了入学、居住和毕业要求的指导方针。教师教育的主要指导方针是培养具有菲律宾生活和文化理想、愿望和传统的教师，并充分掌握有效的教学制度的知识。1986年，教育、文化和体育部颁布了第26条法令修正案”，规定了实施修订的中等教育学士学位计划和提供专业领域计划项目的政策和标准。1993年，教师教育技术小组同全国教师教育和培训委员会协商，提出了一套最低要求。个别院校可以增设合理的课程，以实现院校目标和区域目标。持有非教育学士学位，并拥有18个专业教育单元的学生，也有资格在小学或中学任教。除了教育学士学位和其他适合中小学教学的资格之外，中小学教师还必须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第一次教师资格考试由国家专业管理委员会于1996年举办。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国逐步提高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不少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教师任职资格和严格的教师教育认证标准。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呼吁教师专业化的浪潮已经促进美国教师教育进入到专业化阶段。菲律宾师范教育紧跟时代的浪潮积极促进师范学院发展为综合性的师范大学并规定教师任职资格制度，促进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但师范教育完全移植于美国体制出现排异反应，教师教育机构过度膨胀以及教师培养质量低下是这一阶段师范教育主要面临的挑战。

2.3 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多元化时期(21世纪以来)

近年来，菲律宾基础教育教师群体矛盾日益突出，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菲律宾教育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让教师职业像律师和医生一样受人尊重，更是为了菲律宾中小学生的未来发展。在教师教育制度方面，菲律宾教育制度的指导精神是教育自由，所以私立学校

比较发达，师资培养也准许私人进行。菲律宾每年需要补充教师 1 万名，而公立师范院校仅有 9 所，且因菲律宾政府财政的窘迫状况，教育经费短缺，导致政府难以完成培养全部教师的任务。近年来，公立师范学院毕业生最多时仅有 6 000 人，不足的部分只能靠私立师范学院补充。菲律宾师资培养采取开放性政策和考试制度，但并无必修若干专业科的规定，这是菲律宾开放师资培养制度的重大缺陷^[6]。在教师教育的政策方面，从 2007 年起，教育部开始推行教师教育与发展项目（Teac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简称 TEDP）。经过近两年的实践，于 2009 年推出能力本位的教师专业标准（National Competency-based Teacher Standard，简称 NCBTS），这是教师教育与发展项目的核心，更是菲律宾教师教育传统和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解答^[6]。在教师教育投资方面，菲律宾的国立大学和学院由国家政府资助，遵循菲律宾共和国《第 7722 号法案》的规定，通过一般拨款法案，所有学校的拨款，包括每年授予那些完全集中和部分参与教师教育项目的拨款。因此，政府在教师教育或准备工作方面的投资被嵌入到每个财政年度的州立大学或学院的预算分配中^[5]。虽然政府在教师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这项投资似乎没有得到优化，因为大量参与教师教育项目的毕业生没有达到菲律宾对专业教师的最低要求，即获得教师资格证书（2014，Edna L. R.）。

高等教师教育机构培养教师的质量体现在教师于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的表现，在 2017 年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有 263,679 人参加了考试，85,361 人通过了考试，总通过率为 32.37%。因此，菲律宾教师教育改革的未来愿景，将持续以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深入落实其菲律宾教师专业标准以及教师发展规划系统，来应对基础教育的迫切需求。2017 年，菲律宾国家教师质量研究中心 RCTQ 进行了教师发展需求研究 (TDNS)，该教师需求发展调查产生了重要的见解，可为进行在职培训和其他持续的专业发展活动提供建议。研究结果显示在职教师在学科知识以及高阶思维方面的表现欠佳。因此，教师教育课程需要一定程度的调整，以反映学科领域的性质和学生的认知发展。为解决对教学技能和内容知识不足的关切，需要与学科专家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设计有针对性的内容、策略和教材开发在职培训。根据教师的需要，通过开展持续的专业发展活动，来提高和维持教师的素质。教师对其学科的知识水平，将成为建立其成为具有良好目标的在职培训的有效教师能力的合理基础。

作为东盟的发起国之一，菲律宾在教师教育方面努力开展国际合作，支持东盟教师教育合作机制构建。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菲律宾公立学校教师协会（PPSTA）主办了第 35 届东盟教师+1 会议，以“减少区域教育差距-东盟教师的流动”为主题以及各分主题“东盟+1 教师交流项目”，“东盟+1 教师教育质量项目”等。放眼未来，东盟可从搭建教师教育领域的“10+1”机制、建立教师能力共同标准、打造“互联网 + 教师教育”平台、构建教师教育机构联盟、开发交流交换项目等方面深化教师教育交流与合作。

文献综述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过程蕴含着教师教育政策的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凸显出教师教育制度变迁背后的内在逻辑力量。

1. 深层结构分析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宏观的深层结构对制度的变迁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7]，即制度的产生、发展、终止与变革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基于这一维度的考察，教师教育制度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的深层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语言文化的价值取向等。

1.1 经济发展对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

经济发展对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菲律宾是东亚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菲律宾独立后，仍主要承接美国的教育原则，教师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明显加快。以私立教师教育为主的开放性教师教育制度符合菲律宾的实际情况，教育政策也趋于完善。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经济发展呈现出“拉美式”特点。1960 年之后的近半个世纪，菲律宾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其邻国相比显得十分缓慢。由于出口缺乏竞争力，国内市场狭窄，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制约。20 世纪 90 年代，菲律宾已由该地区的第二工业国沦为最大的农业国。菲律宾政府的教育支出仍然是亚洲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4]。用来培养教师的开支的不足以及菲律宾经济的低迷导致相当多的进入教师教育项目的新生甚至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前就离开了大学。其他人在获得学位后不会进入教学领域，他们会选择与教学无关的工作；而那些已经教书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没有吸引力或没有竞争力的酬报又放弃了教师工作。由此国家经济发展制约教师教育政策的资金投入以及教师教育政策的推行。在这种背景下，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破解教师教育建设长期存在的马太效应，菲律宾教师教育建设模式从追求满足基础教育的教师数量向培养能力本位教师标准的教师高质量方向转变。

1.2 国家主权对教师教育制度的形塑

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传播天主教信仰、传播西班牙语和传授初级生活知识”为此目的来培养有能力的教师。在美国统治时期，殖民者将美国教育体制全盘移植，美国的教育殖民带给菲律宾人很大的影响。不过，美国殖民期间也为菲律宾培养了大批合格教师。但脱离殖民时间短、经济状况不佳、人才缺乏，导致菲律宾师范教育制度的美好构想实施起来存在很大困难

[6]。民族觉醒后,长期以来,菲律宾的政局与社会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教师短缺,投资不足等问题一直存在,教师必须做好准备,在面对全球发展、新技术和新兴类型的新学习者时承担新的角色。教师教育、教学、教师始终是教育改革的中心。教师应继续在发起、采用和实施改革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们能够而且应该在激励和激励我们的年轻人出类拔萃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只有在有关各方支持、协助、赞赏、承认和提供适当奖励的情况下,教师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菲律宾教师教育收到国家主权的影响菲律宾教师教育建设模式从延续美国的教育制度向追求多元化转变。

1.3 语言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

作为教师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语言的逻辑体系和价值取向是不容忽视的。官方语言的更迭,为教师教育的发展起着不同的导向作用。在西班牙统治的三百多年间,西班牙语作为菲律宾的官方用语,主要流通于少数西班牙人子弟及少数当地贵族子弟间。语言使用的等级制性传播限制了师范教育机构的出现与独立,1863年以来,西班牙当局建立的师范机构主要面向初等教育,且由教会组织和管理,教师主要是神父和牧师。在美国统治时期,英语作为菲律宾官方语言和教学媒介。美国统治期间的语言普及化、强制化的政策,促使公共教育以及师范教育的发展。美国的语言殖民和文化殖民带给菲律宾不可磨灭的西方印记,经济、政治以及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都被英语所浸润,其中教育领域成为推广英语语言文字的主阵地,同时,英语的广泛普及也促进公共教育体系的巩固,从而形成双向循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总是借教育机构和教师为温床,一批中小学以及教师教育机构便应运而生。1901年,培养面向中学及以上教师的菲律宾师范学校在马尼拉建立,随后多所省立师范大学建立起来,进一步为英语及其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菲律宾独立后,为追求本土话语体系以及民族认同,在政府的主导下学校以他加禄语作为主要的教学用语,但合格他加禄语教师的有限性引起菲律宾各师范学院在教师的培养目标上和课程设置上以他加禄语的习得为导向。教师教育机构认为一名教师应当学习更多的关于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知识,因此,语文类课程必修学分是一般大学的2-3倍。

菲律宾作为一个多元民族构成体,有180多种语言。由于双语政策的实施,许多地方语言濒临消失。二十一世纪以来,菲律宾逐渐开展了语言政策的多元化,注重保护多元的语言生态。2009年7月14日,菲律宾教育部发布第74号令,规定在全国正式、非正式教学中,采用基于母语的多元语言教学,废除执行了35年的以英语和菲律宾语为教学媒介的双语教育政策(Nolasco 2010)。但在菲律宾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教师的短缺问题以及教师资格证的低通过率和教师流失问题较为严重,因为教师教育制度带来挑战。

2. 路径依赖分析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玛格丽特列维认为：“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条道路发展的话，那么扭转的成本将是非常昂贵的^[10]。”行动者以某种方式实现报酬递增时，就难以从初始制度体系中跳出来寻找新的路径，这导致路径锁定。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从单一到多元变革的历程具有较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菲律宾独立后，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还在政治上干涉菲律宾内政。至今，菲律宾政坛上长期存在大量的亲美派。

美国人非常重视教育同化，菲律宾未独立时，重视美国教师队伍的壮大，是的英语逐渐成为学校唯一的教学语言。不过，美国在创办学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 1903 年美国在菲律宾创办学校 2962 所，平均每省 72 所，每镇 3 所。1903 年入学的学生总人数达到 266362 人，其中公立学校的学生占 74.8%，^[13]美国同时在菲律宾进行了长时间的文化渗透，美国的语言，生活方式等通过杂志、报纸等媒体平台影响着菲律宾。

在后殖民化时代，菲律宾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仍就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殖民影响，教师教育制度也是如此。菲律宾沿袭美国的教育制度，但经济不能支撑其现有的高标准教师及专业培养标准，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也不足以支撑基础教育改革，使得基础教育改革遇到瓶颈，教师教育项目落实难度较大。

3. 动力机制分析

制度制度变迁往往是多重关键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殖民政府向独立后追求适应本国特色转变的过程中，政策机制、外部示范效应等构成了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变革的动力，形塑了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

政策机制是一个国家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日常公共政策中发展的特定操作方式，包括政策战略、目标确定、手段选择等。政策学习机制推进学科建设制度的自我完善。政策学习是解释历史制度主义政策变迁的新视角。彼得霍尔（Peter Hall）认为，政策学习是政府根据以往的政策结果和新信息调整政策制度目标或技术，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最终目标^[17]。教师教育政策作为时间性的制度配置，被编入国家政策行动的框架。政府从教师教育建设政策中吸取经验，将政策目标调整为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师标准。这是政府基于政策学习进行的制度理念和目标的变化。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推进不同时期的教师教育建设，吸收了以往的实践经验，及时停止了相关重点建设政策，并根据新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外部模式效应带动教师教育制度的变革。作为后进生型国家，面向发达国家的制度学习以及基于本土的政策革新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成功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教

师教育建设的实践在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展开，教师教育制度的框架也从关闭逐步开放，发达国家教师教育发展计划的模范效应一直是菲律宾教师教育制度变革的外部驱动力。全球化带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为无国界的教育和学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17]。在这一国际形势下，菲律宾政府应引进高品质、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质量标准，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使菲律宾高等教育更具国际竞争力，不断吸引学生和教师，改善菲律宾的人力资源基础。跨国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受到菲律宾政府高度重视。基于此，菲律宾国会公布了第 11448 号共和国法令（Republic Act 11448, 2019），也被称为“多国高等教育法”（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ct）。菲律宾政府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跨国培养高质量教师，强调发展教师二十一世纪教师技能，追赶教师教育国际化的浪潮。

结论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凸显了在不同时期当权者的立场以及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之下菲律宾教师教育从单一的沿袭不适合自身国家发展的美国教育体制到追求本土化、标准化、制度化。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下，菲律宾教师教育政策发展过程突出，同时教师教育制度改革实践存在着深刻的路径依赖，因此教师教育制度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对教师教育建设的盲目的单一化理论消失教师教育建设的自主性、主体性仍需进一步提高。多元利益主体的协同管理结构还没有真正形成^[21]。在此背景下，如何摆脱传统教师教育建设的路径依赖，是基于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师标准建设和制度改革的重要问题。

建议

虽然政府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但历史和现实表明，教师教育的发展仍受政局不稳定，经济束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要契合本国实际，抓落实。菲律宾虽然继承了美国的教师教育制度，但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还不乐观。因此，在这一阶段，以教师质量为中心，提出高要求的能力本位的教师标准，很不契合本国实际。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断，该制度要么容易流于形式，无法落到实处，要么将靠行政命令推行，学校和教师应付了事。教育部在颁布能力本位的教师标准之后，只出台两个实施文件，并没有要求地方当局或者学校制定各个地区、学校和学科的具体标准，也没有要求各个学校或社区给教师提供实施标准的相关条件，提襟见肘的经费预算是重要原因之一。没有跟踪监督实施，让许多具体指标无法落到实处^[21]。

参考文献

- 周光礼. (2010). *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治学引论*.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马廷奇, 郑政捷. (2022). 从“重点”到“一流”: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学科建设制度的变迁逻辑. *高校教育管理*, 16(2), 47-58.
- 董志强. (2008). 制度及其演化的一般理论. *管理世界*, (05), 151-165.
- 沈红芳. (2017). 21 世纪的菲律宾经济转型: 困难与挑战.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01), 6-13.
- 刘常庆. (2012). 菲律宾能力本位的教师标准述评. *外国教育研究*, 39(1), 51-58
- 马得勇. (2018). 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兼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158-170.
- 李娅玲. (2011).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外语教学与研究*, 43(5), 756-762 + 801
- 何俊志, 任军锋, 朱德米. (2007).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埃里·胡鲁特. (2000). *美国军事和殖民政策*.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 金应熙等. (1990). *菲律宾史*.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宋云伟. (2008). 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 *世界历史*, (03): 48-58.
- 张三南, 解小宇. (2020). 政治整合视阈下的菲律宾国族建构——基于三个例证的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0(02): 137-143.
- 干咏昕. (2010). 政策学习: 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东岳论丛*, 31(9): 153-156.
- 彼得·霍尔. (2007). 政策范式、社会学习和国家: 以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为例.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1): 1-28.
- 王建华. (2020). “双一流”建设的要义. *高校教育管理*, 24(2): 14-20.
- 郜然, 吴坚. (2021). 菲律宾跨国高等教育法探析. *世界教育信息*, 34(10): 55-60.
- 黄建如, 柯莉群. (2012). 菲律宾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践与利弊. *东南亚纵横*, (2): 71-75.
- British Council. (2019). *Philippine government signs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Law*. Retrieved from December 16, 2020, <https://www.britishcouncil.org/about/press/philippine-government-signs-transnational-higher-education-law>.
- 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2019). *REPUBLIC ACT No.11448: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ct*. Retrieved from December 14, 2020.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downloads/2019/08aug/20190828-RA-11448-RRD>.
- Edna Luz R, A., Antriman V, O. et al. (2014). Exploring wastage in teacher preparation invest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The Normal Lights*, 8(2), 8-30
- U. S. Bureau of Census. (1905). *Censu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Washington: Washington Press.

母职经纪人化：多重逻辑下家庭教育生态的正义**MOTHERHOOD AS EDUCATIONAL AGENT: THE JUSTICE OF FAMILY EDUCATION ECOLOGY UNDER MULTIPLE LOGICS**刘璐^{1*}Lu Liu^{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pchyjennifer@outlook.com

摘要：母职经纪人化成为当代社会母职又一新特征，这一特征折射出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人宏微观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其共同塑造着家庭教育生态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国家逻辑起主导作用，对货币硬流通的渴求导致资本和国家对社会再生产能力不断挤压以及“照料赤字”的层层转嫁导致家庭及个人成为最终“兜底”；社会逻辑表现为国家话语体系自上而下的“垂直影响”效应，即“照料经济”映射出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双维度的碰撞与火花；家庭及个体逻辑表现为路径依赖下产生的“子宫家庭”环境以及“再生产劳动”对“生产劳动”的屈从性地位。进一步将“母职经纪人化”研究范围扩大到国际视野，发现英国妇女同样经历着母职角色的结构性困境，莎妮·奥加德教授指出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面对这一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性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制定者；北欧则致力于构建“再生产职责被公共机构和男性所分担，女性成为国家福利制度的坚实同盟”的社会结构。回归到马克思意义上“完整的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再生产”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维系中都处于核心价值 and 地位，将“社会再生产”从家庭私领域中包揽回公共领域，有着关乎国家正义、人民幸福和人口结构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母职经纪人化，家庭教育，多重逻辑，社会再生产，正义。

Abstract: Motherhood as educational agent has become a new fea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ich reflects the action logic of different macro-micro subjects of the country, society, family and individuals, and jointly shapes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ecology. Among them, the logic of the state plays a leading role, the desire for hard currency circulation leads to the continuous squeeze of capital and the state on social re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transfer of "care deficit" leads

to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becoming the final "bottom". The social logic is reflected in the top-down "vertical influence" effect of 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that is, "care economy" reflects the collision and spark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The logic of family and individual is manifested in the "womb family" environment generated by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ubservient status of "reproduction labor" to "production labor". Further "motherhood as educational agent" research will extend to international vision, found that British women's mothering, experiencing the same role structural dilemma, Professor Shani Ogard pointed out that addressing gender inequality is not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women. It is me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public policy makers who need to change their minds about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society; In Northern Europe,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which reproduction duties are shared between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men, and women are solid Allies of the state welfare system. "Whole person" returns to Marx's sense of 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point of view, "social reprodu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maintaining are at the core value and positio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from family shiry domain swept back into the public domain, is about national justice, people's happiness an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Keywords: Motherhood as Educational Agent, Family Education, Multiple Logics, Social Reproduction, Justice.

引言

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作为一部针对家庭教育的法律，《促进法》不仅体现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更是为了完善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为提升我国家庭教育质量提供坚实保障。家庭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场域，而家庭教育往往是看不见的、外人难以干预的环节，正如萨提亚家庭治疗中的冰山理论所隐喻，一个人的“自我”就像一座冰山一样，外在世界能看到的只是表面很少的一部分——外在行为，而更大一部分的内在世界却藏在更深层次，不为人所见，恰如冰山。包括有行为、感受、观点、期待、渴望、应对方式、自我七个层面。而家庭教育所培养的恰好更多的集中在人的内在世界，持续且深远的影响着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各类形形色色的家庭塑造了未来劳动力市场上风格迥异的个性化存在，其背后家庭之间的差异判若云泥，包括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即使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73.0%（2022年2月25日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告》），

教育领域形成的地区差异和阶级差异仍旧是难以跨越的鸿沟，尤其是在今天教育越来越私人化的今天，如何实现或者更接近家庭教育生态正义也依旧是重难点课题。

在现代家庭中，母亲往往承担了更多照顾和陪护子女教育的职责，这是由性别间的社会惯习和传统分工差异所导致的。在中国社会家庭分工中长期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张川川和王靖雯，2020)。家庭成员中的女性确实会从事更多的家庭劳务、照料子女和赡养老人等非生产性活动，从而影响女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因此女性更多的面临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的两难境地(续继和黄娅娜，2018)。追根溯源，早在1929-1933年间，国共两党的劳动法就已经搭建出了现代职业妇女的母职基本模式:以无酬照顾为主、赚钱为辅。国共劳动法顺应了中国早期现代工业的性别特征,建构出自身的性别逻辑和父职的新型标准,隐晦地勾勒出了与现代母职二元对立又二元互补的现代父职模式:以赚钱为主、照顾缺席(王向贤，2017)。性别分工的意识固化和性别平等呼吁下的女性现实遭遇正加剧着劳动力再生产水平的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人口净增长才48万，创60年来新低。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面临“不敢生育”的境况，女性更是面临“性别-母职”双重赋税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对待，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放宽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杨菊华，2019)。本文认为，母职经纪人化将带来第三重赋税的效应，即高负荷的精英教育目标导向下母职标准陡升进一步加剧母职“内卷化”及性别的困囿。本文以母职经纪人化作为研究视角，探讨家庭逻辑下，路径依赖下产生的“子宫家庭”环境以及性别不平等付出，制度再生产根深蒂固“后院经济”；社会逻辑下，社会再生产理论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以及“照料经济”映射出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维度的碰撞与火花；国家逻辑下，货币硬流通的渴求导致资本和国家对社会再生产能力不断挤压以及“照料赤字”的层层转嫁，家庭及个人成为最终“兜底”。

文献回顾

1. 核心概念厘清

1.1 母职经纪人化：帕累托最优在家庭教育中的理想

“母职经纪人化”是杨可在2018年经过都市田野调查总结得出的母职发展新态。经纪人是指介绍买卖双方交易，以获取佣金的中间商人。作者借用大众熟知的明星经纪人的内涵意韵和工作模式，刻画描绘当下母职发展态势：母职实践突破私人领域内照料儿童的传统内涵，在教育培养孩子方面的职责陡增：母亲不仅仅要擅长于经营信息与社交网络、充分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而且要私人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全程规划影子教育学习时间、亲身

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能力，以帮助子女在每一级的升学途中占据优势地位并掌握更多的技能和资源。目前来看，母职经纪人化的现象更多的聚焦于城市文化，偏远地区和乡村村落纵使思想上展望了经纪人化的培养方向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次，中产阶级家庭更有经济实力和资本去完成经纪人化的适应性转变。

所谓帕累托最优理论，是指假设有固定的一群人和一批有限的可分配资源，如果能实现从一种分配资源状态到另一种资源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情况变得更好，就可以称之为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2]，母职在实现经纪人化的过程中，将铺天盖地的教育市场资源和孩子自身素质条件兴趣爱好进行精准匹配以实现有限课余时间内的技能增长，其中，父母现有的人力资本（祖辈投入意愿）、社会资本（通过人脉掌握信息资源）、文化资本（父母的学识尤其是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都影响甚至决定着课外投资的发生与行进。此时家庭的轴心已然是母亲，母亲负责统筹安排所有的家庭事务，父亲和祖辈分工明确地执行着孩子成长中的日常和任务。孩子的进步和成绩成为家庭衡量其规划安排合理性和恰当性的指标，如何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优质的课程体验及掌握更丰富的技能，并从中精选一到两个兴趣爱好作为特长着重培养达到参加国内甚至国外赛事的水平，成为母职经纪人化大趋势下社会衡量母亲优秀程度的指标。

“拼妈”早已成为时代的共识，女性从怀孕的一刻便奋不顾身投入到母职的建构当中，生产、哺乳、早教，再到基础教育穿梭于学校内外的春夏秋冬，社会普遍认可的合格母亲是孩子整个成长过程都陪伴左右亲力亲为的，即便有些女性由于身体或者工作等原因缺席了孩子的成长，也会相应的承受来自于自我内心愧疚感的谴责。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将照料、陪伴等非生产性劳动天然的划拨给女性，即便是从小接受“男女平等”思想长大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婚姻也无法避免地落入尘世，经历“小公主”到“老妈子”的心灵地震。即便是全职妈妈群体，也经历着疲惫和价值感缺失，付出一切又毫无安全感的差评体验。加之社会层面“三胎政策”的出台愈发加剧职场妈妈面临的职场歧视和母职惩罚。在如今母职经纪人化大趋势下，女性在世俗眼光与自我意识的双重挤压下不断挑战着能力的极限和抗压的边界，与此同时，男性依然固守在1929-1933年间国共两党劳动法搭建起的父职基本模式：赚钱为主、照顾缺席的传统中缓慢调整着步调，不禁令人沉思：性别正义到底何以实现。

1.2 家庭教育生态：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

家庭教育生态属于生态学中教育生态学的一个子集。生态学是研究各种生态主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研究家庭教育问题，必然要从主体与环境两个维度入手。就一个家庭而言，环境和主体都是具体的，但又是相对的^[3]。以往的讨论更聚焦于家庭教育的私人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已出现不少关注家庭教育于社会结构层面和国家立法环节的理论推进（李洁，2020；

唐晓菁, 2021; 刘大伟, 周洪宇, 2022)。国家出台《促进法》, 采取法律的形式进一步规范家庭教育, 将家庭教育由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事”。从生态学视角看, 生态圈层中的任何一个圈层都影响着最后生态的平衡, 有必要从多重主体的角度诠释其逻辑以更加深刻意识发展脉络。家庭教育生态包括三个大的圈层: 国家、社会和家庭。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有研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的讨论: 当个体只能依靠家庭资源来解决结构转型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时, 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脱嵌”(阎云翔, 2016, 2018)。家庭的“小问题”往往要放到“大环境”去剖析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2. 理论依据: 黑格尔的国家正义观

2.1 什么是正义?

“正义”(Justice)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与“公正”基本同义。从古至今, 对正义的理解形成了很多流派。无论是哪个流派都不能不同意的一个表述是: 正义是一种能让人类走向最大繁荣的伦理观。尽管各家对于“人类”、“最大”、“繁荣”的定义各有不同, 甚至是种族不同、阶级不同、出身和立场不同, 都会产生较大的分歧。但是, 这个“人类最大繁荣”的共识是没有疑义可言的共同前提, 在这个共识之上, 探寻可能性和可行性是未来所要完成的历程。“正义”区别于“正义的理想”更多关注的是“可行性”问题。正义是可以拿来作为现实审判的法理基础的, 而正义的理想则难以成为。一方面应然之事何其之多, 但在可行性的拷问下难以走到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 路径依赖下导致的正义忽视和正义的曲解也值得更多的关注和纠偏。

2.2 黑格尔的国家正义观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 国家是不可取代的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4]。国家是特殊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层级, 黑格尔的正义论区别于当代正义论的主流话语“罗尔斯—康德”这一主线所讨论的正义, 正是在于其探讨正义于国家这一层面。黑格尔的国家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 而是“伦理理念之现实”, 即自由和正义之实现。正义在城邦制出现之际就已经诞生, 柏拉图的《理想国》便很充分的诠释了希腊的伦理本性; 而自由在经历了一千多年黑暗世纪的掩埋所迸发出的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血腥恐怖, 令黑格尔意识到自由绝不仅仅是正义之事, 自由也同样意味着野蛮和犯罪。因此, 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 论述思路是从“意志自由的现实化”来推演国家的伦理理念。他将意志自由的实现划分为“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发展环节。而“国家”又是“伦理”包含的三个发展环节——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即为最高级别的发展^[5]。因为在黑格尔看来, 抽象法和道德,

单独来看都是片面的、抽象的：抽象法多为单纯的禁令或强制性命令，欠缺主观性表达，而道德仅仅只有主观性，以善意与良知呈现出意识行为的约束。而在伦理中，家庭和市民社会也同样具有片面性：家庭属于私人领域而不存在社会性，市民社会则具有社会性而无血亲之爱。因此，法和道德的平衡和实现要依托于伦理，而最终落脚于国家。国家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统一，“国家既是所有国民主观意愿（情感与信念）的客观化，即每个人都把国家视为自己主观目的的实现之所，因而是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可分割的世世代代的生存之所，是善与爱、利与义、福与责交织起来的心灵家园、情感家园；同时又是自在自为的法的意志的制度化，即抽象法的权利与正义和道德法的自由与良知的现实化^[6]。”在这种意义上，伦理是自在和自为、主观和客观的善的统一性。

黑格尔《伦理体系》书中，详细的区分了“相对伦理”和“绝对伦理”。“相对伦理”是指关系伦理，是社会中人與人之间由于必然的相互需要而在相互交往和互动关系中构成的相对于彼此的伦理关系。而“绝对伦理”是指不与任何关系相关，而能使所有的组成部分皈依于一个整体从而使之具有生命活力的精神性力量。“但整体的生命活力不是生命力的抽象，而是差异中的绝对的认同、绝对的理念^[7]。”这种整体，黑格尔在早期《伦理体系》中称为“民族”，在《法哲学》中称之为“国家”。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公民，在这种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其对待共同体的伦理态度，不以“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他们而定，也不以他们对这个共同体的情感而定，而是这个共同体本身就是目的，先天具有维系其整体性生命活力的伦理原则。黑格尔后期将绝对伦理逐渐理解为自由与正义。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将伦理外化为礼法、律令，而黑格尔更多将伦理释义为精神，作为生生之物的内在主体和灵魂。对于家庭而言，家是一个伦理共同体，维系家之所以为家的“伦理”，不是“相对的伦理”——父母与子女彼此间的相处方式，而是“绝对的伦理”，这种伦理就是“爱”，正所谓“血浓于水”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到了市民社会，已经不存在血亲之家的自然之爱的绝对伦理了，市民社会作为工商业时代的产物，其形成基础是相互需要、相互以他人手段和中介而建立的交往和联合，其绝对伦理是“相互承认”的原则，以“相生”的方式构建市民社会的“普遍之家”。实现相互承认原则的途径是形成“抽象法”的共识：“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将这种具有道德性的法律准则作为自己与他人相处相生的行动原则，就构成了市民社会相互承认的伦理理念。在这种伦理理念的支配下，“契约”才能成为有规范效用的法律，人才能从私人领域中解脱出来，转变成具有共同意志并愿意为普遍意志服务的公民；在国家层面，不再是市民社会所形成的伦理原则，因为市民社会中行为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私人的地位、荣誉和福利。唯有伦理性的国家才能让每一个公民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素养就是普遍意志的养成。“正如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中每

个市民养成其契约人格和公平交易的人格一样，国家促成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从而成为普遍等级的成员，因而养成其真正的政治正义的人格^[8]。”

3. “母职经纪人化”折射出的多重主体行动逻辑

3.1 宏观国家的逻辑：教育私有化的权力进路

在家庭教育的生态中，国家作为看似距离最远实则权力最集中的生态圈层，其逻辑体现为国家逐渐将劳动力再生产和人力资本优化的压力下放到私人领域。

虽然人类的存在远远早于国家的诞生，但国家的延续和更迭在实质上却远远不同于人类的繁衍。现代国家的整体话语体系的中心建构者来自于西方哲学，即使逻辑并不具备时空性，文明的进程也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劳动力再生产是“繁衍后代”在商品经济时代的“新称呼”，纵然其伴随着人类诞生已有五百万年的历史，仍旧抵不过劳动生产在现代化国家带来的根本性时空重塑所创造的价值认同。

劳动力再生产演变到今天，和家务劳动一样似乎已经是一种布雷弗曼意义上的“去技术化”进程(Braverman, 1975)。成熟的国家话语体系将生产、哺育和照料的日常行为规范和标准从主体执行者手中夺走的同时，把实际劳动转化为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并辅助于提供一定的规范手册和时间管理策略。在剥夺主体创造性的同时，形成一种新的外部压力，桎梏了再生产劳动的执行者。即使身处于劳动再生产的情景，大多数人群也会不由自主地用“投入”“产出”“经济”“性价比”等概念来衡量劳动效率。成熟的国家建设构成伴随着话语体系的渗透，早已深刻地、隐秘地影响甚至控制着每一个家庭的节奏。借用福柯所关注的现代权力/知识体系在个人认知领域所发挥作用的现象，一直以来劳动力再生产被贬低、轻视和漠视是否也是国家话语体系的程序错误。当下普遍存在的“密集母职”使得原本已经在经济和观念上获得独立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养育和照料孩子的过程中再次陷入情感和精力的自我消耗，这是否也是一种针对女性的新型自我殖民和劳动内卷？

母职经纪人化的兴起，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安妮特·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中产阶级家庭“连轴转”的生活正是母职经纪人化的展现^[9]。社会往往将教育中存在的现象归于家庭的“家务事”和个人选择问题，但是这些现象所投射出的一系列问题：非编人员子女上不起幼儿园、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紧缺、“双减”下“影子教育”更私人化带来更大教育分层、普职分流遭到质疑并带来更大升学压力等，这一系列问题真正反映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并阻碍着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只有将其置身于更大的社会领域和国家层级，从社会结构和国家权力的视域展开讨论，才有可能真正触及矛盾症结。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发现和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源资本化在宏观层面说明了人力资源具有的经济价值^[11]。女性在人的再生产领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不仅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同时，她们的再生产劳动过程本身也是物质资料的重要消耗者。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 将妇女的劳动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经济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通过对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女性的研究，米切尔认为：“尽管美国女性已经获得了部分的性解放和自由，并且生育的子女数要远低于从前，但其花费在儿童社会化上的时间和精力却并未减少，甚至日趋增加。而这种“母职—家庭—远离社会化大生产和公共生活—性别不平等”的因果链条还在继续塑造其屈从地 (Mitchell, 1971)。”

那么为何在市场化 and 商品化的资本运作时代，人的再生产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许，将这一核心议题放置于更加宏大的国家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发展中，才能得到解答。现代社会区别于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化分工日益提升，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时代的到来到现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石墨烯、基因、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以及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互联时代，根据最新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显示，世界上现有 8 个大类、83 个小类、284 个细类、1506 个职业项目，总列职业 1881 个。因此，人力资本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越来越高，教育领域所面对的市场蛋糕越做越大。然而，资本运作的底层逻辑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建立在理性人的私欲和野心之上。“资本无国界，金钱永不眠。从价值高地流向价值洼地，是一切资本永恒的运转逻辑。”教育，同样是一场高风险的巨额投资（对普通家庭而言）——不得不进行（亲生的）并且战线越来越长（高专业化人才培养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研究）。先不论国家现有的经济水平是否足以将这一部分的市场国有化，“理性的资本”也会在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高、本身存在路径依赖（家庭）后，做出希望由家庭而非系统本身来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理性决策。在此背景下，世界范围内“影子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恰好佐证了教育私有化的权力进路。

3.2 中观社会的逻辑：忽视人口再生产的公共属性

在家庭教育生态中，社会是“承上启下”的重要圈层，其广泛地塑造着家庭教育实现的公共领域，其逻辑体现为社会公共部门将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再生产责任视为私人家庭事务，从而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家庭化和个人化，将劳动力再生产从一般意义的人类活动中剥离并纳入私领域，从而模糊了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

女权主义者建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将女性从家庭内部事务和繁衍后代的本能中解放出来，强调并凸显“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和责任感。但在生活世界，真实情景却与理论认识背道而驰。在资本运作的经济体系中，一切价值都由金钱衡量，却以“爱”和“美德”作为对再生产劳动的回报^[12]。女性主义者敏锐地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调整，还是发

家的经济重塑……社会再生产责任愈是加诸私人家庭，使其通过无酬家务劳动或购买家务劳动的方式来实现……愈会导致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 (Luxton, 2006:39)。

有研究发现：现代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不再基于男女两性的身体差异，而是植根于“再生产劳动”对“生产劳动”的屈从性位置——即便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同样发现，“孩子”被大众意识私有化为家庭财产，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切义务教育外的知识技能、以及发展所需的外在环境场所，必须依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的劳动报酬予以支付后，才能获得和享用。从孩子内在成长来看：丰富的环境非常重要。一项关于动物的研究启示，幼年期成长的环境越丰富 (Enriched Environment, EE)，其大脑中就会有越多的神经形成 (neurogenesis)、突触生成 (synaptogenesis)、并且增加与记忆和学习有关的大脑皮层的树突密度^[14]。就此而论，越是拥有更多资源的孩子，其越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未来表现。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致力于提供给孩子丰富的成长环境，遂逐渐演变出“母职经纪人化”。从外在的社会环境来看：无论是“影子教育”还是优质活动场所，都需要资本的运作，金钱将普罗大众划分为三六九等，应运而生的则是关于城乡、阶级、性别的一系列矛盾。如何打通家庭由“私”到“公”的壁垒，成为正义必须思考的问题。

3.3 微观家庭的逻辑：路径依赖和制度再生产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家庭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功能多重复杂的聚合体：不仅是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整合与控制的组织形式，同时还承担着情感归属、政治约束、社会交往、劳动力再生产等多重功能。工业化大生产和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打破了以土地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使得人类生产的目标开始围绕着原始资本的最大化积累，而非人类需要本身 (Ferguson, 1999)。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工人阶级的壮大，机器化生产将男性更多的从家庭剥取至工厂，逐渐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依赖关系。即便随着生产工艺的大幅改良和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女性也逐渐走向生产领域，但是“母职”和“照料者”的角色印记已经深刻影响了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与此同时，“儿童”的主体性快速崛起，极大的丰富了“养育过程”的范式并加重了大众家庭教育的负担，女性在当代市场经济下，承担了人口权重的社会责任和几乎全部的家庭教育任务。试想：这种“当代母职”的建构究竟是来自于个体的意愿和诉求，还是受到制度再生产的驱动。也许答案已经明显，正是在路径依赖和制度再生产的双重作用下，当代母职面临着“密集母职”、“母职惩罚”、“母职经纪人化”等现实的困境。

4. 他山之石

4.1 英国妇女：从“长发飘飘”到“头发飞扬”

莎妮·奥加德(Shani Orgad)教授所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以都市田野的追踪再现了英国高学历已婚妇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莎妮教授共访谈了 35 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 3-17 年,平均离职时间为 8 年,其中仅有 1 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其余都曾经是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副校长、教师、艺术家、时装设计师、媒体制作人、记者、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等^[15]。通过与这些高学历离职妈妈近距离的倾心交流,莎妮教授发现,家庭生活的私有性“确保了”母亲们负面情绪的小范围流转,“高学历离职母亲是基于个人自由和选择”的乐观表象是虚假的。研究进一步揭露出其中被遮蔽的该群体所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国家政策、经济结构及家庭内部压力等外在限制。据此,莎妮教授追问:当代英国媒体与国家政策中关于社会性别、工作与母职的再现的关联与鸿沟在哪里?高学历全职妈妈的结构性压抑、矛盾与再次踏入职场的困扰等问题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构连?

英国经历了从“快乐的家庭主妇”到“全能妇女”的理想妇女形象的历史变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快乐的家庭主妇”成为西方社会主导的妇女典范,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她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成为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16];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将“工作与生活相平衡”作为政策话语的重心,期待妇女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超级妈妈”即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迈向公众视野,妈妈们不仅有工作在身,而且在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方面也不能缺席和卸责,她们飞奔于家庭与工作之间,成为“头发飞扬的妇女”^[17];世纪之交,在自信文化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体系中,妇女看似拥有选择权力——“一切皆可选择”,并且充分享受着 HIV 约束下的性解放快乐,但工作和家庭的激烈冲突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努力和挣扎却被隐没了;21 世纪以来,英国母职和工作再现的妇女形象呈现出复杂化趋势,莎妮教授认为,这是对上述理想化形象不符合妇女和家庭的现实情形而做出的批判性回应^[18]。

英国同样处于社会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的阴影下。在性别差异自然化的话语中,男人们天然地主宰家庭外部的资本领域,在经济生产的公共空间更易占据主导地位,妇女却被认为更适合于照护领域,应当在家庭私人空间承担更多的责任。导致的现实是,妇女在外被职场性别差别对待、以有偿劳动为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资本力量所操控;在家庭内部则被父权制的特权所宰制,迎合丈夫的需求,将个人价值寄托在儿女身上。在社交媒体中大肆鼓吹“事业家庭双丰收”女性形象往往造成的后果是,大众妈妈们将难以平衡事业和家庭视为“自我无能”,愈发“失去自信”,更深的陷入了家庭的沼泽地。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无尽的牺牲和承受的痛

苦则被社会选择性忽略。正如莎妮教授最后总结的，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应“拒绝将妇女的斗争、痛苦和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19]，面对这一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性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制定者。

4.2 北欧弱势群体：从“家庭附庸”成为“独立公民”

北欧在地域上包括欧洲北部的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和冰岛共五个国家，以及实行内部自治的法罗群岛。抛开北欧在经济竞争力、科技创新力和民众生活质量上的领先来看，其“再生产职责被公共机构和男性所分担，女性成为国家福利制度的坚实同盟”的社会结构^[20]，值得投入更多研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都将家务劳动、哺育幼儿、照料老人视为是家庭内部消化解决的私事，。在北欧，制度通过“高所得、高税赋，却也高福利”的运转机制，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尤其是弱势群体，比如小孩和老人，都被视为独立的公民，享有一定的经济补助。

结论

家庭教育生态发展仰仗于国家、社会再到家庭、个人的主体与环境和谐，同时依赖于彼此结构间的相互建构和形塑。其中，国家的逻辑起主导作用，构成了社会公共机构的合法性基础；国家伦理与社会媒介所塑造的话语体系构成了家庭、母职系列行动的程序性正义。观照现实情境，程序性正义往往并不意味着结构性正义。国家频繁出台教育相关法案、社会普遍对教育议题感到焦虑、母职经纪人化进一步加剧“内卷化”都显现出结构性正义的缺席。如何在家庭教育领域生发正义与自由相平衡的伦理，真正推进民主于个人生活领域，在保护隐私的同时扭转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家丑不可外扬”的陋习，成为当下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议题。

“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把主体性的原则推向完成，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它本身中保存这个统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得精辟阐述深刻描绘了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在家庭教育生态体系中，国家是最有话语权的生态圈层。首先，国家层面应当更多的关注矛盾何以发生而不是如何调解矛盾；其次，在国家话语体系中，应将夫妻、人口、代际矛盾视为时代激烈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挤压与张力而非家庭内部或性别之间的龃龉；第三，国家要引领媒介更广泛地对深层社会结构性动因与对生活世界复杂面貌进行体察，反馈真实世界小人物的不平凡，戒除一味的鼓吹和断章取义。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大同”的美好构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曾试图以集体和单位制的方式分担育儿养老为公共职能；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上述种种

社会再生产职能被重新视作私人领域事务全面退还给家庭或个人。有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飞速增长的背后，是对家庭社会再生产职能的过度开发和汲取^[21]。而中国女性又成为世界上参与劳动生产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由此造成了中国家庭——尤其是家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妇女——同时承受着来自劳动和再生产劳动领域的双重挤压与张力。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传统上一直以家庭伦理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支撑，如今面临着人口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质量和供给侧改革的多重压力，尤其是新生儿数量持续走低，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

回归到马克思意义上“完整的人”即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再生产”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维系中都处于核心价值 and 地位。但是，在政策制定中往往将人口视为劳动力需求的目标导向并且加以过度的人为干预或调控完全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应该看到的是，社会公共管理部门能否将主要由女性所承担的“再生产劳动”从家庭私领域中包揽回公共领域，探索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对再生产职责的分担与共建；国家能否构建起针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机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设施建设；家庭树立成员公民意识，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并相应履行“再生产”义务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正如韦伯斯特所言“正义是人类最大的利益”，正义引领人类反思前行的道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我们是否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征途忽视了微小而平凡的个人生活，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参考文献

- 续继，黄娅娜(2018). 性别认同与家庭中的婚姻及劳动表现. *经济研究*(04), 136-150.
- 王向贤(2017). 承前启后:1929-1933 年间劳动法对现代母职和父职的建构. *社会学研究* (06), 165-188+245.
- 杨菊华(2019).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人口研究*(01), 36-51.
- 张川川，王靖雯(2020). 性别角色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经济学(季刊)*(03), 977-994.
- 李绍荣(2002). 帕累托最优与一般均衡最优之差异. *经济科学*(02), 75-80.
- 洪明(2010). 教育生态视域下独生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治理. *中国青年研究*(08), 96-99+116.
- 杨可(2018).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 *妇女研究论丛*(02), 79-90.
- 邓安庆(2018). 国家与正义——兼评霍耐特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 (10), 24-38+204-205.
- 安妮特·拉鲁(2010), *不平等的童年* (张旭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开国, 宗兆昌(1999). 论人力资本性质与特征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06), 33-46.
- 李洁(2021). 重新发现“再生产”:从劳动到社会理论. *社会学研究*(01), 23-45+226-227.
- 李娴, 谢斌(2012). 丰富环境与脑卒中康复.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01), 47-52.
- 曹晋, 曹浩帆(2021). 高学历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评莎妮·奥加德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 *妇女研究论丛*(03), 124-128.
- 宋少鹏(2012). 从彰显到消失:集体主义时期的家庭劳动(1949-1966). *江苏社会科学*(01), 116-125.
- Braverman, Harry. (1975),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renner, Johanna & Barbara Laslett. (1991). Building on the Strengths of the Socialist Feminist Tradition. *Critical Sociology* 25(1), 25-29.
- Luxton, Meg. (2006).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anada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Canadian Reviews of Sociology*, 52 (2), 10-19.
- Mitchell, A. & Juliet, P. (1971). *Women's Estate*.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Orgad, S. (2019).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如何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美国“家长教育”的经验**HOW TO BUILD A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张卉梓^{1*}Huizi Zhang^{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735612035@qq.com

摘要：“家长教育(Parent education)”在美国存在已久。目前，美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以服务项目为实践载体、组织机构为引导平台共同构建指导主体，通过专项课程、杂志书籍、媒体节目、其他活动等四重路径为美国的普通家庭以及特殊家庭提供基本养育知识与技巧、健康与安全、亲子互动、儿童发展、儿童情绪管理与社交、家庭管理、其它等七方面的育儿知识和技巧，组织网络保证了美国家长教育运行系统的高质量运作，政策对资金与技术的支持和高质量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建设构成支撑体系。美国“家长教育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美国家长教育，美国经验。

Abstract: "Parent education" ha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matur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which takes the service project as the practice carrier and the organization as the guidance platform to jointly build the guidance subject, and provides basic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health and safet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child development, children's emotion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for general and special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four paths such as special courses, magazines and books, media program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family management and other seven aspects, and th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ensure the high-quality operation of the American parent education operation system. The policy support for funds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family education tutor team constitute a support system.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American Parent Education, American Experience.

引言

家庭教育不仅是启蒙教育，更是终身教育。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家庭教育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根据对河南农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13.2%的父亲文化程度为大专或大学，家长的整体素质偏低，教育理念落后，很难满足子女成长的需求”（李云霄, 2020, p. 5）。而家庭教育问题的不仅存在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根据上海市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具有 70%左右的家长存在家庭教育困惑”（张晓东, 2019, p. 70）。有困惑则有指导需求，在一项社区居民家庭教育服务需求调查中显示“85%的家长认为非常需要社区家庭教育辅导”（王维英&冯晟, 2020, p. 106）。面对日益增长的家庭教育指导需求，国家在 2011 年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提到“适应城乡发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为主要目标；2016年全国9部门共同印发《关于指导推荐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提出 2020 年基本检查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加快推荐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迫在眉睫”。

“家长教育(Parent education)”在美国存在已久，原为美国母亲们的团体活动，母亲们聚集在一处讨论抚养孩子的问题。1888 年建立的儿童自然研究协会为最早的家长教育指导服务组织(原名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ld Nature, 现更名为 the Child Study Association of America)(James W. Croake, Kenneth E. Glover, 1977)。随着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寻求帮助，家长教育的范围扩大，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都有公共和私人的参与。而联邦政府对家长教育的支持早于私人组织大规模参与家长教育活动，在一些前期的铺垫下，1918 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开始支持以健康为导向的“家长教育计划(Parent Education Programs)”(Brim. O. G. . Jr, 1965)旨在为家庭提供知识、资源和支持，以提升父母的育儿技能和增加儿童、家庭的幸福感。2010 年《虐待儿童预防和治疗法》将家长教育确定为一项核心预防服务，儿童局资助“家长教育计划”作为当地社区预防工作的一部分(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 2019)。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然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丰富的成功经验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文献综述

1. 主体构建：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践载体和引导平台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施主体指提供服务方，“家长教育”以服务项目为实践载体、组织机构为实施平台，构建指导服务实施主体。

1.1 服务项目：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践载体

从历史上来看，“家长教育”备受美国各方关注，有大量的官方组织和民间机构参与到“家长教育”中，为有特定需要的任何家庭提供服务。而这些服务往往以项目(计划)的形式发起，项目的发起者既有各州政府、也有各民间协会：如，卡罗莱纳州 1972 年开发的项目“初学者计划(The Abecedarian Project)”为 0-5 岁的弱势家庭提供教育资源；1981 年密苏里州试行的“PAT 项目(Parent as Teachers Program)”，服务于具有高需求的特殊家庭；美国最早启动的长期效果研究项目“佩里学前教育研究计划(Perry Preschool Program Study)”中，教师会每周对实验组儿童家长做一个半小时的家访，帮助解决家长出现的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美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家长教育项目。可以说，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要实践载体由每一个属于“家长教育”的项目共同组成，但由于每个项目发起者并不一致，每个项目的管理和运行都是独立自主的。

另外，美国“家长教育”项目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但总体可以归纳为两类项目(Marc H.Bornstein,2015,p.395)：一是普适类，此类“家长教育项目”具有通用性，向所有家长提供，帮助家长了解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服务内容以健康和安全知识为重点，其多样性体现在服务家庭育儿阶段的不同，如“紫哭期(Period of Purple Crying)”为处于 5 个月以下育儿阶段的家庭服务、“父母-儿童互动疗法(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为处于 2-7 岁育儿阶段的家庭服务；二是特定类，此类项目具有针对性，提供给特定的父母群体，如面向黑人群体的“有效的黑人育儿计划(Effective Black Parenting Program)”，面向针对存在虐待儿童风险的家庭的“亲子认知行为疗法(Combined Parent-Chil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和面对被儿童福利局列为虐待儿童家庭的“育儿计划(Nurturing Parenting Program)”。

1.2 组织机构：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引导平台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机构包括系统的专职机构、各类学校组织和零散的大众传媒机构：在实践中，专职机构为“家长教育”的主要平台，根植于社区或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根据对资料的整理本文将专职机构分为三类：一是官方类的管理机构，通常为由各州政府部门设立的家庭教育协会或家庭教育中心，负责管理本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和对本州家庭教育指导师进行培训、考核以及资格认证(袁淑英, 2015, p. 150)；二是国家项目类的实施机构，基

于国家性项目建立的专职机构，尽管此类机构受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或者项目本身由政府牵头，但其拥有独立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考核、认证系统，对于服务的评估、分支机构的质量认可和改进均不依赖政府；三是民间项目类的实施机构，此类机构往往都民间组织或个人自发创立的自治机构，重点为婴幼儿家庭、弱势群体、特殊人群服务，通常无家庭教育指导师认证资格服务以及机构质量的评估依靠国家认证的评估机构。

各类学校是“家长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包括一般学校和家长学校。一般学校指幼儿园、中小学、特殊学校等学生群体为儿童或青少年的学校。2007年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更新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六项标，提出家校之间要定期进行互动、有意义交流；帮助家长将社区内给的家庭指导服务内容联系起来，给家长提供培训或其他方面服务，以促进家长家庭教育技能的提高(PTA,2021)。大多数基础教育阶段的都有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负责解答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困惑以及提高相应的指导和建议，但因为学校性质的不同每所学校指导师的专业重点也不同，如转折点学校的指导师重点在预防犯罪和矫治，和家长共同努力帮助孩子走上正途；特殊教育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还必须拥有特殊教育领域的知识，设计适合的服务方案为特殊家庭提供精神力量，帮助特殊儿童增强生存与适应能力。

家长学校指学生群体为家长的学习。家长学习致力于提高家长对儿童成长过程中如何陪伴并解决接触中的任何问题的意识，如纽约市教育局主办的“家长大学(Parent University)”为家庭提供领导机会、培训、指导和其他资源，提供了解角色和职责、儿童发展特点、如何与儿童相处等家庭教育知识的课程，还有了解政策、文化等提升家长自身水平素质的课程，更提供本州教育方面较为全面的资源信息。

大众传媒机构同样是宣传“家长教育”的重要阵地。除去系统的项目服务，一些零散的、个人的服务指导同样也受美国人欢迎。这些零散的、个人的服务指导往往通过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等大众传媒机构实现。如，1984年 Samuel Whittelsey 创办的《母亲杂志(Mother's Magazine)》，帮助母亲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潜力，1946年美国儿科医生 Benjamin Spock 撰写的书——《婴儿和儿童保育常识书(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出版，彻底改变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的育儿方法。

2. 客体选择：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普适对象和特定对象

美国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的服务客体指受服务者，根据上文对项目类型的两种分类讨论美国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的服务对象。

一是普适类项目服务对象。基于公共卫生服务部的视角，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家长教育”项目属于一级预防活动，目的是防止儿童发育迟缓或威胁儿童健康的情况发生，或促进家

庭最佳状态。因此，此类项目向美国所有家庭开放，能为大多数群体提供服务。而在普适类的项目中，婴儿和学龄前家庭为重点服务群体(Marc H.Bornstein,2015)。

二是特定类项目服务对象。有特定目标群体的“家长教育”项目属于早期干预活动，目的是帮助有发育迟缓或有发育迟缓风险的儿童脱离他们当前面临的“风险”。虽然此类项目偶尔也含有向所有家庭开放的指导，但其主要对特殊家庭开放，特定对象包括以下 5 类：

2.1 存在虐待和忽视儿童风险，或已出现相应行为的家庭

虐待和忽视儿童是美国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美国消除虐待和忽视儿童国家基金会(the National Foundation to End Child Abuse and Neglect)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65%的西班牙裔，60%的非洲裔美国人，56%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和 54%的亚洲人表示其所在社区存在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Research! America,2018)。家庭教育服务机构为制止虐待儿童行为的核心力量，其次是州、联邦政府以及执法部门。通过医院和社区筛查确认存在虐待和忽视风险的家庭，强制其参与特定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如“育儿计划(Nurturing Parenting Program)”通过服务提高此类家庭应对技能，改善父母养育技能，促进亲子互动，促进儿童的最佳发展，从而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

2.2 低收入、低学历家庭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其育儿行为，其育人行为又与孩子的行为、社会情感表现以及能力相关。研究表明母亲受教育水平低于儿童游戏行为受损、轻度智力低下、认知和交际能差等发育不良的部分指标密切相关(Fewell,R.R.,Casal,S.G.,Glick,M.P.,Wheeden,C.A.,and Spiker,D.,1996)。“家庭收入一直被认为是认知和语言/语言发展等领域儿童早期发展的正相关因素”(Duncan,G.J.,Yeung,W.J.,Brooks-Gunn J. Smith J.R., 1998, p. 407)，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反应、发声、语言互动和早期识字等方面的能力低于中等收入家庭儿童(Oller,D.K.,Eilers,R.E.,Steffens,M.L.,and Lynch, M.P., 1994)。一些家长教育项目通过提高干预措施，改善此类家庭照顾者的教养行为，以满足儿童在情感、健康、营养和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减轻因贫困带来的发育迟缓风险以及后果，如“抢先计划(Head Start)”、“家庭扫盲项目(Even Start Family Literacy Programs)”。

2.3 出现青少年犯罪、暴力行为，或存在相应风险的家庭

家庭环境是青少年出现犯罪、暴力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有部分项目则针对此类问题，其服务指导的对象包括家长和青少年，为父母提供合适的纪律技巧，提高父母解决家庭冲突问题、自我控制的能力；为不遵守规则的儿童和年轻人设定明确和一致的限制。比如，“爱与极限育儿(Parenting with Love and Limit)”，首先指导父母和青少年在团体治疗中学习特定的技能，然后双方在家庭治疗中会面，进行角色扮演并练习这些新技能(Youth, 2021)。

2.4 存在残障儿童或行为障碍儿童的家庭

美国《残疾人教育法》的 C 部分被称为“早期干预计划”，“其规定各州为残疾儿童提供教育和治疗服务” (Bailey,D.B.,Hebbeler,K.,Scarborough,A.,Spiker,D.,& Malik,S., 2004, p. 887)。向残疾婴幼儿家庭提供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 care, 简称 FFC)模式的服务是早期干预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 FFC 模式包含了家长教育这一服务(Nicole M.Tomasello,Amy R.Manning & Catherine N,2010), 通过支持小组、个人咨询、教育信息和指导, 给患有发育性残疾青年或具有行为障碍(如多动症、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服务。

2.5 青春期母亲

青春期母亲指在 15-19 岁之间分娩的青少年。而青春期母亲分娩的婴幼儿出现出生体重过低、增加健康问题、遭受虐待和忽视、生活在贫困中和学校成绩差等问题的风险更大(GAO/HEHS-99-4, 1998)。面对此类群体, 家长教育项目通过向青春期母亲提供高中课程、职业技能、养育技能、人际关系和计划生育技能的教学, 帮助她们完成养育任务, 促进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和发展, 帮助青春期母亲获得高中文凭。这些项目大多数发生在普通学校或为新父母和准父母准备的专门学校进行(Marc H.Bornstein,2015,p.403)。

3. 运行系统: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指导实践和网络支持

3.1 多重路径与多元内容: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指导实践

3.1.1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多重路径

美国家长教育通过专项课程、杂志书籍、媒体节目、其他活动等路径开展指导服务。首先, 专项课程是开展家长教育的主要路径, 以线下课程和网络课程等两种形式开展。其中, 线下课程共有三种教学模式, 一是 1 对 1 教学模式, 家庭教育指导师以家庭访问的形式上门开展课程培训, 适用于儿童年龄较小的家庭, 如“健康家庭蒙哥马利(Healthy Families Montgomery)”项目仅为 0-3 岁家庭提供家访服务, 在家访中适用“成长中的好孩子(Growing Great Kids)”课程帮助父母减轻压力。在教学前, 家庭教育指导师还会依据本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文化程度、儿童的认知和情感特点等各方面因素与家庭共同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 二是小组教学模式, 以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多名左右家长的比例开展(一般不会超过 15 名), 如“育儿计划”就是以 1: 10 的比例开展小组教学(Nurturing Parenting, 2021)。小组学习可以使父母从其他家庭带来的问题中汲取经验, 多元文化团体也扩大了父母的文化多样性, 并且让父母有机会在没有孩子干扰的情况下参与学习; 三是 1 对 1 与小组结合的教学模式, 两种模

式共同进行既保证家长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以及不会被孩子打扰的学习，还可以确保在小组会议中展示的知识和技能在其家庭中得到实践和利用。

网络课程是专项课程的基本形式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它成为了最常用的指导形式。目前，部分项目只开展网络课程，如“家长鼓励计划 (Parent Encouragement Program)”、“三重 P-正面育儿计划 (The Triple P -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网络课程包括云课堂和在线课堂，以“家长鼓励计划”为例，其采用云课堂与在线课堂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学习步骤为：家长自主观看视频学习技能→在家练习技能→观看课堂提供的主题性育儿文章→与指导师在线课堂讨论。

其次，杂志书籍是开展家长教育的重要路径，育儿教育杂志书籍的出现十分重要，一方面其扩大了家长教育的实施空间；另一方面它的存在本身证明了美国人们对一战后儿童科学研究日常用途的非凡信念，缺少这种信念美国儿童发展运动无法产生 (Steven Schlossman, 1985)。它的出现意味着人们不用去看晦涩难懂且内容较多的儿童心理学等专业书籍也可以获得育儿知识，如塞尔玛·弗雷伯格的《魔法岁月 (1959) (Magic years 1959)》将一些重要和复杂的专业知识巧妙地呈现给非专业的父母阅读，帮助家长了解 0~6 岁孩子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以及管教的必要性。育儿教育杂志或书籍大多数是由相关领域 (心理、医学、营养学) 的专家或研究者撰写，在不同的板块有不同的专业团队把关。如曾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被誉为美国最受欢迎咨询杂志《父母, (Parents,)》聘请儿科、心理健康和行为、环境卫生、紧急医疗和安全、儿童睡眠、皮肤科、牙科、社会公平等领域的专业顾问，顾问委员会知识涵盖了现代家庭教育的各个方面，可为读者提供可信的最新建议。一些协会或者项目机构也出版了许多 1 育儿指南，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操作性。

再次，媒体节目是开展家长教育的数字化路径。美国有许多的育儿电视节目、育儿电台、和育儿短片。人们可以选择不计其数的手册，书籍和详细指南来帮助他们学习正确的育儿技巧，也可以通过组织机构的课程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但相比与前两种途径，媒体节目路径具备可视化、日常化和生活化的优势。

最后，其他活动是开展家长教育的辅助路径。其他活动包括研讨会、团体交流活动、亲子互动活动等等，通常为项目机构或者社区机构，旨在活动中推进家庭与家庭之间相互交流，分享各自的育儿经验。通过加强家—家联系，推动家—社共同进步。如 PAT 要求参加项目的家庭每年至少参加同一小组的团体活动 12 次，以及提供 250 多项亲子互动，指导师基于家庭需要和教育目标建议互动活动。

3.1.2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多元内容

指导内容是美国家长教育的核心，可将指导内容归纳为 7 大类：

一是基本养育知识与技巧，如了解健康怀孕与适当营养之间的关系、抚触和婴儿按摩的重要性，学会喂养、尿布使用、洗澡等技巧，为怀孕的母亲或年轻的父母提供。

二是健康与安全类，促使家长习得医疗保健技能和家庭安全技能，医疗保健知识促使父母识别儿童的疾病和伤痛以及何时该采取何种行动(在家照顾或就医)，家庭安全知识帮助家长识别和消除常见的家庭环境危害。

三是亲子互动类，目的减少父母负面的外部行为，增加家庭的社交技能和合作能力，改善亲子依恋关系，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牢固、健康和积极的关系。比如开展“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学会鼓励与赞美”、“如何无意地劝阻和制止孩子”“如何解决亲子冲突”等主题课程。

四是儿童发展类，涉及儿童身体和运动能力的发展，目的是帮助父母了解儿童身体和运动能力发展过程及下一步，防止儿童发育迟缓或威胁健康的情况发生。如《今日的育儿指南(TODAY's Parenting Guides)》(Today, 2021)，以年级分类提供幼儿从学龄前到高中的身体发展技巧，以减少危及儿童日后发育问题的发生。

五是儿童情绪管理与社交类，目的是帮助家长了解儿童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发展规律，使家长了解应如何帮助孩子控制情绪、学会尊重以及如何与他人相处和解决问题。比如开展“学习应对压力和愤怒的积极方法”、“尊重他人的沟通”等主题课程。

六是家庭管理类，目的是帮助家长通过家庭规则和奖励来建立良好的家庭纪律，以替代家长大吼大叫、暴力的教养方式。比如“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开设以“创建家庭规则”为主题的课程，帮助家长了解创建家庭规则的步骤和方法，促使家庭成员遵守规则并在家庭生活中保持纪律，形成积极的家庭氛围(CDC, 2021)。

七是其他类，如解决母体抑郁、如何避免家庭暴力、识别与拒绝毒品、拒绝欺凌与骚扰等敏感内容，此类内容针对特定项目开放。

3.2 组织网络：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网络支持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多且散，随着家长教育的发展，家长教育工作者们共同认为组织的独立发展无法满足该领域的一些紧迫需求(如专业发展问题、缺少领域领导者问题、资源难获取问题、跨学科和跨地区指导师的网络与交流问题、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专业身份问题等)，不利于家长教育的长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建立了一些全国性的联合组织，联合组织通过收集和传播有关知识库、项目、从业者和其他资源的信息，将全国参与育儿教育的人和该领域的现有资源相互联系起来，并促进机构与机构、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合作，在专业人士、决策者、媒体和公众的家长教育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形成一个强大且紧密的组织网络。

如国家育儿教育网络(National Parenting Education Network, 简称 NPEN), 一个全国领导性的独立组织, 与全国 48 个州的 172 个与家长教育有关的现有组织紧密合作, 目标是通过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解决指导师跨学科和跨地区问题、促进指导师与组织机构的联系, 为美国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所需的信息、资源和支持(NPEN,2021); 类似的还有家长信息和资源中心(Center for Parent Information&Resources, 简称 CPIR), 它并非一个独立组织, 但它将美国近 100 个服务于残疾儿童家庭的家长培训和信息中心(Parent Training and Information Centers, 简称 PTI)和社区家长资源中心(Community Parent Resource Centers, 简称 CPRC)联合, 形成一个组织网络, 其协调整个组织网络的家长教育工作, 组织各中心的资源互换、提供各中心的的活动信息、并为组织网络的员工设计调查项目和专业知识的数据库, 保证了家长教育运行系统的高质量运作。

4. 支撑体系: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政策支撑与人才支撑

4.1 资金与技术: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政策支撑

在美国, 没有为“家长教育”制定独立的政策, 但其会出现在卫生、教育、儿童福利以及家庭和青年部门出台的有关政策或倡议中。如 1994 年克林顿政府推出《美国 2000 年教育目标法(goal 2000)》将家长教育和支持计划纳入其中。一般来说, 政府提供支助框架和预算, 但执行的责任在于地方政府或市政当局。而在该法案中执行家长教育和支持政策的责任主体为服务提供者, 联邦政府部门仅是为家长教育项目的运作提供了机会, 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提供支持, 但并不负责执行政策(Boaz Shulruf & Claire O’Loughlin& Hilary Tolley, 2009, p. 527), 该法案 sec. 401 指出“教育部负责在每个财政年度向非营利组织或与当地教育机构联合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用来建立家长信息和资源中心”、sec. 404 指出“教育部通过拨款或合同提供技术援助, 以建立、发展和协调家长培训、信息和支持计划以及家长信息和资源中心。(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1)”根据美国教育部 2021 财年预算汇总表统计, 在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均教育部投入 2740 万美元资助 65 个持续家长培训和信息中心(PTIs)、29 个新的社区家长资源中心(CPRCs)和 5 个持续技术援助中心(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1), 支持中心为家长提供培训和资源信息。

4.2 家庭教育指导师: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人才支撑

随着美国家长教育的日益兴起, 人们对于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需求日益增加。而早期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往往由志愿者、有过被指导经验的父母担任, 缺少专业性和权威性, 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为提高指导服务水平, 真正帮助到每一个家庭,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职业家庭教育指导师(又称家长教育者)应时而生。之后, 该职业在密苏里州教育部试行的 PAT 项目的

推动下迅速发展，一方面，PAT 项目的影响范围大，项目建议美国教育相关部门聘请家庭指导师对本单位员工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提供指导(袁淑英, 2009)，为这一新职业的传播与推广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培训家庭教育指导师是支持 PAT 项目实施的重要支撑，通过基础培训和专业培训帮助家庭教育指导师顺利通过 PAT 国家中心的专业考试取得资格认定，促进家庭教育指导师的正规化、专业化发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被提出到今天，在美联邦和各州政府的重视、各相关项目的推动下，家庭教育指导师无论是在申请、培训还是资格认证都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机制，如：

拥有正规的认定和培养机构。由正规的机构进行培训与认定，通常是各州政府设立的家庭教育协会、家庭教育中心，或是有政府授权、公信力强的民办培训机构(如 PAT)，在得到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后才得以上岗。并且对申请资格证者也设置了一定的条件限制，认证机构在培训、考试和资格认定方面也有着正规流程和严格规定。

设立门槛提高人才队伍质量。可颁发相关从业证书的机构对家庭教育指导师申请者设定了前提条件，必须达到一定学历以及拥有相关实践经验才符合申请资格。如 2006 年 NCFR 规定申请职业者资格者在学历方面必须获得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在专业方面如就读专业属于家庭教育或儿童教育领域则需 2 年以上家庭教育实践经验，如就读专业非以上两个领域则需 5 年以上实践经验(Betty • cooke,2006,788)。

建立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想要获得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职业资格证书，必须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认证单位会考核申请者在教育学、心理学、护理学以及与家庭教育、家庭关系相关的知识。这是大致一个考核方向，因为美国各州“教育自治”的原因，各州会依据本州实际情况规定具体的专业知识、专业素质要求。除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以外，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规划技巧也是家庭教育指导师必备技能，指导师需要运用听和说技巧，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为父母提供咨询，制定合理的工作时间表和分析问题。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师已走上规范化和专业化道路，其对申请者资格的限定、培训的内容、资格认证的方式和流程都为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能够为美国的家庭指导服务提供足够且质量较高的专业人才。

结语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服务项目为载体、组织机构为引导平台为指导主体，通过专项课程、杂志书籍、媒体节目、其他活动等四重路径为美国的普通家庭以及特殊家庭提供基本养育知识与技巧、健康与安全、亲子互动、儿童发展、儿童情绪管理与社交、家庭管理、其它

等七方面的育儿知识和技巧。组织网络保证了美国家长教育运行系统的高质量运作。而政策对资金与技术的支持和高质量家庭教育指导师资队伍建设构成支撑体系。

总之，虽然国情不同，比如，美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责任主体为服务提供者，但在我国想要规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必要依靠政府主导。但美国的家庭教育体系在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的多元性和针对性、服务路径的多样性和可操作性、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支持，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仍具有值得我们借鉴参考的经验。

参考文献

- 李云霞 (2020). 河南农村中小学生家庭教育现状调查. *当代家庭教育*, 1(36), 5-6
- 张晓东 (2019). 上海市家庭教育现状、困惑与指导需求情况调查报告. *现代教学*, 1(S1), 70-71
- 王维英, 冯晟 (2020). 社区居民家庭教育服务需求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河北农机*, 1(09), 106+122
- 袁淑英 (2015). 美国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和指导师的主要职责. *教育探索*, 1(03), 146-150
- 袁淑英 (2009). *美国家庭教育指导师研究*. 硕士. 开封: 河南大学
- Bailey, D. B., Hebbeler, K., Scarborough, A., Spiker, D., & Malik, S. (2004). First experiences with early intervention: A national perspective. *Pediatrics*, 113(4), 887-896
- Betty, C., (2006). Competencies of a Parent Educator : What Does a Parent Educator Need TO Know and DO?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 85(5), 785-802
- Boaz, S., Claire, O. L., & Hilary, T. (2009).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support polic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1(05), 526-532
- Brim, O. G. Jr. (1965). *Education for child rearing*. New York: Free Press
- Chil, D. (2019). *Parent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families and prevent child maltrea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hildren's Bureau
- Duncan, G. J., Yeung, W. J., Brooks-Gunn, J., and Smith, J. R. (1998). How much does childhood poverty affect the life chances of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3), 406-423
- Fewell, R.R., Casal, S. G., Glick, M.P., Wheeden, C.A., & Spiker, D. (1996). Maternal education and maternal responsiveness as predictors of play competence in low-birth-weight premature infants: A preliminary report.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17(2), 100-104
- Gao, H., (1998). *Teen pregnancy: State and federal efforts to implement prevention programs and measure their effectivenes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 James W. Croake, Kenneth E. Glover. (1997). A History and Evaluation of Parent Education. *The Family Coordinator*, 26(02), 151-158
- Marc, H. & Bornstein, A. (2022). *Handbook of Parenting Volume 4: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Nicole, M., Tomasello, A. Manning, R., & Catherine N. (2010). Family Centere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3(2), 163-172
- Oller, D. K., Eilers, R.E., Steffens, M. L., and Lynch, M.P., (1994). Speech-like vocalizations in infancy: An evaluation of potential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1(1), 33–58
- Sheppard, P. (2021). *Healthy Families Montgome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heppardpratt.org/care-finder/healthy-families-montgomery/>
- Steven, S. (1985).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Vol. 50, No. 4/5, History and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1). Goal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 Retrieved April 26, 2021. from <https://www2.ed.gov/legislation/GOALS2000/TheAct/index.html>
-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21). Fiscal Year 2021 Budget Summar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2.ed.gov/about/overview/budget/budget21/summary/21summary.pdf>, 202-04-12
- Youth, J., (2021). *Parenting with Love and Limits*. Retrieved on April 21, 2021. from [https://youth.gov/content/parenting-love-and-limits%C2%AE,](https://youth.gov/content/parenting-love-and-limits%C2%AE)

生命化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安全教育的路径优化**PATH OPTIMIZATION OF KINDERGARTEN SAFETY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DUCATION**刘佩^{1*}Pei liu^{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397185996@qq.com.

摘要: 基于生命化教育的视角, 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应遵循幼儿的生命特性, 培养幼儿生存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激发幼儿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实现生命的兴趣。幼儿园安全教育应是一个具有生活性和整合性、趣味性和潜在性、启蒙性和规律性为一体且充满生命活力的活动。现今的幼儿园安全教育存在重保护轻教育、重知识轻实践、重校园轻联合的问题, 促使安全教育未能充分体现生命化教育。幼儿园要以生命性为基点, 重视安全教育, 要以幼儿为主体, 注重参与实践, 要建立校内外联合点, 协调教育力量, 为幼儿整合各方资源, 使幼儿在实践中感知生命发展的多样性。

关键词: 生命, 生命化教育, 幼儿园, 安全教育。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ducation, kindergarten safety education activities should follow children's life characteristics, cultivate children's ability of survival and self-protection, and stimulate children's interest to understand life, respect life and realize life. Kindergarten safety education should be an activity full of life and vitality, with life and integration, interest and potential, enlightenment and regularity.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afety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has the problems of emphasizing protection over education, emphasizing knowledge over practice, and emphasizing campus over cooperation, which makes safety education fail to fully reflect life-oriented education. Kindergartens should take life as the basis, attach importance to safety education, focus on children as the main body, pay attention to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e, establish joint poin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coordinate educational forces, integrate resources for children, and make young children perceive the diversity of life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Keywords: Life, Life-Oriented Education, Kindergarten, Safety Education.

引言

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幼儿园安全教育，是幼儿园以及园内教职工通过一系列符合生命特性、生命需求的教育活动，培育幼儿的生存本能和自我爱护能力，完善幼儿生命的发展和提升幼儿生命品质的教育(王艳，2016)。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条例中清晰提出“学校要健全安全教育机制，把确保权利、尊重差异、尊重生命的基本认识和基本安全知识潜移默化地根植在学生心中”。2016年新修订的《幼儿园工作规程》在第五章安全教育中明确提出应将安全教育纳入到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当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幼儿的自我安全意识、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衣宛霞基于生态视角下，了解到不同人口变量学下幼儿园安全教育存在的差异以及幼儿园安全教育的生态现状，提出了加强多方联系、提升教师反思能力、树立科学安全教育观以及构建多元化教育的建议(衣宛霞，2016)；孙艳对大班幼儿的安全教育现状做了分析，总结出大班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要提高保教人员的安全教育知识、遵循大班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完善幼儿园安全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和利用国内外安全教育资源的建议(孙艳，2018)；从以往研究可知目前的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中存在忽视安全行为的实践，忽视生命重要性的情感体验，忽视家校社会的多方合作等问题，以致幼儿园生命化教育视野下的安全教育质量停滞不前，因此需要从生命化教育视野出发深入探讨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美国杰·康纳·华特士最早提出生命教育，阐述生命教育是一种直观体验，每个人在生活中努力追寻蕴涵在生命教育中的原则(黄渊基,2014)。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安全教育的最重要的要义准则就是要培养对生命的珍视，把对幼儿的信赖、理解、成全、关爱，在具体的教育实际活动过程中表示出来(张文质,2006)。生命化强调我们从人的生命本真出发，如今生命化视野下安全教育已不能再停留在呼吁与倡导中，而是落实幼儿园组织安全教育活动时要遵循的理念。基于生命化教育视野下探讨安全教育主要目的是为幼儿建立一种以生命性为基点、幼儿为主体、校内外建立联合点的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

1. 生命化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安全教育的意义

1.1 安全教育是幼儿了解生命，保护生命的基础

生命化教育视角是以个体的生命为主体，提倡唤醒纯自然生命、呵护社会生命、提升精神生命并促进三者之间协同发展的教育。从生命出发，促使幼儿认识生命、热爱生命、保护生命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主要教育目的(江禹禹,吴吉惠,2019)。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实行）》条例中明确提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开展工作的首位”。幼儿生命安全是幼儿园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而身体是进行活动的物质前提，每一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在和自己的身体打交道，但这并不表示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充分的认识(季卫, 2010)，如牙齿为何会掉落、心脏为何会跳动等问题，孩子并不清楚，且孩子在不经意的时刻可能会去思考“我从哪里来的？”“什么叫死？”等问题。这时教师基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情感接受水平，采取游戏化、情景化和艺术性的活动，如“会动的牙齿”、“我的心脏”等多样化的主题活动可以帮助幼儿感知自己身体各器官的作用，让幼儿充分发现身体的美；还有如角色扮演游戏“我来当妈妈”，整合教育活动“我家的豆豆”等让孩子亲身经历一个妈妈怀孕、生产与养育我们的艰辛，感知植物的发芽、生长与凋零，知道我们的生命来之不易，是父母精心呵护下才存在的，且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便无法再次得到生命，从而使幼儿科学地认识生命，学会主动珍爱生命和保护生命。

1.2 安全教育是幼儿关爱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关键

幼儿园教育要以幼儿为本，让幼儿从小建立科学的生命观点。2006年教育部、公安部等颁布《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特意指明学校应当遵循国家课程规范和课程要求，将安全教育归入教学内容，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爱护能力。生命化教育视野下的安全教育是幼儿在一日生活中掌握了生命安全知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而安全教育活动质量的好坏是在组织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和结果上体现的，教育活动中教师会将生命化教育理念融入在教学实施中，可以让幼儿在实践活动中通过体验学习，感受交流、分享、合作的乐趣，掌握如何处理不良情绪的方法，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从而提高生命质量。教育是一种通过人的生命生长，直接面对人的生命、为了其生命品质的进步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关注生命生长的质量，重视生命发展完整性的教育，就是促成生命完好、和谐发展的教育，它蕴含着客观生命的教育、社会生命的教育和精神生命的教育（冯建军，2006）。人是客观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体，需通过教育才可实现三者的融合，学前教育是教育基础之基础，而安全教育是提升生命教育、生命质量的基础之基础。

1.3 安全教育是幼儿润泽生命，全面发展的重点

在安全教育中保护和润泽幼儿的生命，应该包括对自己的、对他人的，乃至对动物和世间万物的生命生长充满敬畏与热爱(王小英, 2008)。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爱是教育的直接动力，爱会将个体生命提升到真实存在的境界，为了实现人的最大潜力，爱只会在相同的水准上与其他的爱相遇（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1991），因此教师要用爱、信任、尊重和理解促进幼儿生命自由生长，尊重幼儿发展的前提，要与幼儿建立信任感，用心倾听幼儿，蹲下来与幼儿进行沟通（卡尔·罗杰斯著，石孟磊译，2018），如在幼儿相处的规定时间段教

师穿相同的衣服，每周固定时间都带幼儿进行安全教育活动，谈话时蹲下来与幼儿进行眼神交流，用双手拥抱和轻轻抚摸等行为来降低师幼之间的心理距离。幼儿的全面发展首先教师要具有正确的观念，幼儿是人，不是小大人，是处于人生长发展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儿童的身体、生理、认知、情绪情感和社会性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成长，教师要提供充沛的时间和空间让幼儿去实践和感触。其次幼儿园教师在幼儿全面和谐发展上一定程度上包括对个体生命发展的自主选择，即个体的个人爱好、情绪情感、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季卫, 2010)，安全教育集体活动中让幼儿自主进行上厕所、喝水、擤鼻涕，游戏活动时让幼儿在不听取规则时耐心询问幼儿的真实想法，区域活动时鼓励幼儿在基于自己的兴趣时多尝试其他区域活动等。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会充满生命关怀的气息，教师会在理解和尊重生命的前提下，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内在本质，呵护幼儿生命尊严，点化和润泽幼儿的生命，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2. 生命化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安全教育的特征

基于生命化教育视角，安全教育是促进幼儿生命意识的一个重要教育载体，以及必不可少的教育进程，而生命化教育需遵循的是要以生命为基点，把生命的实质、特征和需求体现在安全教育活动中，主要包括教育要以生命为教育的基点，直接面对每一个生命；尊重生命的共性，直接落实在生命过程中(冯建军, 2006)。叶平枝教授指出幼儿园应当当前时代需要开展情感教育、生命健康教育，尊重多样化教育等的相关课程，幼儿园一日活动过程包括区域活动、盥洗环节、游戏活动、进餐环节、集体教育活动和户外活动等，各种类型的活动都具有趣味性、基础性、生活性、启蒙性、潜在性等核心特征，因为这样才可以让幼儿在人生发展的起始阶段，通过与自然、他人、社会交往接触，认识生命、认识世界，进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从生命化教育视野下的幼儿园安全教育也应是一个生活性与整合性、趣味性与潜在性以及启蒙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多样化教育活动过程。

2.1 幼儿园安全教育是生活性与整合性的统一

2012年教育部颁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的学习特点以实际操作所获得的经验为基础，主要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活动中学习。因此组织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要求教育内容来源于生活，活动实施基于日常生活，教育要高于生活，且回归于生活，要在基于生命化视野下，将安全教育与幼儿的每日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生活本身蕴含的教育价值(虞永平, 2015)。如中班安全教育活动中安全用筷子、交通标志、会咬人的电、班级里的小药盒等活动的设计，都是基于幼儿日常的直接生活经验，通过集体安全教育活动将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提升，使其系统化学习，再帮助幼儿在生活中用科学的方式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更好地生活。在整合性上，伯恩斯坦通过社会学研究视角和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在反思传统

课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课程理论(莫云娟,任捷,2018),对我国幼儿园教学活动课程有一定的影响,于是我国幼儿园课程经历了从强调分科课程、五大领域活动到现在的综合课程、整合课程多种课程类型。安全教育活动是幼儿园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活动主题的展开主体是集体教学活动,但在生活活动、游戏活动、户外活动和随机教育中的活动延伸也是很重要的。而生命化教育视野是现代教育主题,认识生命、尊重生命、实现生命是时代发展之需要,安全教育活动以坚持生命第一的指导思想,遵循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基本理念,具有生活性和整合性的特点。

2.2 幼儿园安全教育是趣味性与潜在性的结合

幼儿园组织和开展相关集体教学活动时,要注重调动儿童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当幼儿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得到有效调动时,幼儿才会成为学习的主人,成为学习的主体(朱家雄,2011)。《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游戏是幼儿有效的学习方式,是进行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实行)》也指出游戏为幼儿园教育的基本活动。因此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要多方面注重儿童的多感官参与,采取多样性的活动,让孩子在充满趣味性的游戏中理解生命的重要,学会自我保护知识。如大班安全教育活动《会说话的交通标志》,教师可以创设游戏环境,在教室画上斑马线、马路、手工制作红绿灯等,幼儿与教师进行角色扮演,幼儿一部分扮演行人,一部分扮演交警,教师扮演司机,每个人都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在真实愉快地体验中,幼儿轻松地主动构建着安全知识。在安全教育的方式上,教师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学习一些教学策略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例如创设情境、编读儿歌、讲讲小故事等,尽量选择多种教学策略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且及时更换教育方法。从人本主义心理学来看,生命化教育就是要把每一个人看作正在不断发展的个体,充分挖掘个体发展的各种潜能,以完善个体的生命价值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薛原,2011)。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来看,安全教育也有其潜力。幼儿被认为是正在发育中的个体。在教师准备的教育环境中,他们可以直接运作,巧妙地获得有利于个体性格发展和人格全面发展的教育经验。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的游戏场景设计是为了调动儿童在准备好的教育环境中的热情和主动性,具有兴趣和潜力的结合。

2.3 幼儿园安全教育是启蒙性与规律性的交融

教育与启蒙存在天然的价值联系,二者都关注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更凸显了教育启蒙意识与启蒙使命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李玉侠,肖川,2011)。在生命发展条件下,安全教育也是具有启蒙性的,因为生命需要智慧,一部分是对于外界事物的认知,另一部分是对生命整体性的感知,观察了解事物的出现、成长、衰老和死去,从而寻找生命的智慧。其中生命具有发展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既有群体特征也体现个体差异,符合身心发

展规律的教育将会较好地推动个体的发展，违背规律的发展将会适得其反（Kitamura Y, 2019）。在生命化教育视角下安全教育活动作为完整的教育活动也交融着启蒙性和规律性。幼儿园组织安全教育活动要遵循幼儿生命发展顺序、身心发展特点、课程内容设置、认知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改进和调整；而幼儿园安全教育的规律性则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实施上，在教育内容上，目前幼儿安全教育内容主要为道路交通安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灾害安全（江禹禹, 吴吉惠, 2019），生命化教育视野下应教会幼儿认识生命从生到死的过程，在教育活动实施上，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学龄前儿童处于认知发展四阶段的前运算阶段，幼儿具有表象思维能力和泛灵化，教师需要使用具体形象的事物来帮助幼儿认识外界事物。如幼儿玩具的制作、玩耍到破损就是一个通过具体形象的事物来让幼儿感知从生到死的过程。另外幼儿园生命化安全教育的启蒙性和规律性还应渗透到安全教育活动的评价和反思上，通过多角度思考生命向幼儿传播正确的生命观和安全观。

3. 生命化教育视野下幼儿园安全教育的问题

幼儿园安全教育是让幼儿充分体验生命，形成积极生命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幼儿完整发展的重要内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的背景下，将生命化的安全教育由抽象变为具体，生命化教育视野下安全教育的尊重生命、安全责任和健康关爱权等生命理论也会为新时代克服疫情提供理论指导。2021 年国家关于印发《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中提到在疫情时期，更要加强儿童重点疾病预防，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新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儿童健康评定与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国家政策文件的颁布和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凸显出人们对生命化安全教育重视程度的提升。但目前我国幼儿园生命化安全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体现在安全教育中的生命化特征不明显，忽视了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主动构建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重保护轻教育，忽视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安全教育，一方面是要为幼儿提供安全的活动环境，另一方面是要唤醒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促使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下具有积极主动学习安全知识的机能，从而通过自身获得安全，而不是在他人保护下收获安全（杨恩慧，2021）。为此我们需要为幼儿建设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轻松愉悦的氛围，有挑战的教育内容的课堂。然而由于一些幼儿园缺乏相关机制支持，安全教育资源匮乏、安全设备器材存在隐患，目前的安全教育活动存在重保护轻教育，忽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的现象。首先出于保护幼儿身心，幼儿园存在区域活动场所、教室、户外游戏活动场所，但安全教育活动场所单一，多在教室内进行，幼儿缺乏多感官和多场地学习，如严格按照幼儿园规定的活动时间和固定场地，如户外安全教育活动设计是在

户外草地中进行，当教师看到草地有些微湿润后，便拒绝到室外进行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出于便利，教育内容固化，多采用教材所设计内容进行，缺乏生命化安全教育主题活动的设计，如小班安全教育内容分为：《小心被烫伤》、《我会过马路》、《着火了怎么办》、《不要陌生人的东西》、《交通规则我知道》等。这些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设计有效地减少了幼儿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幼儿与自然生命之间的接触，剥夺了幼儿了解自身和外界事物的权利，也忽视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

幼儿园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幼儿的生命安全，但幼儿的身心安全不可通过过度的束缚来实现（孙妮妮，2016）。生命教育是安全教育的基础，是幼儿园教育的首要任务，实用的安全教育是儿童应该在自然环境中识别、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危险，磕碰、摩擦和摔倒都是成长阶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过程中幼儿也会培养其自我保护能力和内在自我调试能力。

3.2 重知识轻实践，忽视幼儿的主动构建能力

幼儿园安全教育是具有知识性和实践性的集体教育活动。知识性体现在幼儿园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课程中，而实用性体现在儿童与自然环境、儿童与事物、儿童等学科的相互接触中，体现在获取自我保护知识，形成安全意识，发展安全行为的实践互动中。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安全教育活动需要兼顾知识性和实践性。钟小燕、石岩等学者在考察中得知教师的教育理念传承着国家和社会对新时代青年的培养理想，担任着“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责任，从而教师认为对幼儿灌输知识是合乎常理的（石岩，钟小燕，2015），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也存在重知识教育而忽视实践教育。首先表现在教师专业素养上，在安全教育活动中，教师易于标识自己的权威性。第一，在教育效果的影响下，教师只有孩子是否掌握了知识，才使自己的教学具有成就感，传统的强制性、灌输安全教育方法，才会使孩子的主观主动性和内部需求容易被忽视（孙妮妮，2016），教师对幼儿身体伤害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着教师对于伤害预防行为的实践程度（Kelly B, McCarthy PL, Sein C）。第二，父母也深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易量化的知识评价往往成为家长评价教师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这也促使教师关注孩子的知识水平，忽视孩子情绪态度的发展和实践操作的体验（黄豪，范超，2017）；其次是对幼儿的认知上，幼儿表象思维能力表明他们对填鸭式知识性学习的逆反心理，而教师多采用说教形式的教学方式，如围绕教材和图片进行讲解，完全不符合幼儿的表象思维发展和完整生命发展的需求。最后实践性的缺失表现在安全教育制度上，主要是教师培训内容的缺失，生命化视野下的安全教育涉及不同的知识有生物、健康、心理、交通等，幼儿教师的职前、职中和职后培训中总有部分内容缺失，故教师自身安全教育技能的缺失，就无法教给幼儿正确的安全操作行为。

这种重知识轻实践的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现状不仅不利于幼儿培养自我保护能力，这

也不利于帮助儿童建立一个积极的生活观，以及促进儿童的生活潜力。幼儿天性生动活泼，因此教育活动设计要动静结合，让幼儿在实践中不仅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更能珍视到生命安全的重要性。

3.3 重校园轻联合，忽视家校、社区合作效果

生命化视角下的安全教育活动是成功实现是幼儿园、家长和社区多方协作的成果。影响儿童安全教育的重要因素是父母的积极参与、父母的安全知识和某些安全措施改进，从而积极预防事故的发生（YoonSH, 2000）。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作为一种课堂教学，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这种教育活动与其“外部社会”之间存在着交换关系，这主要是外部社会对教育活动的投入，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程晓樵，刘云杉，吴永军，吴康宁，1997）。而目前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幼儿园安全教育重校园自身，轻视家校、社区合作效果。首先，表现在安全教育资源上，一方面教师开展相关活动多采用的是教育部门发行的教材或相关专家开发的校本课程等，很少有结合家庭和社区共同商讨安全教育活动内容的课程内容设置；另一方面在相关消防安全知识和交通安全知识上，幼儿园多是幼儿教师或园区内举行教学活动和讲座，并未邀请相关消防人员和交警来给幼儿做真实示范和演练；其次在家园合作上，一是家长缺乏安全教育意识和对幼儿发生的意外事故识别能力不足，认为孩子交给了幼儿园，这就是幼儿园需要负责的事情；二是家校之间沟通不到位，一些幼儿园关于安全教育知识仅是通过家长会亦或口头阐述，家长们易轻视幼儿园所言，于是家长不了解安全教育的内容以及具体做法，也不清楚自身在幼儿安全教育上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尊重幼儿的安全教育发展是没有错误的，但在坚持生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幼儿园应该建立幼儿园安全合作的三位一体的管理和教育体系，以幼儿园为主导，社区作为辅助和家庭为根本。

4. 生命化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安全教育的优化

4.1 生命性为基点，重视安全教育

把生命作为教育的中心，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润泽生命，为生命的点化和完善创造一定的条件（黄豪，范超，2017）。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属于生命教育，一方面开展安全教育要有对自然生命的存在有敬畏意识，另一方面要让幼儿对自我生命存在进行关注和有敬畏之心（童静，金超，2015）。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安全教育要遵从幼儿的生命特征，遵从生命的整体性、主体性、自然性和弘扬生命的个性，幼儿获得基本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最终回归到对自我生命的关注。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要去重保护轻教育的教育现状，要以生命性为基点，遵从幼儿生长的自然规律，重视幼儿园安全教育和幼儿的自主保护能力。

首先在生命化视野下教育者组织安全教育要树立正确的生命教育观，如教师自身要有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要有积极的情绪和对成长的渴求，只有教师自身珍爱生命、热爱生活、喜欢思考，这样才能使教师自身所教的内容充满生命的活力，使幼儿的学习过程充满欢乐。其次安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儿童懂得珍惜生命，对基本安全保障知识和相应的自护、自救方法有积极学习的兴趣，从而学会保护自己（冯建军，2007）。如大班安全主题活动中的《我很爱干净》，让幼儿通过视频观察自己所熟知同伴的良好习惯，知道健康的生活习惯可以使自己有美好的生活，也会带来愉悦的心情，因此会更珍爱生命的每一天，体现了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情感体验。最后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要尊重幼儿的生命特性，研究和洞察儿童的天性，使教育能够与幼儿生命发展的节拍相契合，借助他们的生长特征，渗透生命全程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发展与升华幼儿的生命性。如在区角活动时专门开设植物角，让幼儿参与种植和养殖，在与自然接触和亲身经历中充分感知生命的存在和生命形态的多样化，且不管任何生命都要经过从生到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要珍惜生命，但死去不代表就消失不见，还可以以另一种姿态去影响另一个生命。与传统的教师高控知识为主的幼儿园教育活动相比，目前以尊重生命生长性、整合性、主体性和弘扬个性化的教育活动更能支持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创新思维，满足幼儿个性化和社会化的成长需要。

4.2 幼儿为主体，注重参与实践

教育是主体间的指导学习，即教育实践主体指导受教育学习主体的一种指导性学习活动，活动目标达成要求教师和幼儿之间平等对话、交往与理解，教师要把幼儿看做有独立人格的人（郝文武，2006），而 3-6 岁幼儿处于直接行动思维，这种思维阶段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离不开思维的对象，即具体存在的事物，凭空不能想象；另一个是离不开具体实操的行为动作（白鹭，2009）。因而在开展安全教育活动要最大程度上去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为主，鼓励和支持幼儿的接触式和操作式的学习方式，提升教育过程的可操作性和可体验性，从而使幼儿在安全教育活动与生命环境的双向互动中得到身心全面的发展。

首先，要重新认识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它并不是一个只在教室中进行的集体教学活动，是以幼儿为主体，需要与幼儿的一日生活进行接轨，是与幼儿园内游戏活动、生活活动、区域活动和衔接环节相互促进影响幼儿的安全行为，从而影响幼儿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态度，教师要善于随机教育，在日常抓住教育契机开展安全教育，通过合理途径使教育融入幼儿真实的生活。如大班安全教育活动《怎么保护胃》，在课堂上通过小熊吃饭的故事和相关视频，幼儿们知道了吃饭要专心、要细嚼慢咽才有助于肠胃蠕动和吸收营养，故在午餐等待环节教师便可利用小熊吃饭故事再次提醒幼儿吃饭不说话，要专心。其次为提升安全教育活动的教育价值，我们还需要注重幼儿参与实践的程度，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改进教育方法入手，

倡导情景式、体验式的教育形式。如中班安全教育活动：我会过马路，教师可选定空旷的场所画好斑马线，自制红绿灯，模拟交通道路，并在活动过程中，让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扮演过马路的行人和指挥道路通行的警察等，身临其境的体验，幼儿会感受更加深刻。总之安全教育活动就是要在尊重幼儿的前提下，在教室、操场、走廊、社区等多场景和视、听、触等多感官的配合下丰富安全知识，养成保护自己 and 他人生命的意识。

4.3 校内外为联合点，协调教育力量

教育中提倡“社会是环境，学校是阵地，家庭是后方。生命化教育视角下的安全教育类似一个圆，没有从何处起，终结在何处的说法，需要幼儿园、家庭和社会三者合一才能为幼儿构筑一道生命安全屏障（童静，2012）。幼儿的生命安全经验的获得需要依赖多方联系与合作，过于重视幼儿园内部，易于造成幼儿学习的片面性，会导致幼儿从一个情景转换到另一个情景中所呈现的学习经验具有不可转移性和连续性，从而阻碍了幼儿学习的完整性，也未尊重幼儿生命的完整性。因此组织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时应避免重校园轻联合，忽视家校、社区合作效果，要建立多方合作，资源整合和环境的协作联系。

首先要重视各位家长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2016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应积极与幼儿家庭配合，协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向家长传授科学保育、教育幼儿的知识，共同承担教育幼儿的任务”。一是幼儿园要与家庭保持一致的安全教育态度，保障生命化安全教育的有效实行，如安全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目标和教育规范和教育行为幼儿园和家庭都要保持一致；二是要构建有效多元家园合作形式，丰富幼儿安全教育的内容，如幼儿园可定期举办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家长园地等活动，成立家长委员会参与幼儿园安全教育活动的开展等形式，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的安全管理制度、幼儿园游戏设施、幼儿园消防设施的安全性等。也可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如微信、电话、微博、网站等与家长进行交流沟通，使幼儿园将近期进行的相关安全教育内容与父母进行同步。其次社会是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幼儿园也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如在进行消防安全和交通安全知识时，可邀请消防工作人员给幼儿示范正确的用火用电的行为，警察工作人员示范正确的交通规则，最后有条件地可带幼儿去实地进行角色实践演练。这样的做法不仅能扩宽幼儿的安全教育知识，为幼儿创设学习的机会，也能促使幼儿在活动中获得的知识在真实的情景中得到升华和转移。

参考文献

- 白鹭. (2009). *幼儿园安全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9&filename=2009104971.nh>
- 冯建军. (2006). 论生命化教育的要义. *教育研究与实验*(05), 25-28.
- 冯建军. (2007). *生命化教育*.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黄渊基. (2014). 生命教育的缘起和演进. *求索*(08), 172-177.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4.08.071.
- 黄豪, 范超. (2017). 安全教育融入幼儿园一日生活: 要义、原则与路径.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01), 85-88+128.
- 郝文武. (2006). *教育哲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季卫. (2010). “新教育”视野中的幼儿生命教育. *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研究)*(04), 68-69.
doi:10.13694/j.cnki.ddjylt.2010.04.015.
- 金超, 童静. (2015). “三位一体”安全协作管理体制中家庭、社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江苏教育研究*(13), 59-62.
- 卡尔·罗杰斯著, 石孟磊译. (2018). *论人的成长*.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任捷, 莫云娟. (2018). 伯恩斯坦整合课程理论对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黑龙江科学*(15), 76-77.
- 孙妮妮. (2016). 生命化教育视野下幼儿园集体教育活动的现状与对策.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07), 30-33.
- 孙艳. (2018). *大班幼儿安全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802&filename=1018220788.nh>
- 童静. (2012). 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促进”——当前幼儿安全教育的策略.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12), 130+164. doi:10.16728/j.cnki.kxdz.2012.12.086.
- 王艳. (2016). 生命化教育视野下的幼儿园安全教育. *教育导刊(下半月)*(11), 57-60.
- 王小英. (2008). 教育原点的偏离与回归: 点化与润泽生命. *学前教育研究*(04), 34-37.
- 吴康宁, 程晓樵, 吴永军, 刘云杉. (1997). 课堂教学的社会学研究. *教育研究*(02), 64-71.
- 吴吉惠, 江禹禹. (2019). 生命教育视域下幼儿安全教育的实施与评价.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06), 83-86.
- 薛原. (2011). *生命化教育视野下中学体质健康教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DFD0911&filename=1011131872.nh>

肖川, 李玉侠. (2011). 生命化教育视野下的课堂教学. *衡水学院学报*(02), 105-109.

衣宛霞. (2016). *生态学视角下幼儿园安全教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02&filename=1016112317.nh>

虞永平. (2015). 课程游戏化的意义和实施路径. *早期教育(教师版)*(03), 4-7.

雅斯·贝尔斯著, 邹进译. (1991). *什么是教育*. 北京: 三联出版社.

杨恩慧. (2021). 生态学视野下幼儿园户外游戏环境的意义、特征与优化. *学前教育研究*(04), 11-18.

张文质. (2006). *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 上海: 华东师范出版社.

朱家雄. (2011). *幼儿园课程*.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2021).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的通知. Retrieved fro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1/05/content_5649019.htm.

钟小燕, 石岩. (2015). 生命视野下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渗透生命安全教育的常态化研究. *搏击(体育论坛)*(09), 7-9. doi:10.13293/j.cnki.tylt.002488.

Kitamura, Y. (2019). Safe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ducation reforms and practices. *Pediatrics*, 65(5), 118-140.

Kelly, B., Sein, C. & McCarthy, P. L., (1987). Safety education in a pediatric primary care setting. *Pediatrics*, 79(5), 818-824.

Yoon, S. H., (2000). *Korean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safety knowledge, perception, and practice*. Sookmyung Woman's University Press.

适应与超越：教师教育改革的两种逻辑阐释及其中庸辩证

**ADAPTA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E TWO 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ITS
MEAN DIALECTICS**

黄业毅^{1*}

Yeyi Huang^{1*}

¹教育科学学院，南宁师范大学

¹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771070105@qq.com

摘要：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立足现象世界”与“脱域实体世界”的双重属性。前者是对教师教育的工具理性与社会功能进行主线解释，而后者则是对教师教育的本体价值与人性向度进行图景叙述，这两种由教育存在本体衍生出关于不同问题指向的并列关系在逻辑立场、批评范畴及价值谱系上表征为“适应论”与“超越论”的语境倾向。基于此，需以“适应论”的辩护与“超越论”的辩驳作为阐释教师教育改革的脉络框架，对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与问题矛盾进行考察。在阐释两者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中庸论”的辩证视角去统整教师教育改革“适应论”与“超越论”的二元对立，旨在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廓正发展路向。

关键词：教师教育改革，适应，超越，逻辑。

Abstrac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ha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ased on the phenomenon world" and "decentralized physical world". The former is the t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rational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main line,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teacher education ontology value and human orientation, the two kinds of education ontology derived about different problems pointing to the parallel relationship in logical position, criticism category and value spectrum characterized for "adaptation" and "beyond" context tendency. Based on this, the defense of "adaptation" theory "and" transcendence theory " should be taken as the framework of explaining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oblem contradiction of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logic of the two, we should further unify the dual opposition of "adaptation theory"

and "transcendence theory" of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from the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f "mean theory", aiming to correct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teacher education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Teacher Education Reform, Adaptation, Transcendence, Logic.

引言

2018年, 中国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MOE, 2018), 在迈向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了培养什么教师、怎么样培养教师、办什么教师教育、怎么办教师教育的根本问题, 为我国教师教育的转型变革涤荡坚实基础。教师教育改革的展开逻辑是基于顶层设计的总体指导, 在遵循教育的规律基础上, 对陈旧的或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教师教育, 从上层建筑、基层探索以及生产关系作出更为科学的、深刻的、全面的调整变革。教育与经济、政治等社会实践活动的互构互织, 进而衍生教育改革在理论维度与实践层面的多重逻辑序列。改革的主体意图是政治—经济需要的从属逻辑, 行动路向则是人们以思想理论、哲学思维与逻辑推论等文化因素及其内在机理为教育改革起到指导作用的文化逻辑。教育本质在于育人的共识直接确证了这种文化逻辑作为教育改革的本真逻辑。作为驱动整体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母机”, 教师教育的改革目标必然要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相适配。

教育改革的总体逻辑及其范围框架涉及教育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定位问题。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由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机关以行政权力介入为主变量而“形塑”与“绘色”的国家体制产物, 在教育价值、理念和制度上具有鲜明的国家逻辑。教育改革的逻辑走向与实践进路是沿着特立定向型到多元开放化的格局转变, 在这一格局转变历程中因为主导价值选择的取向差异与利益角力而出现“适应”与“超越”两种论调倾向, 并且在表现形态上普遍地运用“事件化”的教育观或者历史观介入社会现实。潘懋元先生根据教育外部关系的客观规律阐明成“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适应论”(潘懋元, 1990), 鲁洁先生认为教育是“培养出能改造现存世界的人”的“超越论”(鲁洁, 1996), 杨昌勇先生则是从动态统一的视角提出: “教育、社会 and 人的发展是在适应与超越的互适和互促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双主体论”(杨昌勇, 1997)。教育命题的适应与超越之论调本质上在于探讨教育培养人的原点问题, 即教育是培养适应社会的人还是培养改造社会的人。在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体系建设从数量式发展的初级阶段到质量化发展的过渡阶段再到创新型发展的高级阶段, 必然要回答好这一培养人的原点问题。因此, 需以“适应”与“超越”的角度审视教师教育的

改革逻辑，在理清理论思路与实践样态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廓正未来的发展路向。

1. “适应”与“超越”：两种语境阐释及其意蕴

“适应”与“超越”是一组互为辩证且意义隽永的互补关系或理念取向，而非上下位的从属关系或逻辑对立。从生活用语到学术话语的语境变迁，“适应”与“超越”作为动作性语素义的本体存在及其使用价值在言内语境与言外语境两种不同的差异语境中难免因为有限的语言符号与序列组合中被赋予太多的文化属性，在文本理解中出现特定含义或多重解释。从语义通则上看，“适应”（Adaptation）是主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行为改变，包含“主动适应”与“被动适应”两种不同的状态。无论是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文地理学的“文化适应自然环境”或是教育学的“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均是“适应”对于主客体之间相互调适与融入发展的模式描述，暗含着当事主体被客观世界裹挟的前设。

“超越”一词（Transcendence）原义是西方自由派神学中描述人感觉经验之外的“超验存在”，后被衍生为存在主义用来论证“人的自我先于存在”的“最本质的存在”，深层含义在于表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能够在原有存在基础上塑造人的意义世界。作为不同语境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适应论”与“超越论”代表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等一系列同时在场与互为嵌入的术语概念，并在社会文明进程中进行理论维度与实践层面的交替论争。从价值论的角度理解，“适应论”或“超越论”如果作为教育改革的范式，必然要在一般的理念层次与复杂的制度层面中体现出它对教育改革是具有积极作用的，研究真实存在的真问题而不是进行思辨式的游戏或探讨无意义的假问题，构成教育的本体论基础。

教师教育是有用的教育，有益于培养教师教育人才，有益于盘活国民教育体系，有益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作为创造经济收益的学科专业或提升教育教学能力的职后培训。教师教育的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清晰地勾画出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与价值，既是对国家教育事业治理效能的深度检验，也是在特定时期人民对教师教育的理想诉求。改革能够指引教师教育朝着更美好的、理想的道路发展。教师教育改革在适应我国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应适当地体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取向与指引未来的发展航向（黑晓佛，2010）。即教师教育改革存在“适应论”和“超越论”的合法性基础。

受利益主体的裹挟性、评判标准的二重性、地方情景（local context）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控制性等多种权力的话语交错，教育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矢量交替过程，而非单一的线性假设或单向的标量演变。“适应论”与“超越论”的对峙与驳难、交织与嬗替、媾和与

互补对现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改革的目标徘徊振荡于这两种价值之间（杨东平&周谷平, 1997）。从单摆式往复的交替状态存在，到非此非彼的中间状态存在，再到彼此共融的辩证状态存在，被称为教育的“钟摆现象”。这种对教育变革与发展所作的哲学应答是以谁占据意识主流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公共领域，成了教育改革的“庞加莱循环”。即“适应论”与“超越论”在教育理论与实践观上的利益角力以及何者占据教师教育改革中心体制的细化与外延。教师教育改革的“适应论”与“超越论”能够成立的关键在于它能否对教师教育基本理论的结构框架进行有效解释或是在教育实践治理进程中能够对教师教育客观存在的问题与现象进行有效解决。任何理论及其“衍生丛”的本质意义在于引发人的有效行动并在实践中检验其先进性和存在的正当性，这必然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演进逻辑，而不是停留在问题表面的无休止争议或简单地套用逻辑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基于此，我们必须站在适应与超越的审视角度，从理论描述与实践经验上讲清教师教育改革的“适应论”与“超越论”，构建起与教育强国共命运、同发展、赴未来的教师教育。

2. 教师教育改革适应论：“国情决定论”的辩护

理性地审视教育改革逻辑在历史演变过程的转承启合，能够发现时代特征的变化赋予改革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而非某个思潮或能者造就教育的时代。植根政治—经济结构的“适应论”遵循“国情决定论”的逻辑主线进行合法性辩护，它认为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如果出现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坐标、社会现实与发展愿景的相互割裂，主张以一种“渐进式”实施手法推行改革。“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市场经济经济服务”“教育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服务”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因子，逐渐演变成教育学公认的命题，并被论证为决定教育其它具体规律的一条基本规律（鲁洁, 1996）。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紧围绕这一基本规律展开话语叙述，教师的培养体系、人事体系、培训体系是被“国家炼金术”洗礼的。在科层结构制的权力逻辑下，把有形的物质形态或无形的文化赅续中萃取出最为纯粹且具有意识形态的部分，剔除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边角料”。从形式化的教育法律制度到实体化的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再到无组织、无形式的教育习俗、教育习惯、教育惯例（李江源, 2004）是经过国家认可并推行的，是一种经过系统化总结后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教育主导逻辑。

“适应论”站在社会现实的立场上认为，人类各种文明的发展是建立“现象世界”基础上的适应过程与维持现状，适应性是现代科学最好的代名词，遵循“社会—教育—人”的递进逻辑并以先后顺序来表明地位。在教育领域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框架上表现为未经教育文化系统进行改造和雕琢的“原朴人”塑造成适应社会结构的“职场人”，确立起“教育改革从属社会发展”的关系命题与指导路线。他们认为“超越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只是在特

定情景中个人或一小部分群体的理想见解，由于脱离社会的现实情况与得不到主流的认可而不能作为普遍的解答方式与实践推行，如同乌托邦或理想国的空想主义。如果说“超越论”是以沿着反现代性的人性道路前行的话，那么“适应论”则是扎根于现代性的社会阵营展开辩护。

2.1 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社会本位

伯顿·R·克拉克在其三角协调理论提出，政府权力、市场经济和学术权威代表着左右高等教育发展的三方势力(杨素萍&任初明, 2020)。具体而言，教师教育作为镶嵌在高等教育中以培养教师为宗旨的教育场域，其改革与发展必然要沿着自上而下的政府—市场—院校的多重制度逻辑链条进行同方向与作用力的矢量发展。政府、市场、院校具有内在的逻辑蕴含关系，依次代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逻辑关系序列。制度逻辑凭借其特定的逻辑作用影响着教师教育，形成教师教育改革的“协调三角形”模式：基于服务国家发展的导向型逻辑、基于满足市场需求的虹吸式逻辑、基于符合学校定位的生存性逻辑。这三方势力塑造了教师教育改革的社会本位取向（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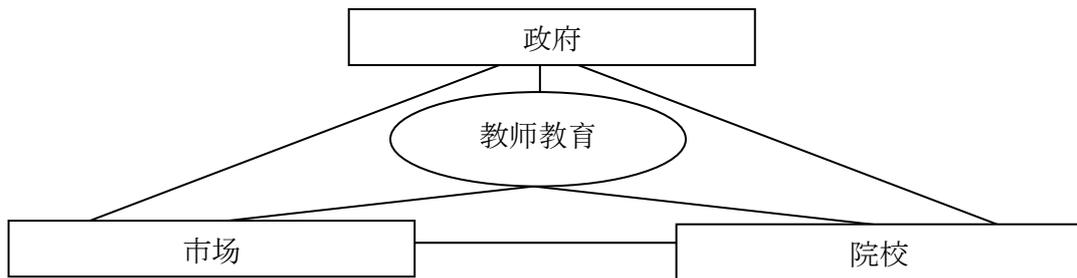


图 1：教师教育改革的“协调三角形”模式

2.1.1 政府导向型逻辑：适应国家发展的总体需要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政治秩序理论中认为，社会变革的产生与运演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政府采取有效的机制来维持变革秩序。政府作为改革主体的具体存在与权力结构，其逻辑作为权力意志在社会总领域的体现，是多重制度逻辑链条中最高层面的上位逻辑。教育是社会的子系统，其改革的逻辑结构既有作为教育逻辑的显性结构，也有代表权力逻辑的隐性结构，两者不同组合和运作方式深刻影响教育改革的效能。政府对教师教育的有效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刚性机制，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教师教育的国家目标、办学机构和质量标准作出制度规范。其二，柔性机制，政府通过颁布专项文件作为指导教师教育改革的原则要求。譬如，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教师队伍的任务维度、体

系维度、建设维度与保障维度上作出原则性指导的意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师教育体系，通过变革与调整推动教师教育的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从战略上，明确我国教师教育振兴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十大行动；从规模上，根据 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数据，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3.71 万所，专任教师共计 1793.97 万人（MOE, 2020）；从形态上，形成定向—非定向、本—硕多层次、多元化教师培养模式群（朱旭东&胡艳, 2019），有力支撑起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逻辑作为权力意志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表明教育改革目的在于适应国家发展的总体需要，其演进逻辑是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的导向型转变，贯穿教师教育发展历程并扮演着中央调适器的角色。

2.1.2 市场虹吸式逻辑：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教育被等同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从宏观的学校发展规模、速度、质量、效益到微观的学校办学经费投入、教师管理、招生分配等，都主要通过国家的计划来加以控制（劳凯声, 200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国家垄断教师教育的局面被打破，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教育商品化成为影响教师教育改革的风向标。“经济人假设”要求我们在审视教育发展规律与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对教师教育体制进行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1985 年，为了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MOE, 1985）。1990 年的“第二次全国院校调整”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分权”的结果，通过联合办学与资源配置来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我国向社会开放教师教育市场，教师教育师资培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革。高等师范院校开设非师范专业或改制综合性院校、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迅速发展、综合性高等院校创办教育学院及其附属机构、民办高等师范院校获得办学资格、非师范专业学生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成为教师等一系列关于教师教育的变革与调整就是为了与市场经济接轨，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以荷兰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影响，推行的教师教育改革通过市场自发的竞争秩序，为教师教育机构为教师提供更为自由灵活与专业化的教育服务。在社会背景下，市场机制的虹吸式逻辑以市场经济、产业需求和资源配置作为教师教育改革的驱动力，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输送、知识生产与技术支撑，是一种学术资本主义的教师教育改革。

2.1.3 院校生存性逻辑：适应院校发展的自主需要

院校逻辑是高校凭借学术组织和自主权对教师教育改革进行的一系列制度设计，这些制度设计具体落实在师范高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传统职能，形成大学本位的价值取向。从生存性逻辑上看，无论是强势群体（Strong Groups）或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

如何在同类型单位的同质化倾向与结构性矛盾中凸显自身的特色优势成为生存发展的立身根本。近几年来，一些知名综合性大学撤销教育学院建制及其内设机构或合并其他学院的做法，引发了学界对于教育学科的热议。教师培养是教育学科的关键，综合大学撤销教育学科仿佛释放了一个教师教育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即综合性大学有没有办教师教育的必要性。实际上，这种做法是综合性大学为了“双一流”建设与应对学科评估的调整需要，通过调整相对弱势的学科适应学校的发展战略。作为“教育母机”的教师教育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根据教育部的 2021 年全国高等学校名单统计，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共有 235 所高等师范类院校（MOE, 2021），分为教育部直属、省属重点与地方其他三种层次，承担起培养各类师资力量的使命。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教育改革必然要在符合自身发展定位的基础上规划长远发展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办学体制的转型与探索培养模式创新的途径；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与优化课程体系，构建现代化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机制；增强办学水平与院校实力，在不同师范院校单位的竞争关系中凸显优势。师范院校作为制度环境中培养教师主体的组织场域，改革目的在于适应自身发展、拓展生存空间与攫取发展资源，其本质是在不同的制度逻辑的博弈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 教师教育超越论：“自然人性论”的辩驳

在教育传统中，“超越论”作为“适应论”的对立状态而存在。超越是人的根本特性与实践表征，遵循人—教育—社会的关系序列逻辑，不仅表现为教育系统对社会发展发挥价值引导的导向作用，而且具体体现在教育系统对社会存在具有改造功能，是对“教育先行”诠释的别样演绎。“超越论”并非像“适应论”所说的得不到主流的重视。国家出台的多项教师教育改革措施中明确提到“教师教育要优先发展、适度超前”的原则，主张教师教育的规模与结构、质量与效益实现超越式发展。但现实情况的“为模式而改革”“以模式代改革”“用模式评改革”（王佳佳&高若瑜, 2018）等模式崇拜使得“超越论”而陷入困境，侧面反映出“适应论”对于教师教育改革的“宰制”。“超越论”批判“适应论”制度结构框架的逻辑操纵及其程序裹挟湮没教师主体的职业逻辑、思维模式与行为表现，教师教育改革是一种披着“利他主义”（altruism）与“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的合法化外衣进行控制的说词。这种外在的管控与赋予是经过选择与归化的“客体物”以单向度的规训方式作用于“主体我”，以“社会自我”僭越“个体自我”，造就没有灵性的“伪自我”，培养的是作为“教师”的人而非作为“人”的教师。“超越论”以“返魅人性”的后现代途径为人的自然本性进行宣扬，厘清教师教育的旨归是“育人”而不是“制器”，并体现出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客观而言，“超越论”偏向推行一种“大破大立”的改革态势，具有全面革新的进步意

义的同时，也往往容易陷入“拍脑袋”与“一刀切”的思维误区，导致改革在实行时出现“硬着陆”的急剧回落。

3.1 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个人本位

教师教育的改革逻辑除了科层制度的权力逻辑、市场机制的经济逻辑与院校实践的学术逻辑等系统世界的外在结构逻辑，在生活世界中还存在个人私领域的内在结构逻辑。帕特森（Patterson）主张教师教育应发展师范生的人本主义信念和性情倾向（叶菊艳, 2016），基于“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塑造教师正确的教育信念与提升专业水平。“个人本位”的教师教育改革逻辑遵循“内部—外部”与“主体—他者—群体”的关系链条，在教师主体、学生他者与教师群体之间进行整体的逻辑考量。

3.1.1 自我专业性逻辑：提升教师专业发展

人的任何一项职业类别必然以其专业性（professional）的知识、技能、信念与态度等本质特性作为社会存在的立足根本。教师作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专业人员，其职业的专业性指称的是构成教师专业工作的本质特性，具有动态的特征。鲍曼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构建出“流浪者”（vagabonds）与“观光者”（tourists）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身份。两者存在共性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泊，后者是按照意义地图进行价值探索。这种人群类别的划分与生活状态的隐喻生动形象地揭示了教师教育改革中专业发展方式的变迁及其角色转变。“流浪者”刻画的落寞形象，与传统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世俗性印象形成鲜明反差与颠覆性话语解构。“流浪者”身份的教师被迫接受教师教育改革中规定的专业化发展，并不是基于对教师教育的信仰而主动发展，专业发展呈现出“改革怎么改—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的沿用逻辑，最终塑造的可能是教师职业群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非理想信念主义者。我国“四有教师”包含了对教师专业性因素的描述，其中“第一有”就是理想信念，如何培养具有理想信念的教师是教师专业化改革的首要前提。“观光者”是教师教育改革的主动参与者与行动研究者，教师专业发展是基于理想信念的应然价值指导，具有超自我性、超现实性与超功利性等特征，能够更好地指导教师教育实践活动。“观光者”身份的教师主动追求专业发展的自主权、实施专业的发展规划，达成对自身、学生、教育和社会的生命自觉，促进自身专业发展。从“流浪者”到“观光者”不仅是字里行间的文本转变，更是教师专业发展从“被动适应”向“自主超越”的进步。

3.1.2 他者双向度逻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育者的主导性与受教育的主体性之间的相互钳制、利益交织构成教育对话系统的二元变量，各自形成教师“自我”与学生“他者”的主客体关系。当“自我”与“他者”产生文

化交互时，往往是“自我”遵从主体占有性原则，凭借身份权威与权力话语的压制，将“他者”强行置于次要从属地位，被视为实现自身价值利益最大化的增值附庸和外延拓展。“自我”以同一性作为价值衡量标尺与筛选过滤器把“他者”的“异质性”同化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基质或结构运作，“他者”的本质特征及其差异特性被等同为“自我”进行利益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主轴渐次联结成非对称性的教育对话系统。在这种不对等的对话系统下，学生“他者”只是教师“自我”的物化客体或类比性投射，其专业发展只是教师的单方面成长而非指向共同体的双向度发展。

教师教育改革意涵着教师“自我”的否定和再否定，在教学场域这一特定场域中实现“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彼此融合与话语的同频共振。将“自我”与“他者”的平等关系对立成割裂状态或划分地位的高低从属面位都是不科学、不可取的。教师专业发展是受到多线程情景因素的影响而非单一线性的因果性作用，其中教师“自我”与学生“他者”意义建构的过程是最为关键的推动因素。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不仅通过课堂讲述来教授学生学科知识，而且还通过语言和肢体的表达以及情感与思想的传递来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双方是有意义的交互关系。复杂性强调各种“人”“事”“物”及其所处环境的嵌套与联结，教育情景的复杂性要求教师能够适应甚至超越不同的教育环境、条件与要求，更好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是经过系统设置的动态育人框架，它的实现必须落实到教育体系的各个环节，通过教师专业的教育知识、教育专业能力和教育思想得以贯彻，教师的专业性与学生的发展性是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

3.1.3 群体共同化逻辑：促进群体专业发展

作为社会建构性的概念，教师专业化具有两重关系意涵：其一是教师专业与其他专业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外部竞争关系。教师专业化在此外部竞争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专业标识的文化—知能体系、塑造规则意识与规范行为、在生存情境脉络与社会交互过程中形成具有身份认同与利益相关的组织群体，从而促进专业地位与专业自治得到初次发展的意义过程。其二是现代教师专业化与传统教师专业化、教育系统各种专业取向之间的内部竞争关系。教师专业化是在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对专业的利益关系特征、实践能动特征以及专属道德特征来构筑话语和知识的专业边界的二次发展过程。为了解决教育实践活动的问题与实现专业的内涵式发展，教师个体及其专业活动以“同质促进”与“异质互补”的原则共同构成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通过与同单位群体“场域”产生协作与发展的联系，在合作交流中提升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并成为个体知识建构的一种不可剥离的文化的和制度的境脉（赵健，2004）。教师群体发展场域的共筑包含共同价值观、协同发展性、教育共享性和成员互补性四大特性。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传递和建构一种共同价值观作为推动教师专业发展的一套信念系统，激励教师个体与

教师群体不断提升专业化发展。协同发展性是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成员通过互帮互助的形式提升教师队伍建设，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教育共享性旨在以教育资源与个人经验的开放以形成群体交流与共享的教育体系资源库。成员互补性要求教师的交流既是对输入信息的理解与吸收，又是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在新旧知识经验的反复作用中取长补短，涤故更新。共筑教师群体发展场域的自主性与共同性指向群体间的共同信仰，通过唤醒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意识与教学热情，为教师群体专业化发展提供多向灵活的联动途径与互惠互利的合作平台。

4. 中庸主义：统一“适应论”与“超越论”

“适应论”与“超越论”之争是一个真实的假问题。“真实”是因为两者的逻辑立场、批评范畴及价值谱系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我国教师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难免出现一些深层次的观念性阻碍和制度性缺陷等矛盾，从而深刻影响到我国教师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假问题”的说法则是因为它割裂了“适应论”与“超越论”作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矛盾而直接划分为对立状态。

“适应论”与“超越论”本就属于一个整体的双重面相而非各执一端的“两张皮”，在理论逻辑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将两者之间本就存在的互补关系强行割裂，则可能对教育子系统乃至社会母系统产生崩坏的连锁效应。以我国教师教育体系从“三级师范”到“二级师范”的过渡问题为例。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这一过渡使得我国教师教育的办学层次与教师群体的学历结构得到全面性提高。但过早的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中等师范学校建制，导致一些落后地区的乡村教育缺乏稳定的师资力量，无论是当时的专科师范、本科师范或是后来的特岗教师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农村初等教育的师资问题。而且就教学技能而言，当时的中等师范毕业生擅长常识性和实践性知识的教学，比很多大专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还管用（向宇循，2010）。

任何本体存在及其隐喻遵循辩证分析的原则，而非隔着暗色玻璃里的一瞥，失去了其理念最为本真的底色。“适应”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脱离了“适应”的“超越”如同空中楼阁般虚无，两者遵循质变与量变的适度原则。教师教育改革作为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改革，涉及对教师培养、学生成长、教育发展、社会进步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体变革与局部调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关系，必然要以符合中庸思想的辩证统一观去处理好教师教育的各种矛盾与分歧。

4.1 主导与参与的统一：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益互惠性的教师教育发展格局

就教育的利益属性和价值特征而言，教师教育的产品属性与供给制度两者相互关联，教育的边际拥挤成本表明教师教育供给可以由政府宏观调控与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承担。教师教

育作为一项具有“正的外部性”的公共事业，其发展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共识。教师教育改革是人—事物的复杂样态交织与多方面的利益协调格局，如何建立一套相对完善与行之有效的教师教育办学体制，并能够适应基础教育改革、满足教师队伍利益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成为了教师教育改革的基准点。我国现行的教师教育是一种“大政府、小市场”的空间表象与结构模式，其改革是源自国家体制内衍生出来并具有合法性基础与制度化表达的自主过程，即绝对的国家主义和相对的市场机制。无论是纯粹由政府宏观调控或市场经济供给都难以实现教师教育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必然要统整两者的力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益互惠性的教师教育发展格局。

从政府主导层面上，政府必然要履行好责任主体的角色担当，重视教师教育的重要性，继续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计划，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继续推动教师教育的变革与调整，深化公平与质量这两条改革的逻辑主线，加强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教师培养规格层次，完善教师教育体系结构，发挥教师教育“工作母机”的价值与功能。从社会参与层面上，鼓励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本参与提供教师教育服务，发挥市场机制的教育资源配置作用，全面深化民办教育改革，建设民办教师教育队伍，推动民办教师教育的法律化、体系化与制度化。一方面，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出台专门的民办教师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规范民办学校教师队伍管理，保障民办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构建民办教师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完善民办师范院校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强对民办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鼓励民办师范院校探索管理和发展的有效方式，提供优质的教师教育服务与培养教师教育人才。

4.2 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接轨“顶层设计、教师执行”贯通统整型的教师教育政策路线

作为教育改革的思想纲领与行动准则，教育政策能够有效执行的核心假设及其内在逻辑在于能够凝聚教育共识，在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人价值取向、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达成动态耦合的互嵌状态，处理好理论层面的价值性问题与行动层面的操作性问题。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自上而下、安排严密的科层式组织结构，改革的效力按照等级原则从上方延伸并贯彻到下方的线性顺序。处于顶层面位的政府权力机构决策改革、绘制蓝图，构成教育改革的“思想者”；而处于底层基础的学校管理机构及教师群体等执行主体就相应的权称为“行动者”。教育政策的制定是一种被赋予政治属性的行为，以政府官员、教育专家共同组成的“单中心主体”的决策体制本质上属于内循环状态，强调政策方案的忠实执行，教师执行主体更多的是在外围充当被谋划的角色，较少兼顾到变革情境中的教师行动及利益诉求。

教育政策的实施是从政治领域过渡到教育领域的操作性问题，如何理解、内化和实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作为具体执行人员的自主裁量权，而教师能否有效执行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教师专业化发展、课程改革、新高考改革、“双减”政策、教师轮岗制度等一系列关于教育的调整与变革无疑会对教师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构成教师群体的压力源事件。当事件超出压力阀的可承受的安全阈值时则可能衍生成教师抗拒改革、妨碍改革的“教师阻抗行为”，导致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的情况。由于“思想者”与“行动者”的认知范式与逻辑路线不同，教育改革方案既要保障教育改革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兼顾教师群体的利益，为教师执行政策“赋权增能”。明确改革的各维目标、程序步骤、教师的任务以及改革利益的分配，并根据政策执行的实践状况进行调整和优化，为教师执行政策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教师应该以行动者为基础角色，以监督、评估者和决策者为成长目标（李冬冬, 2013），树立责任意识，发挥教师执行的能动性，在执行主体与决策主体间构建出贯通统整、有序合作的运行路线，塑造共生式的决策—执行逻辑。

4.3 师范与学术的统一：探赜“学术为知、师范为行”实践取向观的教师教育培养模式

教师教育具有“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双重属性特征，前者是对师范教育的“特殊性”指向，后者是高等教育对“师范性”扩容。从历史维度上看，“师范性”是我国百年师范文化传承而来以培养师范生成为能够具备知识、技能、道德与实践经验等职业能力的技术型人才，强调教师“怎么教”的教学水平，是师范教育区别高等教育的根本特性。“学术性”是师范教育的办学层次发展到高等师范教育，受到高等教育的共性影响，培养具备教育知识、理论教育、学术研究的学术型人才，强调教师“教什么”的教育专业素质。两者产生分歧的原因源于何者为“教师专业化”的主次问题，即在教师培养实践层面具象为培养什么类型教师的问题。“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深刻影响到我国教师教育的办学主体的选择、办学格局的确立、师范生培养模式的改革、课程体系的调整（陆道坤&许游, 2019）。

教育是一项实践性的工作，实践领域的具体问题不同于知识王国所推崇的“思维支配”与“机械操作”的知识法则，而是主张知行合一的价值论与方法观，并且在真实境遇中跨越科学与实践的鸿沟。由实践领域衍生而来的“实践取向”（Practice-Oriented）是一种强调以教师教育的实际情景为主要依据的教师培养模式，即根据教师的职业特征与培养模式根据实践内外源的任务不同而科学调整，在管理实践与体系结构中实现“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动态耦合，从而建构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机系统。教育部在 2011 年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明确规定把“实践取向”作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理念（MOE, 2011）。作为培养教

师及教育研究人员的组织场域，高等师范院校要突出教师教育的主体地位与办学特色，坚持以观念变革为先导，在实践取向中践行“学术性与师范性相统一”的办学思想，正确处理坚守传统师范院校与转型综合师范院校的关系，明确战略发展定位，提高师范生的培养层次，构建多元开放与创新活力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机制。

5. 结论

总体而言，教师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存在“立足现象世界”与“脱域实体世界”的双重属性。前者是对教师教育的工具理性与社会功能进行主线解释，而后者则是对教师教育的本体价值与人性向度进行图景叙述，这两种由教育存在本体衍生出关于不同问题指向的并列关系在逻辑立场、批评范畴及价值谱系上表征为“适应论”与“超越论”的语境倾向。无论是教师教育改革的“适应论”与“超越论”均有其合理或不足之处，理应以“中庸论”的辩证视角去统整教师教育改革“适应论”与“超越论”的二元对立，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的教师教育体系廓正发展路向。

参考文献：

- 潘懋元. (1990). 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2), 17-38.
- 鲁洁. (1996). 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 *教育研究*(02), 3-6.
- 杨昌勇. (1997). 也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对鲁洁教授“超越论”的商榷. *教育研究*(03), 27-32.
- 黑晓佛. (2010). 农村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考量.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 53-57.
- 杨东平, 周谷平. (1997). 我国当代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取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01), 26-29.
- 鲁洁. (1996). 论教育之适应与超越. *教育研究*(02), 3-6.
- 李江源. (2004). 论教育制度的逻辑结构与权力结构. *复旦教育论坛*(05), 22-27.
- 杨素萍, 任初明. (2020) 新加坡一流大学建设的联动逻辑与崛起机理. *江苏高教*(09), 115-120.
- 朱旭东, 胡艳. (2019).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40 年: 教师教育卷*.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劳凯声. (2005). 教育市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15-22.
- 王佳佳, 高若瑜. (2018). 教育改革中的模式崇拜及其超越. *高等教育研究*(12), 18-24.
- 叶菊艳. (2016). 各国教师教育取向及其核心素养主张. *人民教育*(23), 29-33.
- 赵健. (2004). 从学习创新到教学组织创新: 试论学习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背景、分析框架与教学实践. *教育发展研究*(11), 18-20.
- 向宇循. (2010-03-03). 昔日中师教育留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教育报*, p8.

李冬冬. (2013). 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教师角色. *当代教育论坛*(03), 89-93.

陆道坤, 许游. (2019). 论“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基于“师范性”与“学术性”互动的角度. *大学教育科学*(06), 9-14+1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1). *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6991/201110/t20111008_145604.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1803/t20180323_331063.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0).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2-03-26.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108/t20210827_555004.html?ivk_sa=102432

0u.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985).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0407/2482.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1). 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03/202110/t20211025_574874.html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教育惩戒缺失与重拾**LACK AND RECOVERY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THEORY IN CHINA**林慧圆^{1*}, 廖庭瑶²Huiyuan Lin^{1*}, Tingyao Liao²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¹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²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3395976212@qq.com

摘要: 教育惩戒一直以来是中国中小学教育中的难题,也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但是对于教育惩戒的使用边界一直难以说清,导致教师仍然处于对惩戒概念一知半解、对惩戒形式轻重难辨、对学生过失“束手无策”的情况。基于此,分析教师“误用惩、不敢惩、懒于惩”等造成教育惩戒的缺失表现,再从风险社会理论的制度、文化、系统与环境的这三个维度来对造成教育惩戒缺失的原因(制度失范,尚待完善;责任主体缺失,教师独揽;体系失整,权责不明)和如何重拾教育惩戒(规范制度,完善细节;反省自我,正看惩戒;多元主体,理解共识)进行探讨。

关键词: 风险社会理论,教育惩戒,教育惩戒权。

Abstract: Educational punishment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 is also a hot topic among scholars. But for the use of education punishment boundary has been difficult to say, although in the latest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punishment rules (trial), for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punishment and attributes, but still lack of its legal and illegal form of detailed discussion, lead to the teacher is still in a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punishment concept, punishment form, to student negligence" helpless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lack of education punishment caused by "misuse punishment, dare punishment, lazy punishment", and then analyze the system, culture, system, and how to review the education punishment (standard system, perfect details, reflect on themselves, looking at punishment, multiple subjects, understanding consensus).

Keywords: Risk and Social Theory, Educational Punishment, Educational Punishment Power.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部有关教育惩戒的相关文件出台,教育惩戒已然成为现今教育界的一大热点问题。二零一九年六月印发的《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指出:“制订具体实施具体细则,确定老师教育惩戒权。”(MOE, 2019)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中国教育部向社会征集建议后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规定“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法定职权”(MOE, 2019)。再到二零二零年底中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首次以行政部门规章制度的形式对老师惩罚的属性、范围、执行的细则、程序、办法、条件等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范,并力求将老师惩罚制度引入法制轨道(MOE, 2020)。这几个文件颁布的间隔时间如此之短,颁布的内容更为细化,更是说明教育惩戒已经成为教育界一大不容忽视的讨论话题。虽然文件对于教师教育惩戒权的使用问题已经作了较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而当下老师“不敢惩”现象日益强烈,更是形成了校园教学中的一些怪象,导致教师教育惩戒权使用的缺失问题。因此,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从制度、文化、系统与环境这三个维度来分析教育惩戒缺失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能够让“不敢惩”的教师能够重拾教育惩戒的权利。

1. 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近年来关于“教育惩戒”文献的浏览,发现大多数学者对“教育惩戒”这一主题的关注点多放在研究其概念、价值、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法理以及教育惩戒实施的措施和效果等方面,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学者对同一个点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

1.1 关于教育惩戒的概念研究

自从“教学惩罚”一词的产生和老师享有教育惩罚权利之后,部分研究者都主张教学惩罚是对学校教师不良行为进行矫治的教育方法或技术手段:如中国学者左崇良胡劲松等人就主张,教学惩罚是指校方和老师对校内非法违纪学员所实施的教育矫治活动,是纠正学校教师过失、警告他人、维持社会秩序的教育方法(左崇良&胡劲松, 2019);陶丽和胡钰涵二位学者也认为教学惩罚是一个行为矫正、规范培养的手段(陶丽&胡钰涵, 2021);又有研究者经过对中国当代文献、民国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等的综合考证后,对教育惩罚的范畴与划分做出了比较专门而细致的研讨,认为从教育惩罚的含义、目标、执行主体、手段、结果、性质、种类、

合法性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说明了教育惩罚的范畴是指校方或老师,为实现教学目的、防止学校教育失范行为再次发生,通过对学校教师违法违规的失范行为,做出否定精神评价的一个辅助教学手段,既包含纪律性惩罚,又包含学业性惩罚(任海涛,2019)。也有研究者认为,教师惩罚是校方和老师针对违规学生实施惩罚的一项特殊权利和负强化(田艳媚,2019);认为教育惩戒是广大教师完成立德树人使命的必要手段(朱茂磊,2022)。基于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关于教育惩戒的概念定义,学界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论调:第一,矫正论;第二,育德论;第三,辅助论;第四,权力与权利论;第五,手段论。

1.2 教育惩戒的价值研究

从学生视角,有研究者认为惩罚的教学价值,是使学生逐步个性化,在道德方面有所发挥,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健康发展(李帆&郭亦荣,2021);还有学者从多主体的角度指出,正确实行惩罚教导,除了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健康发展、完善学校教学有序、还利于达到素质教育目的和体现老师人格道德(李静静&沈贵鹏,2017);更有人从德育正义的视角,指出德育惩罚是一项德育“善制”(林靖云,刘亚敏&杜学元,2021);而在英国,有研究者认为其德育惩罚价值就是使学生能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并通过对其独立性格的训练来使其承受一定的行为结果(田艳媚,2019)。

综合不同学者对教育惩戒的价值研究结果,从对象来看,基本是以学校、教师、学生等为对象来阐述教育惩戒的价值,而且大多学者都认为教育惩戒有利于让学生适应社会化生活,充分肯定了教育惩戒的价值,也间接说明教育惩戒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1.3 教师行使教育惩戒的法理学研究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对老师行使教育惩罚权利的法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基本上都认为目前对中国的教师教育惩罚权力的使用并没有法制基础。如有学者通过从教育法理学角度研究了教育惩戒权的法学特性和教育属性,认为教育惩戒权虽然具有教育基础,但缺少一定法律依据,且中国的现有法规、条例中并未规定对教育拥有惩罚权利(谭晓玉,2017);又有学者通过对我国的立法研究证实,教育惩戒权仅仅停留在法律理论层次,惩罚机制在现有的立法体系中难以觅据(曹水清,2019)。另外,也有研究者从法制和道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中国教师惩戒权法权结构展开了道德反思,以及解释和推理中国教师惩戒权伦理正当性和形式的变迁合理性问题(邵成忠,2021);从法理学角度来研究教师惩戒性质中的师生法律关系上的平等与差别关系(张俊友,2018);在行政部门法关联性上,考虑高等院校和学生相互之间的司法关联具有内部性质,一般

认为应当界定为特殊行政部门的司法关联。在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理论的二分下,将教师惩戒权归于政府处理,必须严格按照政府处理的基本法理原则来执行(秦涛,张旭东,2019)。

1.4 教育惩戒的实施途径研究

针对中小学教师教育惩戒的具体实践问题,有学者从主体间性角度进行探究和理解师生双方的师生互动,并提出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研究:以公正为前提、以对话为手段和以共生的教育理念进行教师惩戒教育(张军,2021);有学者从实施学校教育惩戒的困境角度出发,提出解决措施为建立学校教育惩戒相应规定、完善健全现代校园管理制度、强化师德师风培养(余雅风,杜佳欣&李美仪,2020);有学者以新闻媒体和家长为主体,提出:新闻媒体提供客观公正的舆论环境,家长尊重和支持惩罚教学(李静静,沈贵鹏,2017);有学者从学生的视角入手,提出教学应根据生为本,努力做到有情可循、有理依据、有法依据;有学者从更为全面的视角考虑,认为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现代校园教学管理体制和进一步完善师德师风培养制度来推动贯彻落实教师惩罚制度(余雅风,杜佳欣&李美仪,2020);有学者从合法化、合目的性、合伦理性、合艺术性等角度来探索教育惩戒实施的新出路(朱丽桢,2021);有学者从道德伦理学角度研究教师惩罚制度的具体构建途径(田艳媚,2019)。

有学者指出,德国的教育惩戒措施主要包括教育措施和纪律措施,部分联邦州还规定了安全措施(巫锐&王世岳,2021)。还有学者指出,美国从奥巴马政策开始,美国就不断地在试图探寻更为有益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德育惩罚方法比较典型的有“恢复性惩戒”(Restorative Discipline)和“积极行为干预支持”(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upports)(蔡海龙,2021)。

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或视角出发,综合以上学者对于教育惩戒的实施措施研究来说,以对象来看,大致上从国家政策立法、学校治理、教师师德和以学生为本等方面来提出。

1.5 教育惩戒的制度研究

有关专家与学者认为,虽然《规则》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教育惩罚的性质和目的,但规范了教育惩罚执行的具体程序和条件,但是还是需要通过实践予以不断健全和完善(蔡海龙,2021)。也有学者指出,目前教师教育惩戒权得到了制度的确认,但还存在法律规范体系缺失等局限(朱茂磊,2022)。和中国不同,联邦德国并不是专业的《教师法》,教育惩戒机制的依据是各美国联邦州制订的《大学法》。教师教育惩戒权,是该机制的主要部分(巫锐&王世岳,2021)。英美等国的教师惩戒制度中,关于经司法授权的惩罚方法及其对各种惩罚采取的条件、程序、

遵守的准则、结果都做有很明确的表述，而且对于各种惩戒方式的经典判例具体明了(张俊友，2018)。

1.6 教育惩戒的视角研究

通过在中国知网上高级检索查找有关“教育惩戒”的文献，发现有学者从现代社会关怀伦理视角来探究教育惩罚的含义、特点和执行原则(陶丽&胡钰涵，2021)；有学者从现代社会变革的视角来讨论教育惩戒权从教化性权利到契约性权利的转变(曾娇，马早明，2020)；也有研究者从教育主体间性角度来探究英国中小学教师惩戒的实现途径问题(张军，2021)；还有学者从学校治理视角研究英国教育惩戒政策实施及取向问题(李梦花，马早明，2020)，以及学者从教育道德伦理学角度探究英国教师惩戒问题(田艳媚，2019)。

综上所述，基于不同学者对于教育惩戒的研究可知，以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对教育惩戒的缺失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较少，因此，从该视角对教育惩戒的缺失问题以及如何重拾教育惩戒进行探讨。

2. 造成教育惩戒缺失的表现

2.1 教师误用惩

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对选取的中小学教师进行调研，结果发现，13.5%的教师对“体罚是一种惩戒”持肯定态度，访谈中，33%的教师也存在类似误解。实践中还有部分教师误将涉及体罚、变相体罚的行为当作教育惩戒形式，如有8.4%的教师曾采用“用课本等教学工具敲击(学生)”的“惩戒”形式。可见，教师对惩戒与体罚概念区分不清以及对教育惩戒形式存在认知偏差，由于缺少判断标准，教师在实际教育情境中容易误用教育手段。所以在教师使用教育惩戒权的过程中，极其容易导致过度使用教育惩戒权。

2.2 教师不敢惩

教师除了逐渐懒于使用教育惩戒权而造成教育惩戒的缺失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教师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和各主体施加的压力造成最终不敢使用教育惩戒权。比如课后留校教导作为传统的教育惩戒形式，具有一定的教育、规诫意义，是英、法、美、日等国家都在使用的合法的教育惩戒形式，《规则》中也将其归类于“一般惩戒”形式。但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极少数教师会使用这种教育惩戒形式(余雅风，2019)。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校的安全管理造成的，一些学校要求学生放学后尽快离开学校或者要求家长对学生是一

对一接送，而且必须到点就放学，所以慢慢的就很少有教师敢使用“课后留校教导”惩戒形式。除了“课后留校教导”这种惩戒形式在《规则》中归类为“一般惩戒”形式，“点名批评”在《规则》中也归类于“一般惩戒”。但是在一线教学的实践中，部分教师对学生进行点名批评时却受到来自学生的抵抗甚至“指控”，这类问题在小学阶段尤为突出。因此，由于担心受到学生的非议，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或者课后也不敢轻易批评学生，长久以往，教师逐渐不敢使用教育惩戒权。

2.3 教师懒于惩

根据教育惩戒的概念和价值得知，惩戒的使用主要是学校和教师为了通过对违规违纪学生施加矫治行为，来达到矫正学生过失、警示他人、维护秩序的目的。然而在教师使用教育惩戒权的过程中，部分学生认为是对他们的体罚，进而引发学生对教师管教的不满。尽管教育惩戒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更好发展，但是教育惩戒的手段仍倾向于通过采取排他性措施对存在失范行为的学生进行“惩罚”，实际上容易导致为了“解决问题”而惩戒，而非把惩戒融入“教育过程”，弄巧成拙，从而也进一步导致惩戒的效果不显著。而且在中小学中，学生容易有叛逆情绪和逆反心理，教师对于教育惩戒权的不当使用，也会进一步助长学生的叛逆情绪，疏远师生之间的关系，长久以往，教师认为得不偿失，没有从教育惩戒权的使用中达到惩戒的效果，也就渐渐懒于使用教育惩戒权。

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九八六年，“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理论，由德国知名学者、社会学家贝克(Beck, U.)在其德文版的《风险社会：迈向一个新的现代化》一书中再次提到。之后，他又编写了《全球风险社会》等书籍。这些著作基本形成了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刘莹，2008)。贝克还指出，在人们社会发展史上各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经营风险社区，也因此每个拥有市场主体意志的生命个体都可能意识到死亡的威胁。而经营风险也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就只有在人为因素逐渐变成了经营风险主要源泉之后，经营风险的构成才出现了本质变化。也应该说，所有现代含义上的经营风险都是“人工制造经营风险”，因为人们代替大自然变成了经营风险的生产者，经营风险的结果也导向人们，人们既是经营风险的生产者也是受害者。经营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为主转向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所谓“如果人们越是想拓殖未来，我们也就越是有机会引发意想不到的事件。当贝克开始了对现代社会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深入研究以后，继而与吉登斯、卢曼、拉什金等研究者又进入了共同研究的行列中，并产生了诸多的基础理论探究观念和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从他们对现代社会风险和风险

社会深入研究的基础理论设定、认识方向、科学研究角度等几个基本方面考察,目前已大致构成了社会制度、人文、社会系统和环境等三种领域研究维度(张广利&许丽娜,2014)。

“惩戒”一词本身兼具惩罚与警戒的含义,前者是行为,后者是行为的目的,教育逻辑下的惩戒就是通过正确的惩罚与警戒达成其教育意义。斯金纳(B.F.Skinner)在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中提出“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概念,这一理念认为强化在学习过程中十分重要。当实验对象的某一行为获得积极的强化与正向的反馈时,那么他可能倾向于重复这种行为;当实验对象的某一行为受到消极的反馈或惩罚时,那么他重复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降低。斯金纳“强化激励—强化惩罚”的双重教育逻辑在心理学上能够解释动物和人类的某些重复或规避行为的同时,也为教育惩戒矫正不良行为奠定理论基础。

随着风险在社会领域的拓殖,教育惩戒行为也带有了强烈的“风险”特征(李帆&郭亦荣,2021)。从上述教育惩戒缺失的表现来看,目前存在教师“误用惩、不敢惩、懒于惩”等现象。之所以“不敢惩”是因为教师“误用了惩”,导致教育惩戒行为的复杂性伴生风险,惩戒后果难以预料,又因为惩戒责任主体缺失,惩戒后果的个体承受,而又因为教师的“不敢惩”,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懒于惩”的局面。从这可以看出,正教育惩戒行为带有强烈的“风险”特征,“教师不敢惩”又横杠在“误用惩、懒于惩”这两者中间,解决“教师不敢惩”问题成为重拾教育惩戒的关键所在,而重拾教育惩戒又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因此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制度维度、文化维度、系统与环境维度这三个维度来进一步具体分析造成教育惩戒缺失的原因以及探讨如何重拾教育惩戒。

4. 教育惩戒缺失的原因

4.1 制度方面：制度失范，尚待完善

从制度层面来说,教育惩戒缺失的一大原因来自制度的失范。虽然说中国教育部近些年来也有出台有关教师教育惩戒权使用的政策文件,还对教育惩戒的概念界定下了明确的定义,但是那些都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太空泛,没有具体到细节的操作层面。所以,尽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不少学校的教师还是惧用教育惩戒权和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还是依然不敢惩。而且如贝克所说的,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自身知识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化环境”和“社会化自然”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宰力量,社会充满了各种人为的风险。按照这个说法,当学校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权的时候,也会因为把握不住那个适度的标准,被判为过度使用教育惩戒权,还有现今学生对于自身人权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认为教师只要使用一点点的教育惩戒就是对学生本人造成伤害,把教师的惩戒行为告

到家长那里去，然后家长就会去到学校找到老师理论，甚至有的家长还会恶意报复教师。而此时，教师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人身安全风险时，中国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却没能及时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当制度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时，就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问题，而面对制度失范带来的制度化风险，教师也承担不起，所以这也就进一步造成了教师不敢使用教育惩戒权和教育惩戒缺失的局面。

教育惩戒的缺失的原因还来源于政策文本的失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一般”、“较重”、“严重”，《中小学校学生违规行为惩戒实施暂行办法》的“一定数目”、“一定时间”、“某项”等概念的模糊性与多义性无疑进一步加剧教育惩戒的缺失的原因。此外，在没有建立系统完善的教育惩戒制度体系时，学校遵循的是学校规则。与教育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相比，学校规则似乎要求更为严格、处罚更为严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法规相抵牾。例如某些学校规章制度所设定各种违规违纪行为的罚款内容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而非基于民事责任的补偿、赔偿。此外，学校的规章制度作为学校利益一方的单行决定，存在缺乏民主的程序、权利和义务设定失衡等弊端。学生、家长与社会代表较少参与到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诸如“不准”、“禁止”、“严惩”等强制性用词与限制性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学生的授权性规范。现行的学校教育惩戒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弊端。

4.2 文化方面：责任主体缺失，教师独揽

从风险文化的角度来看，造成教育惩戒缺失的一大原因在于人们对社会的风险意识增强，对于任何对自身可能带来威胁的行为都容易带有抵制情绪。虽然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观念里，一直提倡尊师重教，但是随着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地更新中，特别是新一代接受前卫观念的洗礼之后，部分学生对于尊师重道不再那么看重。相反，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和层出不穷的信息带来对头脑和认知的轰炸，新时代的新人们更加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所以，不同于以前，教师怎么打骂学生都好，学生一般出于尊重和害怕教师，都不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正所谓“打不还口，骂不还手”，但是 21 世纪初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师生都很淳朴，所以也不会闹什么太过出格的事。但是，进入到 21 世纪的发展以后，不管是学校高层领导、教师还是学生，抑或家长，只要学生是在学校里受到伤害，那么第一个被问责的就会是受到伤害学生的同学、任课教师或者班主任，其次是年级长再到学校领导。特别是对于教师教育惩戒权的使用一旦对学生造成所谓的伤害，那么教师就会首当其冲，受到来自教育部有关部门、学生家长甚至是学校领导的层层施压，最后迫于压力之下，就算教师使用教育惩戒权得当，也有可能被当成学校的“替罪羊”，甚至最后还可能因此丢了“铁饭碗”。所以基于此，可知教育惩戒权缺失的缘由来自何方。教师惩戒不良学生的做法是被视为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即使

体罚、变相惩罚等极端惩罚行为被摒弃后，基于保障教学秩序的一般惩罚仍然在较长时间内被视为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教育惩罚如果没有得到明确的规范，诸如打手心、罚下蹲、罚跑步等惩罚行为具有教育暴力的倾向，没有与教育体罚、教育惩罚形成完整的理论切割与界限划清，明显体现出从两者遗留而来的思维逻辑。

4.3 系统与环境方面：体系失整，权责不明

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系统与环境角度，可知造成教育惩戒缺失的很大原因在于整个教育的大环境中，不同主体对教育惩戒的了解过少，以及教育系统中，不同组织之间的沟通存在堵塞和缺乏配合。与之相反，德国教育惩戒的制度设计被安排在各州《学校法》中“学校关系”的子标题下，这表明教育惩戒依赖于包含教师教育惩戒权在内的一整套处理系统和不同决议机构，且涉及校内外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包括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学生监护人、学校与上级教育监管部门等。不同惩戒措施由不同机构决定，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处理校内外不同主体间的关系，比如何时告知学生监护人、是否告知上级教育监管部门等。这种多层次参与、不同主体决议的教育惩戒体系体现出较高程度的整合性。

从德国的教育惩戒举措就可以知道我国目前每个部门之间对教育惩戒的配合到底有多缺乏。若无其他部门给予相应的配合，那么仅靠教师一人实施教育惩戒权和承担惩戒后果，可想而知有多么吃力，也从而得知为何会造成教育惩戒权缺失的局面。

5. 重拾教育惩戒

5.1 制度方面：规范制度，完善细节

教师身份具有培养学生的专业人员、基于聘任合同的雇员与国家特殊公职人员等多重面向，对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执行教育惩戒均是其权益和责任的表现。若想让教师重新干预恰当地行使教育惩戒权，还需要对《规定》等针对教育惩戒的文件政策继续予以不断地完善和细化。在这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英美等国教师惩戒的经验。英美等国的教师惩戒制度中对于教师惩戒的方式以及有很清晰的说明，因此教师、学生和社会各界都明确且认同教师对学生所具有的各类惩戒权力，如言语责备、罚站、罚做额外的作业、罚做额外劳动、取消特权、没收特定物品、课后留校、责令离开教室，等等。制度中还各类惩戒实施的条件、程序、遵循的原则、后果明确表述，教师、学生和社会各界都明白并形成了对各类教师惩戒的实施条件、程序、遵循的原则、后果的认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教师惩戒争议的发生。此外，美国的“零容忍”政策的变化，表明美国学生惩戒的政策由“功利主义”向“关怀伦理”的转

变，也表明了美国学生惩戒向公平性、正义性的新的迈进，并启示我们避免重蹈美国早期的一些已被证明了的错误的政策与做法。

5.2 文化方面：反省自我，正看惩戒

关于对教师使用教育惩戒权的问题，部分教师意识里面认为一旦对学生使用教育惩戒权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学生的恶意捉弄和恶语相向，甚至是来自学生和家长的恶意报复。因为在现实教育的案例中，的确发生过因为师生关系的纠纷而造成教师被学生伤害甚至致死，但这些案例在整个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中，是极少数极端的案例，却被无限放大了，随之教师对自身的安全意识和防范风险的意识也日益增强。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使用过教育惩戒权的教师数不胜数，被教师因为不良行为而进行教育惩戒的学生也不胜其数，就连笔者自认和在周围同学们的眼里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是好学生的榜样，但也不乏被老师惩戒过。但是仔细想之，为什么这些大多数被惩戒的学生没有对教师实施报复？这时，就需要教师们进行自省和反思，是因为使用教育惩戒权一直都伴随着风险？还是自己放大了教育惩戒权的使用对教师造成的人身安全风险？又或者其实是自己使用教育惩戒权不当才会造成学生的不满，进而可能带来隐形的风险呢？

5.3 系统与环境方面：多元主体，理解共识

俗话说要对症下药，从上文得知造成教育惩戒缺失的部分原因在于教育惩戒的有关部门内部之间职权不明和各主体之间缺乏配合。而与教育惩戒权实施有关的主体不外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各相关部门。为使教育系统内部各组织和角色之间都能对教育惩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实施教育惩戒权，可以采用一些管理智慧，比如师生共同制定学校纪律规范，充分发掘各类针对性的批评方式；家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等。

对于教师来说，只有教师在明确教育惩戒权的边界时，才能知道所谓的体罚是什么，也因此才有可能知道一旦超过这个边界时，会可能带来什么风险。对于学生来说，一部分教师由于师德问题和扭曲的教育观，认为“乱棒之下出孝子”对于教育教学也同样适用以及所谓的“严师出高徒”就随便滥用教育惩戒权，也会容易给学生造成伤害和隐患。因此，要加强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此外，学校在选拔招聘教师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把关，不仅看重教师的业务能力，还要注重新教师的道德修养，把对教师的师德考核放在第一位，做到把风险杜绝在源头上。

6. 结语

惩戒的教育价值在于让学生适应社会化生活，获得品德发展的自主能力，最终获得身心全面协调发展。同时，教育惩戒也体现着教师的教育机智。但随着风险在社会领域的拓殖，教育惩戒行为也带有了强烈的“风险”特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教师不敢使用教育惩戒权、懒于使用教育惩戒权甚至误用教育惩戒权。再结合现今我国缺乏关于教育惩戒权的法律依据和相关制度还不完善，所以教育惩戒仍是教育教学中的一大难题。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各方面的不断完善，相信专门针对教育惩戒的法律和政策制度仍然会相继出台，教育惩戒仍然还是学界热议的话题。

参考文献

- 左崇良，胡劲松. (2021). 教育惩戒的制度困境与立法考量. *当代教育科学* (07), 37-45.
- 林靖云，刘亚敏，杜学元. (2021). 教育惩戒权再审视：内涵、边界与落地. *教育科学研究* (05), 40-46.
- 李帆，郭亦荣. (2021). 论教育惩戒的风险及规避——从教师“不敢惩”现象说起. *教师教育学报* (03), 127-134.
- 朱丽桢. (2021). 为教育而惩戒：从“惩戒”到“教育惩戒”. *当代教育科学* (04), 40-45.
- 朱茂磊. (2022). 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基本属性、权能构造与法律渊源——对现有研究和制度规定的双重反思. *重庆高教研究* (02), 37-48.
- 陶丽，胡钰涵. (2021). 关怀伦理视域下教育惩戒的内涵、特征及实施原则. *教育理论与实践* (07), 3-7.
- 巫锐，王世岳. (2021). 德国中小学教育惩戒制度及其启示. *全球教育展望* (03), 118-128.
- 邵成忠. (2021). 道德推理与原则重构：教育惩戒权的法理学思考. *教育科学研究* (03), 11-16.
- 蔡海龙. (2021). 发挥惩戒的育人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惩戒制度. *人民教育* (Z1), 80-82.
- 张军. (2021). 主体间性视角下中小学教育惩戒的实施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 (02), 47-51.
- 余雅风，杜佳欣，李美仪. (2020). “慎用”与“滥用”：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困境与反思. *中小学管理* (12), 51-53.
- 李梦花，马早明. (2020). 学校治理视角下英国教育惩戒政策实施及取向分析. *比较教育研究* (11), 105-112.
- 曾娇，马早明. (2020). 从教化性权力到契约性权力：社会变迁视野下的教育惩戒权. *教育研究与实验* (01), 47-51.
- 余雅风. (2019). 论教育惩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人民教育* (23), 18-21.

- 曹水清. (2019). 教育惩戒合法性困境论析. *当代教育科学* (09), 62-67.
- 秦涛 & 张旭东. (2019). 高校教育惩戒权法理依据之反思与修正. *复旦教育论坛* (04), 41-47+63.
doi:10.13397/j.cnki.fef.2019.04.007.
- 任海涛. (2019). “教育惩戒”的概念界定.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4), 142-153.
- 田艳媚. (2019). 基于德性伦理视角的教育惩戒问题研究. *上海教育科研* (02), 39-42+52.
- 张俊友. (2018). 法治理念下的公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惩戒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06), 93-96.
- 谭晓玉. (2017). 教育惩戒权的法理学思考——兼评《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00), 129-142.
- 李静静, 沈贵鹏. (2017). 惩戒教育的价值、困境与实施.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4), 84-86.
- 张广利, 许丽娜. (2014). 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探析.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2), 1-8+16.
- 刘莹. (2008).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国外理论动态* (01), 83-86.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19).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202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907/t20190708_389416.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 *关于《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202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02/201911/t20191122_409278.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2/t20201229_507958.html.

课程视角下幼儿园班级植物角活动实施现状研究**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PLANT CORNER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CLASS FROM THE CURRICULUM
PERSPECTIVE**黎馨忆^{1*}Xinyi Li^{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Nan 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238093468@qq.com

摘要： 班级植物角是利用班级的走廊、阳台等角落让幼儿进行观察植物、进行非正规科学活动的场所。班级植物角活动则是利用班级植物角这一教育资源，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在教师指导下，幼儿通过观察、种植等而得到发的活动。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观察法、访谈法进行研究。本研究将从课程视角出发，从植物角活动实施的目标、主题内容、评价三方面分析 A 幼儿园开展班级植物角活动实施情况。植物角活动还没有摆脱由教师主导的局面。教师的“观察支持”与幼儿的“实际需求”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关联。植物角活动应从儿童出发，满足儿童对植物探索的需要。

关键词： 幼儿园活动，植物角活动，班级植物角，课程视角。

Abstract: Class plant corner is the use of the class corridor, balcony and other corners of the place for children to observe plants, informal scientific activities. Class plant corner activity is the use of the class plant corner these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nee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children through observation, planting and get the activities. This study mainly used the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methods.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t horn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bjectives, theme content and evaluation. Plant horn activity has not yet gotten rid of the teacher-led situation. There is no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observation and support" and children's "actual needs". Plant horn activities should start from children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plant exploration.

Keywords: Kindergarten Activities, Class Plant Angle, Plant Angle Activity, Course Perspective.

引言

幼儿园班级植物角是作为科学区角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与植物相互作用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幼儿直接观察研究植物的重要场所。幼儿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观察、探究，进行隐性科学活动的区角。同时，班级植物角不单单是班级区角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幼儿与植物相互作用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幼儿直接观察研究植物的重要场所。同时，幼儿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种植活动，引导幼儿仔细地观察植物所出现的一些特点和变化，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对于自然的探究兴趣。

植物角活动是幼儿园科学领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理论指出：大自然是活教材，认为儿童在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中获得经验。植物角作为班级科学区域，是幼儿进行科学探索的重要途径。幼儿是科学探索的主体，需要通过与植物角植物的相互作用，才能获得其中的科学经验。植物角是幼儿园科学领域课程的重要区域，幼儿通过对植物角的主动探究和对相关的课程的学习，从中了解和认识植物的基本特征，获得科学知识。

现阶段幼儿园的植物角活动中，植物角一般作为环创的一部分进行设计，其教育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在植物角活动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上，一般由教师按照自身意愿进行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幼儿的实际生活和现有经验水平；在植物角活动结束后评价和反思，并没有系统的评定标准。因此反思现有植物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深化植物角课程的教育价值，对强化植物角与儿童之间的联系和发挥植物角教育价值至关重要。

文献综述

植物角的设立对于幼儿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焦荣华（2016）的研究从种植对幼儿所带来的教育价值出发，指出种植不是单单为了一种“收获”，而是在一种动态的参与中儿童作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与自然相遇，建立一种深层的与自然、与大地、与万物的联结。虞敏芳（2020）则从植物角课程的主体出发，认为幼儿是植物角课程的主人。幼儿通过在植物角进行探索活动，丰富自身知识经验。张天宇（2020）指出大自然对于幼儿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植物的种植、观察、记录引发幼儿的思考和探索。将自然带入城市，让孩子走进自然，带来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关于幼儿科学领域中指出：幼儿的科学学习是幼儿在对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了解和挖掘事物本质和关系的过程。对于幼儿的植物探究，《指南》提出了详细的要求：感知和发现植物的生长变化及其基本条件；察觉到植物的外形特征、习性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通过考察、种植活动，感知生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的过程。

植物角的材料投放的选取要丰富性。潘燕玉（2013）认为植物角的材料要有丰富性，更要用合理的方式呈现。比如：高效利用空间摆放植物，分类放置等，这都有利于幼儿进行观察、体验、探索。杨枫（2011）提出，植物角内容要满足不同区角的需要，观赏植物以及观察类的植物的品种要有不同，明确植物的教育意。

植物角内容要因地制宜。周碧波和康莉（2010）指出，植物角角内容应该结合幼儿园所实际情况，有针对的进行种植，激发幼儿探索自然的兴趣。

植物角内容应以幼儿为中心。姚佳怡（2020）指出幼儿园科学区角内容应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设计，科学操作材料的投放要符合幼儿的喜好，能够使每一个幼儿都可以进行科学的探究，更好地提高幼儿的科学知识。曹燕华（2019）从对班级自然角的观察中，对种植活动的教育策略进行探索，认为要从开始就让幼儿加入内容的选择。教师应成为支持者和引导者，帮助幼儿更好的进行探索。丰月瑶（2017）指出要系统的进行对植物角建设的层级开发。依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认知特点，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等纬度作为分层的要点，结合幼儿自身的认知水平进行活动。通过层级区分，能有效的配合教师的教学，实现植物角辅佐教学作用。

研究设计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为了更全面直观的了解幼儿园班级植物角活动在 A 幼儿园开展的现状，以非介入性的观察为主要手段，进入幼儿园各班级实地观察植物角活动实施情况，对幼儿园班级植物角活动实施现状进行具体的观察并做好详细的记录。着重关注植物角活动中对于课程目标的取向，植物角活动中主题和内容的选择，以及在活动实施中教师和幼儿评价。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访谈和结构性访谈相结合，对幼儿园中的园长、教师进行访谈，并及时记录幼儿教师在日常实施植物角中对于现状的陈述。以了解植物角课程在幼儿园各班级的开展情况，以及在实施这些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融入幼儿当中，与幼儿们相互熟悉相互习惯，使得在研究中幼儿能够有真实、自然的表演，从而使得本研究所取得的数据客观。

研究结果

1. 幼儿园班级植物角创设

幼儿园班级植物角活动是围绕着班级活动角开展的相关活动。植物角不单单作为班级的区角存在，也作为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植物角中材料的投放决定了可以开展怎样的植物角教育活动，是教师在设计植物角教育活动的前提条件以及活动材料。

A 园幼儿园班级植物角在投放植物时主要满足以下三种需求：投放的植物可以供幼儿欣赏及装饰自然角环境；投放的植物供用幼儿观察，以便幼儿更好了解该物的名称、形象等；投放的植物供幼儿进行种植实践，在种植体验中幼儿能更好地了解植物的生长特性，同时也能增强幼儿和植物之间的联系，培养幼儿对植物角的兴趣。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A 园植物角投放的植物来源主要分为三大类：学校统一购买的盆栽、幼儿带来的植物、教师带领种植的植物。这三类植物投放的数量、种类都有所不同，从在植物角种植的植物数量上来看，教师带领幼儿种植的植物数量最多；其次到幼儿带来的植物；最后数量最少的是由学校统一购买的盆栽。同时，在这三类植物中，由学校统一购买的盆栽植物种类最为丰富；其次到幼儿带来的植物；最后植物种类数量最少的是有教师带领幼儿种植的植物。

幼儿园方重视对各班级植物角的建设，每个学期会定期给各个班级补给植物。对教师关于班级自然角植物的选择依据的访谈可以发现，教师对植物选取会根据依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来选择植物角放置的植物，”我们班的孩子年龄比较小，植物的要求主要就是安全无毒、颜色鲜艳”。其次，也会从植物的类型、用途和功能选取植物，“我们班在种植的植物方面一般会选择一些常见的蔬菜品种，这些幼苗成长周期也不能太长，一般一个月左右能够成熟。这样也便于幼儿观察植物的生长变化特征”。最后，教师会通过家园共育，请家长和幼儿共同准备植物放到班级植物角中。

2. 植物角活动目标的取向

幼儿园活动目标是进行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对幼儿在接受阶段性的教育后，智力、体力、品德等方面应该达到的程度，是对幼儿在经过活动后发展水平的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幼儿园活动目标对于学前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实施有着纲领性的作用，是设计活动实施和教育评价的重要依据。

2.1. 三维度目标选择取向

对于老师所进行的植物角相关活动的活动目标按照三维目标，即认知、技能、情感三维度进行了整理，并把目标中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分析其出现的次数，以了解教师在

设计植物角活动时对知识点的选择。

植物角活动认知目标

教师在对植物角活动的认知目标的设计中，最喜欢使用“特点”一类的认知目标，比如说：“了解树叶的特点。”“认识蝴蝶花，知道蝴蝶花的基本特点。”“通过发现树叶的不同特点，能分辨出树叶的种类”。在对 A 老师的访谈中，教师对此也有说明“我们可能对于植物角活动中带领幼儿观察时候，第一反应都是带领幼儿去观察植物的特点。”同时 B 老师认为“观察特点是最直观最简单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可能也比较好理解。”

对于“作用”“生长”方面的认知目标，教师所涉略的不是很多，从他们的访谈中可以窥探到，“解到植物生长、作用方面也很有意思，只不过对于老师来说要做好功课才行，以免孩子提问你答不出来。”

教师会偏向于设计关于植物特点的认知目标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能够引导幼儿进行观察活动，让幼儿在观察身边事物的能力有所提升；其二是教师不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能够对观察的植物有一定的认识。对于植物的其他方面的认知，教师需要做更多的课前准备，有丰富的植物科学知识。所以教师可能在日常的活动教学中，不会经常设计生长、作用等这样的活动目标。

植物角活动技能目标

在对于对于植物角活动中技能目标的设计，从技能目标的关键词能发现，教师更侧重于幼儿的亲自体验，在技能目标的设计中更多的是使用“尝试”“动手”等词。比如：“尝试摘菜，体验摘菜的乐趣”“观察树枝的形状，使用颜料动手绘画树枝”。在访谈中也能窥其一二，在于对设计活动目标中，教师解释道“现在我们要求把权力还给孩子，孩子们有可以亲自动手的权力，我们不应该剥夺孩子动手的权力”“让孩子们亲自尝试种植，亲自认领自己的植物，能感觉孩子们对植物的兴趣大大增强”

对于技能方面的习得这类技能目标教师很少会在班级植物角活动中设计，所以关键词很少会提及“学到”“学习”等词。教师们认为植物角能够开展的技能能够让儿童体验一两次就可以了，长期的学习和习得需要较多活动，幼儿园的教学重心不在此。

植物角活动情感目标

在设计植物角活动的情感目标中，教师更倾向于使用“兴趣”，比如：“产生对大自然的兴趣”、“对身边的植物产生兴趣”。其次是“体会”，比如：“体会到种菜的辛苦”“体会到植物生长的不容易”。最后是“喜欢”“积极情绪”，这两个关键词都只出现过一次。

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了解到，“因为我们还是小班，所以更多的是想引起孩子和植物之间的接触。”“孩子们很少会主动的接触植物，所以说还是想先激发孩子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好

奇心吧。”教师根据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自身特点，在活动种更多的是希望能引起孩子对于植物的好奇心，所以设计的情感目标更偏向于引发好奇心。

2.2 重难点选择取向

植物角活动重难点选择取向主要考察的是在具体的活动教学中，本班教师在设计植物角活动的目标中对于认知、技能、情感三个方面在活动目标重视程度。

教师在对于植物角活动三维度目标的重难点有所不同。A 老师：“在植物角活动中，我可能会更注重幼儿情感目标，我认为现阶段应该培养幼儿对植物的兴趣和对我们班级植物角的兴趣。” B 教师则认为幼儿的认知目标更为重要，她在访谈中表示：“我比较重视认知的教学，我认为孩子应该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或者说对我们观察的植物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开展我们的教学活动。这些知识能进入孩子的知识网里，孩子能拥有丰富的前经验，我们也更好开展之后的活动。”

综上所述，教师们对于课程目标中的三维目标的重视程度上是存在偏向的，所以我们通过图标分析教师在设计活动重难点对于三个维度的目标重视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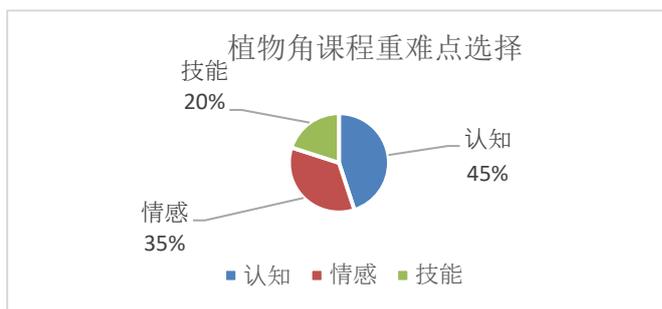


图 1：教师设计植物角活动重难点偏好选择

如图所示，教师在设计植物角活动目标的重难点时，选择认知目标作为重难点的次数最多，其次是情感目标，选择技能目标的次数最少。通过对教师的访谈也可以感受到，在描述植物角活动重难点时经常提到的是“认识”“知道”等与认知目标相关的词汇。而对于“掌握”“做到”等技能目标方面的词汇比较少提及。教师对于植物角活动的重难点的重视程度排序基本为：认知目标、情感目标、技能目标。

3. 植物角活动的价值取向

课程的价值取向是在构成课程的诸要素之中十分重要的存在，尤其在课程内容中更为直接的反映出来。将活动设计内容的具体展现是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具体转变过程，是一

个较为困难的阶段，因而活动的教学设计将会直接的反映出幼儿园教师的总体素质和能力。

3.1 植物角活动主题生成

通过对本班植物角活动主题的来源进行调查，一共有四种主要来源：一是由年级组制定的学期主题所延伸出的主题、二是教师根据本班植物角的情况所制定的主题、三是根据观察到幼儿兴趣的问题所指定的主题、四是教师根据自身的兴趣或者是想法所制定的主题。

教师最倾向于依据年级组制定的学期主题展开设计活动主题，比如：《水培植物的发芽》、《寻找春天》、《春天的蔬菜》等；其次，是教师根据自身想法所设计制定的主题；最后，来源最少的是依据本班植物角情况和幼儿感兴趣的问题两个来源。

从对教师的访谈中发现教师关于科学角活动的主题的选择上，主要是依赖学校年级组指定的统一活动主题。比如 T1 教师在访谈中提及：“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提前制定好班级周计划，每个年级有统一的主题，比如我们小班就是春天来了。所以我们在提前制定班级周计划的时候就会考虑围绕我们的年级计划去制定活动。”而这样的话语是在访谈中最为常见的回答。对于两个占比较少的来源教师也有短暂提及：“孩子们可能对植物角没有太多的问题，幼儿在植物角活动的时候偶尔有疑惑我们也会尽力去做解答，但是生成活动可能就比较少。”

“我们植物角偶尔可能有一些可以用于组织活动的问题我们也会生成成活动，比如说当我们班级种植的草莓有果实的时候，我们就展开了一节关于草莓果实变化的活动，带着孩子观察草莓果实有什么特点。”

可以看得出来，目前教师对于植物角活动的主题的选择只是停留在依据教师和幼儿园年级组本身，对于班级幼儿的思考和对现有植物角的探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3.2 班级植物角活动领域取向

同时研究者为了更好的分析出班级植物角活动主题的教师设计和选择情况，于是将班级进行的植物角活动按照五大领域进行划分，即健康、语言、科学、社会、艺术五大领域。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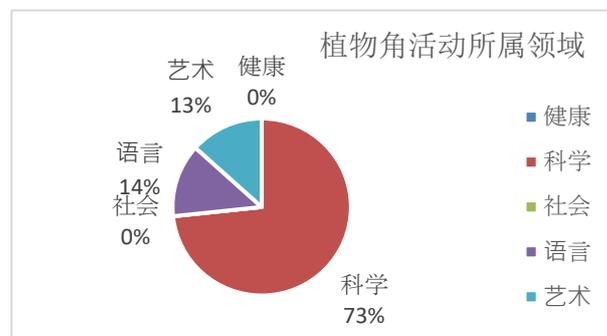


图 2：植物角活动所属领域

通过上图，教师在选择班级植物角活动的领域时更倾向于科学领域，所占比为 72%。其次艺术领域和语言领域占比约为 13%。最后对于健康领域和社会领域，教师在设计班级植物角内容时候都没有选择过。

在对教师的具体访谈中，访谈者提到：“我们班级植物角活动会组织什么领域的课程？”这一问题的时候，教师提到“一般我们就会组织科学活动吧，除此之外我们也不知道组织什么好了”。所以目前为止，教师对于植物角活动内容的领域选择有一定的局限。主题的选择局限在了科学领域，对于其他领域和植物角的关联没有深入的探索。

3.3 植物角活动内容的组织

幼儿园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三类：集体教学活动、小组教学活动和个别教学活动，并根据这三类对教师实施的植物角课程进行分类。

集体教学活动是幼儿园一直以来应用最为普遍最为广泛的活动类型，它具有计划性强、有组织性等特点。教师在组织植物角活动时候，也会较多的运用到集体教学的组织方式。小组教学的活动组织方式是教师在组织植物角活动偶尔会使用到的组织形式，它是指教师将幼儿分成几组，小组内同时进行某一活动的教学组织方式。教师一般在组织幼儿自主操作的时候会运用到小组教学的。例如：班级植物角收获的韭菜制作韭菜饼这一活动的时候，教师把幼儿分成三组，依次进行切韭菜。通过对活动的观察，研究者发现，运用小组教学的时候，班级的课堂纪律不能得到保障，一组孩子在认真进行活动，其他的孩子则是在玩玩具，班级氛围比较混乱，幼儿没有得到足够的操作时间和操作氛围。教师应该在一组幼儿进行小组活动时候，对其他组的孩子对即将进行的活动进行介绍或者引导幼儿进行观察正在进行活动的幼儿，让其他组的幼儿也能融入进活动中。

个别教学活动是教师最少会使用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对教师的具体访谈中，教师对此也有所回答：“我们只有三个老师，进行个别教学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在对于一些需要幼儿亲自尝试，而且需要老师指导的活动环节，我们可能偶尔使用个别教学。”“但是这样使用的时间会很长，基本一上午可能就过去了。”可以看出，在班级中实施个别教学活动对于幼儿园来说还是很困难的。

4. 幼儿园班级植物角活动的评价

课程评价是由评价主体、客体、方法、标准等基本要素构成。课程评价解释教育的程序所具有的价值与效果，为课程开发提供有效的信息。植物角活动评价应该以幼儿为主要对象，根据一定的标准，运用科学的评价技术方式、方法，对活动的目标、内容、过程及教师、幼儿等进行分析并对活动进行科学的评价，同时也重视对幼儿发展的评价。

4.1 幼儿园植物角活动的评价内容

通过对植物角活动的观察和整理中看出，教师在评价的内容上关注到科学概念、科学情感和态度以及具体的科学探究。

比如：在《认识水培植物》的活动过程中，主要的活动目标是知道生物有吸水性，可以通过水培的方式种植。在研究者观察此次活动中，教师使用的语言有“你觉得杯子中的水会不会少？”“为什么杯子中的水少了呢？它们去了哪里？”教师的这些言语中指向的是幼儿的探究过程假设和具体推理思维过程，以及引发幼儿们的科学探究兴趣。此外在本次活动中，教师有关注到有些幼儿的情绪，当其中一名幼儿开始在课堂上表现出走神的倾向时，教师对此进行及时的干预。通过提问和语气变化的方式，使得幼儿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活动中来。最后在本次科学课程中，教师也关注到了幼儿的科学态度和情感体验。

同时，在班级植物角课程《给树叶宝宝找家》的活动中，主要课程目标是让幼儿可以区分常见的树叶。研究者在观察中发现教师说道：“A 小朋友，是不是很厉害，竟然把所有的树叶分对了，我们给他鼓掌。”同样在本次课程中该名教师对于 B 儿童不能够区分树叶时，教师不但没有给予该名幼儿帮助，反而说：“小朋友们你们说他分对了吗？”。这些言语中表现出来了该名教师所关注的重心是对于科学知识的掌握，过分关注科学知识目标的达成。

4.2 幼儿园植物角活动中教师评价类型

激励性评价是幼儿教师的一种评价方式和手段，针对幼儿的具体行为或事件，从语言激励、情感激励、物质激励、环境激励四种类型着手，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幼儿科学探究的兴趣，培养幼儿的主动性，促进幼儿科学探究能力发展的一切激励手段。

研究者对收集的 15 个具体的植物角活动中出现的激励性评价从语言激励、情感激励、物质激励、环境激励四种类型进行分类，分析四种类型在活动中出现的情景和出现的频率。

例如在科学活动《种子的传播方式》中教师使用了语言激励的方式，对于幼儿们的回答进行了正向的评价和鼓励，以下是活动的部分片段：

教师：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知道了原来莲子和椰子都是通过流水传播的，那么我问下小朋友们蒲公英是怎么传播的？

幼儿 C：靠流水传播。

教师：C 小朋友认为蒲公英是靠流水传播的，其他的小朋友还有其他答案吗？

幼儿 A：蒲公英是靠风来传播的。

教师：C 和 A 小朋友回答的都很棒，并且很完整。其实蒲公英是靠风来传播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教学过程中教师并没有单一的关注到幼儿是否对科学知识掌握，而是对于小朋友的完整回答给予了表扬。

同时在艺术活动《吹花画》中，教师将孩子们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吹花画，放到了环创墙中展示。在对活动中出现的激励性评价中，发现在幼儿园植物角活动实施的使用的评价中语言激励和环境激励两种激励类型出现的频率较高，对于情感激励和物质激励出现的频率较低。

讨论

1. 班级植物角活动目标局限于《指南》

幼儿的学习实质是幼儿在对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了解和挖掘事物本质和关系的过程。我国现行的幼儿园三级管理体制赋予了幼儿园更多的活动自主权利，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纲要》、《指南》提供了总的教育目标，学校方面则依据总的提出的教育目标结合幼儿园自身的资源设计教学活动。

对于幼儿的植物探究学习活动，《指南》提出详细的要求：幼儿需要能够感知和发现植物的生长变化及其基本条件；察觉到植物的外形特征、习性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通过考察、种植活动，感知生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的过程。在设计活动目标时，《指南》成为教师设计活动目标的来源。但是，这也导致教师的思维被束缚，更偏向于重视认知和情感目标，对于指南中没有提及的与植物探究相关的技能方面有所忽视。这就要求幼儿园活动目标不能单单教师自身的对儿童发展需要的解读，不单单是依靠《指南》中提出的目标。而是应该通过对儿童的日常观察了解儿童当下的生活经验，关注到当下儿童对植物角感兴趣的问题。多元化和符合儿童发展的活动目标，才能让植物角活动更好的满足儿童生活、发展的需要。

2. 班级植物角活动主题远离幼儿生活

在具体设计和实施班级植物角活动时，教师往往会通过自身的生活常识进行判断儿童现有的生活经验，对眼前幼儿实际生活经验的解读得少。在植物角主题的来源选择上，教师会更喜欢从现有的主题入手，从年级组设计的学年主题中延伸主题或是自身的兴趣和知识决定班级植物角活动的主题。这就导致班级植物角活动主题没有从幼儿当下的生活出发，幼儿对于活动的兴趣度较为薄弱。

儿童非一成不变的物体，而是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发展需要的人。因为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就必须考虑到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园的活动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地方就在于幼儿园活动的生活性。对于幼儿的教育不单单知识的传授那么简单，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生活即教育”“一日活动皆课程”。儿童具有巨大的潜力，能从环境、交往等

等方面获得经验，再把自身经验通过内化吸取其中的知识。所以我们要重视生活中给儿童带来的教育价值，让植物角活动主题源于儿童生活，让植物角活动真正能满足幼儿当下对知识的渴望。

3. 班级植物角课程设计单一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A 园教师在对于班级植物角活动设计上多局限在了科学领域，对于其他四大领域和植物角的关联没有深入的探索。植物角本身与科学领域相关度高，利用植物角设计科学领域的活动较为容易。但是，五大领域活动看似分散，实则五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对植物的观察，教师既可以通过科学领域活动，让幼儿观察、触摸以了解植物；同时也可以设计与之相关的艺术领域活动，通过绘画等方式，以不同方式引导幼儿对植物的认识和了解。五大领域对应着儿童发展的五大方向，不忽视某一领域，才能将植物角活动从单一的科学知识的学习转变为能够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课程。

同时，教师在设计如何组织植物角活动时候很少运用到小组教学活动以及个别教学活动这两种组织形式，对如何运用这两种教学组织形式有一定的顾虑。每一个教学组织形式都有一定的优势和局限性，会带来的活动效果也会一定的差异性。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活动目标或者活动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不同的组织形式也会给幼儿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教师需要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寻找更适合儿童参与活动的教学组织方式。

值得注意，在教学活动中，从活动的设计到实施环节都是教师确定的，但幼儿在活动中仍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在活动中，教师的角色不能单纯只是知识的传递者，更应该成为一个知识建构者，将活动中的知识与幼儿的生活建立联系。

4. 植物角活动教师评价质量不高

教师在评价的内容上关注到科学概念、科学情感和态度以及具体的科学探究，但是却忽视了植物角活动实施中的一些隐性表现，例如儿童在科学探究中的表现，儿童的情绪性体验等。

在幼儿园活动中，在植物角教学活动中的评价语言教师应该围绕目标，落实目标。教师会根据目标和对本班幼儿原有认知水平的了解，根据幼儿的回答，教师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如何通过不断的“提问-回答-提问”将活动深入进行，进而达到教师预设的目标。预设的教师评价语言或是教师在活动中产生的即兴评价，都考验到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应变能力。

所以幼儿教师在进行实施植物角活动的过程中，要仔细观察幼儿的行动行为、耐心倾听

幼儿的发言，充分发挥好评价语言对于幼儿活动的作用，能够针对不同的个体，进行客观的评价，用精、用准评价语言，既能关注幼儿全体发展，又能关注幼儿间能力水平的差异，给幼儿创造宽阔的思维空间，让他们在宽松自由的活动环境中，大胆地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结语

儿童是自然的儿童，儿童拥有自然的天性。通过班级植物角，给与身处于城市中的幼儿一片属于自然的区域。班级植物角作为一种有效的生命教育的载体，它能为帮助幼儿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和感知生命的真谛，在认识、观察、种植、培养过程中了解到生命存在的形态与方式。

植物角活动不是单单为了一种“收获”，而是在一种动态的参与中儿童作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与自然相遇，建立一种深层的与自然、与大地、与万物的联结。所以植物角课程需要教师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活动初始，需要对所涉及的科学知识要有一定的掌握，这对教师的知识素养有较大的要求。教师也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对植物角的教育潜力有充分的理解，发挥班级植物角的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 焦荣华. (2016). *儿童的自然教育之路*. 硕士学位. 南京师范大学.
- 虞敏芳. (2020). 在自然角中培养大班幼儿的探索能力. *科学大众(科学教育)*, 2020(03), 103.
- 张天予. (2020).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幼儿园种植活动初探——以小班幼儿植物角种植为例. *科学咨询(教育科研)*, 2020(12), 164.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 潘燕玉. (2013). “小小一角, 智慧无限”——浅谈幼儿园自然角的创设与管理. *学周刊*, 2013(01), 200.
- 杨枫. (2011). 新课程背景下幼儿园自然角区域环境的创设. *新课程研究(下旬刊)*, 2011(06), 44-46.
- 周碧波 & 康莉. (2013). 对比种植 探索自然——对比种植在幼儿园种植园区的应用. *生活教育*, 2013(12), 91-92.
- 姚佳怡. (2020). *幼儿园科学区角活动材料投放的基本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 硕士学位, 河北师范大学.
- 曹燕华. (2019). 大班自然角种植活动的创设与策略探讨: 基于本班自然角的观察和研究. *才智*,

2019(33), 192.

丰月瑶. (2017). 层级开发植物角 系统提升幼儿认知力. *成才*, 2017(11), 41-42.

秦旭芳, 谢果凤. (2011). 激励性评价的内涵及其实践探寻——兼谈在幼儿科学探究活动中的运用. 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 *第八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895-897). 沈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田兴江 &杨晓萍. (2011). 论幼儿园自然课程生成内涵及内容选择取向.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11(05), 8-10.

周立波. (2014). 以植物培植活动激发大班幼儿对生命的认识.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16(02), 115-117.

“双增”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挑战与对策**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INCREASE”**黎莹^{1*}Ying Li^{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ingli779@163.com

摘要：“双增”政策的实施对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教师需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课程设计多样化、提高自身的反思实践能力，不断在实践中夯实教学基本功，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和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名师联盟师徒结对，打造一支强有力的教师队伍擅长于教育教学，又乐于科学研究。

关键词：双增，教师专业能力，初中体育教师。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increase" polic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s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eachers need to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diversify their curriculum design, improve their reflective practic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ir basic teaching skills in practice,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ve spirit and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he master teacher alliance is a pairing of teachers and apprentices to create a strong team of teachers who are good at teaching and enjoy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Double Increase, Teache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引言

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同年10月26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提出“双增”政策，“一增”：在双减政策落实后，为学生减轻了校内的课业负担，这样学生增加更多空闲的时间，用在体育锻炼、艺术培养上：

“二增”：学生在体育和美育上，接受课外培训的时间增加了。

“双增”“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不仅家长和孩子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对于教师的专业能力可持续发展而言更是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特别是体育教师，面对增加的课外活动时间、教育方针政策向体育方向倾斜教学活动怎样设计，怎样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职前职后专业成长等问题是值得政策落地之后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教师既是教育活动中的教育者，也是教育改革中的实践者，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与最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教师的支持。“双增”背景下，教育部下发的改革措施对初中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又该如何应对挑战？

1. “双增”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要求

“双增”政策与“双减”政策对标，其中增加学生体育锻炼和艺术培养的时间，期待教师科学安排学生的课后活动和丰富的体育课程、美育活动课程。早在201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到“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同时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家庭型教师的目标任务”，2022年2月教育部继续深入开展“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健康教育活动，这不仅为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带来发展机遇，更对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1.1 转变传统教学模式

“双增”政策下，学生的学业负担较小，体育活动、课外活动时间增加，要求体育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而促进教学活动多样化展开。增加体育锻炼和艺术培养的时间，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标准，向善向上。传统的教学模式单一化，讲解、示范、指导，小组自由练习。体育活动有了充足的时间，教学活动设计应多元化，考虑到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运动方式，考虑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尽可能满足大多数学生的需求，确保大部分学生能在体育活动时间达到锻炼的目的。以学生为本，坚持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转变传统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在体育活动中获得课本之外教室外的成就感，帮助学生实现在全面发展的促进学生个性化的成长。

1.2 提高素养增强科研意识

新课程改革的推进，科研引领已成共识，增强体育教师的科研水平成为新时代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关键。体育教师从事科研工作，既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对体育教师的要求。大量新课程的设计和开发需要教师不断充实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提高科研素养，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高科研意识。教师不仅要准备好每一堂课，还需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增强自己的科研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改革的持续推进，对体育教师科研素养、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教学中进步，在科研中提升，通过与学生的充分交流或课堂活动中，在研读前辈的课题研究中积累科研经验，积极参与学校的课题研究，在交流学习活动中提高自身发现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以此为契机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

1.3 提高教学反思能力

教学反思一直以来都是各学科教师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的重要法宝，体育教师更是如此。著名学者叶澜教授说，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合理的教学反思要求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的思考，采纳学生的反馈，结合同事、同行的客观评价，研读理论文献的精髓理论结合实践进行系统性反思。不仅仅基于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还要考虑教学结果和教学过程，将结果评价和过程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教学反思体系。教师还要积极参与校内教育教学研讨和校外家校联盟与同事家长开展沟通合作，反思并改进自己的教学。

2. “双增”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挑战

“双增”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了体育教师的教学活动计划安排，迫使学校作息时间表、课程安排等一系列培养方案的变革，推动着教师自身专业能力发展的变革。梳理学界相关研究发现，初中体育教师专业能力主要存在教学基本功不够扎实、课程设计简单、教学科研能力弱等问题。下面结合现存问题分析初中体育教师在“双增”政策实施后面临的具体挑战。

2.1 教学基本功有待提高

教学基本功扎实的教师可以从其语言表达能力、教学板书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备课是教师上好一堂课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也是课堂气氛准备的基础。不少教师根据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准备、根据参考教材照搬照用，使得课堂活跃度较低。初中生正处在活泼好动，生命力旺盛的阶段，对新鲜事物持有高度的热情，但持续时间较短，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的语

言枯燥无趣、课程环节的衔接不紧凑，讲解速度较慢，学生活动实操的时间太短都会影响学生对体育课的期待，不利于学生体育兴趣的养成。

相关研究显示，教师只是在形式上认同改革背后的先进教育理念，具体行为中并未体现出个性化的教育理念。体育课上，教师注重完成学校安排的课外活动任务，并没有给予每个学生寻找一种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的机会。调研中看到，教师一堂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让学生跑 400 米，没有其他关于 400 米的体育技能技巧。实际课堂中会出现，临近广播操比赛或者学校运动会，体育课就变成了广播操练习课、校运会走队形训练课。40 分钟的课程训练 30 分钟，最后 10 分钟自由活动，长此以往学生对体育课变得熟悉而又陌生。

教师的语言表达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体育教师往往忽视日常教学活动中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专攻专业运动技巧的术语，未曾对课堂交流用语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未站在学生的角度使用易于学生理解的语言，讲授运动技能技巧，实际教学过程中没有展现出教师的教育智慧。“双增”政策实施，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夯实教学基本功，在课堂内外展现教师的教育智慧，引导学生热爱体育运动，理解坚持体育锻炼对自身身心发展的价值，做新时代学生健康发展的引路人，而不是学生运动锻炼的教练。

新时代，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的普及，体育教师未能将先进的教育技术融入到实际的课堂教学当中，课堂讲授运动技能技巧依旧是单一的教师一人讲解，缺少图文并茂，学生会对较难的动作要领难以掌握，未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领悟运动技能技巧。

初中体育教师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运动习惯的老师，因此体育教师的教学基本是否扎实将决定初中第一堂体育课能否对学生接下来三年的体育课学习充满求知欲，真正能够从体育运动中收获快乐。

2.2 课程设计单一化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目标引领内容，在年度计划、学段计划内容设定时，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运动兴趣及需求、学校师资配置情况、学校传统体育、特色文化等进行一体化设计。“双增”政策的实施对教师课程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过去传统单一化课程设计将面临新时代的考验。

从相关研究结果可知，教学模式单调枯燥导致有些学生出现体育课逃课、请假，理论课睡觉的现象频繁发生，每学期的第一节课课程设计显得尤为重要，影响着学生对本学期体育课的期望程度。从运动前的热身运动，适当加入学生们喜爱的、有节奏感的音乐，加上教师的引导课堂的氛围就会在此刻活跃起来。

教师在课程设计仅仅考虑学科知识，较少考虑学习者本身的兴趣、身心发展特点，仅为了上课而上课，为了达成目标而走形式，学生的参与度会随之下降。班与班之间学生对运动技巧的掌握存在差异，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也不同，体育教师的课程设计没有体现班级之间的区别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

教师课程设计仅仅只考虑学科知识本身，忽视我国的教育目的中所提到的“德智体美劳”，课程设计只体现了教师教学设计对每个运动技巧的把握，缺少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的关注与培养。体育活动时间充足的今天，体育课堂或者户外活动课程仅仅考虑学科知识一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单一片面、简单的课程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课程设计单一化，学生参与学习积极性不强，教师还需要面临课堂管理纪律较难管理的困境。学生参与度不高、课堂表现不积极，部分学生会故意扰乱课堂纪律，影响教师的正常上课；部分学生虽不会扰乱课堂秩序，但会对体育课埋下一个无趣的种子，与其说热爱体育运动，不如练习几道题，考试多得几分，学生容易形成对体育锻炼占用自身学习时间的错误观念。课堂讲解之后，学生自由练习存在问题没有再次集中统一指导，而是放松运动后直接下课，缺少本次课程学习内容的总结回顾。

课程设计会影响实际教学效果、影响学生对课程的期待，单一化的课程设计很难再满足信息化时代下初中生对体育课的好奇心和求学心，丰富的课程设计、趣味性强、竞争性的课程会让学生喜欢体育运动、乐于参与体育运动。

2.3 教学创新精神需培养

教学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科研成果上。科学研究是学校发展的动力，更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同时还是提高教师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途径之一。“双减”政策要求教师丰富学生校内课外活动时间的同时，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提高科研素养。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广西农村体育教师工作任务重，不仅要承担全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还需要负责全校各种课余体育活动的组织指导，忽视对自身科研能力的要求。职后学校不重视、相关培训课程空缺、教师对自身的科研能力不够自信。相关研究结果中，关于学校体育各方面研究的文献总计为 2292 篇。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教师的创新能力跟不上，科研素养推后腿，课程和教学上就很难找到吸引学生参与课堂的创新点。

“双增”政策实施迫使教师在合理安排好日常的教学活动后，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提升科研素养。教师需要利用好备课时间研读当前研究文献，系统性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课题研究项目中，积累自己科研经验。不断深入学习了解相关智能体育对初中教学活动的运用，以及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更适合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教师提升科研素养和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教师应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和技能知识的学习，积极开展对学生体质健康的研究，在生活中主动探索观察和运用所学专业知 识，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关注科研动态，梳理科研意识，朝着一名学习者、研究者努力，推动中学体育教育教学发展。

3. “双增”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对策

响应“双减”政策的号召，积极应对挑战的不仅仅是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校内外名师联盟，强强联合携手并进、提供间接经验支持。转变传统教学方式，课程设计多元化，学科渗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科研，共享科研成果，让更多的学生和老 师受益于“双增”政策的价值。

3.1 校内外名师联盟，师徒结对促发展

“双增”政策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体育活动时间和课外自由活动时间，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 到户外活动中。这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调动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体育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具体从学习和实践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双增”政策落地学校间应加强校内外名师联盟，名师工作室助力新时代教师成长。托马斯说：教师专业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将关注的重心从个人化的努力向学习者的共同体资源。在共同体资源中，教师通过参与合作性的实践来滋养自己的教学知识和实践智慧。名师工作室不定期举行讲座传授经验，传帮带、师徒结对的方式促进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明确当前的教育环境，传统的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教师之间开展实际教学困惑交流学习，听取其他教师的解决方式和意见。促进教师对转变传统教学方式的重视和态度，唤醒其内在的教育情怀和教育初心。校内外名师二对一强强联合，帮助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不断开拓创新授课形式，朝着多样化、多元化转变。转变传统教学方式的同时，不断夯实教学基本功，提高教师的教育智慧，每一堂课都留下掌声、笑声。从根本上推动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改革，名师指导每周反思总结，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另一方面，在实践所学的新的教学方法应用到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增加课堂的活跃度和参与度。教师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时与名师交流探讨，研究这背后隐藏的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存在不妥当的地方及时改正。例如，多媒体教学技术的示范，缩短了学生实际练习的时间，使得部分教师不得不对现代技术教学应用产生抵触心理。需要及时与教师进行沟通，授课教师必须要意识到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作为教师需要在当中进行指导和引领，传统的教

学模式不能够直观展示，不适应新时代学生身心发展要求。有助于教师勇于克服实际困难并对实践中的问题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进行反思。教师的学习需要常常来自日常教学中遇到亟待解决的实践性问题。

搭建具有地区性、校本性的职前、职后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体系。邀请名师走进高校指导准备实习的新晋体育教师分享交流经验，培养新晋教师形成终身学习、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发展的意识。入职后教师自我制定一份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成长手册，记录自己听课学习的收获感受，与自身教学相结合总结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和解决。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体系不仅提升能力，更要提高教师入职后的教育情怀、建设职业倦怠心理疏导中心，增强奉献教育事业的社会使命感。

3.2 课程设计多元化，多学科融合拓新知

“双增”政策的要求下，教师需要在课程设计上投入更多的时间，让学生在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中，收获体育活动带来的快乐。教师在夯实自身专业基本功的同时，结合各学科的特点，课程设计加入不同学科的元素，充实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有助于不同学科教师进行交流，填补体育教师对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存在的认知盲区。具体从交流研讨，结合学生实情、多方合作三方面展开。

首先，学科之间交流研讨。我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学科之间相互交流融合，多学科多视角搭建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课程体系，结合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学科教学方式、教育教学中所积累的知识为出发点展开交流合作，同一年级之间交流研讨，制定符合本年级学生的课程。

其次，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符合学生兴趣爱好的体育课程。在学校软硬件设施的支持下，采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与学生体育课程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指导正确的体育运动姿势和运动准备、放松方式，实景模拟的方式让孩子感受不锻炼身体、不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危害。课程设计之初，与学生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充分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热爱一项体育运动并坚持锻炼。设置竞争类的、团体合作类、学科课程渗透的体育活动，引导学生从体育活动中交流自己的感悟，开展主题式的校本体育课，增强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例如，在体育竞技比赛中，凸显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准则，彰显当代中学生的道德品质。

最后，加强多方合作，提升体育课程深度和广度。健康教育是新时代学校体育教学任务的新内容，是体育学科素质教育的新形式，是对体育教师能力素养的新要求。积极开展与兄弟学校及体育馆和教育研究机构、体能训练培训机构合作，侧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导向，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加快体育教学与其他学科知识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健康生活的

知识、开展健康生活进校园、邀请奥运冠军进校分享运动故事等营养与运动、心理健康与体育运动的公益活动，提高学生对健康生活、体育锻炼的认识，平衡体育运动与学习生活的时间、劳逸结合，让学生重新认识体育、参与体育锻炼、热爱体育运动。

3.3 鼓励教学创新，科研能力促成长

教师需要增强创新意识和科研素养，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以应对“双增”背景下的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立足教学第一线，掌握学科研究热点提高教师的科研文化素养。

首先，立足教学第一线。从教学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研究课题切记大而空，坚持从教学实践中来，又服务于教学实践。体育教师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经验考虑，坚持每一堂课反思总结，课后阅读相关资料进行理论总结和探讨。注重于同事之间、名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造一个擅于教学又乐于科研的体育教师团队。

其次，掌握学科研究的热点。贯彻落实“双增”政策，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利用课后实践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科研能力培训班，听取学科专家的观点、建议。学校建立科研学习交流平台，为教师的科研成长之路提供保障。

最后，教学和科研要回到根本的育人目标上。在教学中，探索发现，在课题研究中实践适合学生的体育运动，开发新的体育活动内容，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紧系学生未来的成长需要，从学生中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科研探究中找寻科学的解决方式，最终服务于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

结论

在“双增”政策的落地实施中，虽然学校的各项教学活动都要变革，但是其中也对初中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教师在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后，要不断夯实自身的教学基本功，培养创新精神，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素养，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王从春. (2016). 体育教师科研能力的影响因素与发展举措—上海市学校体育科研现状的分析.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04), 79-82. doi:10.16099/j.sus.2016.04.014.
- 张丽军, 孙有平. (2021). 我国体育教师教学能力评价: 反思与建构.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01), 67-73. doi:10.14104/j.cnki.1006-2076.2021.01.008.
- 杨静茹. (2021). 青少年体质健康背景下体育教师能力面临的挑战. *田径* (05), 17-19.
- 彭温豪博. (2019). 新高考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教学与管理* (27), 56-59.

- 尹丽旺, 李会明. (2019). 边疆民族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科研困境与突破路径. *当代体育科技* (27), 130-134. doi:10.16655/j.cnki.2095-2813.2019.27.130.
- 杨静茹. (2021). 青少年体质健康背景下体育教师能力面临的挑战. *田径* (05), 17-19.
- 马小清, 张华. (2015). 广西农村初中体育教师科研能力现状与提高对策. *钦州学院学报* (11), 55-58.
- 杨兴文. (2020). *成长的守望: 名师工作室助力教师专业发展实践研究*.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20.12, 60-62.
- 罗蓉、李瑜. (2012). *教师专业发展: 理论与实践*.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8, 100-102
- 陈素烟. (2018). 建构主义视野下“师徒结对”对新任教师的影响. *内江科技*, 2018, 39 (10): 120-121.
- 柏丹, 马瑞. (2021). 新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师资培养的再审视. *上海教育科研* (11), 52-58. doi:10.16194/j.cnki.31-1059/g4.2021.11.010.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研究**A STUDY ON TEACHER' GUIDANCE BEHAVIOR IN STRUCTURAL GAMES IN LARGE CLASSES**杨成鹤^{1*}Chenghe Yang^{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526367949@qq.com

摘要: 要想在结构游戏活动中充分发挥游戏的最大价值, 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本研究以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对南宁市某幼儿园的四个大班的十二名教师指导行为进行为期两周的观察。研究发现, 当前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主要存在投放低结构材料较少、指导方式单一、介入时机不够准确、偏向于扮演指导者, 权威控制性强这四个问题。作为教师应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不断积累教育的指导经验, 掌握科学观察方法, 灵活转变教师角色。幼儿园应积极为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

关键词: 大班, 结构游戏, 教师指导行为。

Abstract: Teachers' guida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ximum value of structured games. In this study,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and twelve teachers in four large classes of a kindergarten in Nanning were observed for two weeks. 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 guidance behaviors in large class structured games mainly have four problems: less low structure materials, single guidance mode, inaccurate intervention time, preference to play the role of instructor, and strong authority control. As a teacher, we shoul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education, constantly accumulate educational guidance experience, master scientific observation methods and flexibly change teachers' roles. Kindergarten should actively provide teachers wit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Keywords: Large Class, Structural Game, Instructional Behavior of Teachers.

引言

结构游戏是幼儿游戏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也是幼儿游戏当中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丁琦琦，龚正华，2019）不同年龄幼儿或同一年龄的不同幼儿，由于其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经验不同，（丁海东，2001）受认知水平、动手操作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幼儿对生活中事物的认识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幼儿需要教师的指导，以帮助幼儿解决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促进其发展。在此研究者拟通过对南宁市某幼儿园的大班教师在结构游戏中指导行为的调查研究，了解老师在游戏中指导行为的发展状况，找出其中出现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可靠建议，为幼儿教师的指导提供参考。

研究目的

通过对南宁市某幼儿园的调查研究与其大班教师在结构游戏中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记录，了解老师在游戏中指导行为的发展状况，找出其中出现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可靠建议，从而提高大班教师在结构游戏过程中的指导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幼儿更好的发展，这是我们本次研究的目的。

文献综述

围绕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行为现状展开研究，研究者以“区域游戏”、“结构游戏”、“教师指导行为”等关键词查阅了国内相关的硕博论文等，对近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整理，研究幼儿园大班教师指导幼儿进行结构游戏的现状，以下是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1. 关于区域游戏的相关研究

1.1 区域游戏概念研究

区域游戏是指教师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创设适当的区域活动环境，幼儿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游戏材料和方法进行自主学习的游戏活动。（江盼，2017）同时，区域游戏也是幼儿自主获得新经验，收获愉悦体验的活动。它既能为幼儿提供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机会，丰富其原有经验，也能反映出幼儿的身心发展和内心需求。

1.2 区域游戏指导行为研究

1.2.1 关于区域游戏中教师角色定位的研究

在区域游戏活动的实践中，常常会出现教师的区域角色定位不当的现象。郝萍瑞指出教师不仅是幼儿环境的创设者，也是活动的观察记录者、支持引导者。（郝萍瑞，2008）陈淑

敏认为教师在游戏中还扮演时间的安排者和管理者、材料与经验的提供者。(陈淑敏, 1999) 因此, 从不同角度看待教师, 教师的角色定位也是不同的。

1.2.2 关于区域游戏中教师指导方式和策略的研究

教师在区域游戏中的指导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指导和间接指导。其中直接指导包括以自身为媒介进行语言指导和非语言指导, 而间接指导则是指以材料或者幼儿伙伴为媒介进行的指导。(丁海东, 2001) 针对不同的区域游戏, 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指导策略。一是根据幼儿的需要与兴趣及能力发展组织相关游戏; 二是通过提问问题来引导幼儿进行游戏, 引发思考; 三是以谈论的方式发现问题从而找出解决问题办法; 四是采取多种方式来使幼儿具有丰富的相关经验。(刘焱, 2015)

1.2.3 关于区域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现状与问题研究

教师在幼儿区域游戏活动中, 往往习惯于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幼儿身上, 而忽略幼儿的主体性地位。其次是教师由于指导经验和能力不足, 介入幼儿游戏的时机不够准确和介入方式不够科学, 指导区域游戏时也容易偏向于指导某一区域的幼儿而不能兼顾其他区域的幼儿。(左文玲, 2004) 再次, 教师在指导幼儿游戏活动时重于给幼儿传授知识和游戏纪律管理, 而忽略了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成长体验。(李会敏, 2006)

2. 关于结构游戏的研究

2.1 结构游戏概念研究

结构游戏是幼儿利用教师提供的积木、积塑、沙土等材料进行建构作品, 提高幼儿创造力、反映周围生活事物的游戏。(宋娜, 2015) 同时, 结构游戏是一种能增强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 反映自身想法的游戏。

2.2 结构游戏价值的研究

结构游戏对幼儿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 结构游戏不仅可以发展幼儿的感知运动技能、提高幼儿认知水平、培养幼儿美感, 还能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和创造力的提高。(黄人颂, 1992) 其次, 结构游戏不仅可以为幼儿提供与周围事物互动的机会, 帮助幼儿认识周围生活中事物, 还能提升幼儿肢体协调的能力, 促进幼儿审美能力的发展以及身心健康发展。(杨珊珊, 2009)

2.3 结构游戏特点的研究

结构游戏主要以建筑和搭建作品的方式开展, 其具体表现为结构游戏必须要有材料以及建构的基本操作。(丁海东, 2001) 结构游戏从不同角度分析, 有不同的特点。它从材料看可以认为它是一种素材玩具, 而从行为上可以说它则是幼儿自主搭建的活动。

2.4 构游戏发展阶段的研究

学者邹敏、张承宇、孙丽影认为儿童的结构游戏发展水平主要有摆弄、垒高平铺重复、架空、围合、模型、再现六个阶段。（邹敏，张承宇，孙丽影，2015）学者王翠萍则具体指出了幼儿在3岁时进行的主要是简单平铺、延伸式的二维结构，5岁的时候逐步探索垒高、架空等简单的三维结构，5岁后孩子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作品并为其命名。（王翠萍，2016）因此，随着幼儿认知结构的逐渐完善及动手操作能力不断提高，表征经验越来越丰富，幼儿的游戏水平也会不断提高。

3. 关于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3.1 大班结构游戏材料投放现状

3.1.1 投放材料的性质

结构游戏材料具有真实性、结构性的特点。学者刘焱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游戏材料的性质与幼儿智力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使用低结构材料的前提是幼儿必须具备一定的建构技能与表征经验以及动手操作和想象能力。随着大班幼儿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他们在学习新经验的同时能将旧经验融入其中，并能在脑海中按照自己的想法中构建象征性的画面，符合低结构材料使用对象的要求。因此，低结构材料更适合投放于大班的建构区当中。

3.1.2 投放材料的数量

“投放材料数量的多少”一直以来备受热议。一部分学者认为幼儿参与结构游戏，会需要很多建构材料。因为幼儿认为使用越多材料，建构的作品就越好，所以只有当材料都用完时才意味自己完成任务。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幼儿结构游戏时投放材料的数量主要是依据幼儿的年龄和数量以及搭建的需求决定，而不能盲目投放材料。在结构游戏中，材料的数量的投放对幼儿参与游戏的兴趣、游戏中是否获得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大班幼儿结构游戏过程中，要根据幼儿的年龄发展水平、游戏需求等投放数量适宜的材料，以充分发挥结构游戏对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

3.2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介入时机与方式

3.2.1 教师介入时机的研究

教师的正确介入可以引导幼儿游戏的深入的开展，促进幼儿游戏水平的提升。教师介入的时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当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较低时，二当幼儿违反游戏规则时，三当幼儿不能顺利进行交流合作时，四当幼儿遇到困难寻求帮助时，五当幼儿重复某一搭建动作或一情节时。除了上述情况，王青莲指出当幼儿在游戏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或支持鼓、游戏

中出现过激行为、幼儿不能独自解决矛盾、出现不良情绪、教育契机、幼儿无所事事时教师都需要介入。(王青莲, 2010) 教师适当的介入其中, 可以帮助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愉悦的体验。

3.2.2 教师介入方式的研究

针对幼儿的游戏情况, 教师介入幼儿游戏的方式有很多种。刘焱认为教师介入幼儿游戏的方式主要是直接介入、利用游戏材料的介入和以游戏参与者身份的介入三种,(刘焱, 2000) 但主要以平行式介入、交叉式介入、垂直介入为主。不管采用哪种接入方式, 教师都要注意介入的时机, 尽量在合适的介入时机时介入, 否则容易破坏幼儿游戏的氛围和降低幼儿的游戏兴趣。

3.2.3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内容

华爱华认为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的内容主要有: 认识材料种类及作用的技能、操作材料的技能、分析建构作品构造的技能等方面。此外, 由于各年龄段幼儿的发展水平不同, 教师指导的内容应有所侧重和不同。在大班幼儿结构游戏中, 教师则主要指导幼儿学习铺平、围合、平式联结和交叉联结等建构技能, 搭建一些稍有难度的建构作品, 鼓励幼儿搭建具有主题情节性、逼真美观的建筑群。(华爱华, 2003)

3.2.4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的问题

在建构活动中, 教师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幼儿建构水平的发展。当前在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出现以下问题: 首先, 教师在游戏时间不够合理。其次, 教师对幼儿的游戏过程预设太多。再次, 教师在建构区投放的材料种类单一、层次性不强。最后, 教师指导方式不当, 缺乏方法和技巧, 限制了幼儿的想象能力的发展。(周红梅, 2011) 因此, 教师在游戏前期, 如果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 游戏中指导不科学, 就很难完全达到游戏预期效果。

3.2.5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策略

余星宇指出指导策略按其目的划分, 可分为讲解示范型、启发引导型、干预控制型、总结评价型四种。(余星宇, 2018) 同时, 其他学者认为教师指导策略可以归纳为积极策略与消极策略两种。积极策略主要是指教师是以正面的方式对幼儿进行指导, 消极策略是指教师以批警告、制止等方式进行指导。在大班幼儿结构游戏中教师也偏向于运用积极策略。

4. 对现有研究的思考

综合上述国内外的研究, 可以发现现今关于幼儿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行为研究主要从区域游戏的相关研究、结构游戏相关研究、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行为研究三大方面进行展开。其中区域游戏研究主要涉及其概念、教师的指导行为, 结构游戏研究则主要围绕其概念价

值、特点、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展开，而结构游戏中教师的指导行为研究主要涉及教师指导的时机与方式、教师指导内容等方面。

虽然研究者对结构游戏的进行研究总结，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但有些地方还是有所争议的。例如在结构游戏材料投放数量上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所以，本研究将以相关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幼儿园大班教师进行深层、集中观察和访谈，从而进一步了解教师指导行为的现状，查明现存在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提高教师的指导水平，改善指导效果，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研究方法

1. 非参与式观察法

研究者本人在与班级教师一起工作的同时，征求教师的同意，借助电子设备在幼儿进行结构游戏前对教师投放材料的性质及数量、游戏过程中教师介入的时机、方式以及指导角色与策略等方面进行记录，一共观察教师指导幼儿结构游戏 150 次。

2. 访谈法

在调查研究初期，研究者采用非结构型访谈。在观察活动时或活动结束后，针对教师的指导行为对其进行相关的交流沟通。而调查研究后期则以结构型访谈为主，研究者充分利用下班时间，对教师自身组织开展的结构游戏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访谈。

3. 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中研究者将南宁市某幼儿园大班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并将所要研究的问题编制成问题表格进行打印。

研究结果

1. 教师投放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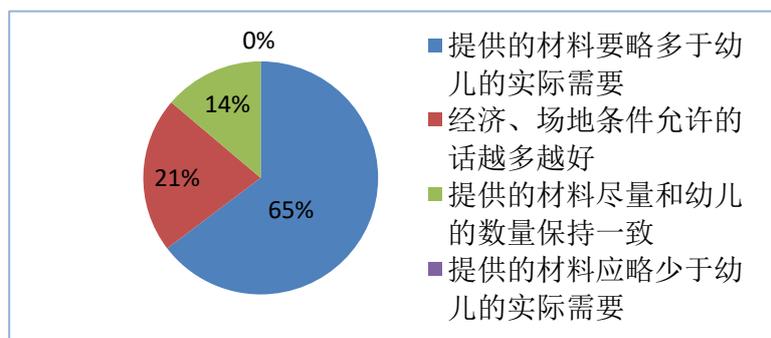


图 1：教师提供结构游戏材料数量统计图

从图 1 的统计数据可知，在投放结构游戏活动材料的数量上，65%的教师认为应该比幼儿实际需要的多提供一点，21%的教师认为“如果经济、场地条件好的话应该提供一点”。



图 2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2 至图 9 是某大班教师在建构区投放的材料图片。从图片上看，教师投放的材料主要是积木和积塑，数量还是较充足的，但是种类相对来说较单一。

从教师的访谈中可知，在结构游戏材料的选择上，教师在大班建构区投放的材料偏向于大型积木和塑料拼插玩具；数量上，教师投放的材料还是很充足的。但经过观察发现，大班建构区里缺少一些低结构的材料。

2. 教师指导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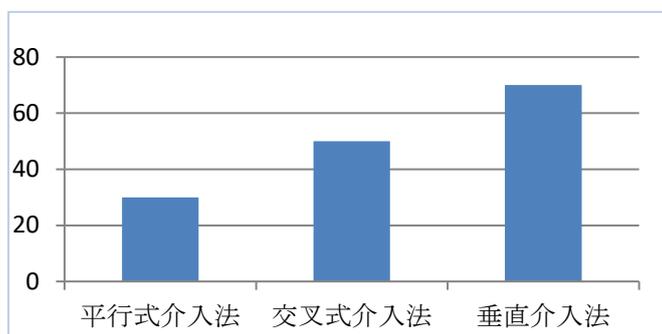


图 10: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的方式统计图

图 10 的数据统计表明，教师在指导幼儿结构游戏时，采用垂直介入法次数最多，而使用其他两种指导方式次数相对较少，由此得出教师在指导幼儿结构游戏活动过程中是偏向于使用垂直介入法的。

案例一：在一次结构游戏活动中，蓓蓓在建构区进行搭建，刚搭了一会又拆掉，反反复复几次。见此现状，老师为能够暗示引导她，在旁边搭了一座小花园。蓓蓓见到后，她也像老师那样搭了一座花园，并且她还对花园进行了装饰。

案例中的幼儿没有明确的搭建目的，多次重复同样的操作，面对此情况教师选择以平行的角色的身份对幼儿进行指导。采用平行式介入法一方面可以让幼儿感受到教师对幼儿的关注，增强幼儿游戏的自信，另一方面幼儿可以学习教师的行为，其有利于更好地帮助幼儿掌握结构游戏技能。

案例二：帆帆和佳杰在结构区合作搭建一座火锅店，搭建好后他们在第一层放了搭了凳子给客人休息，第二层搭了厨房，第三层搭建餐桌椅子。但是他们又说道：“店是搭好了，都没有客人光顾，怎么办呢？”这时，帆帆看见老师站在旁边，就邀请了老师做他们的新顾客，老师也答应了。老师问：“那我要怎么上去呢？”经老师这一问，他们才想起忘记搭楼梯了。于是两人边笑边搭建着。

案例中幼儿主动邀请教师扮演顾客角色，教师欣然答应，这不仅可以丰富游戏情节，而且还能让幼儿感受到教师对幼儿的关心。教师采用交叉式介入法介入幼儿游戏，可以为幼儿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游戏环境，让幼儿体验到积极欢快情绪，提高幼儿参与游戏的积极性和搭建水平。

案例三：有一次结构区的材料洒满在地，六六几个小朋友商量着要搭什么，但是他们各自都有想法，于是开始发生争执。这时老师听到争吵声后，匆匆忙忙赶过来，看见直接质问

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听完后，老师请他们一起合作搭建公路。但是他们都不愿搭了，跑到了其他区域。

教师听到争吵声后选择直接介入，虽然听取了幼儿诉说发生的事情，但是教师只是听而已，并没有对其采取针对性正确的指导。同时在没有征求幼儿的意见下，盲目提出让他们搭建公路的主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幼儿身上。垂直介入法的指导是显性的，虽然教师可以直接介入，解决幼儿的问题，但这种方式容易破坏游戏氛围，减退幼儿继续参与结构游戏的兴趣和积极性。

3. 教师指导的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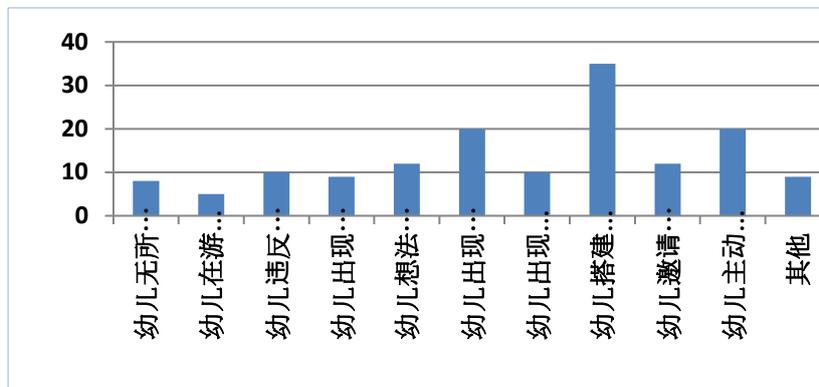


图 11：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介入时机统计图

图 11 数据显示，教师介入的时机一共有 11 种，其中当幼儿搭建过程遇到困难时、幼儿出现争抢玩具时、幼儿主动寻求帮助时教师都能及时进行指导，帮助幼儿解决难题；但在幼儿无所事事时、在游戏中反映消极内容时、出现不安全和过激行为时教师介入次数较少。

4. 教师指导时的角色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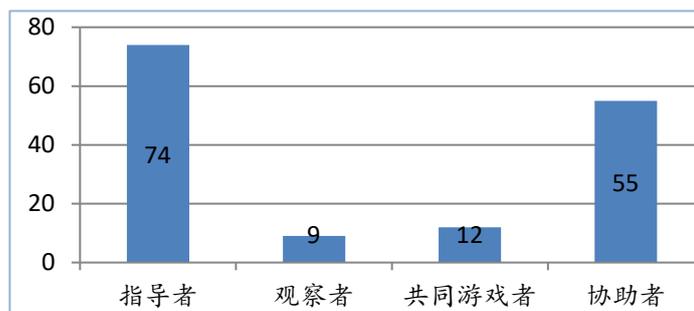


图 12：大班结构游戏活动中教师指导角色统计图

图 12 中的数据显示，教师扮演指导者 74 次、协助者 55 次、共同游戏者 12 次、观察者 9 次。由此得出教师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比较偏向于以指导者身份对幼儿进行指导。

4.1 指导者

虽然教师在幼儿游戏中扮演指导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幼儿的原有经验，引导幼儿向教师指导方向思考。但由于幼儿经验有限，在游戏中常常会遇到问题，需要教师的参与，如果教师总是以指导者身份参与到幼儿游戏当中，并且急于为幼儿提供帮助，这可能会阻碍幼儿的游戏活动，降低儿童参与游戏的热情。

4.2 观察者

观察幼儿的游戏不仅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幼儿的兴趣和需求，有的放矢地指导幼儿游戏，还能不断改善自身的教育行为。在游戏中，教师指导幼儿游戏的关键是教师观察好幼儿的游戏，了解幼儿的活动情况，对此能作出针对性的反馈。

4.3 合作者

教师参与到幼儿游戏活动中，成为幼儿的游戏搭档，师幼合作操作探索，相互交流。教师的参与，可以给幼儿带来自信和成就感。幼儿也会更愿意把游戏当作是展现自我的一个小舞台，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到游戏当中。

4.4 协助者

教师适宜的帮助一方面可以满足幼儿的需求，增加成就感，另一方面保护幼儿游戏的积极性和兴趣，促进幼儿游戏活动的顺利开展。

5. 教师指导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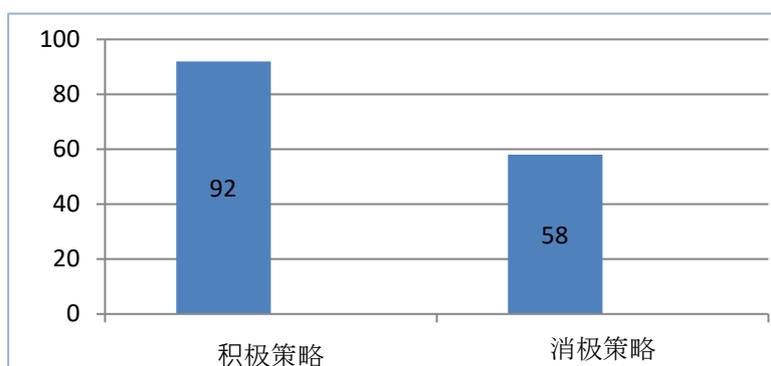


图13：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策略的类型及使用次数

图 13 数据统计显示，教师在结构游戏中共进行 150 次指导，其中采用积极策略的指导次数为 92 次，占 61.3%；采用消极策略的指导次数为 58 次，占 38.6%。由此可得知，在两种策略中，教师更偏向采用积极正面的策略对幼儿进行指导。

虽然消极的命令、制止、批评也会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使用其过程中也会给幼儿营造一种紧张的气氛，幼儿自主学习的欲望就会减退。另一方面，教师使用消极策略次数过多，会对幼儿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造成不良的影响，教师的消极评价也会给幼儿产生消极情绪。

6. 教师指导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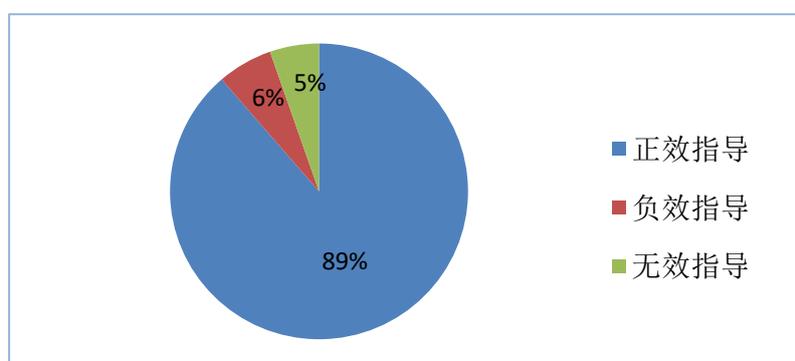


图 14：大班结构游戏活动中教师知道效果图

在幼儿园里大班教师正效指导占比例较高，约为 89%，远远高于无效指导和负效指导。这说明幼儿愿意听取教师的指导并按教师的指导进行活动。负效指导占比约为 6%，说明了教师采取的一些不够合理的指导，阻碍了幼儿的建构活动。无效指导占比约为 5%，这说明了教师虽然对幼儿采取了指导，但是其指导对幼儿并没有产生作用，所以幼儿的活动仍没有发生变化。

6.1 正效指导

案例四：大一班建构区中，婷婷和瑶瑶正在搭建一座学校，看到老师走过去的时候，他们邀请老师参观他们搭建的学校，并激动地向老师介绍：“他们搭建了一所学校”。教师表扬她们搭建得很不错，并向她们提出一个建议：“你们觉得在搭建的学校里加上一个升旗台，会不会更好呢？”婷婷她们点点头说：“对哦，每个学校也会像我们一样周一的时候升国旗。”说完便继续搭建升旗台了。

案例四中幼儿对于教师提出的建议是能听取和欣然接受的。教师的建议给幼儿带来启发，引发幼儿思考，从而让幼儿充分投入到活动中，促进其发展，起到指导和介入的目的。

6.2 无效指导

教师的指导之所以无效，往往是因为教师忽略了幼儿的知识储备，跨越了幼儿的思维，直接把自身的想法加在幼儿身上，盲目在活动中进行指导。因此，教师要以增强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幸福体验，帮助幼儿积极思考，学习生活经验和知识为目标，来指导幼儿开展游戏活动，提高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促进幼儿的成长。

6.3 负效指导

案例五：晓健和几个幼儿在建构区用积木摆了一个又大又长的圆形，然后把各种积木乱七八糟放进去。老师见到后走过去看了看说：“你们为什么不会分类放好呢？”老师说完走就开了，晓健他们只好按老师的要求，把积木分类放好。但是等老师回来时，晓健他们都去其他区域玩了。

老师在没有观察的、完全不了解幼儿游戏行为的情况下，盲目介入，打断了幼儿的游戏思路 and 想法。随意的介入，使得幼儿的游戏兴致顿失，也终止了幼儿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游戏行为。因此，教师在介入幼儿游戏指导时，要避免盲目性，如若不然，教师指导开始很可能就是幼儿兴趣减退之时。

讨论

1. 大班幼儿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过对南宁市某幼儿园大班结构游戏活动的观察和调查，研究者发现教师在幼儿游戏活动中的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促进幼儿结构游戏活动的顺利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幼儿的建构水平。但是，教师在指导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1.1 教师投放低结构材料数量较少

上述图2至图9及对教师的访谈表明，大班建构区的材料虽然数量比较充足的，但还是缺少一定数量的低结构材料。而出现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教师对大班建构区投放材料方面缺乏科学正确的认知，忽略低结构材料在建构区的重要性和价值。

低结构材料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在结构游戏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可以为幼儿提供更多的独立思维力和构思发展空间，同时也提供多种选择和创造的机会。因此，教师在大班建构区一定要充分利用低结构材料的优势，将其以科学合理的方式投放到结构游戏中，以促进幼儿主动探索学习，丰富幼儿的建构技能和经验。

1.2 教师过多使用垂直介入法，指导方式单一

研究者通过观察记录和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发现，教师存在过多地使用垂直介入法，指导的方式运用得不够科学合理的情况。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总是急于帮助幼儿解决难题，而没有选择科学适当的介入方式进行引导，去提升幼儿的能力和思维。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经验型的教师在处理幼儿游戏中的问题时凭借的是自己多年积攒的实践经验，但缺乏幼儿行为观察理论；有些新手教师对幼儿的思维特点和成长规律的理论学习不够扎实，不了解幼儿的发展水平，所以在进行游戏介入时把握不好介入的方式，具体实施效果较差。

1.3 教师指导介入时机不够准确

教师在不同时机介入幼儿的游戏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最佳的时机介入能增强幼儿参与游戏的欲望；反之会减退幼儿的游戏兴致，并会对幼儿的游戏活动造成阻碍。

把握好介入幼儿游戏的时机，是教师在专业成长路上的必修课之一。当幼儿碰到难题时不要急于给出解决难题的办法，要给幼儿提供思考的机会，最大限度地让幼儿自己解决走出困境；当幼儿争抢玩具、违反游戏规则、想法违反常规教师时也不要急于判断制止。假若幼儿一出现争抢玩具教师就立即介入阻止，这会使幼儿失去了独立处理问题、体验情绪变化的机会；幼儿一违反规则或想法违反常规教师就批评，可能也会扼杀幼儿今后探索世界的勇气。当然，如果当幼儿无所事事、反映消极游戏内容、主动邀请老师参与、主动寻求帮助、出现不安全、过激行为时教师是需要马上介入的。

1.4 教师偏向于扮演指导者，权威控制性较强

幼儿的游戏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幼儿的游戏能否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其价值，主要取决于教师在幼儿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幼儿年龄小，经验有限，在游戏中或是因为争抢玩具发生争吵需要帮助，或是因为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教师应该思考这种情况适不适合马上给予指导。因为大班幼儿的社会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提高，很多事情或是问题他们是独立解决。相反，如果教师仅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过于给予积极的指导和帮助可能会好心干扰幼儿的游戏，阻碍幼儿游戏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2.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教师的观念

2.1.1 结构游戏观

幼儿园教师对结构游戏的理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教师在结构游戏指导行动上的准确性，针对这一重要因素，研究者对教师进行了访谈。研究者发现，部分教师能对结构游戏有正确的认识，小部分教师对结构游戏的认识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的。他们认为幼儿是结构游戏活动中自由自在的个体，在游戏时间里幼儿自己想搭什么就搭什么。在结构游戏过程中，无视游戏给予幼儿的发展价值。

2.2 教师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质

2.2.1 教师对幼儿的指导不够熟练科学

教师经过理论学习和积累经验后，掌握一定的指导方法，但是其掌握的方法并不完全准确科学合理的。例如教师在访谈中有谈到，他们垂直方法使用较多，但是他们在多次使用后并没有考虑到这一频繁的指导行为会对幼儿发展造成影响。其次，他们通常都是在幼儿需要时才介入。他们不知道这一想法会让他们错失很多指导的最佳时期，也让幼儿失去了更快发展的机会。最后，由于他们对幼儿缺乏正确熟练的指导方法，导致他们在指导幼儿开展结构游戏活动中会出现无效或负效的情况。

2.2.2 教师不善于观察

教师本身是具有观察意识，但是他们并不善于观察。访谈中教师提到，他们有时会观察，但是有时事情比较多，没有太多的时间观察。有时班里幼儿又比较多，教师会观察不过来，所以常常是自己也想观察但是实在观察不了，出现需要介入情况时，只能直接介入。

在幼儿游戏活动中，教师要面对几十个孩子，不能完全靠随机观察就能了解到每个幼儿的活动情况。因此，教师在幼儿结构游戏活动中应该要有核心的观察。在建构活动中通过对幼儿的观察，教师能了解到幼儿现阶段最真实的建构水平，从而能够得知现阶段幼儿需要怎样的指导，并给予科学的指导，促进其发展。

2.3 幼儿园培训力度不够

幼儿园培训是教师学习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渠道，虽然教师可以通过自我学习获得知识，也可以通过日常经验积累的获得技能，但是还是远远不够的。

3. 大班结构游戏中教师指导行为的相关建议

3.1 教师自身方面

3.1.1 教师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教师只有树立科学正确的教育观念，才能更好地指导幼儿开展建构活动。

教师要树立正确的结构游戏观。一教师要知道建构活动是什么；二教师要知道大班幼儿建构活动有什么特点，活动中包括的建构技能和建构要素都有哪些；三教师要知道建构活动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对幼儿来说有何重要意义。教师只有树立正确的建构活动观，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好的对幼儿进行指导，促进幼儿的发展。（余星宇. 2018）

3.1.2 教师要不断积累教育指导经验

幼儿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且幼儿是连续不断发展的，幼儿的发展又具有差异性的，如果理论和实际不相结合，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教师在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也要努力积累教育实践经验。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更加有效地指导幼儿的建构活动。

3.1.3 掌握科学观察的方法，适时介入指导

在结构游戏中，教师对大班幼儿进行恰当的指导可以使幼儿更容易了解游戏材料的特性和游戏的规则，帮助幼儿更好地开展结构游戏，获得积极的行动体验，[3]而掌握科学的观察方法是教师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情。通过观察，可以从幼儿的行为变化中分析幼儿现阶段的建构水平、同伴交往情况，判断是否需要介入幼儿的活动，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会达到更好的指导效果。

3.1.4 灵活转变教师角色

研究表明，教师在建构活动中，主要以指导者的身份对幼儿进行指导，对其他的身份使用较少。但在指导过程当中，教师指导者的身份一出现，一般会给孩子造成约束感，对于教师的指导，很多幼儿会迫于教师的权威而选择接纳服从。在建构活动中，教师的角色是多样的，教师应该随着幼儿活动情况加以灵活转变。但不管以什么身份对幼儿进行介入指导，教师始终要把幼儿放在游戏活动中最重要的位置，尊重他们的想法，为孩子提供和谐的活动环境，从而促进幼儿结构游戏的发展。

3.2 幼儿园层面的建议

3.2.1 幼儿园积极地为教师提供学习的机会

第一，增加幼儿园教师外出参加研讨会议，学习其他先进园所的经验 and 专家学者最新观念和理论，可以有效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指导技能的水平。

第二，开展专家主题讲座。开展专题讲座是提高教师指导水平的重要途径，教师可以向专家提出指导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专家进行专业解答，从而得到提高自身的指导水平。

第三，支持教师外出进修学习。进修学习可以提高教师的思想认识，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

第四，组织教师到示范园观摩学习。通过观摩，可以看一看其它幼儿园教师是如何有效地指导建构活动的，相互学习分享，吸收其他幼儿园优秀的指导经验来提高本园教师的指导水平。

参考文献

南姣鹏, 钱海娟. (2015). 大班幼儿结构游戏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课程教育研究*(22), 21-22.

- 丁海东. (2001). *学前游戏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丁琦琦, 龚正华. (2019). 结构游戏在幼儿园大班活动中的实施情况研究. *河南教育(幼教)* (07), 58-61.
- 江盼. (2017). 大班幼儿区域游戏中教师介入指导行为的个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温州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801&filename=1017275052.nh>
- 郝萍瑞. (2008). 人类发展生态学视野下幼儿园区域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8&filename=2008118676.nh>
- 陈淑敏. (1999). *幼儿游戏*. 台湾: 心理出版社.
- 刘焱. (2015). *儿童游戏通论*.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左文玲. (2004). 幼儿园区域活动的新思考. *江西教育科研*(05), 35-40.
- 李会敏. (2006). 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教师指导行为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广西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7&filename=2007047109.nh>
- 宋娜. (2015). 幼儿园结构游戏中的教师指导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601&filename=1015647160.nh>
- 黄人颂. (1992). *学前教育学参考资料下册*.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杨珊珊. (2009). 幼儿园结构游戏材料配备与使用的评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09&filename=2009187399.nh>
- 邹敏, 张承宇, 孙丽影. (2015). *幼儿园游戏*.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翠萍. (2016). 幼儿园结构游戏的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801&filename=1017281081.nh>
- 王青莲. (2010). 促进教师适时介入游戏的有效性策略. *科教文汇(中旬刊)* (11), 57-58.
- 刘焱. (2000). *幼儿园游戏教学论*.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 华爱华. (2003). *幼儿游戏理论*.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红梅. (2011). 当前幼儿园结构游戏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析. *教育导刊(下半月)* (05), 46-49.
- 余星宇. (2018). 大班建构区活动中教师指导策略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湖北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901&filename=1018119621.nh>

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现状研究——以南宁市为例**A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SCHOOL IN NANNING, CHINA**农江婷^{1*}**Jiangting Nong^{1*}**¹ 南宁师范大学¹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365784222@qq.com**

摘要: 学前期是幼儿进入小学教育前的准备阶段, 在语言能力上应当做足充分的准备, 以备于幼儿适应小学的教育。本研究通过对幼儿园大班教师及一年级教师展开关于幼儿语言入学准备内容的调查, 了解两个教育阶段的教师对语言入学准备能力的要求, 探寻其异同。发现两类教师的语言入学准备观念有所差异, 对幼儿进入小学时应掌握的语言能力的要求不同, 影响了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活动的开展。针对相关情况, 本研究提出了建立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幼儿的语言教育、建立幼儿语言入学准备能力评价机制, 实施补偿性学前教育、营造良好的家庭语言环境等教育建议帮助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有效开展。

关键词: 幼儿, 语言, 入学准备, 幼小衔接。

Abstract: Preschool period is the preparatory stage for children to enter primary education, so they should be fully prepared in terms of language ability so that children can adapt to primary education.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cont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school by investigati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large classes and first-year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ers'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school in two educational stages, and to explor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types of teachers have different concepts of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school entrance, and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when they enter primary school,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school entrance. In view of the relevant situat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to help children's language preparation effectively, such as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connection between kindergartens and primary schools, effectively strengthening children's language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children's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school, implementing

compensatory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creating a good family language environment.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Language, Preparation for Admission, Connecting Stage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School.

引言

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承担着为学前儿童未来的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奠定基础的重要责任。在幼儿时期，人的众多能力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包括语言能力、运动能力、艺术能力等，而语言能力的发展尤为重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儿童语言在得到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其他领域的学习和发展，比如事物认知、技能操作、情感萌芽、逻辑思维和社会性等。因此，作为教育者应该在平时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更加注重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正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所提出，幼儿园应该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开展幼儿的言语教育时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既包括家庭、社区和学校，学校中也应当做好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工作。学前期是幼儿进入小学教育前的准备阶段，在语言能力上应当做足充分的准备，以备于幼儿适应小学的教育。尽管幼儿园与小学在语言课程上存在阶段性和连续性，但二者在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以及教学进度上都存在差异性，为了地解决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问题，需要幼儿在进入小学之前做好语言方面的准备，以便幼儿能够更好地去适应新的学习生涯。语言入学准备得到真实有效的开展，对于幼儿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指南》中有指出：“幼儿时期是语言发展的巅峰时期”。大量的教育实践也证明，婴幼儿时期是人一生中众多能力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即“敏感期”。如果婴幼儿能够在“敏感期”内得到及时且良好的语言教育，为进入学校教育做好充分的语言准备，那么就能够帮助其尽快地适应新的学习阶段，对其一生的发展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幼儿园、小学和家庭等方面都较为重视幼儿的语言入学准备，但由于受到种种现实情况的影响，如升学压力等。教育者在对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理解只局限在为幼儿储备小学知识，如掌握一定的识字量、学习并运用汉语拼音和背诵唐诗宋词等。这样的“揠苗助长式”的语言入学准备观念过于狭隘，且会给幼儿的身心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如今，还有一些幼儿园还提倡以知识教学为指导的教育理念，重视儿童的认知发展和技能培养，忽视儿童的自主学习意识、学习兴趣和态度的养成。这种带有严重“小学化”现象的语言教育违背了当今提倡的可持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念。

研究目的

随着幼小衔接科学化的呼声不断高涨，教育者逐渐对幼儿语言教育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幼儿语言入学准备得到了受到众多研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很多学者对于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研究视角主要放在对幼儿的语言测试上，如王声平、田兴江等。很少学者有通过对比幼儿园教师及小学教师对语言入学准备的任务和内容的要求来展开研究。本研究从对比幼儿园与小学对幼儿语言入学准备要求出发，对当今幼儿园与小学在语言教育衔接、以及语言入学准备活动开展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寻找相关解决策略，为幼儿的语言入学准备的开展提供一些思路与建议，为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科学衔接提供借鉴意义。

文献综述

1. 关于入学准备的研究

1.1 入学准备的内涵

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入学准备的定义都有着他们不同的见解。国外的研究人员普遍接受的概念是由 NEGP 提出来的生态模式，这个模式包含三方面，分别是儿童对学校的准备、学校为接受儿童所做的准备和社区、家庭为入学准备提供的服务和支持。我国学者廖莎对于入学准备概念的说法有两种，一个是广义上的，指的是幼儿进入正规教育机构（幼儿园、各级学校）中学习与生活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和条件；另一个是狭义上的，即幼儿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学习和发展时应该必须拥有的关键特点和基本条件（廖莎, 2007）。

总之，关于入学准备的内涵，大致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来讲，入学准备指的是幼儿对学校的准备、学校为接受幼儿所做的准备以及家庭、社区为幼儿入学准备的支持和服务；狭义上而言，入学准备是指进入基础教育阶段学习时对对幼儿各方面发展水平的期望，以及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任务要求的身心状态。

1.2 入学准备的现状

所处环境欠佳幼儿的入学准备、入学准备的相关领域划分、教育者的入学准备观念是目前学者们对于幼儿入学准备现状的主要研究方向。

首先，所处环境欠佳的幼儿包含有，社会经济地位或者家庭经济环境欠佳的儿童、流动儿童、被遗弃的儿童和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等。刘丽伟等人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父母会经常参与幼儿的语言教育活动，在参与的频率上要明显高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父母（刘丽伟, 2015）。也有很多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所处环境欠佳的幼儿相较于普通的幼儿来说，入学准备水平明显比较低。其次在对入学准备相关领域的划分上，NEGP 的划分方式是从入学准备的

内部领域进行划分，分别为健康与运动技能、认知与一般知识、语言、情绪与社会性以及学习方式五大领域。最后，教育者的入学准备观念会直接影响到幼儿的入学准备水平的发展，而教育者的入学观念多种多样且并不稳定，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由学者李玲玲指出的幼儿园所在地、教师的文化程度、职称和教龄以及有无编制等因素（李玲玲, 2013）。

1.3 影响入学准备的因素

邵宇指出，儿童在身体健康和运动技能发展上的缺陷可能导致其在入学准备上落后于正常的同龄幼儿（邵宇, 2010）。在实际的教育活动开展中，会发现患有某些疾病或健康问题的儿童，会因为身体的不适而减少学习的机会、降低与外界刺激的接触，甚至会躲避与成人和同伴的互动等，这些机会的丧失极有可能会使他们在言语、认知和情感社交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同龄的健康儿童。家庭背景往往直接影响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发展情况，是决定幼儿入学准备水平的主要因素，通常为父母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长的教育参与程度以及家庭的教育资源四个方面。父母特征通常包括父母的文化水平、教育理念等；家庭经济状况指家庭经济收入；教育参与行为通常包括亲子互动、共同学习等内容；教育资源通常指对儿童思维逻辑、认知能力等有促进作用的电子产品或纸质资料。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智力发展起着引导作用，儿童的入学准备水平往往与父母的特征、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的教育参与和指导密不可分。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的入学准备观念等都会影响到幼儿入学准备教育的开展，学校和教师以入学准备活动开展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措施等方面影响幼儿入学准备水平的成绩。为了确保幼儿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时能够保持充足的学习动力，岳素云建议幼儿园与小学双方教师加强交流与合作，更深入地了解幼儿的认知能力、学习方式等方面的情况（岳素云, 2015）。学前教育机构与小学的有效衔接会大大促进幼儿入学准备的发展，使得幼儿能够更好地融入新的学习生活中。

2. 关于语言入学准备的研究

2.1 语言入学准备的内涵

首先，在对幼儿语言发展的重点和要求上，国外的 NEGP 认为是运用语言进行表达与书写；我国在《纲要》中也认为是倾听表达、阅读和书写准备。其次，在阐述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概念时，不同的学者的表述也有所不同。其中学者刘焱认为语言入学准备就是儿童在进入小学学习之前，他们的语言发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状态，反映了当前社会以及学校所期待看到的学前儿童应有的语言学习经验和能力，具体包括了听动与视动的转换、空间的感知、识别细微的差别、阅读技巧与故事理解、理解阅读与表达等内容（刘焱, 秦金亮, 潘月娟&石晓波, 2012）。

基于对幼儿语言发展的侧重点的了解，再结合入学准备的概念解释，可以将语言入学准备的内涵说明为：幼儿在进入小学一年级时，期待他们的语言应该达到何等的发展水平，或者在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以及接受新的学习任务时，幼儿的身心发展程度与状态。

2.2 语言入学准备的现状

幼儿语言学习的准备工作看似是学前儿童教育机构单方面的教育任务，但实际上它与基础教育系统的教育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幼儿园对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基础教育的语言教学工作，良好、有效的语言入学准备可以帮助幼儿更好的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对于语言入学准备的教育内容上，陈帼眉认为，幼儿园教师不应盲目地争取幼儿园的孩子应该理解多少单词，掌握多少的汉字认识量，而是应该重点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分析和比较分类等能力，增强他们的空间意识，加强他们对倾听与表达方面等语言能力的训练，进而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陈帼眉, 1997）。湘音认为，孩子们的语言入学准备重要内容是进行读写准备，并了几点建议：首先是提高幼儿手部小肌肉的灵活性，提高他们控制笔书写的的能力；其次是发展他们的空间感知能力；三是帮助幼儿初步地了解日常中口头用语与书面用语的对应关系，能够理解前阅读和前写作的基本规则；四是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湘音, 1998）。提升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整体质量是许多学者和教育者持续追求的目标。“生态化”研究取向是目前国内外的学者一致认为的研究语言入学准备的最好取向，学者们对于“生态化”的解释，就是将幼儿的语言入学准备看成为一个由儿童、家庭、学校和社区多方联动的生态系统，而不是把这项工作仅仅看成幼儿园单方面的责任与任务，这样的研究取向拓宽了研究视野，对于幼儿的发展和提高学前教育的整体质量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提出的“延迟入学”曾经成为人们认可的入学准备的主要干预措施（于涛, 邵宇 & 盖笑松, 2010）。在他们看来，入学准备的状态是由孩子的发展成熟水平决定的，孩子的入学准备有他们自己的生物钟，每个孩子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孩子发展成熟之前为其提供入学经验是没有用的。

2.3 影响语言入学准备的因素

关于影响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因素，国内外研究者的看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主要有儿童的性别以及年龄；家庭的亲子结构、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长的教育观和参与教育的情况等；学前教育机构的办园理念、等级、教育环境质量、环境创设、师资配置、教师的教育观和课程设置等；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之间的差异等。语言入学准备的影响因素同样呈现出生态化的取向，并且越来越丰富和细化，未来的研究将会朝着更加科学合理地建立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影响因素体系，并考虑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动态变化的方向上发展完善。

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在南宁市选取五所幼儿园及五所小学，以幼儿园中的大班教师和小学里的一年级教师为研究对象，共 47 名大班教师和 42 名一年级教师。幼儿园类型涉及公办园、民办园及高校附属幼儿园，小学类型为公办小学。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语言能力的三维度，即口语交际能力、前阅读技能和前书写技能依据，将幼儿语言入学准备划分为良好的倾听习惯、听懂常用语、口头表达的意愿、完整正确的表达、文明规范的表达习惯、良好的阅读兴趣与习惯、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有识字兴趣、有一定识字量（约 100 个常用字）、认读拼音、运用拼音简单拼读汉字、喜欢书写、正确书写自己的名字、书写姿势正确、书写字体工整等类目。基于以上能力类目设计调查问卷，了解不同教育阶段的教师对语言入学准备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的相关情况，获取相关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信息。

研究结果

1. 不同教育阶段的语言教育内容分析

1.1 培养语言学习的兴趣与习惯是主要任务

教育目标决定教育内容，教师在开展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活动时，所开展的内容主要围绕教师所设定的目标，即语言入学准备的主要任务。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教师对幼儿语言入学准备主要任务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培养儿童语言学习的兴趣和习惯是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最主要的任务，其次是对幼儿进行语言学习的启蒙教育，最后才是帮助儿童初步掌握拼音和汉字，详见表 1。

表 1: 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主要任务

	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主要任务			合计 (%)
	对幼儿进行语言启蒙 (%)	培养儿童语言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	帮助儿童掌握拼音和汉字 (%)	
大班教师	14.3	37.4	1.1	52.7
一年级教师	6.6	33.0	7.7	47.3
合计	20.9	70.3	8.8	100.0

1.2 不同教育阶段的教师对语言教育的侧重点有差异

在对幼儿口语交际能力、阅读前技能和写作前技能三个维度之下的各能力的重要性进行调查时发现，不同教育阶段的教师所侧重的能力类目有所不同。首先，在口语交际能力中，幼儿园大班教师以及小学一年级教师都注重幼儿具有口头表达的意愿、能听懂常用词以及具有良好的倾听能力这三个方面。除此之外，小学一年级教师在这基础上还注重幼儿完整正确表达的能力。其次，在阅读前技能上，幼儿园大班教师侧重的前三项为有识字的兴趣、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良好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小学一年级教师的侧重点在于具有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约 100 个常用字的识字量、良好的阅读兴趣与习惯。最后，双方教师在书写前技能上都更加侧重于培养儿童具有正确的书写姿势、并且能够书写出自己的名字，不同的是在第三项侧重点上大班教师选择的是喜欢书写，而小学教师选择的是书写字体工整，详见表 2。

由此可知，在幼儿园阶段，教师们在幼儿语言入学准备上更加注重培养幼儿对语言领域的兴趣和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而小学教师在培养幼儿兴趣与习惯的基础上，对幼儿应用语言的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能够完整正确的表达、具有一定的识字量以及书写字体工整。教师对幼儿入学前语言能力的要求直接决定了教师对于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教育内容。

表 2：必备的语言入学准备项目的被选择数及比例

能力维度	必备的语言入学准备项目	大班教师		一年级教师	
		计数	比例 (%)	计数	比例 (%)
口语交际能力	良好的倾听习惯	34	72.34	31	73.81
	听懂常用语	35	74.47	31	73.81
	口头表达的意愿	40	85.11	35	83.33
	完整正确的表达	27	57.45	32	76.19
	文明规范的表达习惯	23	48.94	28	66.67
前阅读技能	良好的阅读兴趣与习惯	30	63.83	31	73.81
	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	36	76.6	33	78.57
	有识字兴趣	38	80.85	29	69.05
	有一定识字量（约 100 个常用字）	28	59.57	32	76.19
	认读拼音	16	34.04	25	59.52
前书写技能	运用拼音简单拼读汉字	14	29.79	20	47.62
	喜欢书写	30	63.83	25	59.52
	正确书写自己的名字	36	76.60	33	78.57
	书写姿势正确	32	68.09	38	90.48
	书写字体工整	19	40.43	30	71.43

在实际的语言训练中，两个教育阶段的教师所侧重的教育内容也有所不同。幼儿园大班教师在幼儿语言入学准备中，各个教育内容的比重差异较大，在日常的学习中重点在于训练幼儿口语交际能力的发展。小学一年级的教师在一年级的教育内容中比较注重的是儿童各个方

面能力的均衡培养，但对于拼音、识字等方面的训练会更为重视一些。

综上所述，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教育内容囊括了口语交际能力、阅读前技能以及书写前技能三个维度能力的培养而展开各个方面的培养，整体看较为全面。从教育目的上看，两个教育阶段的教师都能达成一致，认为培养幼儿语言兴趣是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主要任务。但具体的教育内容会受到不同教育阶段的入学准备要求的影响而产生差别，如幼儿园教师倾向于注重的是口头语言的运用训练，如口语表达训练等，而一年级教师在关注幼儿口语运用能力之外，对书面语言的应用也更为重视。

2. 幼儿教师开展语言入学准备教育的手段分析

幼儿园是入学准备教育的主要开展实施方，幼儿教师也是入学准备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在开展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教育中，教师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对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有效施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大班幼儿教师语言活动设计的教学目标、方式和途径的选择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班教师开展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教育活动，首先在对活动目标的设计上，会依据本班级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结合幼儿园相关课程目标文件，如《纲要》《指南》等来制定。其次，幼儿园大班教师经常使用的语言教学途径是以集体活动教学为主，辅之以个别教学和随机教学。最后，常用的语言教学方式是以游戏和示范为主，详见表 3。由此可知，大班教师在开展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教育活动，锻炼幼儿入学技能时更能够做到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采用儿童感兴趣和容易接受的游戏形式传授入学准备知识与技能。但在教学途径的选择上比较单一，更多的选择集体教学。

表 3：大班教师组织语言入学准备的设计

	选项	小计	比例
语言活动目标的设计	根据课程目标文件来制定	14	29.79%
	根据教师参考用书来制定	8	17.02%
	根据个人想法来制定	4	8.51%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需要来制定	21	44.68%
常用的语言教学方式	讲解	29	61.7%
	示范	37	78.72%
	游戏	38	80.85%
	多媒体演示	21	44.68%
常用的语言教学途径	集体活动教学	38	80.85%
	随机教学	22	46.81%
	个别教学	25	53.19%

3. 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开展效果分析

通过幼儿园系统的语言教育之后，幼儿到了大班或一年级时，语言能力发展水平是否

达到了教师的语言入学准备目标呢？为此，本研究对比大班教师与一年级教师对本班级儿童在语言入学准备能力上存在哪方面的不足，结合教师们日常组织语言能力训练的内容了解当前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开展效果。结果显示，在语言能力三维度中，幼儿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和习惯相关项目的发展，教师们总体还是较为满意的。也有一些项目是教师们认为还存在发展不足的情况，比如在在口语交际能力中，两个教育阶段的教师认为，幼儿对于完整正确的口头表达的发展还有待加强；在前阅读技能上，一年级教师希望幼儿在进入小学前，能够具有一定的识字量以及掌握拼音的认读及简单运用；在前书写技能上，幼儿对书写姿势的掌握还比较弱，详见表 4。由此也更能看出幼儿教师与一年级教师在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要求存在差异，一年级教师的要求会高于幼儿教师的培养目标。

表 4：班级幼儿不足的语言入学准备能力的对比

能力维度	不足的语言入学准备项目	大班教师		一年级教师		总比例 (%)
		计数	比例 (%)	计数	比例 (%)	
口语交际能力	良好的倾听习惯	6	6.6	7	7.7	14.3
	听懂常用语言	3	3.3	4	4.4	7.7
	口语表达的意愿	7	7.7	4	4.4	12.1
	完整正确的口头表达	27	29.7	35	38.5	68.1
	文明规范的表达习惯	9	9.9	19	20.9	30.8
前阅读技能	阅读兴趣和习惯	5	5.5	5	5.5	11
	初步的阅读理解能力	10	11	11	12.1	23.1
	识字兴趣	7	7.7	1	1.1	8.8
	具有一定的识字量 (100 左右常用字)	13	14.3	28	30.8	45.1
	认读拼音 用拼音拼写汉字	14	15.4	24	26.4	41.8
前书写技能	喜欢书写	0	0	1	1.1	1.1
	正确书写自己的名字	16	17.6	3	3.3	20.9
	书写姿势正确	31	34.1	42	46.2	80.2
	书写字体工整	6	6.6	21	23.1	29.7

总结

1. 幼小语言教育的缺乏有效性配合

在调查中，67.41%的教师认为幼儿教师与小学教师的入学准备观念存在差异是阻碍当前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有效施行的重要原因。而幼儿教师与小学教师的教育观念差异源于两个教育阶段的衔接工作做得不到位。调查结果表明，只有 12.77%的幼儿教师和 7.14%的小学教师表示有经常参加关于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幼小衔接活动。由于大部分教师很少参与相关衔接活动，

以致于只有 4.26%的幼儿教师和 9.52%的小学教师表示非常了解另一个教育阶段的语言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这影响到了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开展。

幼小衔接工作的不到位导致了幼儿园与小学在语言教育的衔接上，缺乏有效性的配合。通过对比两个教育阶段教师在语言入学准备教育的观点，发现幼儿教师与小学教师对于幼儿语言发展的要求和教育内容存在差异。幼儿教师在幼儿语言的培养时，更注重培养幼儿的口头语言发展、对语言的兴趣和学习语言的习惯等，而幼儿进入小学后，小学教师则更为重视幼儿的书面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希望幼儿能够简单的掌握语言的具体使用，如识字、认读拼音等，要求会更高一些。两个教育阶段对幼儿语言发展的不同要求使得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教育难以做到有效衔接，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教育阶段的对接工作做得不到位。幼儿园和小学在语言教育的衔接上缺乏沟通和配合，不了解对方的需求与学习任务，导致了幼儿在幼儿园接受了幼儿园认为幼儿应该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但进入了小学，却发现这些知识和技能不符合小学教师对学生语言能力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这为幼儿适应新的学习阶段带来了困扰，挫伤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2. 教育者的观念及语言素养有待优化

部分教师尚未树立科学、正确的语言入学准备观。虽然我国教育部多次提出严禁幼儿教育“小学化”，但部分小学教师为了自身能够更容易地完成教学工作，要求幼儿在进入小学前能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和掌握拼音认读及简单运用。加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才竞争压力增大，使得部分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迫切希望幼儿园能对幼儿进行大量识字、认读拼音、背诵唐诗宋词和写作等小学语文内容的训练。这些来自家长和小学的压力影响着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和语言入学准备教育的开展方向。

幼儿园的办学理念中，是否重视幼儿语言入学准备并采取一系列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措施，对于幼儿语言发展和入学准备来说都极为重要。儿童语言发展以幼儿语言课程为重要的载体，从我国推行了“一纲多本”的课程政策以来，幼儿园在语言课程的设置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同办学理念的幼儿园所设置的语言课程有所不同，因此入学准备的教育内容上也会随着语言课程设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的幼儿园注重培养幼儿的语言兴趣和学习语言的习惯与态度，有的幼儿园则迫于现实家长的需求，提前给幼儿教授识字和拼音等小学教育内容。给幼儿教授“小学化”的语言内容，是不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不正确语言入学准备观念。在这样不健康的观念指导下所进行的语言入学准备教育，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进步，但从长远来看却会阻碍幼儿的学习兴趣和语言的更深层发展，“揠苗助长”式的学习只会磨灭幼儿学习的积极性。

在幼儿园中，教师的语言素养也影响着幼儿的语言发展。幼儿语言的发展贯穿于幼儿一日的生活和学习之中，除了组织专门的集体教学活动之外，日常的随机教育也是幼儿学习语言的重要时机。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在幼儿的语言学习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教师的语言素养水平在幼儿学习语言中起着关键作用，由于幼儿的年龄特点，逻辑思维发展尚未健全，语言表达不够清晰和完整，缺乏逻辑性。如果教师能够及时向幼儿指出错误，并教育幼儿正确的语言使用方法，则会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但这需要教师有一定的语言素养，能够帮助幼儿，如若教师语言素养欠缺，则会在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道路上增添阻碍，不利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

3. 幼儿园语言教育过于集体化

由于受到班级幼儿数量较多的影响，在幼儿园语言教育的实际开展过程中，教师更多采用的是集体教学的方法组织学习活动，而在集体教学中所选择的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通常取班级幼儿发展水平的中间值。但幼儿的语言发展存在明显个体差异，发展水平比较高或比较低的幼儿会因为已经掌握了所学内容或者跟不上教师的进度，而游离在教师的授课之外，但很多教师因为没有他们的能力进行过科学的评估，就会以为他们在捣乱课堂甚至怀疑他们在智力方面存在缺陷，以致于缺失对他们开展针对性的教育，阻碍了幼儿的发展。在幼儿语言教育的开展过程，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展开针对性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幼儿是语言入学准备教育活动的主体，是教育活动能否有效施行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幼儿个体存在差异性，幼儿发展存在阶段性，因此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效果也存在差异性。有些幼儿在语言方面的发展领先于同龄幼儿，在语言的学习上与普通的同龄幼儿相比，接受能力更强，速度更快，保持更久。也有一些先天发育不足的幼儿，如听障幼儿、迟说话幼儿等，他们由于先天的不足，语言能力发展缓慢，以致于他们在语言发展上落后于同龄的普通孩子。正常健康发育的幼儿在语言的发展上也存在着阶段性，每个年龄阶段所发展的语言能力有所不同，在适合的时间进行适当的语言训练才能事半功倍的发挥出教育的效果。

4. 家庭语言教育的实施比较薄弱

在实际的教育中，很多家长将幼儿语言入学准备归结为幼儿园的任务，但通过对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75.28%的教师认为家庭的入学准备观念是影响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重要因素。家庭是幼儿学习和生活的主要环境之一，很多生活上的知识与经验都是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学会的，因而在儿童语言发展中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教育水平以及职业等要素共同构筑起一

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深刻地影响着幼儿的身体健康以及认知发展。经济发达的地区以及家庭条件优渥的家长在幼儿教育的观念上更具有前瞻性，并且有能力为此提供良好的物质资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家庭的家长往往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谋生上，对于幼儿的教育重视程度比较低，也没有充裕的经济条件支持幼儿的能力发展。儿童的语言准备水平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如经济状况相对靠后的地区的儿童在语言入学准备中明显要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儿童(王声平&胡玲燕,2013)。但社会经济处境不利的家长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促进孩子社会情感非认知入学准备技能的获得(夏小英,2020)。

相比于幼儿园系统的语言教育，家庭层面在语言教育的实施上比较薄弱。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人格形成和智力发展起着引导作用，儿童的入学准备水平往往与父母的特征、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父母的教育参与和指导密不可分。但就目前而言，很多家长在家庭中对幼儿的语言教育仅停留在教会孩子认字、说话的比较表面的教育，而对于更深层次的语言素养、学习品质和态度等方面的教育还较为缺乏。甚至有些家长认为将幼儿送到学校接受学校的教育就可以了，不再重视的家庭教育，在幼儿面前不注重语言的规范使用，甚至使用一些不文明的用语，没有做到言传身教。

讨论

1. 建立幼小科学衔接的长效机制

语言入学准备不仅仅只是幼儿园单方面的责任与工作，也需要小学积极参与和配合。建立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长效机制，双方就彼此对于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的要求展开深入交流，了解对方的教育目标和内容，共同开展语言准备的宣传活动，促进幼儿园和小学的双向衔接与配合。

由于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存在本质性的不同，其目标与内容也有所差异，因此幼儿园和小学双方应积极组织语言入学准备研讨会，共同商议出满足双方需求的幼儿语言入学准备教育目标、内容等，并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兴趣采取相关教学组织策略，为幼儿在语言方面进入小学后更够尽快尽早地适应提供帮助。此外，加强对幼儿园、小学教师提供有效的职前和职后培训，增进教师对这两个学段儿童发展特点、课程与教学差异的理解，促进教师之间的沟通合作协调，确保他们对儿童实施连贯性的教学(路娟,2021)。幼儿园大班教师应加强幼儿在学习习惯和规则的培养，帮助幼儿建立初步的规则意识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小学低年级的教师应为刚进入小学的儿童，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学习环境，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儿童顺利过渡。

2. 规范幼儿园语言入学准备教育

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够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为提高幼儿的语言学习效果，幼儿园具有为学龄前儿童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幼儿园作为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主要开展场所，应该切实加强幼儿的语言教育。

首先，教师要树立科学的语言入学准备观，科学有效地开展幼儿语言教学活动。尊重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兴趣，为幼儿提供广泛学习语言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倾听和表达能力、阅读兴趣和能力、保护幼儿的书写前兴趣，做好必要的书写准备，避免出现极端化的教育。此外，教师应加强自身的语言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通过良好的语言使用规范，为幼儿树立榜样。良好的语言素养是在对幼儿的提问时，给予语气柔和的、神态丰富生动的回应，且所回应内容具有拓展性。其次，丰富幼儿语言学习的途径和手段，在组织集体教学活动之余，不忘结合幼儿园的一日活动开展语言教育。一日生活可以充分满足幼儿的身心需要，帮助幼儿潜移默化地习得习惯、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增长其独立生活的能力（史瑾&叶平枝, 2016）。幼儿园积极开发幼儿感兴趣的语言课程，通过角色扮演等幼儿喜爱的游戏方式，培养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最后，对幼儿语言发展的观察与评价加以重视，及时了解班级孩子的语言发展状况。例如，及时筛选出相对于正常的同龄幼儿在语言发展上比较落后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干预。同时，也要重视对幼儿家庭教育的指导，与幼儿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及时向家长通报幼儿语言的观察和评价结果，并提供相关的指导建议。

3. 建立语言入学准备能力评价机制

建立幼儿语言入学准备能力评价机制，实施补偿性学前教育。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在对幼儿语言入学准备能力的要求和评价上存在差异，这样的差异不利于幼儿顺利地从一个教育阶段过渡到新的教育阶段，甚至因为教学任务的不同给幼儿带来挫败感和自卑感，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组建一个由学前教育阶段专家和基础教育阶段专家组成的团队，共同建立一套完整的适配全体幼儿的语言入学准备评价制度。

通过有效运用评价制度，在监管幼儿语言教育的整体质量的同时，也能够对语言入学准备能力弱的幼儿及时进行早期干预。有研究显示，及早鉴别语言入学准备能力弱的幼儿，并对他们进行针对性的及早干预，有利于幼儿后期各方面的成长，使其尽早赶上同龄幼儿的发展进度（盖笑松, 杨薇 & 宋爱芬, 2009）。对于语言入学准备能力弱的幼儿进行的及时干预可以表现为开展相关性的补偿性学前教育，如幼儿园可以通过阶段性语言能力评估和过程性语言能力评估，为语言教育准备不足的儿童提供及时有效的干预；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学期，可以对幼儿准备语言入学的整体能力进行评估，将他们准备语言入学的情况记录成文档提交小学，并让

小学老师根据幼儿的个人情况对其开展针对性教育。

4. 营造良好的家庭语言环境

在幼儿园与小学积极开展配合的同时，幼儿的家庭也应该为孩子们的语言发展营造良好的家庭语言环境，肩负起促进儿童语言发展的重任，共同承担起幼儿语言入学准备的担子。

首先，家长应该认识到幼儿语言发展的重要性。家长应以幼儿自身的特点及发展水平为出发点，为幼儿创设自由、宽松的交流和语言环境（王丹, 2020），还要树立正确的语言入学准备观，既不采取“揠苗助长式”的提前语言教育，又不消极应对采取不作为的行为。家长应该经常与儿童积极沟通，激发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重点培养幼儿习得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态度和习惯。其次，家长在与幼儿相处的过程中，或者是幼儿在场的情况下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使用规范的、有礼貌的语言，做到言传身教。为幼儿提供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书籍，通过陪伴阅读等方式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并且对于儿童积极勇敢表达自己观点的行为给予鼓励和支持。最后，协助学校的语言教学工作，家长积极地与幼儿园或小学教师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的语言学习情况，并向教师真实反映幼儿在生活中的语言发展情况，以便获得幼儿园或小学教师的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的指导，促进儿童的语言发展。

参考文献

- 陈帼眉. (1997). 幼儿入学准备教育. *学前教育研究*(05), 4-5.
- 盖笑松, 杨薇, 宋爱芬. (2009). 迟说话儿童的入学准备状况. *中国特殊教育*(11), 56-60.
- 廖莎. (2007). *父母关于儿童入学准备的观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
- 刘丽伟, 李敏谊. (2015). 在家努力还是参与学校:家长参与幼小衔接情况调查. *学前教育研究* (06), 31-39.
- 李玲玲. (2013). *父母与教师的入学准备观念与儿童入学准备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 刘焱, 秦金亮, 潘月娟&石晓波. (2012). 学前一年幼儿入学语言准备的城乡比较研究. *教育学报* (05), 90-97.
- 路娟. (2021). 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是幼小衔接的关键. *当代教育与文化*(05), 53-59.
- 史瑾, 叶平枝. (2016). 幼儿园教育环境质量与幼儿入学准备的关系. *学前教育研究* (08), 41-50.
- 邵宇. (2010). *儿童入学准备研究进展*(硕士学位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
- 岳素云. (2017). *城镇化背景下儿童入学准备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师范大

学).

于涛, 邵宇, 盖笑松. (2010). 儿童入学准备的评估与促进. *心理科学进展*(01), 46-54.

王声平, 胡玲燕. (2013). 不同地区儿童语言入学准备的调查研究. *教育与教学研究* (01), 109-114.

王丹. (2020). 论幼小衔接视角下的家庭语言教育. *教育科学*(01), 91-96.

湘音. (1998). 幼儿入学前的读写准备. *早期教育*(01), 35.

夏小英. (202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入学准备的关系: 家长参与的中介作用. *当代教育论坛*(05), 64-73.

基于绘本教学的大班幼儿死亡教育实践研究**A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INFANT DEATH EDUCATION IN
LARGE BASED ON PICTURE BOOK TEACHING**韦漪^{1*}Yi Wei^{1*}¹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¹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353447456@qq.com

摘要: 当今世界信息传播迅速, 孩子过早的接触到有关死亡的话题, 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家长和老师往往会避而不谈, 导致孩子对于该类认知不足。因此, 本研究将立足于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 通过绘本教学来对大班幼儿进行死亡教育, 提高幼儿对于死亡的认知。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访谈法, 通过对幼儿的初步观察后, 参考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 设计符合实际需要的实践活动, 将实践活动所展现出来的情况进行分析、探讨, 最后提出符合现代社会幼儿教育实际的建议和意见。让幼儿在接受死亡教育的同时能够适当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降低幼儿意外死亡率, 同时为相关国内外领域研究学者作适当的参考。

关键词: 绘本教学, 死亡教育, 实践研究, 大班幼儿。

Abstract: In today's fast-spreading world, children are exposed to the topic of death at an early age,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ideas, parents and teachers tend to avoid talking about it, resulting in children's lack of awareness of this type.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be based on the kindergarten picture book te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picture book teaching to large classes of children for death education, improv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death. The research mainly use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interview method, through to the infant's preliminary observation, the reference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material, the design conforms to the actual need practice ac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presented by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modern society preschoo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researchers.

Keywords: Picture Book Teaching, Death Education, Practical Research.

引言

3-6岁正是幼儿对死亡充满好奇的时期，加之如今信息传播的方便快捷，幼儿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接触到生命无法延续的场景，或者在一些绘本中了解到主人公的死去，这些方方面面都让死亡教育变得更为有必要。在实践中不难发现，当父母老师被问及有关死亡方面的问题时，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向孩子正确解释死亡的意义，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儿童死亡概念的发展特点。人们时常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在面临死亡问题时都会产生恐惧心理，在谈论涉及这方面话题时也会避而不谈，这导致了我们就不能正确接受的死亡教育。再者年轻人自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引起我们教师对幼儿进行死亡教育的重视。近年来，人们的思想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死亡教育的关注度逐渐提高。虽然幼儿园里都会开设有关生命的课程，但在生命教育中有关死亡教育课程就少之又少，甚至一部分老师会因为不知该如何和幼儿谈论该话题就取消这一课程内容。幼儿期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期，本研究通过分析大班幼儿对死亡的理解，开展相关课程，为幼儿死亡教育提供建议，也为幼儿园教师在开展死亡教育时提供可参考素材，让幼儿的身心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让幼儿在面对死亡问题时，从而学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研究设计

本研究通过利用绘本对幼儿进行死亡教育，让幼儿在了解生命的同时，学习到死亡教育的内容，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处理好自己的悲伤情绪，并从中体会到生命的珍贵，更加珍惜生活，保护好自己。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南宁市 F 幼儿园某大班为例，通过对该大班的幼儿、教师的调查发现，死亡教育课程相对较少，大部分孩子不能准确理解死亡的含义，教师们也表示没有较多的参考范例让他们去学习。

（二）绘本选择

运用绘本开展死亡教育是当前对幼儿进行死亡教育时采用较多的方法，根据大量查阅文献发现，大多数研究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幼儿初步认识死亡的本质，学会积极地面对人生。学者孙静妍在《学前儿童生命教育研究》指出，死亡教育是幼儿对死亡的认知和如何看待死亡所进行的教育。通过辩证关系帮助人们认识生与死，使人们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能直面死亡问题，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进而反思生命生命，激励人们积极投入生活，展现生命的

活力。并且学者顾菲菲在《利用绘本开展大班幼儿死亡教育的实践研究》中也提出，幼儿需要合理宣泄自己面对死亡问题时候的情绪；肯定人生价值，珍惜和尊敬生命，积极面对人生，以达到教学目标。

我们在开展死亡教育前需设定符合大班幼儿年龄阶段特点的目标，从不同方面来对幼儿进行死亡教育。参考童宏亮、李旭、段丽红等人的对于幼儿死亡教育绘本选择的研究，在内容上，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用过选取的绘本来进行主题教育，通过阅读绘本，感受丰富饱满的语言，以此来体会到“死亡”这一概念。

绘本拥有绚丽多彩的图画和丰富饱满的语言，一直以来都深受广大孩子的欢迎，他们更愿意通过绘本来学习知识，也更愿意把专注力集中于绘本。绘本教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通过讨论，我们选择的绘本包含一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内容：

1. 了解出生

死亡教育离不开生命教育，应该让孩子先了解生命的来源。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孩子了解自己的生命由来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众多生命教育绘本中，我们发现，《小威向前冲》这一绘本以生动形象的图画赢得孩子们的喜爱，也成为大部分教师的教学选择绘本。我们选择《小威向前冲》这一绘本来给孩子讲述一个精子是如何遇到卵子成为受精卵的，并且告诉孩子，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是如何长大的。这一会崩能让幼儿学习了解到平时生活中父母很少会告诉孩子的知识，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2. 生命进程

幼儿通过《小威向前冲》这一绘本了解了“小宝宝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后，教师进一步采用了绘本《一片叶子落下来》给孩子了解整个生命的过程。通过讲述一片叶子从出生到掉落死亡的过程，让幼儿知道整个生命的进程。

3. 情绪处理

《祝你生日快乐》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认识了一个患有癌症的小女孩，留个小女孩的时间不多了，在小女孩离去之后，小男孩依然坚守约定来到他们之前相约的地方。这本绘本用娓娓道来的语言让孩子能感同身受，故事中虽然没有讲述小女孩的离去，但在结局明示的说出小女孩再也不回来了，小男孩为此给她庆祝了生日。

4. 对死亡的理解

为了让幼儿加深对死亡的理解，我们选择了绘本《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这一绘本更能贴近孩子的生活，也与我们每个人的亲人息息相关。幼儿在阅读这本绘本之后，能对死亡有更深刻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5. 珍惜生命

为了不仅仅让孩子知道死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更要让孩子通过了解死亡，更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选择了绘本《安全第一》，教会孩子如何在危险的时候保护自己生命，知道生命的脆弱，也能在日常生活中防范于未然。

通过调查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研究者在给幼儿了解生命的由来时，基本会选择《小威向前冲》这一绘本，幼儿在阅读这一绘本后也能清楚的了解精子与卵子的结合过程。《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是研究者在进行死亡教育活动时都会选择的一本绘本，该绘本语言丰富，内容温暖，能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中感受生命的流逝。《一片叶子落下来》属于生命教育类绘本，但这次选入死亡教育课程是想让孩子能更加深刻的了解生命的逝世，明白死亡也是一个生命的必经之路。《祝你生日快乐》从另一个角度来告诉孩子生命的消逝，从一个小女孩生病来侧面告诉幼儿，病魔也是会让我们失去生命的。

（三）活动目标设计

以下为本研究的教育活动目标设计（见图表 1）：

表 1：大班幼儿死亡教育绘本活动目标设计

活动主题	活动名称	选择绘本	活动目标
认识生命	了解出生	《小威向前冲》	1、让幼儿了解生命的诞生 2、感受生命的成长过程 3、体会到妈妈的辛苦
	生命过程	《一片叶子落下来》	1、了解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 2、深刻感受叶子一生的经历，有自己的见解 3、学会珍惜时间，珍惜生命
接受死亡	情绪处理	《祝你生日快乐》	1、开始接触生命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死亡 2、能感受到故事中小女孩内心的强大，对生的希望 3、学会在面对死亡问题的时候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死亡理解	《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	1、理解故事内容，能联系生活分享故事 2、通过聆听绘本和他人分享的故事产生共情 3、学会处理自己的悲伤情绪
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安全第一》	1、懂得死亡是严肃的事情 2、学会珍惜生命 3、懂得远离危险地方

基于绘本教学的死亡教育活动过程

(一) 认识生命

1. 认识生命的教学活动实施

(1) 了解出生

笔者通过运用绘本《小威向前冲》来给孩子们讲述一个精子是如何找到卵子成为受精卵，并且让孩子知道小宝宝是如何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解除了孩子的疑惑。很多孩子在小的时候都会问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但父母一般不会给出正确的解答，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父母选择忽视这一问题，或者搪塞过去，甚至会出现“从垃圾桶出来”这一荒谬的回答。活动设计过程见下图（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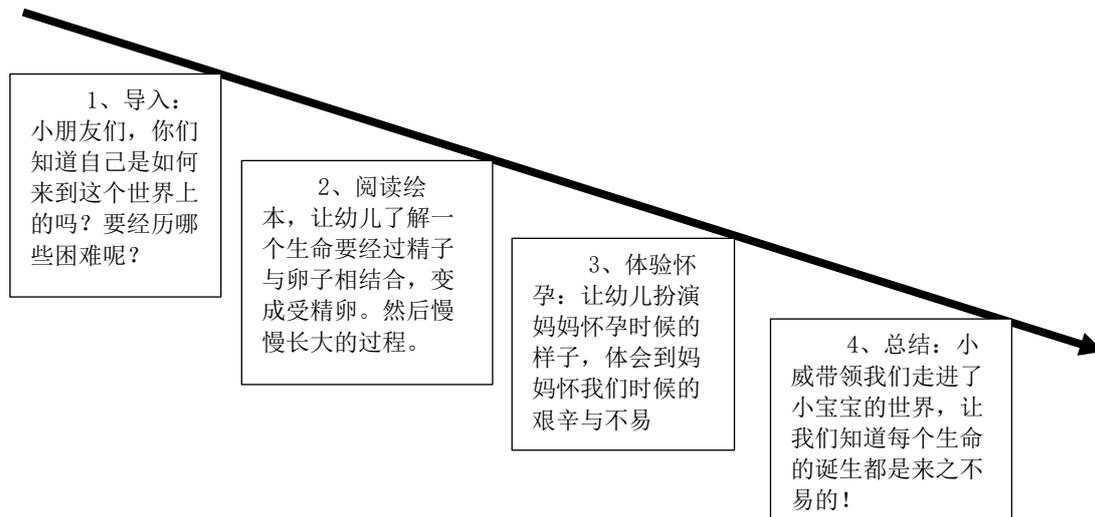


图 1

通过这一绘本的讲述，孩子能清楚的知道生命的诞生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与条件，甚至有一个孩子在面对老师的提问时能回答道“因为小威得了第一名，所以它可以变成小宝宝”。这一回答让笔者非常惊喜，大班的孩子不是没有理解能力，恰恰相反，他们其实都能有自己的判断，如果父母和老师一味的用“他们还小”的想法去看待他们，那将会错过给孩子进行死亡教育的最好时机。在本次绘本讲述活动中，孩子们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觉得非常的新鲜，加之这一绘本图画鲜艳，更能引起孩子的注意。在教师的引导下，孩子对生命的认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2) 生命进程

《一片叶子落下来》这一绘本将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以下为设计过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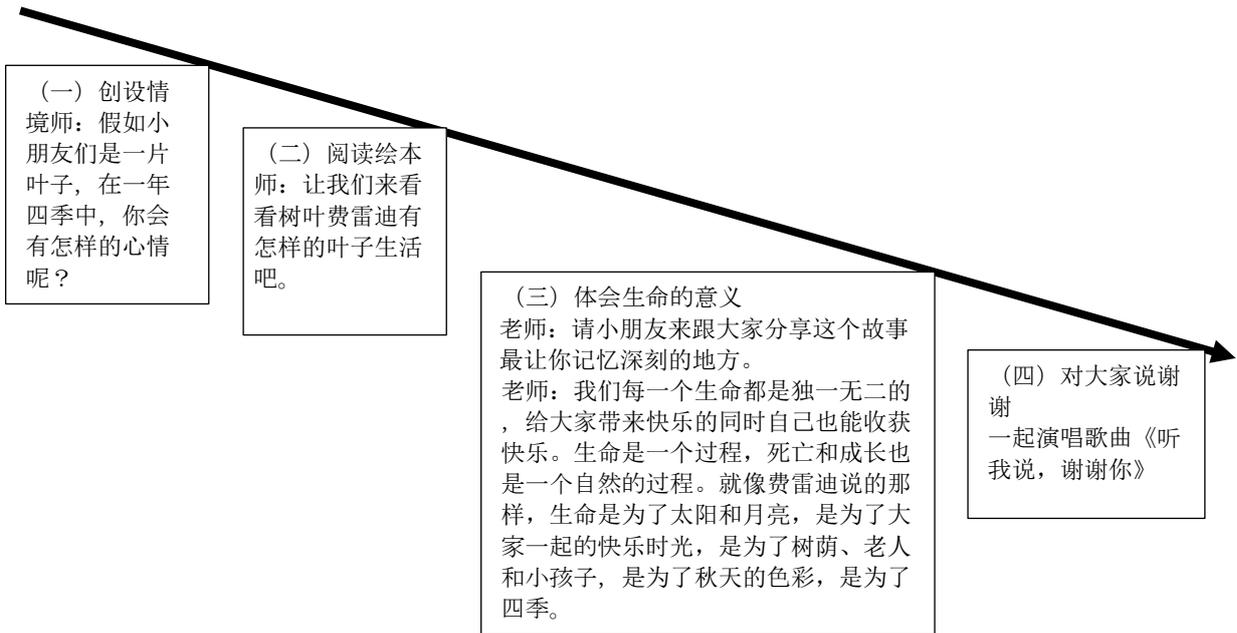


图 2

在这一课堂活动中，孩子们的积极性明显提高，跟教师的互动更加频繁。当教师问道“如果你是一片叶子，你会有怎样的心情”时，孩子们的想法天马行空，A：“我会在空中飞来飞去”，B：“我会把自己变得绿绿的”，C：“我要一直长在树上，不让自己掉下来”。从幼儿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对生命的理解仅仅局限于活着，而并不能想到生命还有一个过程是死亡。他们知道的死亡是相对孤立的，不能与整个生命进程联系在一起，我们教师在这一阶段要给孩子知道的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自然规律，我们并不能否认生老病死这一自然现象。在本次课堂活动中，孩子们通过对叶子的一生的了解，能感受到生命的全过程，不孤立的看待生与死，通过该活动最后的谈话得知，孩子们能平静的谈及死亡问题，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家长们往往夸大了“死亡”这一词，把自己的感情色彩加入其中。大班幼儿通过《一片叶子落下来》这个绘本，深刻感受到生命过程，为我们后续进行死亡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让孩子不孤立的看待死亡，其实，死亡教育就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2. “认识生命”主题活动总结与反思

通过给孩子们学习了解了生命的诞生后，孩子们对生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自己不是从“垃圾桶”“路边”来的，对生命也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能准确说出“受精卵慢慢发育”这类较为专业的名词，但只是了解生命的诞生还是远远不够的，孩子们给研究者的反馈也仅仅局限于出生前的那段时间，对于了解整个生命，还需要更多的知识输入给幼儿，以确保他们的知识体系完整，所以研究者又加入了《一片叶子掉下来》这一讲述整个生命进程的绘本来给孩子进行学习探索。在进行这个绘本讲述中，孩子们都能沉浸在叶子的世界里，导入时让

孩子们想象自己是一片叶子这一举动让他们更快进入课堂状态。本次活动孩子的参与度很高，在进行游戏环节时，部分幼儿的兴致高涨，有些控制不住场面，在配班的老师的帮助下活动能顺利进行，了解完《小威向前冲》孩子的知识面不都宽，加入《一片叶子落下来》后，孩子们对生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本次主题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了解生命，为之后的死亡教育做准备。在进行《小威向前冲》活动时，孩子们都能体会到妈妈怀孕时的辛苦，在《一片叶子落下来》谈话活动时，教师问幼儿“明年这棵树还会发生什么”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询问幼儿有关树生长的事情，引导幼儿了解生命的循环，从出生到死亡，又会有新的叶子出生，这样幼儿能更加深入了解生命的进程。在今后的活动开展中，我们教师应该更加注意自己的提问语，让幼儿能快速捕捉到我们想告诉他们的信息，并能根据教师的引导来思考相关问题。

（二）接受死亡

1. 接受死亡的教学活动实施

（1）生命消逝

《祝你生日快乐》讲述的是一个小男孩有一天偶然认识了一个患有癌症的小女孩，在他们的友谊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小女孩不幸离世，小男孩去到约定地点没有见到小女孩，但在她生日那天，小男孩还是自己给小女孩庆生了。在一个故事中，这一绘本的作者并没有直接说明小女孩的离世，而是需要小朋友们自己体会，留给孩子们一个想象的空间。本文还有最令人感动的一个细节：小女孩知道自己患有癌症，但她妈妈依然告诉她，癌症并不可怕，要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这一教育观念值得我们去学习。教学过程见下图（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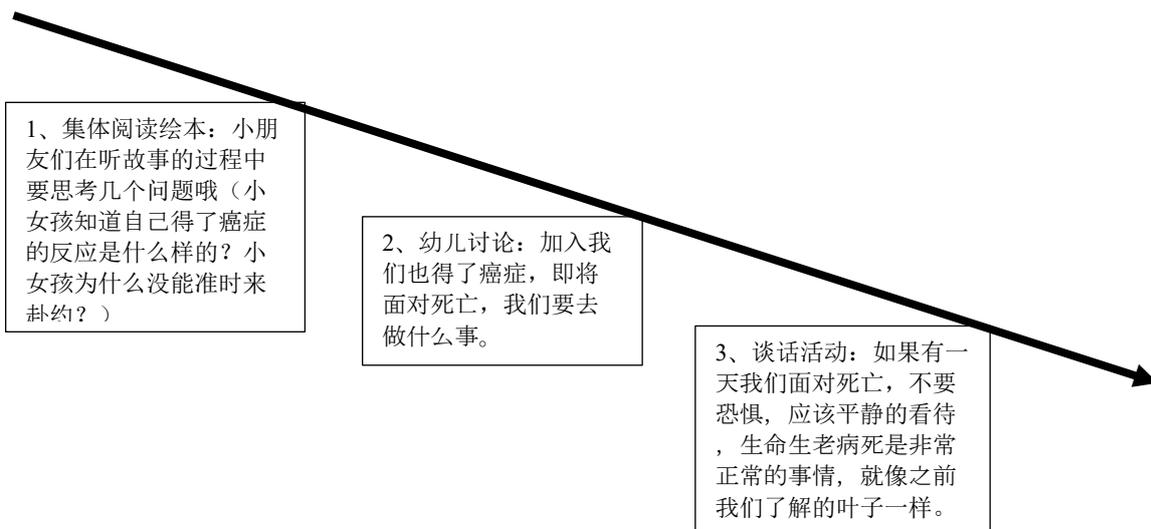


图 3

大班幼儿在接受这本绘本的绘本讲述的时候，有些孩子一开始并不能理解小女孩为什么不来赴约，但在老师再次用概括的语言把绘本再讲一次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都能明白，小女孩是没有战胜病魔，渠道了另一个世界。但本次的绘本讲述过程中，也许是绘本的内容太过于压抑，孩子们的兴致并不高涨，甚至有点沉浸在悲伤当中。这时，笔者在做反思的时候总结，这时应该引导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学会处理好自己的悲伤情绪。

通过本次活动，幼儿更加深刻的直面死亡，不仅仅是通过讲述生命的进程，更是直接让孩子接触。虽然绘本有些压抑，但孩子们还是坚持听完整个绘本，也有了一定的收获。

(2) 死亡理解

《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这一绘本将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进行。以为为设计过程（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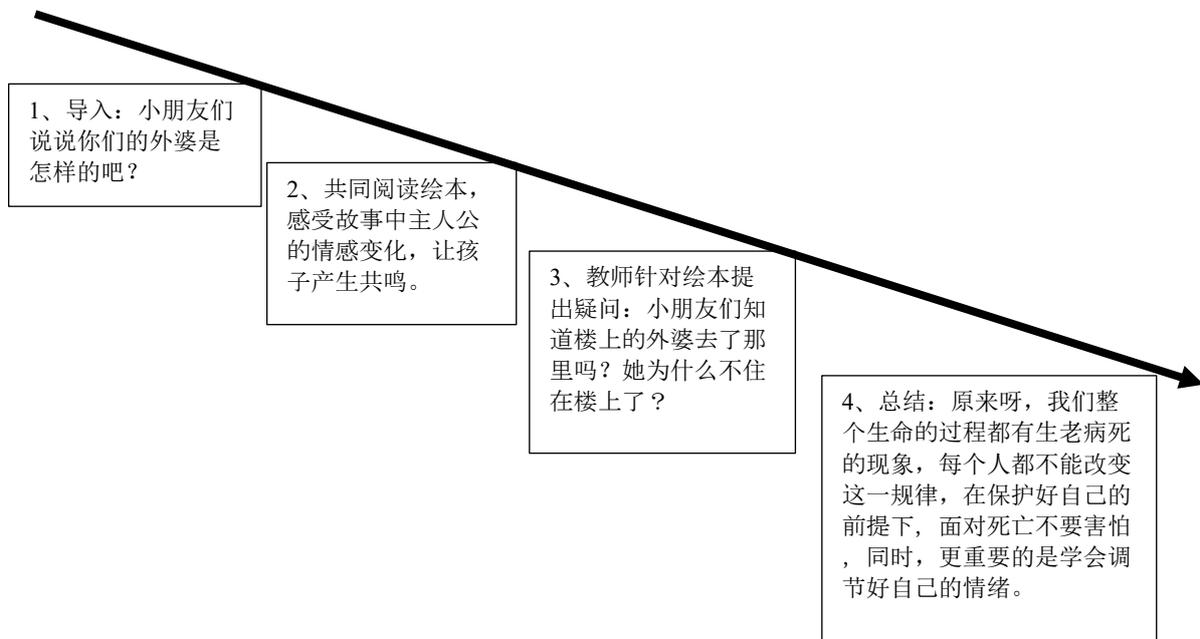


图 4

在这一绘本教学中，由于比较贴近生活，幼儿的理解力更加展示出来，孩子们非常积极讨论自己的外婆。在课堂活动教学中我们发现，经过上一本绘本的讲述，孩子们更能理解这个绘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并能很快抓住主题大意。教师在提问到楼上的外婆去哪的时候，孩子们能准确的说出她太老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在最后的谈话部分，孩子们也越来越嫩对“死亡”这一话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在手传统观念的影响，甚至有些小朋友回家把我们这次的活动的绘本讲述给爸妈听后，父母们也开始慢慢接受了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并表示对幼儿园开展死亡教育持支持态度，慢慢的大家的想法有了些变化，这一想象是非常可观的。

通过《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这一生动有趣的绘本，让大班的孩子们对死亡有了自己的理解，不再恐惧和害怕，在面对自己养的小动物、家人的离世时，也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坦然面对。

2. “接受死亡”主题活动总结与反思

本次主题活动气氛比较凝重，尽管孩子刚接触到“死亡”的内容，但受生活的影响，孩子们还是便显出了沉重的心理，相较于上一个主题活动的活泼有趣，本次主题活动孩子更能沉浸在绘本故事中，体验故事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在《祝你生日快乐》中，孩子们刚开始并不能感受到小女孩的难处，甚至有些孩子会觉得是小女孩爽约，没能来见小男孩，但在老师的引导下，小朋友们都懂得了是因为小女孩去世了所以才不能来赴约，大家都能逐渐的理解小女孩了。在进行《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活动时，孩子们有了上一个故事的经验，能快速的理解故事内容，根据上一个故事来推导这个故事情节，并且在情绪处理方面有了较大改善，刚开始接触死亡时，幼儿的表情是痛苦的，认为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在进行第二次活动时，孩子的接受度明显提高，在理解故事内容的同时能表达出自己的看法。《楼上的外婆和楼下的外婆》这一绘本更贴近生活，与我们的亲人息息相关，所以孩子们能更快领悟。孩子们经过了两次活动学习了有关“死亡”的知识，学习到了他们在生活中并不能学习到的，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但在了解“死亡”的同时，还需要幼儿学会保护自己，不能因为学习后认为死亡并不可怕而不保护自己的生命。因此，研究者和教师决定，再给孩子们多上一节有关于珍惜生命的课程，以确保孩子在了解死亡的同时，能更加爱护生命。本次主题活动运用到的两本绘本都是属于人物情感类的，今后教师在选取绘本材料的时候，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出去，去选取适合幼儿的绘本。两本绘本可能对于大班幼儿来说理解的深度还不够，再实践的时候教师应投放更多的绘本给幼儿去学习。

（三）珍惜生命

1. 珍惜生命的教学活动实施

《安全第一》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远离危险地方的一本书。是死亡教育的延伸、扩展。在问及孩子知不知道有哪些危险的地方时，孩子们的回答非常的广泛，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教育与家长都会给孩子进行家庭教育。在给幼儿进行了之前的死亡教育后，孩子对自己的生命有个更深刻的理解，再最后一个安全教育作为结束的绘本，能让孩子在平时更加注重自己的安全，让注意安全不再是泛泛而谈。过程见下图（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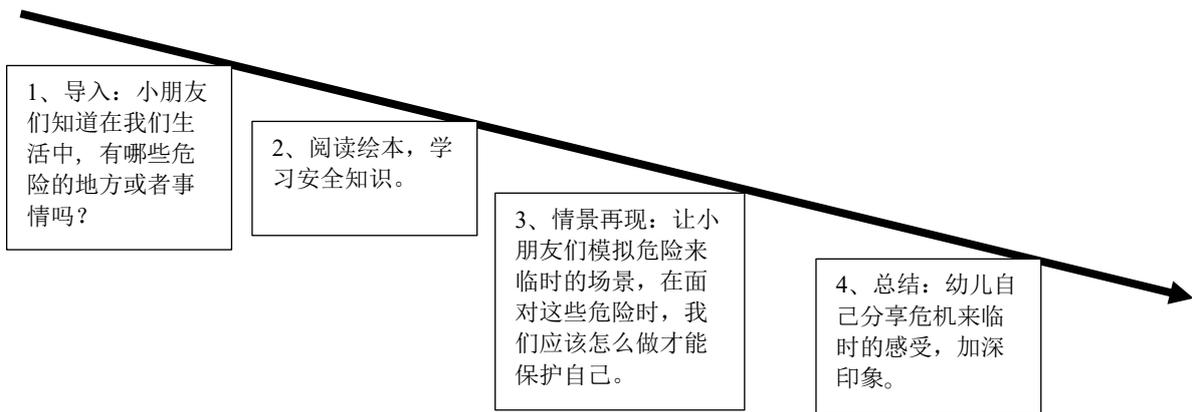


图 5

2. “珍惜生命”主题活动总结与反思

研究发现，孩子们在进行死亡教育后，再进行安全教育的时候孩子能更加融入课堂。和班级教师了解到，之前进行的安全教育都是以观看视频的形式来进行，很多孩子当成动画片观看。但在孩子了解了死亡是怎么回事后，对安全教育知识更为渴望，活动的参与度更高，幼儿在生活中也能学会保护自己，如在午餐时间，自己打完汤后走回位置能注意到避让其他小朋友，在以前的观察中，孩子几乎都是自己走自己的，如今能更小心的进行午餐活动。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孩子们也能互相提醒不要追逐打闹，有小朋友摔跤了能及时告诉老师并帮助小朋友去校医室进行伤口处理。但在开展情景的过程中，孩子们会非常的活泼，需要教师把控好场面，有些孩子虽然是做出来急救的方式，但也是跟风摆姿势，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什么，老师在讲解的时候也应先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尽量不要出现老师在讲解，但有些幼儿在大闹的情况。在每个情景下，教师都应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让幼儿更好的理解，加深他们的印象。“死亡”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身为幼儿园教育者也不能把死亡当做一个不可谈及的话题，幼儿园教育涉及方方面面，只有让孩子了解、接触，孩子们的恐惧心理才会慢慢减弱。

（四）总结与评价

本次死亡教育活动我们一共开展了五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孩子们的反馈更是让我们惊喜。但由于时间有限，部分绘本只能进行了绘本讲述，如果五次死亡教育活动都是以课堂活动的形式呈现，效果应该会更好，孩子们的专注力更好，吸收的内容更为全面。死亡教育的开展取药多方面的配合，幼儿园在提供舒适环境的基础上，更要积极给教师培训，教师在实践中是有非常多的例子，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但很多教师常常因为自己的知识水平不能达到这

一要求而放弃开展这些活动。像死亡教育这一活动需要教师有更高的素质要求，所以幼儿园教师更应该积极的学习，与时俱进。本次活动还有一个不足就是活动延伸方式过于单一，我们所讲述的是“死亡”有关的话题，笔者在准备活动的时候，对课后延伸这一块没有考虑周到，孩子不能及时的把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延伸到生活中。

教育建议

（一）建立家校合作的教育平台，发挥家庭优势

学校和家庭应该是一体不能分开，孩子从进入社会开始，就和学校、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家校合一才能从共育上让孩子能更深刻理解死亡。家庭教育是幼儿教育中绝对不能缺少的部分，家可以使孩子更有安全感，所以孩子在家里的展现的是更为真实的一面，因此家园共育才能让幼儿能有更深刻的学习。幼儿园应该多组织家校活动，比如定期开展安全教育知识讲座，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通过安全教育知识讲座，让家长更多的了解相关的安全教育知识和方法，不仅能更好的配合幼儿园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安全教育，也可以让家长充分的了解关于幼儿死亡教育的重要性，帮助家长转变死亡教育的观念，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可以和孩子对“生死”进行正确的沟通，而绘本可以成为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桥梁，是家长可以开口于孩子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在共读中了解生命。有了家长的帮助，才能为教师开展死亡教育时更加的有效。幼儿园还可以通过文化长廊等地方，粘贴有关死亡教育的内容，让家长在接送孩子的这一时间段能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学习，以打破他们认为的不跟孩子谈“死”的传统观念。家校共育，才能使我们的死亡教育开展得更加顺利。

（二）结合实际环境，保证幼儿新鲜感

经验学习是幼儿主要的学习方式，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运用现有的园区环境，让幼儿直接感受自然存在的动植物，实际触摸，亲身体会生命的变化和差异，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进行随机教育，比如说“植物角”的植物死亡了，可以让幼儿讨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植物的死亡，我们在下次种植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把这些问题制作成观察表，教师和幼儿一起再次进行种植，观察植物在避开了之前我们设想的条件下，能不能存活下去。同时，在看到有植物、动物死亡的时候，教师可以因地制宜的采取死亡教育措施，让孩子们跟我们看过的绘本联系起来，让孩子观察植物、动物死亡后时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并让幼儿学会及时地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围绕生命教育的主题开展不同内容形式的活动，不仅可以加强幼儿在活动中的新鲜感，同时也保证生命教育的有效开展。

（三）多内容交织，创造活动多样性

幼儿在单一化、模式化的活动中十分容易产生疲劳感，丧失积极性，进而影响幼儿教育的效果。因此需要教师们利用不同形式、不同角度来设计活动方案，例如可以与传统五大活动领域结合，在其中体现死亡教育的内涵，结合五大领域课程内容来开展活动。终身学习，多去参加幼儿园教育讲座，了解目前死亡教育的水平，知道有哪些死亡教育的形式，形式过于单一会使幼儿失去兴趣，我们在对幼儿进行死亡教育的同时，不能灌输式教学，一定要激发幼儿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将生命教育穿插在日常活动中，让死亡教育能以多维度、多方面、多样化展现，摆脱机械化教育，让幼儿不会感到枯燥乏味。

（四）转变教育观念，摒弃传统糟粕思想

很多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给幼儿开展死亡教育会产生抵触心理，不仅要承受幼儿园、家长带来的压力，还因为自己本身也抵触这一块内容而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避开这一部分内容，不会去触碰有关死亡教育题材的活动。所以，在给幼儿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教师观念的转变，在教师的观念得到转变后，才能说服自己接纳死亡教育课程，才会给幼儿上好一堂死亡教育课程。并且，我们在给孩子谈及死亡的话题时，应该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去学习了解，而不是以一种神秘、悲伤的情绪去给孩子讲述死亡，当我们带有神秘、悲伤情绪的时候，孩子也会受到感染，从而会导致他们也抵触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

参考文献

- 孙静妍. (2009). *学前儿童生命教育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顾菲菲. (2018). 利用绘本开展大班幼儿死亡教育的实践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童宏亮. (2016). 幼儿园开展死亡教育应坚持的“四大原则” *江苏幼儿教育*, 16 (1), 12-19
- 李旭, 段丽红. (2019). 从“一片叶子”到“寻梦环游”: 儿童生活世界中死亡意义的叙事重构. *教育学报*, 19 (5), 34-39.
- 罗苑. (2020). *基于绘本教学的大班幼儿生命教育实践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敖琪. (2019). *以绘本为载体开展幼儿生命教育的实践研究*. 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翟迪. (2008). *幼儿园死亡教育的价值及特点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产教融合视域下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研究**A STUDY ON TEACHING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陈朋^{1*}, 翟文娟², 谭建强³, 张泽鹏⁴Peng Chen^{1*}, Wenjuan Zhai², Jianqiang Tan³, Zepeng Zhang⁴^{1 2 3 4} 山东英才学院^{1 2 3 4}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604620856@QQ.com

摘要: 要想提升职业院校的教学质量, 产学结合是有着显著效果的一个办法。产学结合不仅提升了职业院校整体的教学质量, 还增添了许多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它在原有的教学基础上加大了难度, 使得学校在管理方面遇到了瓶颈。职业院校要想维持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活动, 建立有秩序有效果的管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本文章将为大家详细分析职业院校在融合产学结合后教学管理体系出现的问题, 并同时为这些问题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 同时为提升职业院校整体教学质量, 为社会各方面培养人才提出一些有利的建议, 如提升师生考核难度、加强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组成等。

关键词: 职业院校, 管理体系, 产学结合, 教育教学质量。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is a method with remarkable effect.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not only improves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many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 school encounter a bottleneck in management. If vocational colleges want to maintain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 orderly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system. This article will give you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fter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difficulty of assessmen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control system, promoting the composi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ers, etc.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引言

职业院校要想发展的更好，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学校教学质量，与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相呼应。这不仅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职业院校赖以生存并不断向上发展的根本。但是如今的职业院校发展不如一流大学，教学质量也是远远低于一流大学的教学质量，同时在教学管理上也暴露了许多致命问题。国家给予职业院校的政策补贴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此外，职业院校的学校建设和办学条件低于普通本科院校，职业院校对高考生们的吸引力也远远不如普通本科院校。种种条件使得职业院校常常在招生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在这些方面，职业院校远不如普通本科院校，但是职业院校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根据市场形势的改变，针对性的培养行业需要的人才。职业院校应着力发展自身最大的优势，为我国培养全能型的高素养、强技能的专业人才，推动社会的发展，履行学校自身的职责与义务。要想促进职业院校的发展，校长必须将培养复合型人才作为本校发展的唯一目标，以此为方向规整整个学校的发展方向，将学校与社会相结合，及时了解社会的需求与发展趋势，同时让教师带领学生进行社会活动，将书本与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在社会的生存性与适应性，不断提升教师与学生的能力，更好地适应日渐变化的社会。同时，职业学校也要利用产教融合，在此基础上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全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大人才发展的空间。

1. 职业学校构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重要性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职业院校的教学已从外延拓展转向内涵发展，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是职业院校必不可少的实施方法。我国已经出台的各种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深入推进职业院校与国有企业合作的若干意见》等）着重强调了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对于各类职业院校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职业院校利用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整体发展的建议。

1.1 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可以平衡教学质量组织。

教学质量组织管理部门从时代发展的趋势，行业的发展方向与变化情况等各个方面仔细分析，结合职业院校的教育优势，提升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开发新型的课程，合理利用学校与社会提供的教学资源，解决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完善，为学生的培养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1.2 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可以提高教学资源的合理分配

教学质量管理部门仔细分配好教学资源（师资、人才、设备、实训基地建设等），与其他职业院校进行合作，共享国家提供的资源，形成各个方面相互融合的教学资源管理。学校要为学生提供社会就业的详细资料，让各个专业的学校能够根据自身所学专业匹配到合适的岗位。同时加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强化学生实践能力，让学生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职业学校也要提升产教融合的深度，提升教学资源管理的适配度。

1.3 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可以优化提升教学过程与质量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为学生讲解专业基础知识，也要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并且，职业学校要为教师提供进深机会，让教师积极参加企业生产，掌握企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教师也将自身所了解到的信息融入教学课堂中，让学生了解每个企业的优缺点与企业文化，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将自身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实现书本与实际，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学校也要加强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尽可能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1.4 建立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可以促进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职业学校应将企业的人才要求告诉学生，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成为“能上岗、好用”的职工。企业应与学校进行合作，成为评价学生能力的另一个主体。企业也要将人才需求的标准融入评价中，让学生自发的加强自身技能，成为复合型人才，为以后的职场竞争增加入职可能性。

2. 产教融合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学的基本要求

职业院校不同于以往的高中或高等教育，在当前产教融合的背景之下，职业院校更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更加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技能型、知识型的专业复合型人才。职业院校顾名思义，对学生职业技能方面培养较为注重，牢固树立学生提升自身职业技术水平的观念，将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作为毕业目标和择业前提。当前社会需要的是技能型人才，职业院校学生想要更快更好的适应社会，职业院校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基本的教学活动。首先在专业的设置方面，需要符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对院校中存在的冷门技术或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技术专业及时更新替换，保障学生毕业后能凭借自身学习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应对当前就业难问题。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高职院校在设计教学内容时，要充分考虑到教学内容对学生未来发展的作用，保障学生所学所知能够应对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和产品的快速更新。第三在与未来职业匹配度方面，教学大纲的设定和学业考试需要和学生择业所需执业证书相对应，在产教融

合的基础上给学生进行专门、统一的辅导，使学生能够快速的拿到某一行业所需证书，并熟练掌握相关知识。第四在专业与实践结合方面，教师在向学生传递专业知识的同时需要和企业发展与运营联系在一起，使学生更好的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五是在职业教育方面，贯穿终身学习理念，在产教融合背景下为学生营造终身学习氛围，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职业知识学习。

3. 职业院校教学管理的现状

3.1 教学质量缺乏规范性

教学不是教师或学生单方面努力就可以实现较好的效果，需要教师、学校、学生和家等多方长期共同努力，需要多个环节共同协作才能实现的，教学管理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教学管理是指对学校后勤、教学、组织办公等多种功能进行管理，构成复杂、综合的管理体系，职业院校需要通过教学管理体系来实现学校平稳运行，因此在日常管理、教学实践、教学体制等方面都存在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相关人员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与学习，才能实现教学工作正常开展。但近年来随着校企合作的开展，职业院校源源不断的为企业输送技术人才，职业院校传统的管理体系与模式开始出现弊端，很多职业院校管理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管理制度也无法进行改进，使得学校管理浮于表面，未能渗透到教学活动中去，学校也由于其封闭性和传统型未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企业需求调整自身教学方式，使得培养出的人才与社会有所脱节。

3.2 校企合作形式过于片面化

随着产教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大职业院校对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注重，也都逐步与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一些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校企合作效用，专门在学校内设立实训中心与管理机构。但现有的校企合作中大都是学校主动联系企业，凭借政策扶持和红利企业会接受和学校的合作，但合作之后合作项目实施主要是由教师与学生完成，企业人员则很少参与，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学校中获得廉价劳动力，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缺乏企业指导，使得校企合作成效较差，很多合作浮于表面，无法真正实现融合。

3.3 教学实践过程中存在不足

职业院校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出有竞争力的人才，因此在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不能

过于注重某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加强学生基本职业素养和道德的养成，注重学生的平衡发展，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建立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学生实操能力训练与提升。但却很少有高职院校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轻实践操作，使得学生未能充分锻炼自身的实践能力，在真正面对工作岗位时显得手忙脚乱，严重影响企业对学校的观感和学生日后职业发展道路的发展。

3.4 教学改革效果整体不乐观

传统的职业院校虽然是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但对专业技术的培养也主要是以理论知识为主，能够让学生对专业知识理解透彻，但实践活动开展较少，因此学生面临着在实际工作中不会实际操作，在此情况下职业院校不得不对传统的教学体制进行改革，需要对当前所处社会环境与发展情况有细致的了解，对企业需求有充分的认知，由此调整教学内容与课程设计。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有学校能够做到这种情况，很多学校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等，未能将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融入到职业能力培养与提升课程中，使得当前教学体制改革效果不够理想，直接影响学生对专业学习的兴趣。

3.5 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动态复杂系统，具备实施主体多、利益诉求多样等特点，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当前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还存在组织机制不健全、制度建设不完善、评价保障体系不科学等问题，具体如下：

首先是组织机制不健全，直接导致生态系统构建不完全，校企合作效果不好。当前产教融合主体之间存在着职责不明晰、合作不畅通等问题，这可能是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不到位、行业指导发挥失灵、职业院校及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不积极等造成的。政府方面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对教学质量管理方面并没有制定专业的政策性文件，行业由于属于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因此行业内部对教学质量管理经验欠缺，无法制定出权威性的标准和课程标准；职业院校虽是实施的主体，但由于主动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研发与推广教师较少，更少教师能够主动了解企业需求，并根据需求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改良；企业作为参与教学质量管理的第三方，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由于利益达不到其所求，因此企业驱动力不足。其次在制度建设方面，制度建设不完善会导致整个校企合作生态系统出现问题，校企合作的合作力度不足，职业院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相关政府、产业部门没有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权威性的规章制度，使得学校、企业、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学校就业率，积极向企业寻求合作，一些企业也为了获取优质毕业生，

为学校提供实习场所，但在教学质量研究方面却没有作深入研究，尤其是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训建设等方面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流程，使教学偏离计划。最后是评价体系不科学等方面的问题，使得校企合作深度不够，产教融合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需要以优势成分为主导，构建多元化机构基础才能分散风险，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存在模糊性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使得校企合作中的主导成分被异化，如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并没有充分结合各部分实际需求和意见，未能将教学目标和岗位需求实现衔接，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反馈不够及时、全面。

4. 建立以产学结合为基础的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措施

建立以产学结合为基础的职业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看似是被如今的形势所迫，实际上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依势而建”。职业院校应该根据社会变化方向，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增添新的课程，高价聘请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实践经验的教师团队，建立新的实验室方便教师学生进行试验，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也推动学校整体的发展。同时，职业院校也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中。并且院校要注重教学质量，在学生理解并接受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提升自身能力。

4.1 明确建立以政府主导、行业指导、校企双主的生态意识

教学质量的管理离不开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作为搭建产教融合框架的组织者，是维持产教融合秩序、提供发展环境的主导者，具体可以通过构建教育园区、成立管委会等措施搭建协同育人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规划公共小区、设备设施、创业季度，根据校企合作性质来探索专业课程选择、学分设定、教师教材、评价等教学机制，使其更加贴合实际情况。行业或协会是保持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外部监管力量，同时也是产教融合的指导者，因此很多行业都陆续成立专门的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着力于推动学校专业结构的调整、课程体系的建立健全、教材教学资源的信息建设，且在实际工作中初显成效。如通过牵头组建专业团队、研制行业职业标准等来完善工作知道体系，通过行业或协会对本行业的认知与需求，帮助学校和企业建立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深度合作激励保障机制和约束机制，逐步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

4.2 构建以问题为导向、关键因子为引领的生态结构

产教融合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使培养出的人才更加贴合社会需求，随着产教融合工作的推进，众多职业院校都已经通过协调各个生态主体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专

业、课程、师资的建设，完善了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与结构。首先在专业共建方面，专业共建作为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生命因子，充分将企业需求纳入到专业设置上，校企双方再根据岗位需求和相应的标准，规范教学资源的投入，不断提高专业适合度。其次在课程建设方面，课程建设使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关键与核心，学校需要根据企业的工作过程，将其内化为课程内容，不断提升课程的转化率，不断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使学生更加喜欢课堂，师生课堂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谐，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课程体系也不断建立与完善。最后是师资建设，师资使教师管理质量体系的主要因素，教师作为学生的指路明灯，对学生整个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很多院校也建立了帮助教师发展的成长性政策，教师可以通过生产管理、业务培训等操作将自己提升为具备理论与实践的全能教师，能够和企业共同探索产学研与技术，逐步实现师资结构优化。

4.3 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组成

职业院校以产学结合为基础经历了大幅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教师任职要求：职业院校聘请的教师更多方面是看教师是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专业素养。只注重理论的教师地位大大下降，而注重实践的教师则占了教师中的绝对地位。因此，“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职业院校不可避免的要做成的事情。职业院校要合理利用学校本身资源和社会资源，打造一支教学实力强悍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但是，“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组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学校给教师不断的提供进深机会，让本校教师去其他学校学习，与其他学校的教师进行学术交流、课程讨论等，增加教师授课经验，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同时，职业院校还可以聘请企业的优秀员工来为学生授课，作为指导教师帮助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并将学生的实践作为期末评价的另一个标准。再者，职业院校还应该为教师争取在企业实习的资格，让教师在实习中不断提升专业实践能力，成为更加优秀的教师。

4.4 提升师生考核难度

建立考核机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教师考核制度。建立教师考核制度是顺应社会变化趋势，贯彻落实产学结合政策。教师聘请的数量根据学校要求择取，“以岗选人”，不能单纯增加聘请与授课专业教师数量。教师的聘请都是严格按照考核制度，并且成功任职的教师也不是拥有“铁饭碗”的，在岗位上的教师要受到更加严格的考核。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就会有下岗的危机感。为了适应这个“变动”的岗位，教师们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二是建立学生考核制度。企业的考核与职业院校对学生的考核应该相辅相成，要以企业的考核为主，职业院校的考核为辅。考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察学生的思想、遵纪守法情况及对

工作的态度等，如尊敬师长、尊重同事、自觉履行职责与义务、有良好的文明礼仪素质、没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等。这些的考核内容只占全部考核的30%。一个方面是考察学生完成任务的质量和数量情况，它的侧重点是在考验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企业可根据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的数量与完成度来评价学生任务的优良情况。这些的考核内容几乎占了全部考核内容的一半，是企业最关注，最能分清人才优劣的地方。另一个方面是考察学生写实习报告、实习笔记等的质量。这部分考核内容比重最轻，仅为20%。企业通过三方面的考察来辨别一个人才的能力情况，并借此机会对能力落后的人才进行专门性培训。

4.5 加强质量控制体系的建设

职业院校要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应当建立“学校育人为主，企业育人为辅”的培训机制。企业要给学校提供培训教师，让学生尽快的了解企业文化，按照职工统一标准严格管理学生。为了防止学生在实习期间遭遇到的问题，校企双方应提前制定防范措施，确保学生的人身和财产收到保护。同时，在学生培训期间，学校也要时常去企业观看，深入了解学生在实习期的情况变化。若是遇到难以适应实习期的学生，学校要及时对学生做好思想疏导，帮助学生缓解压力。并且，专业课教师除了在课堂上帮助学生梳理知识，传授知识，还应留在企业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或者指导学生进行实践。

4.6 成立产教融合教学管理组织

应用技术大学必须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行政管理、专业和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评价管理等，特别是在高校管理中。为保证校企紧密合作和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需要成立产教融合综合教师管理部门，组成教师综合管理部门，由以下部门组成，是集各部门、部门、科学实验室团队于一体的多边合作管理体系。技术院校要有机组织学校、企业、职业培训等人员，作为产教融合教学管理委员会成员，负责校企合作、社会教育学的组织与实践等相关事宜以及实用的服务。专业课程的沟通、开发与建设、教学质量评估等工作内容，统一管理和指导，尤其是校企合作的和谐稳定。增加产学研合作办公室等部门的设立，负责校企沟通协商，推动双方形成合作共识，支持所属高校有序开展相关工作。部门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简化部门的行政工作，适当放宽权限。附属大学是教育管理的主要目的，并负责某些教育管理任务。专业实验室是教学管理的基本单位。只有齐心协力、齐心协力，才能真正促进产教融合的发展和尽快落实。

4.7 全面落实企业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学校要想培养适配企业的人才，就需要与企业建立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制定对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共同友好的制度。同时，双方也要改变以往的传统学校及培训机制，时时关注市场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做出相应的制度改变，以岗择人，选择专业成技优秀，自身能力强的学生担任职位。同时，企业也要为这些职工提供培训，让他们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其他的能力，争取让他们成为复合型人才。此外，要积极适应和优化教学内容，以适应相关岗位当前的专业水平和具体岗位的需要。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发新课程，开发与当前职业发展相匹配的教科书，并为学童制定实习计划。技术人员全力投入以提高教育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将企业文化充分融入教育，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感受企业文化氛围，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技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结论

总之，要想实现学校、企业和学生的互利共赢，就必须灵活得当的运用好产学结合，推进职业院校的发展。职业院校要想在时代潮流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认清自身发展的需求，聘请更加优秀的教师团队，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现代市场的要求培养各个行业的人才。同时利用产学结合构建教学体系，提升学校各方面的实际力量。

参考文献

- 耿立波，刘颖. (2021). 浅析新时代信息化背景下技工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策略. *职业*(24)， 3.
- 兰录平. (2020). 产教融合生态学视域下的技工院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12)， 4.
- 耿立波，刘颖. (2021). 浅析新时代信息化背景下职业院校提升教学质量的策略. *职业*， (24)，
- 葛小平. (2016). 南通市技工院校办学特色现状调查和改革建议(上). *中国培训*(11)， 2.
- 王磊，张昊. (2021).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33(1)， 4.

《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融入思政的实践探讨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M**翟文娟^{1*}, 陈朋², 翟惠晶³, 鹿少莹⁴Wenjuan Zhai^{1*}, Peng Chen², Huijing Zhai³, Shaoying Lu⁴^{1 2 4} 山东英才学院, ³ 齐鲁工业大学^{1 2 4}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³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53475046@QQ.com

摘要: 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高校开启了新型的“课程思政”教育之路, 它是高校“思政课程”教育由显性教育到隐性教育的转变。“课程思政”融入在每个课程之中, 能够进一步发挥教育本身的育人作用, 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数量与质量的提高。高校把立德树人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 发挥各课程的育人功能, 需充分发掘课程思政的资源, 让学生学会学习的同时,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理想和责任融入到实际的课堂教学中, 引导学生从小我到大我, 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新闻是人类生活极大丰富和发展之后的产物, 新闻史就是一部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渗透发展相互交融的历史。现如今, 新闻不仅密切融于我们生活当中, 更作为一种公众的力量体现着公正、正义。众所周知, 传媒类专业意识形态属性比较强, 将《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融入思政, 融入传媒类专业能够更好的提高学生们的政治素养, 让他们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可靠的接班人。本文通过对专业知识学习与《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融入思政进行分析与研究,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素养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关键词: 《中外新闻事业史》, 课程思政, 新闻传媒类专业, 新闻传播学。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pened a new road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education from explicit education to implicit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each curriculum can further play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education itself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the thought of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various courses. They need to fully explore the resource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t students learn to learn, and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egrate the great ideal and respon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the actual classroom teaching, guide students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and consciously integrate their personal ideal pursuit into the caus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News is the product of the great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life. The history of news is a history of the infilt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rational spirit. Nowadays, news is not only closely integrated into our lives, but also reflects justice and justice as a public force. As we all know,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majors can be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a, so as to make them more qualified and reliable.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earn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m, this paper makes its own modest contribution to further improving students' literacy.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jor of News Media,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引言

1. 新闻传播教育实施专业思政的理论依据

课程思政是专业思政的基础，专业思政是立足于课程思政之上，进一步升级而来的，两者呈现的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我国高校在进行专业思政教育的时候是离不开课程思政的，高校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教育育人的道路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而其他课程则是配合其协调发展，各个高校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需要我们抓住人才培养的根本性问题，还需要坚持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点来发展工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社会培育学习好，思想好的人才时往往是离不开政府精神的指导的。其核心思想，就是教育工作者应当把立德树人当作根本任务，运用并发挥好课堂的育人功能，并能结合自身课程的特点，有机地在教学和改革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使得自身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让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发生协同效应，培育出更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爱国爱党，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性原则是我国媒体基本属性原则之一，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科学调整媒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商业属性，才能更好的做好新闻工作。新闻进行传播从实质上来说是有带有一定的舆论导向的，政府部门的讲话对我

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讲话的。新闻学体系的三大分支为中国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中国新闻史在新闻学中也叫历史新闻学。作为重要的一个分支，新闻史作为一门专门史一般被归入文化史范畴。学习新闻史，正是从历史的角度，以史为鉴的观点去看待各类问题。学习新闻史，全面认识新闻学，也是在人文历史学科的教育内对于同时代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把握。不论是否从事该事业，学习新闻史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2. 明确《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体现其应用性就是需要理论运用于实际当中，解决问题，实践也在不断呈现丰富的问题，需要我们用批判实践的“眼光”、观照问题的“思想”，以避免我们被实践和问题牵着鼻子跑，避免沦为问题或实践的奴隶。在新闻教育方面，急功近利的“操作”、“技巧”、“技术”训练，难以实现“养成良好新闻记者”的目标，更容易把学生养成“新闻匠人”。中外新闻事业史也要面对这个不断变化更新的大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正处于艰难转型和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事业，更需吸收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新闻事业需要反映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其中所引例证也应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以用来体现“当代”的特色。现如今，“新闻”功效的最大发挥需要“传播”，从此意义上来讲，新闻事业同时也是一种传播事业。

《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以新闻史为基础，思政资源丰富。其中，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是该课程主要的功能之一，它是提高学生的社会意识，促进学生在毕业之后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成为社会栋梁的重要课程依据。立足于《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我们可以了解到此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讲述我国新闻工作的诞生与发展，通过讲述在不同时期下我国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介、重大事件来让学生对新闻行业的整体发展过程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知。学生通过对《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可以进一步培养自身的爱国热情和为新闻工作奋斗的信念。所以，我国高校在开展《中外新闻事业史》教学的时候就需要将重点放在新闻事业的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新闻事业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是新闻事业的政治价值。不仅如此，教师还需要将目光聚焦于新闻工作者的爱国情怀，新闻人身上的品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增强学生对该专业有清楚的认知和认同，让学生在在学习中坚定自己学习新闻传媒的信念，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学习新闻人的精神。如何开展好《中外新闻事业史》，更好的达到课程的教学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知识目标，简单来说，知识目标可以促进该专业的学生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同时，通过知识目标，学生较为充分的了解了新闻传播类的专业特性，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中外新闻事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同国家的觉醒与反抗，民族的斗争与独立，发展和富强密不可分。那时候

封闭的中国与高举自由民主大旗的西方之间形成强烈“反差”，那就需要在交流中实现某些方式以期达到平衡，中国近代报刊一开始是由外国人“引入”，并没有我们历史悠久的国土上自行产生，一开始是作为外国传教士的传教工具，这就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是新闻自由精神的强有力的生动体现。19世纪末的第一份国人办报，他们就主张报刊应是“议论时政、监督舆论、主张言论自由，并强调报刊“通上达下”的作用，这也能看出是在抵制洋人在华办报，控制舆论，同时也看到这是对于西方人侵略性的一种反抗；第二是能力目标，一般来说，它是指在知识进行学习掌握之后，学生利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传播现象进行分析，在实际的新闻传播中坚持该理念指导实践工作；第三是价值目标，简而言之，它是指学生们借助于对新闻前辈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传承了前辈们的优秀的职业精神，在学习中提高了学生们的“两同一怀”，即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与爱国主义情怀，大大加强学生们对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的学习。综观中国新闻事业史的曲折发展，我们感受到前辈身上的激情热血，他们的反抗和建立，还有涤荡弥漫在旧中国文字世界里的黑暗的那种临危不惧的气魄。我们看到他们身上所展示的新闻精神：核心就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社会公众服务，为民疾呼。而蕴含新闻精神背后的则是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其中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正义至上的人文精神、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构成其新闻精神的主要内容。学生对中共党报理论的学习实际上也是对自身思想的更新，在学习《中外新闻事业史》中，学生加深了对专业的认知，坚定了专业主义信念，培养了良好的职业操守，深化了职业理想。

综述

高校开展的《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思政建设立足于《中外新闻事业史》专业，并且将新闻传媒工作者的职业价值观与道德观作为该建设的精神导向，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教育闭环。我们把思政教学目标悄悄地融入到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与课堂设计之中，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推进《中外新闻事业史》教学方法进一步改进，以求达到良好的课堂效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重点关注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在思政教育上的能力，对教师进行侧重培养，整合师资力量，积极与学生互动，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职业观，以便更好的完成《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深化教育育人的影响。学习和研究中外新闻事业史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外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较为全面的了解中国从古到今新闻事业的基本情况、特点和发展趋势，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鉴古察今，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并能获得从宏观上把握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能力，更能做好新闻传播工作，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这也是学习中外新闻事业史的目的和意义。

1. 坚持《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思政的特色化

《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的课程思政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与思政课程相结合，而是应该立足于学校实际，与学校特色相结合，举例来说，若是农业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新闻传播中提及到农业、农村、农民和扶贫脱贫工作等等与农业有关的报道之上，充分将农业院校的特色加入到《中外新闻事业史》这一专业课程中去。高校学院在开展学生实习工作的时候，教师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引导学生们对实习地的环境和人文进行新闻采写，还要在初始阶段对学生们的实习地进行线上调研，赶赴实地进行考察，促使学生们充分了解实习地的人文环境、传统文化，培育孩子们的家国情怀，为他们写出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教师还要立足于新闻传播课程思政实际情况，积极鼓励学生们了解新闻传媒类岗位的要求，明确岗位发展的新目标，新方向，进一步完善学生们的文字工作能力、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能力以及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鼓励学生利用结果导向思维进行《中外新闻事业史》的学习。

2. 坚持教学内容上的专题化与微观化

《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不仅涉及的内容非常多，而且时间也比较长，当前的教材编写大多是根据革命史的顺序来进行的，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学生将新闻发展历史与不同时期的革命历史相对比，方便学生了解事件背景，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上述的做法不能没有对新闻人物，新闻媒介进行详细的描述，整体发展把握力度不够好，学生较难抓住课程重点。在《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内容设计上，老师们可以借助于专题整理的方法来详细的展示教学内容，举例来说，梁启超先生的报刊经历了维新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老师们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就可以将报刊作为立足点，整理不同时期所用的媒体特点，进行专题化、微观化教学，而学生们就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进行课前预习，整理不同阶段的历史资料，促进课堂活动的开展，积极与老师进行配合，以便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

3. 坚持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呈现飞速增长趋势，《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时候需要把握好这一契机，坚持传统思政教育与互联网技术并行发展，在进行教学时，我们可以借助于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向学生们讲述《中外新闻事业史》的知识，将线上线下教学进行混合，不断变化教学方式，如此一来，不仅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促进良好课堂效果的形成，而且还深化了课程思政建设的两大特征——时代性与先进性。教学评价机制在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时

代教育下也要进行变革，在平常的作业或者一些考试上可以适当降低其所占份额，借助于互联网增加线上学习和实习评分，促进学生们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了解新闻传播岗位的工作要求，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积极运用到实践之中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早日成为专业化的复合型传媒人才。社会氛围会影响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价值立场和事业理想，进而影响到新闻事业的价值取向。梁启超的“耳目喉舌”理论，邵飘萍的新闻救国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倡导的五四新文化民主与科学精神，彰显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启蒙和救亡的时代主题。对于媒介的受众来说，时代的文化氛围决定了受众的精神需要，使得媒介的重心开始向这种需要所在的方向转移。在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下，受众就是传媒的顾客和上帝，媒介要在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获得受众的肯定。当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的时候，新闻事业的面貌也必然随之变化。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时代发展的变化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4. 坚持师资力量的整合与培训

教师需发挥自身的榜样作用，切实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并开展教师行为规范的学习。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集体开展以师德师风教育为主题的讲座活动，让教师定期学习前沿的政治、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参与评选、宣传、学习最美教师、师德师风典型事迹等，让教师能够正视和规范自身行为，发挥其榜样作用，并引导教师将课程育人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完善奖惩机制，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一项课程的好坏是与老师分不开的，对于培育专业新闻人才的学校来说，要高度重视老师们的思政教育培训，如今不少学校的教师虽然专业知识十分丰富，但是思政教育相对比较匮乏，因此，各个高校都应该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只有教师对社会发展、思想政治建设有了充分的认知，才能在课堂上更好的运用，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教师之间可以积极沟通与交流，分享各自的教学经验，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的教学之中。不仅如此，学校还可以实行多名教师共同教学，集体备课的方式，每一位教师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教学风格，这样的做法能够促进教学的具体化与生动化，提高学生们的《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的学习兴趣，深化教学影响。

5. 坚持教学考核评价体系上的多元化

高校对于《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的考核评价可以坚持过程考核与目标考核两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的方法，一般来说，过程考核是由以下三个方面来构成的：第一是出勤率；第二是课堂讨论；第三是阅读体会，其中，阅读体会不仅可以考查学生们对于资料的了解情况，还可以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建设的认知情况。在实践教学环节，积极引导并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让学生主动探讨新闻人的事迹，新闻人的思想，新闻人的精神，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学习，并从中理解其重大历史意义。在此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综观整个新闻事业史，并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形成课程论文。目标考核则是采用期末闭卷的方式，促进老师们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在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学生在思政教育上的意义重大，开展《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有利于学生增加对新闻传播专业的认同感，进一步培养孩子的爱国意识、政治意识，树立良好的爱国情怀。

6. 课程的思想性与思政元素内容

思想性是指课程内容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启示意义。《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不仅注重学生理论能力的培养，也注重结合时代特点进行思政教育。相较于技能动作训练的外显性，思政教育具有一定的内隐性，需要教师主动进行引导、启发和学生内化于心。《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的思想性及蕴含的思政元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蕴含知行合一的辩证思想。《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是一门需要“动脑”去认真领会、分析、判断、理解、运用的知识课程，在知与行、思与用、看与学之间蕴藏着丰富的辩证关系。学生深刻理解了某一新闻发展阶段知识点，并不一定意味着达到了学习目标，他还需要结合知识内容去亲身感受、检验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主动引导和启发，使学生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并运用于实践”的思维模式，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提升学生利用科学方法主动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是蕴含与时俱进的主动意识。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新挑战、新问题，及时调整和更新课程教学内容、方法以适应当前执法实践，既是社会发展对新闻学研究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动吸纳新内容和运用新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技能教学的效率，而且可以使学生克服因循守旧、裹足不前的保守求稳思想，树立主动创新、积极求变、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意识。让学生在学新、思新、练新、得新的教学过程中，树立关心时事、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的观念，进而形成与时俱进的主动意识。

三是蕴含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在教师的指导下，培育学生开拓创新实践精神的重要方法。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建立内在的有机联系并灵活运用于外在实践。《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有利于提升学生灵活运用所学技能的能力，培养学生开拓创新的实践精神，为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夯实基础。

结语

在开展《中外新闻事业史》课程上，贯彻“课程思政”这一概念不仅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思想政治意识，还能够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高校借助于显隐结合的手段，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的，从而为建设完整的教育育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现今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是离不开高质量的专业人才的，各个高校应该重视提高老师的政治素养，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专业课程的特色，坚持教学方法的多样化，积极将新闻传播与思政建设相融合，促进学生积极开展相关的学习活动，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提高自身作为新闻媒体人的素养，为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与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 唐乘花，朱艳琳，劳欣哲. (2020). "双向协同,三链融合"传媒类专业课程思政理念与模式的构建.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4), 5.
- 范松楠. (2021). 践行课程思政的传媒类课程混合教学设计与实践.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 7.
- 孙孟猛. (2021). 地方本科高校传媒专业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以影视导演基础课程为例. *传播与版权*(10), 3.

基于新常态背景的电商“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A STUDY ON E-COMMERC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NEW NORMAL

谭建强^{1*}, 张泽鹏², 陈朋³, 李秋英⁴

Jianqiang Tan^{1*}, Zepeng Zhang², Peng Chen³, Qiuying Li⁴

^{1 2 3 4} 山东英才学院

^{1 2 3 4}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121095442@qq.com

摘要: 针对区域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发展状况,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以及产业变化趋势对双创型人才需求的要求, 融合各种人才培养模式, 从中找出目前电商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进行改进, 提出此背景下电商“双创”复合型人才的全新培养模式和培养平台, 加强专业教师团队整体教学质量, 开辟出新的“双创”人才培养的高效路径。

关键词: 人才培养模式, 双创人才, 电子商务。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normal of region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trend on the demand for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tegrate various talent training modes, find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e-commerce talent training mode and make improvements, and put forward a new training mode and training platform for e-commerc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ompound talents under this backgrou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teaching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team and open up a new efficient path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alents.

Keywords: Talent Training Mod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alents, Electronic Commerce.

引言

在当前区域乃至全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之下, 大学生就业压力持续增加, 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人才培养有关。例如,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跟不上社会需求的改变, 电商大学生创新意识

薄弱、实践能力不强等。我国高校除了理论型人才培养之外，还提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新思路。因此，未来我国部分高校的发展，将主要倾向于面向技能型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大方向。高校不仅是理论研究的基地，也是重要技术积累的资源地，因此也是技能型人才聚集的重要地区。

要想在此基础之上促进高校的发展，学校本身就应该根据当地的经济变化方向做出顺应社会进步的举措，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尽力让学生学会在社会中适应高技术含量的工作，让他们做到书本与实践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从而反过来推动整个学校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共同进步。

笔者将着重以某高校作为特殊例子，结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处的现有阶段——常态为背景，明确高校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双创”模式结合高校电商方面的课程（如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研究符合实际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使电商人才培养结合新型技术渗入大众生活，成为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主体。

综述

要想成功实现理想的未来，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时代，复合型人才成为当今社会需求的主要人才，因此社会对高校的压力大大提升。15年，我国国务院正式将创新提上日程，大大宣传创新对未来社会的重大影响，呼吁各级政府重视创新型人才，配合企业及学校制定新的人才培养计划。同年，国务院也出台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提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计划，甚至制定了一系列方案：要求学校对人才提供一切社会资源，开设新型课程，聘请专业的教师，为新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帮助，甚至可以支持学生休学创业，同时也要建立创新教育联盟，与企业进行合作；要求企业以及政府建设新型创业平台，为各方面人才创设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高校在经历一段创新探索之后，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课程教授仍然以学科体系为主，割裂了创业课程与其他主课程之间的联系，使得学生无法平衡主课程与创新课程，出现重视其中一个的现象，使得“双创”在学上身上没有得到体现。目前，电子商务课程体系也出现的一些致命问题，如：学生无法透彻了解专业，与创新课程割裂，缺乏拥有深厚教学经验的教师团队，师资力量不足等。

一、电商双创人才培养计划出现的缺陷

（一）电商双创人才培养缺乏目的性和原则性

目前，部分高校电子商务专业的定位就是电子商务业务与国际贸易的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具有沟通协调能力的人才。这也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之前的电商人才培养策略

有所不同。因此，就要求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融合产教的背景，强化新的理念，有效提升电商双创人才培养模式效率，提升人才综合绩效能力。但是，在该大学中，电子商务创业创新作为学习重点其实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大学课程中，导致教师有时无法精准介入知识体系来组织授课内容。加上部分高校的电子商务课程内容比较浅显，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也还没有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水平，缺乏立体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总之，培养创新创业型电子商务人才没有明确的原则和目标。

造成这些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不成熟，内部市场缺乏成熟的运行机制。高校也没有从各个角度看待电子商务双创人才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只关注如何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而忽略了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动态的需要。总的来说，高校电子商务双创知识体系的结构和设计不够完善，以及原则和目标不够明确。

电子商务的实际用人方向是多方面的，对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不同的要求，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创业技能要求也是极其重要的。其专业化过程则应根据具体要求进行具体划分。显然，多数院校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一系列问题。

如果电子商务专业的主要活动领域定位为国际进出口贸易，其课程设计应面向管理视角，如果工作主要内容是电子商务业务处理，课程设计就该面向具体的技术应用，尤其是创业技术教育。

（二）部分高校轻视电商专业，教师及双创教师资源的缺乏

由于电商专业是这几年刚兴起的专业，社会还在适应阶段，各方面对于电商的计划与策略不是比较完善，这导致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是不全面的，更不提师资方面。部分高校的电商专业教师都不是本专业出身，而是来自于计算机、信息管理、乃至管理学等专业。这就造成了，学校为电商专业配置的教师不能完全解决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导致学生接受的知识不是全面的，学生的能力低于市场的要求。同时，长期以来对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忽视，加上对于专业的“不专业”，导致了电商双创教育的缺失。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高校开设的电商专业课程包括电子商务课程、国际进出口贸易课程、商务英语课程、市场营销课程等。这些课程复杂多变，而且灵活性、逻辑性和连续性较强，教授的教师需要拥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但是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缺乏行业背景，这就严重阻碍了电商专业人才，尤其是双创人才教育的发展。

（三）高校针对电商专业课程没有明确规划，忽视双创教育

电商专业课程的开设就是学校适应社会发展的体现之一。由于电商专业的课程设置偏离市场需求，导致学生的理论课程严重与社会的现实状况脱离，与市场电商的人才需求要求背

道而驰。正确的电商专业应该将理论课与实际课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学校中不断为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

同时，学校也要对教师资源进行调整，改变传统的教师授课方式，给学生新的教学体验。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学校由于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资源方面比较落后，从而电商专业的学生的学习就比较落后。

另外，创新创业教育并未受到电商专业的重视，在多数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并未有明确的培养方式和相应的课程设置，也阻碍了电商教学及双创教育的发展。

二、高校关于电商双创人才培养道路的摸索与前进

（一）改变培养人才的目标

电子商务专业具有五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行业瞬息万变，专业知识更新较快，特别是与电子商务行业结合紧密的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二是面向的应用领域宽泛，能够与传统行业、农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交叉融合；三是涉及学科面广，结合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等多方面的知识内容；四是毕业生就业面广，与专业相关度差，尤其是不断衍生出基于电子商务的新职业，适合创业；五是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商业运作方式。正是由于电子商务的这些特点，使电子商务相关需求与职位很容易产生新兴模式，从而使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新型模式正在成为创新源泉。因此，电子商务是最适合于创新创业的实用型专业。创新变成了新时代社会对所有人的要求，尤其是对电商专业人才。它要求在培养电商人才的过程中，不仅要时刻保持这个专业本身的特色让人才全面掌握，还需要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电商专业的人才不仅要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及社会实践能力，还需要拥有创新精神，懂得各个方面的知识，在岗位中会灵活变通。例如，D市某技工学校对大学生定位就是：大学生必须要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拥有丰富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并且还掌握不同专业的知识，具备在一些岗位上工作的能力，能够将创新精神和能力完全体现在工作岗位中。

（二）加强综合实力

学校要在传统的专业课上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让学生能够全面了解本专业的各种问题，而新加的创新创业课程则要求学生们不仅要拥有丰厚的理论知识，还要拥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所以，大学生们在以后的岗位上，不仅要体现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素养，还要体现创新创业精神。而职业能力的目标就是要求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由教师与专家共同确定学校人才培养的方向。

在社会发展和“双创”的大背景下，要求电子商务岗位变为电子商务运营、网络营销、电商美工、网站维护等几个部分，并且每个职位的对应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比如，电子商务运

营岗位就要包括电商运营、制定策略并实施；推动整个企业朝着指定的目标发展；加强产品的宣传与公司本身的知名度，提升产品销售量和顾客的回购量。与职位相匹配的能力就有市场调研能力、分析能力、管理能力、服务能力等。在具备了相应能力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及实践。

（三）透彻了解创新创业能力，构建双创能力体系

电商“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指以本行业需求为根本出发点，以创新创业为培养导向，分析对应工作岗位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并按照项目和任务的方式，将创新创业能力教育融入到相应的课程体系中，体现出课程体系的实用性和创新性。同时，开发基于“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培养方面的各类程，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技能。

创新创业能力体系是由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共同组成的。创新精神分为了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经验，团队合作等。这对于学生的要求就比较严格，它明确要求学生要学会在岗位中灵活变通，不可死板，要掌握不同方面的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同时自身也要进行反思，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创业能力则指的是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包括市场研究能力、分析能力、谈判能力、投资能力、运营管理能力等方面。要求学生要具备创业的想法，正确把握市场给予的机会，利用社会各种合理资源进行创业。

（四）优化课程体系

依照社会的变化，我校要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首先要根据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原来的课程体系，重新将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和选修课这四种课。这四种课要分别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基础、职业能力和职业拓展，按照大学的四年分年级进行。并且，每种课程所占比例不能相同，像公共必修课只占 21%、专业理论课占 37%、专业技能课占 29%、专业拓展课占 13%。

除了这些课外，学生们还会有实践课。实践课也是大学生们大学四年的必修课程。学校在优化理论课的同时，也应该优化实践课，将实践课分为三阶段、三层级、六模块体系。

三阶段就是学校将理论课分为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课程，每个年级的学生所接受的理论课是不一样的；三层级就是学校教授学生的技能按照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按层次教授，以便学生能够接受；六个模块就是将所有实践课分为认知实践、课程实践、专业实践、岗位实践、综合实践、职业资格、项目运营、顶岗实习、创业实践这几类，层层递进。学校优化课程体系是为了能够不断提升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素养，以便适应未来岗位的变动。

最后，鼓励电商专业学生参与各类竞赛，尤其是创新创业方面的竞赛，来提升他们的认知和创业能力，为将来的创业打好基础。学科竞赛是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培养电商双创人才必须将学科竞赛与课堂专业知识教学、实践教学等结合，开设第二课堂。通过加

强对学科竞赛的建设与管理，实施鼓励政策，激发学生参赛兴趣与创新潜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协作和实践创业能力，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竞赛在“双创型”人才培养中应有的作用。

（五）“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进

1. 举行全民创新创业的教育

我校在创新课程中开启了多项如“创业启蒙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与创业教育”、“人文素养”和“电商创业基地”等课程，尽可能地让学生明白创新的重要性，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以后的工作做铺垫。

2. 对电商大学生进行针对性创新创业教育

电子商务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从学生入学教育就开始，在进行专业课程及技能课程学习的基础之上，增加赴知名电子商务企业参观等教育教学方式。通过聆听企业相关人员的讲解，引导学生了解电子商务行业特点，熟悉电子商务企业的一般运作方式以及其内部架构。并对于不同的岗位职责和日常工作进行讲解和学习，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同时，由学院创办创新创业基地，以培育大学生创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为宗旨，让学生有场所、有指导的进行在校期间的创业研究和实践，通过“创业实训”使学生掌握电商专业不同岗位所需的知识和相关技能，最后通过每学期或者学年安排的企业顶岗实习活动来加强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创新思维。各高校可以将创新理念融入各个专业课程当中，让学生在实践中体现出创新精神，培养他们动手能力。教师可以就着专业课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能力，让学生尽快适应社会的变化，以便在以后的工作中如鱼得水。例如，可以在“网络营销”课程中增添淘宝和京东的指导，帮助学生尝试开店，真实的模拟生活。同时，教师在教授理论课时，也可以结合各种创新创业的实例，让学生更能体会到创新的重要性。

这样，通过理论、实训、实习为一体的教育，让学生循序渐进地对于创新创业思维和教育有一个清晰地认知和具体的目标，为电商双创教育带来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和模式。

3. 开展“学生走出去、企业进校门”的双向校企合作培养计划

为解决电子商务企业人才需求和学校毕业生技能实际情况的差距问题，帮助学生能够尽快适应行业需求，我校与国内外其他学校进行“双创”人才的共同培养，利用国外的人才培养方法对我国学生进行自我提升，加强学生自身的技能。比如，我校曾经与B市某学校开展合作办学活动，共同培养电商“双创”人才，也曾与C区某跨国电商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培养“双创”制造业人才。

（六）提升“双创”师资整体能力

为了有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向学生传递创新创业思维、知识、技能，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对于双创型教师的培养：一是要求教师要不断增

强自己的创新创业意识，深入对专业理论知识的渗透，同时要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和创新创业技能的融合；二是教师要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创业意识的培养，把创新创业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举办双创讲座和开展主题活动等方式，加大创新创业价值宣传，搭建有利于学生拓宽创业思维的双创平台，投入师资、专业资源等开展创业活动。

要想彻底实现“双创”计划的实施，就离不开“双创”师资的推动。教师要想成为“双创”教师，就要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社会实践经验。所以，学校要重视这方面教师的培训，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注重累计教学经验，提升教师整体能力。例如，学校可以开展培训，让教师进行专业的岗位训练，培养创新精神。现如今，我国已经拥有了数位获得多项荣誉奖项的导师，全校教师素质高达82%以上。学校也可以聘请某方面的成功人士，邀请他们做学校的培训导师，给他们丰厚的条件，丰富“双创”教师队伍。

同时，教师还必须能够指导好各类电商技能及创业竞赛，这就要求未来的电商专业教师在教好学得基础之上还必须熟读比赛规程，将职业技能大赛所反映的行业信息、企业信息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根据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人才培养需求，将竞赛项目落实到课堂教学中，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质量。同时，职业技能大赛也给教师们提供了经验交流的平台，教师们可以在赛项说明会或者比赛见面会，甚至是平时的竞赛训练中，与电商双创教育发达地区或先进院校的同行互相交流沟通，取长补短，为了共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前进。

结论

总之，通过改进人才培养方案，把双创教育融入到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维度，构建电商双创人才培养体系，可以使电商专业培养的人才切实提高双创意识，提升实践能力，不断适应新常态下行业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适应市场人才需求。

参考文献

- 王伟娜. (2019).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跨境电商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智库时代*. 2019(10).
- 罗薇, 陈唯, 邓敏慧. (2022). “互联网+”视域下高校电商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现代商贸工业*. 2022 (02).
- 向红梅. (2017). 基于“互联网+双创”跨境电商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社会科学家*. 2017(11)

中国新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质量实证分析**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NEW ECONOMY**李方圆^{1*}, 涂乃天², 谢明³, 王艳⁴, 徐琼⁵Fangyuan Li¹, Naitian Tu², Ming Xie³, Yan Wang⁴, Qiong Xu⁵^{1.2.3.4.5} Hunan Institute of Foreign Economics, Hu Nan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55054224@qq.com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已跃居全球第二，但是目前我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社会背景的变化、社会思潮的湍流以及社会形势的转变，为社会企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挑战危机。行业在面临转型升级的时候会使得一些岗位消失，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岗位。而这样的社会形势使得高校人才培养面临巨大的挑战，大学生就业面临重重困难。因此，本文立足于社会形势的变化，结合学生发展实际情况，对当前教育教学进行创新与改革，努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得学生在面临社会就业竞争时能够沉着冷静，夺取胜利。

关键词：新经济，大学生，就业质量。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y country's economy has been rapidly improved, and its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 has jumped to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world. However, my country's economy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eeking greater development space. The change of social background, the turbulent flow of social thoughts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situation have brought grea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but also brought inevitable challenges and crises. When the industry fac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ome jobs will disappear, but at the same time, new jobs will be created. And such a social situation makes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ace huge challeng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novates and reforms the curr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strive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be calm and wi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face of social employment competition.

Keywords: New Economy,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Quality.

引言

目前，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这样的窘境并不是某一个高校或者地区所独有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学生层面的主观因素，又有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因此，党和政府着力打造一条学生培养发展之路，努力使得这条路上的所有学生都能实现自我的提升与进步；着力民生保障问题，力求解决社会就业难题，攻克就业难关，不仅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要努力提升就业质量，使社会发展迈向新的台阶。

由于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就业岗位明显缩减，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逐渐朝纵深方向发展。目前，社会经济结构升级，产业调整，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终结，科技智能代替了大部分人工劳动，待业人员数量明显上升，这对社会安全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大学生毕业数量累年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社会民生问题日益突出。

1. 我国新经济的发展现状

1.1 新经济发展的成果

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自2018年以来，我国大部分行业都在稳步向前发展，其中还有一些新兴产业更是带来社会的革新和进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在全国经济比重中逐步上升，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大。这些行业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对社会就业形势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行业使得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更多的可能。

分享经济作为新经济的典型其发展态势向好。新时代下，共享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词语，以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为简单形式的共享经济时代已经来临，近几年，共享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营业销售称倍数增长，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支撑。此外，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为社会创造了近600万就业岗位，极大地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多的人员能

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还很有可能催生出更多工作岗位，间接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走上工作岗位。

社会发展必然会对传统行业造成直接冲击，而那些不合社会发展脚步的部分必然会被洪流所淹没。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众多新兴行业的重要支撑，依托互联网技术，大量的就业岗位涌现，也为一些传统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传统的汽车销售和共享汽车的出现。科技发展和互联网技术带来了全新的购物方式，网上购物在近几年间发展迅猛，活动期间销售额更是屡创新高。同时，网上购物能够为各个年龄段的群体提供支持，消费群体众多，发展空间一片大好。

1.2 新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是发展新经济的基础还很薄弱。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较好，从整体上看发展前景广阔。但是，深究一下，我们就能从中发现很大的问题，新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发展新经济的基础还是非常薄弱的，一旦出现问题，很有可能造成整个行业的覆灭。这主要是因为版权保护、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投资太少，无法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此外，部分地区思想观念落后、基础设施跟不上，既不能在思想上有所觉悟，又不能在技术设施上提供援助。

二是政策环境不完善。新经济发展是站在信息的肩上向前走，而信息制度必然需要科学的建构。但是，由于传统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原有的管理制度、政策等难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处于辩证统一的格局之中，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那么新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直接的影响。传统的管理观念极大的限制了新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在于人力资源上做出改进。社会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只有为经济发展培养输送出足够多的人才，才能支撑起一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都在极力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业，鼓励大学生走上创新创业的大道，努力用自己的所学解决自己的就业，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连带解决其他人的就业问题。但是，一些大学生和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来源，没有可靠的经济支撑，创新创业的脚寸步难行。

2. 新经济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新经济的发展既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可能，但是与此同时也对大学生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只要我们握好剑的方向，

我们也能化劣势为优势，转危为安。共享经济时代的来临则为大学生带来了更多的岗位，但是这项经济的产生也让一部分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而这部分人同样会来和大学生抢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更为激烈的竞争。这种新型的经济形式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因为新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高素质人才的支持，这也迫切的要求大学生专注于自身的专业技能提升和综合素质发展，为胜任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新经济的组织形式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灵活性，这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优势。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思想开放的年代，所受到的约束很少，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高于其他年代的群体。但是，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必然在开始阶段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就比如新经济的发展对大学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新经济之所以被称为“新”经济，就是因为它和传统的就业岗位存在显著的不同，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会为一些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的学生带来消极影响，同时新就业岗位所具备的专业技能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对于一些平时不上课学习、临时抱佛脚备战期末考试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拦路虎，以至于很多岗位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市面上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就是毕业生素质和岗位职责不匹配的首要表现。此外，再加上一些国家政策的出台，使得社会上的性歧视现象日益突出，这对于一些女性工作者来说十分的不友善。

3. 大学生就业质量调查问卷调查

3.1 问卷发放与回收

为完成本文的写作，笔者还对当地几所大学生进行了必要的调研问卷分析。本次共发放 300 份调查问卷，有效问卷率近 90%，其中有效问卷率较高的是长沙理工大学，较低的则是湖南师范大学。

3.2 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问卷内容较为丰富，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四大方面：第一，就业基本情况；第二，就业质量评价；第三，对自身就业能力与知识的评价；第四，对母校教学及就业工作的评价。因此，本文也是从这四个方面出来分析工商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从第一个内容方面来说，超半数学生的就业是受雇全职工作，多在一些中小企业任商业和服务人员，工作地点则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方。大多数学生对自己目前的就业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同时这些大学毕业生所选择的岗位与自身的专业还是非常对口的，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可以观望的。但是，在

对母校的评价中，很多毕业生认为母校提供的个别咨询指导不够，此外师生之间的沟通也是远远不够的，对学生的帮助十分有限。此外，在就业知识与素质上也还需要格外注意。

从表 1，我们可以看到，在专业基础知识和科学知识掌握上，工商管理类的学生表现较为良好，基础知识掌握的相对较好。但是，其他专业的学生其专业知识掌握得要稍差一些，均值在 3 分左右。专业前沿知识对学生的发展同样存在直接的关系，前沿知识能够影响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它能够帮助学生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和社会发展趋势，使学生能够对未来有一个较为清楚的把握，也只有这样，在机遇来临时才能够第一个抓住，并将机遇转化为长远发展的基石。因此，学生不仅需要掌握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还需要掌握必要的专业前沿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双重保障。

表 1 就业知识掌握的评价(掌握程度从 5 分到 1 分)

题目\选项	5	4	3	2	1
专业基础知识	63 (22.82%)	123 (44.57%)	67 (24.28%)	13 (4.71%)	10 (3.62%)
专业核心知识	34 (12.32%)	141 (51.09%)	67 (24.28%)	23 (8.33%)	11 (3.99%)
专业前沿知识	13 (4.71%)	98 (35.51%)	114 (41.30%)	38 (13.77%)	13 (4.71%)
专业技能	20 (7.25%)	99 (35.87%)	119 (43.12%)	29 (10.51%)	9 (3.26%)
人文社科知识	28 (10.14%)	132 (47.83%)	85 (30.80%)	20 (7.25%)	11 (3.99%)
科学技术知识	16 (5.80%)	110 (39.86%)	119 (43.12%)	20 (7.25%)	11 (3.99%)

4. 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内容

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密切相关，完善科学的体系构建能够良好的反映教学效果，而且这一体系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

4.1 就业率

评价一个高校的教学质量，永远离不开对就业率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业率直接体现了高校及教师的教学水平。虽然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就业率并不存在绝对的关系，但是相对来说二者关系比较密切。就业率首先突出的是对“量”的考核，学生的就业不仅要重视其数量，更要重视其质量，而且质量更为重要。教师的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为了所谓的就业率，而是教书育人的根本要求。就业率曾分为初次就业率和年终就业率。初次就业率主要以学生毕业时的就业数据为准，而年终就业率则把目光放在了大学生就业的整体情况上，立足于对整个大学生团体的就业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一般来说，大学生的就业率与社会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直接联系。

4.2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

大学生就业满意度测评的主体是大学生，在这个测评中，大学生可以表达自己的评价，这样的评价更为直观且真实，对学生诉求有真实的反映。以人为本、教书育人是素质教育的本质，只有只有重视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重视大学生的就业测评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学生一毕业并不能选到自己对口的工作，但是专业对口的学生其职业发展存在更大的上升空间。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就包括专业是否对口，薪资福利是否符合预期等。

4.3 用人单位满意度

用人单位满意度测评的主体则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对所招聘的员工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毕业生也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使用者有权对所购买的产品进行评价。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测评主要包含以下方面：政治思想、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其中，政治思想是根本的指标，只有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执着的理想信念，我们所作出的成果才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专业技能是胜任一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掌握某一项特定的技能，我们才能在岗位上走得更远，不会被他人代替。而综合能力则是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引，只有具备优秀的综合能力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4.4 工作稳定性

工作稳定性强调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决定，并不只是看单方的因素。工作稳定性不只是强调工作环境的稳定，而是未来有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工作稳定性的获得需要工作人员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从这个稳定的工作中各自获取利益，这样合作的关系才会继续持续，但是稳定的合作关系中所获得的利益肯定是更多的。

4.5 社会认可度

社会认可度主要是站在学校之外的角度对学校进行评价，主要包括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度。学生家长由于立场的原因，主要关注学生的就业情况，同时再加上了解学校的途径具有主观性，因而家长的评价也极具主观性。社会组织由于立场不同，因此更能从客观的角度对学校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极具参考价值，在整体评价上占据重要地位。

5. 新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

5.1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调查结果分析

1. 不同性别就业质量指标比较

从图 1，我们可以发现，性别差异也会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上面的每一个指标都是取其被测对象的平均值。其中，女生劳动报酬、福利待遇等的均值较低，而男生的均值则较大；双方都十分重视工作环境、社会保险、同事关系等。除此之外的指标中，女生的均值略低于或等于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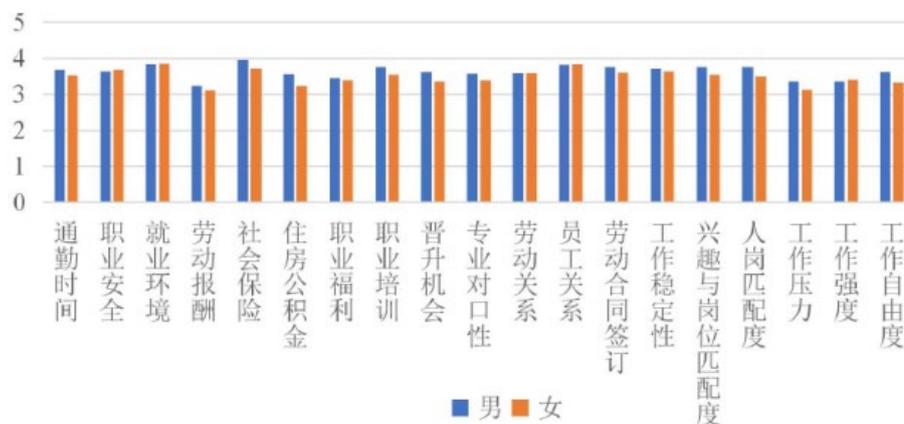


图 1：不同性别就业质量指标

2. 不同单位性质的就业质量指标比较

图 2 则是从单位性质出发进行评价的一个报告，在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行业不同，就业质量评价也不同，行业差异直接影响质量评价。但是，不管是哪一行业，劳动报酬、工作压力等的均值均不高；而国有企业的职业安全、保险、工作合同等均值均高于其他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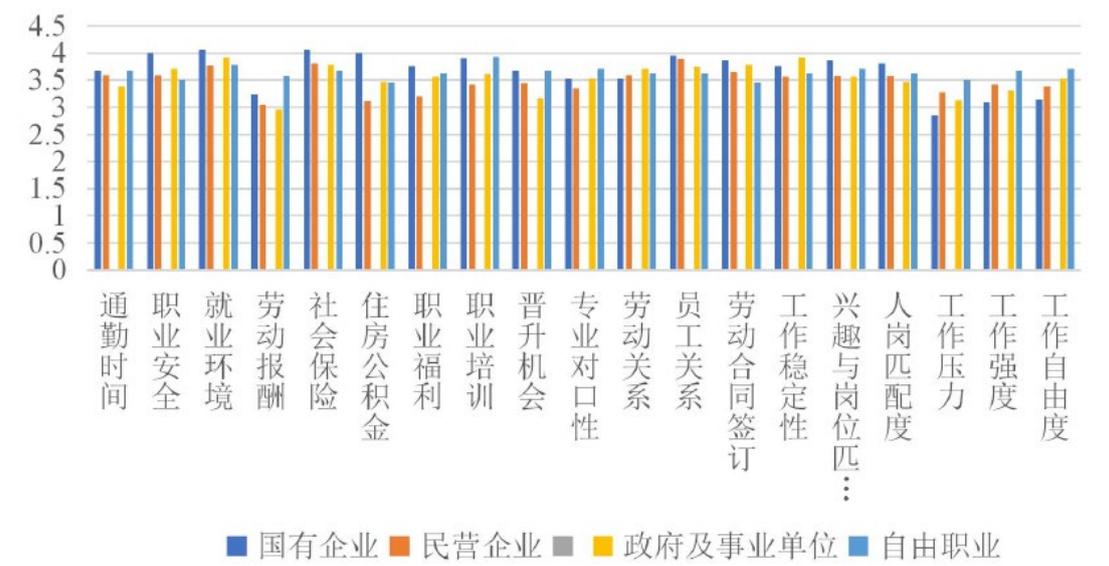


图 2：不同单位性质的就业质量指标

6. 新经济背景下大学生就业质量解决措施

这些问题都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既要看到问题存在的客观性，又要看到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因此，本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努力解决问题。

6.1 优化课程模式，扩充专业前沿知识

课程是培养教育孩子最主要的载体之一，也是知识内容所呈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高校及教师要从课程优化上入手，对课程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探索出真正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模式。这就需要高校及教师树立先进的教学观念，终身学习，及时补充自我，扩充专业前沿知识。在扩充的过程中，不仅教师能够得到专业上的进步，使自己成为专家型教师更进一步，学生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与帮助。学生不仅要在教室学习课本知识，更要学习社会行业发展趋势，为未来行业的转型升级打下基础。

6.2 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增加模拟实验教学

素质教育并不是在一室之内就能完成的，它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在教室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学生要走出教室，走进校外实训基地，增加模拟实验教学，让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变得越来越宽广。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参与过程中得到知识的升华和能力的综合提升。

6.3 开展专业素质拓展活动，建立小组合作考核模式

在重视学生理论学习的同时，更要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以专业素质拓展活动为载体，以小组合作为形式，在实践中达到能力的提升。同时，在合作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正确看待竞争和合作的辩证关系，在班级学习中形成有序竞争、良性竞争。

6.4 关注学生个性发展，提升学生“主人翁”意识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十分强调管理，但是却把重点放在了对教师的管理上，忽视了学生才是学校的主体。高校要把发展和管理放在学生身上，聚焦学生的发展才是高校的本职工作。同时，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还远远不够，教师要从多种途径和多种形式上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提升学生的积极性，要引导学生不要一直待在教室或者寝室，要积极的走出去，到学生会去、到社团去，到社会上去，要做好学习与未来工作的衔接，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

6.5 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学生参加校外活动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开展教育教学实践，只有建设好实验基地，学生的才能有实践的平台和机会，这是保障学生动手能力提升的第一基础。同时，光靠学校的实践基地进行动手操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投入到社会志愿者工作或校外活动之中，这不仅能够为学生的能力提升提供更多的途径，同时还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6.6 搭建训练平台，建立导师团队

要想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实现其创新能力的发展，就必须积极实现创业创新能力训练平台，只有为学生发展提供必要的平台支持，教师的教学才不会白费。能力训练平台不仅仅是包括实际的设备支持，还包括一些软设施，例如创新能力大赛、创新培训与讲座等，同时，还需要打造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为学生发展保驾护航。只有打好实践平台硬件设施基础，软件设施才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孔微巍，廉永生，张敬信（2017）.我国劳动力就业质量测度与地区差异分析——基于各省市2005—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3(1), 12-18.

- 吴新中. (2017). 大学生就业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统计与决策*, 12(2), 23-26.
- 涂建明, 涂晓明. (2015).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析及其提升路径.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37(4), 47-50.
- 刘敏, 陆根书. (2015). 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差异的比较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31(2), 45-49.
- 李海舰, 朱芳芳, 李凌霄. (2018). 对新经济的新认识. *企业经济*, 74(5), 103-109.
- 杜传忠, 郭美晨 (2016). 发展新经济打造新动力.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31(5) 78-80.

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就业能力的研究综述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MPLOYABILITY OF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SOCIAL SPORTS

王艳^{1*}, 谢明², 涂乃天³, 李方圆⁴, 吴友华⁵

Yan Wang^{1*}, Ming Xie², Naitian Tu³, Fangyuan Li⁴, Youhua Wu⁵

¹²³⁴⁵ 泰国曼谷斯坦福国际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¹²³⁴⁵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tamfor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694280420@qq.com

摘要: 近年来, 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人数发展迅速, 就业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 而就业能力是影响大学生成功就业的主要因素。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 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相关理论和因素, 以及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模式、计划、活动等进行了回顾和探讨。通过现有文献梳理发现, 国内外高校已经认识到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性, 对就业技能和影响因素研究丰富, 但对于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和提升就业能力的相关研究较少, 提出具体实施推广方案则更少。随着中国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 如何提高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提升本科生的就业能力包括就业技能亟待认真反思与应对。

关键词: 就业能力, 就业技能, 影响因素, 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

Abstract: The number of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social sports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employment problem has also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nd the employability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successful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uses text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review and explore the theory and the factors of employment ability, and the activities affecting the employ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combing foun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students' employment ability, employment skil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research is rich, but for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ability promotion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less, put forward th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promotion plan is less.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ese college enrollment scale,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sports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students' employment ability and employment skills need to be seriously reflected and responded to.

Keywords: Employment Ability, Employment Skills,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Social Sports.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国家各项产业技术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全民参与大众化体育活动在发达国家迅速兴起，并渐渐成为全球化的体育浪潮，继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后的又一体育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有关体育文件中指出，要保障每一个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力（喻坚，2013）。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际奥委会积极开展大众体育工作，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国际大众体育。在此号召之下，世界多个国家陆续推进社会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将体育学类的本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如美国 100 多所体育院系中有超过 50% 的院校设置了社会体育专业，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一些体育院校或综合大学中，也设置不同社会体育专业（吕化，2017）。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不断提升高校体育专业标准，加强对体育学本科专业的建设和创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注重人才培养质量。

在中国高度重视国民健康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社会体育专业生源稳中向好。自 1993 年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国内专业体育院校率先创设社会体育专业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发展，社会体育专业建设已具规模。2003 年中国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提出对社会体育专业的具体人才培养目标，这一政策的提出为社会体育专业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为进一步明确该专业性质，2012 年教育部将其改为“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亦简称为“社会体育专业”。该专业主要培养的是应用型专门人才（戴志鹏，2020）。这类人才需要具备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特征，拥有社会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具有较高组织能力、社会交往等能力，具备从事体育活动组织管理、咨询指导的能力（卢元镇，2019）。“十一五”计划实施以来，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教育对人才培养目标、发展模式、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构建了全面系统的工作机制。然而部分高校社会体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一味追求扩大专业种类与规模，使得对体育人才能力培养陷入较大误区。对于社会体育专业大学生而言，市场不仅要求其应具有扎实的体育理论专业功底和知识素养，还要有实践应用能力（董茜，2010）。社会体育专业大学生只有扎实的锻炼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从而实现良好稳定就业。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体育专业派生、迭加、变化的发展历程。现今普通高等学校社会体育学本科专业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较好地满足了当今社会、时代的具体需求，为中国体育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

1. 国内外相关理论回顾

1.1 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 (Employability)，最早由美国学者贝弗里奇 (Beveridge) 于 1909 年提出，它旨在提升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从业积极性。国内外研究学者基于不同的维度，围绕就业能力展开了宽领域、多层次的探究。就业能力是一种在特定行业背景下，适应于不同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综合能力 (杜德省,2010;汪昕宇,2014)。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往往涉及到多个方面，对于就业能力最普遍的界定就是“综合能力”；个体具备的技能等资本的存量都属于就业能力 (Hillage,1998; Pollard,1998)。福格特(Fugate, 2004)界定就业能力为在职业期间个体通过确认和实现其在组织内外部职业机会的能力。就业能力亦可以定义为是一套技能、知识和个人特质，使个人更有可能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获得并管理和领导力 (Vicki, 2009)。就业能力包括职业管理能力、求职能力、发展策略、表达能力、个体的知识、技能和态度(Bowe, 1998)。李军凯 (2012) 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有专业能力、分析思考，另外还包括了人际影响、职业认同和个性品德。宋国学 (2008) 指出良好的知识技能与和谐团队技能，能够让就业发展更广阔。邹奇清 (2005) 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要求角度通过实际调查得出，对于就业能力的重要性，依次排序为：动手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和专业知识。由此看来，就业能力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衡量求职者的综合素质技能的一种重要工具。

1.2 就业技能

就业技能是与获得和维持工作直接相关的技能 (Harvey,2001;McQuaid & Lindsay, 2005)。就业技能是本科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部分，增强毕业生的就业技能，提高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是推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必由之路，各个高等教育院校理应重视。2002 年以前，人们对“什么是就业技能”并未形成较为固定的、系统的、理论性的看法。直到 2002 年“澳大利亚工商联合会”和“商会”(Austral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共同提出了“就业技能框架”。就业技能框架包括 8 个方面内容：沟通能力、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计划和组织能力、技术、终身学习的能力、创新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对多个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估，总结出了促进个体就业技能发展的 8 个方面。自从这一结论公布以来，许多大学和体育教育培训部门开始注重对这些能力的培养。也有其他基于此就业技能框架下提出的不同观点。TCU 提出的基本就业技能：是一个包含 6 大项技能领域，“交流、计算、批判性思考与问题解决、信息管理、人际交往、个人能力”(Ontario Ministry of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1)。Cotton (2001)认为就业能力技能，包括基本技能，如口语沟通、阅读、写作和算术，高级技

能，如学习技能和策略，问题解决，决策，情感技能和性格如可靠和责任心、积极的态度、人际交往能力、自律和自我管理以及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工作的能力。他还提出有助于成功地教授就业能力技能的因素有：教学方法、教师属性、将技能习得作为明确的学习目标、学生参与和互动、相关背景以及学生的责任和自主。Pan 和 Lee(2011)在台湾情境下所确定的学生就业能力技能和胜任能力，包括一般工作能力、工作专长、工作态度、职业规划和信心。根据查阅的相关文献，国内外对大学生就业技能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是从对就业技能的相关研究来看就业技能对于每一位大学生来说都非常重要，因此高校在教育教学、学生职业发展规划过程中，对大学生的就业技能的培养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社会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2. 国内外相关研究梳理及动态

2.1 本科生的就业能力

Allison, Harvery 和 Nixon 认为，本科生就业能力对于学生而言，不只是着重于得到首份工作的能力，也着重于通过长期工作或将所学专业特长发挥在工作上的能力，从用人单位来说，Buck and Barrick (1987) ; Busse, (1992) ; Cotton, (1993) ; Young (1986) 认为用人单位更喜欢拥有一系列基础的、高级的以及在申请初级毕业生工作时的情感技能。其中 Cotton(1993) 将就业能力分为基本技能、高级思维技能、情感技能和特征，基本技能包括口头交流、阅读、基本算术和写作，高级思维技能包括解决问题、学习技能、创造性和创新思维以及决策，情感技能和特征包括工作态度积极、守时、自信、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和责任心/可靠性，能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工作，以及适应能力/灵活性。L.M.也发现用人单位在看重应聘者专业技能的同时，对一些软技能也是相当重视的，比如沟通、解决问题、具有团队精神、领导技能 (Crawford et al., 2011)。Chung-Khain Wye(2009)指出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技能能力，但诸如批判性分析、计划、解决问题、口语等技能、沟通、决策和谈判反映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匹配程度不高，这一结论与 Jackson, D. (2013)的研究结果非常相似。从高等教育提供者来说，Husam Helmi Alharahsheh1 and Abraham Pius2((2019)认为高等教育提供者应对学生进行反思性评估，首先应将实践元素纳入高等教育提供的课程，而不是只关注理论方面，然后，考虑进一步在评估中启用积极的反思实践，以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包括真实经验，并鼓励自我意识，但是在要求学生在反思时具有技术性和评价性的限制性指导原则下，修葺反思性评估是比较难的。在此之前 Simon Cassidy(2006)提出了同伴评估，并证实对就业能力技能的发展有积极的贡献，因此应该成为高等教育中常规实施的教育实践。Cotton(2001)指出，关于就业能力教学的

问题，有必要确定和实施具体的教育实践，作用于就业能力发展问题。Nick Wilton（2011）认为学生的成绩如何在用人单位展示也应是高等教育就业能力发展的有效目标。

2.2 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的就业能力

对于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的研究偏少。Nick Breeze 对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的就业能力进行了调查，目的是让学生们能够衡量和明确自己的发展，提供有准备的工作申请，解决面试问题，此研究将学生就 16 项就业能力（适应能力、商业意识、信息素养、人际关系、阅读能力、计算能力、观察能力、口头交流、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自我管理、团队合作、时间管理、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压力下工作、书面交流）进行评分，发现其在岗位上的总体完成率与其他专业相比是最低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们认为社会体育专业的毕业生所需要的四大技能类别分为：个人技能、技术技能、求职技能和基础知识。研究表明就业能力是由多种技能和属性构成的，这与其他就业能力研究相一致。基本社交技能、个性属性、语言技能和基本人际交往技能都被认为是学生在体育行业就业的关键。同样，学生也需要具备与社会体育管理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Louise Martin 基于问题的学习 (PBL) 干预的影响，在三个心理构念(动机、控制源和自尊)上学习者自主性发现，一个短期的 PBL 课程有利于学习者发展自主性和其他关键的就业能力技能内容知识的应用。PBL 使学生能够在应用内容的同时发展就业技能知识。Jenny Fleming 发现采用合作教育、实践或工作综合学习 (WIL) 经验来发展适当的能力，提高就业能力。认为大学的学术项目需要为学生提供机会来发展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意愿，主动性和个人组织技能的使用。WIL 结合经验的设计应该允许学生在交流、自信、关系建立以及团队合作等方面发展，以增加毕业生就业的可能性。

2.3 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研究

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因素是研究就业能力的关键指标。Xie（2017）通过整合计划行为理论检验毕业生感知就业能力对求职的影响，并确定求职自我效能感、主观规范、意向强度随时间变化的具体情形。结果表明，感知就业能力对求职自我效能感、态度、意向强度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所有的重复测量变量（除了求职态度）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Peter & Mantz（2003）认为就业能力没有得到提升主要是因为就业能力政策得不到很好的执行。David, Leah, Riley and Mark（2013）也对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因素进行了探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实证检验五大类就业能力因素，并分析了影响毕业生就业能力的 17 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当前研究定性和定量阶段的结果表明，17 个就业能力因子可聚类为 5 个高阶复合因子类别。此外，调查结果表明，在招聘新毕业生时，雇主会最重视软技能，最不重视学术声誉。为

了提高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大学课程和实践训练应侧重于与教育发展相关的学习成果软技能。并且，在寻找招聘信息和制作简历时，毕业生应该突出他们的软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生学习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尚有差距、职业素养认知较差、就业心理素质较低等问题，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主要难点。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与人相关的自我调节、沟通合作、组织规划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大学生并未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仅仅关注学习能力与业务能力培养，很少关注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对此，研究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的构成元素，分析培养大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的思路方向，从方法论的角度具体阐述如何提高学生就业能力非常必要 (Adedokun, 2019)。就现实而言，部分大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在就业过程中通常面临难以应对的局面(Lysova, 2018)。李永苍(2010)，王茜雯(2019)指出，部分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专业技能不足、实践操作能力欠缺、创新能力不强等多个因素方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缺乏正确的择业观。不少大学生对自我认识不到位，从而没有一个合理定位、合理规划。二是主观能动性有待提高。多数大学生对就业形势认识不足，被动地等待就业信息，甚至仅凭借家庭资源去获得就业，这导致其就业面临较大困难。

Mohamad Zuber Abd Majid, Muhammad Hussin, Muhammad Helmi Norman, Saraswathy Kasavan. (2020) 还探讨了公立大学本科生就业能力的预测因素，发现制度是提高就业能力的关键 (Mohamad Sattar et al. 2014)。以制定指导方针和战略，提高就业能力技能，从而开发人的潜力，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说，学生应该全面发展就业能力。Jackson & Chapman, 2012 发现学生在与他人有效工作、社会责任感、主动性和自信心方面表现是出色的。Jackson, D. (2012) 通过调查、收集发现影响就业能力技能能力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包括地域出身、性别、工作经验、技能议程的参与、学位学习的阶段、教育和工作之外的关系和活动的范围，以及学习方案中技能发展的质量。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是指高等学校影响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各要素的各种因素。陈勇(2012)认为大学生就业能力可以概括为四类影响因素：一、个人层次的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即大学生通过四年的专业学习，从自身的角度开发自我的就业技能，包括职业规划、前期职业准备、就业意识、合理的职业规划、良好的心理素质等；二、组织层次的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即大学生就业能力如何被开发？理论与实践课程如何衡量？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如何服务学生？另外还包括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相关的专业设置，改革创新教育理念，理论教育和实践教学相协调，加强毕业生就业服务等；三、外界力量的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即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开发的支持，包括校企合作、政策支持，产业支持等。另外可以邀请企业全程参与学生的课程制定，与高校合作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企业与学校签订就业契约，保障毕业生就业等等；四、

宏观层次的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即政府支持或参与大学生就业能力开发的过程，关键举措是政府可以适当完善大学生就业服务的相关制度与政策、改革就业服务平台等。从上述四个层次共同点看，都可以通过高校组织建立各种机制和开展各类活动来实现。

2.4 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模式、计划、活动

近年来，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是普通高等院校的重中之重。在注重提升大学生专业素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高等教育如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保证毕业生获得持久就业和职业生保障。Zhang & Zou (2013) 对中国用人单位认可的大学生就业技能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模型。结果表明，服务业雇主和制造业雇主对大学生个人特征的感知主要集中在诚实、独立、自信、适应性和积极性上。基于此，大学生就业能力有必要采取创新教育理念、采用复合的培养方式、加强就业能力的跟踪测评来完成。Esther & Vaaland (2016) 提出“UIL”活动，即校企联合，各种加强学生就业能力的联系活动。他从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学生、教师和行业的角度，将“UIL”活动分为三个领域：培训和教育、服务和咨询活动以及研究，以此确定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最重要的 UIL 活动。并采用结构化问卷的方式询问受访者，其中大多数人认为 UIL 活动在就业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并能提高就业能力。Fiona & Bhavik (2021) 提出工作整合学习 (WIL)，是一种将传统学术研究或正式学习与学生接触工作世界相结合的实践，他们认为 WIL 是提供关键就业技能的替代方法。通过一项基于游戏的学习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平台展示一系列就业技能。学生这项具体活动以实际工作为基础的内容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就业能力，对他们找到一份工作有所帮助。现实世界的经验对学生在提升就业能力具有价值。学生在参与现实商业世界中可能遇到的活动或情况最能激发他们的能力，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学生表现出反思性思维，增强了信心 (Ester & Nicola, 2009)。

学者们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应用了多元理论模型构建、实践活动策划，目的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提高就业率。Kerang Li & Yao-Ping Peng (2020) 研究就业导向的教学活动，建立基于教育语境应用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探索教学活动与就业能力的关系，其研究结果使学校和教师了解最合适的课程规划和活动。就新时期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现状而言，滕智源 (2012) 强调应以提高就业能力为目标，采用人才“线性”培养模式，即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将就业相关的指导融入课堂、实践理论相辅相成、成立创业基地。在大学生的就业过程中，席娟 (2014) 认为学生基本应聘能力不强、专业的运用能力偏低、职业的适应能力不高等现象是制约就业率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多元有效地提高学生就业能力。赵海晓 (2015) 通过研究大学生就业能力现状，发现，有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传统技能竞赛模式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比

如竞赛内容模式化、竞赛组织形式主体较为单一、太过于看重个体能力的培养等等，该学者还提出了“TRSFP”五位一体的技能竞赛模式，包括实践创新能力、项目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刘泽林（2018）以就业能力为导向构建了体育职业院校“学以致用”的人才培养模式。即通过学（体育职业院校的教育）、用（用人单位）两方一起进行职业体育教育的模式，包括以雇佣者对体育人才的需求作为教学依据，以体育职业能力作为目标，以体育职业院校为基础。

研究大学生就业能力最先开始于英国，且已取得较大进展。其中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的研究尤为突出且贡献显著。比如罗伦·达西·波尔 (Lorraine Dacre Pool)、彼得·斯维尔 (Peter Sewell)两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模型：职业发展学习—工作和生活经验—学科知识理解和技能—通用技能—情商模型，即 Career EDGE。2013年，帕米拉·柯尔特和罗伦·达西·波尔等学者在 Career EDGE 模型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就业能力发展计划”——为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生设计的诊断性工具。该工具基于 Career EDGE 模型中所涉及的就业能力相关组成部分进行自行性调查问卷分析，要求大学生对自身情况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就业能力发展计划”不仅对大学生发展性工作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它也可以很好地满足就业能力测量这一目的（马永霞 & 薛晗，2016）。

2.5 中国高校提升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就业能力的相关活动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高校中社会体育专业的较快发展，学校对提升社会体育专业本科生就业能力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湖南工业大学在 2015 年就把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作为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导向，对过程的监督尤为重视；对课程结构不断完善，对专业的学习更加注重；对就业能力的培养流程进行改善；增加社会体育项目，从社会体育走进社会；接轨社会培训，提供专业能力社会认证（钟丽萍&何非凡,2020）。在 2019 年时，因为健身项目的兴起，社会对健身教练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于是进一步将健身教练与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结合，通过了解当前健身教练的职业需求之后，制定完善的社会体育专业培养模式（张皓，2020）。对于中国部分高校的该专业来说，李琼志和颜学智（2015）从教学能力以及社会就业的两个点出发，深入研究得出学生应具备一专多能的特点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及发展。除此之外，两位学者还认为应将社会体育与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区分开来，其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尤其重要。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作为湖南省社会体育专业规模最大、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2021 年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 1362 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体育专业技能为根本，行业适应能力为目标是学校遵循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的实习和生产实践过程要与企业、社会密切联系，通过校企合作，建立专业实习基地，目前取得了比较好的就业率。

结论

对已有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高校都已经意识到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有关大学生就业能力、就业技能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就业能力提升的相关理论研究较少，提出具体实施提升计划的则更少。随着中国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如何提高社会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包括就业技能亟待认真反思与应对。

参考文献

- Adedokun, M. O. (2019). Effective Learning Skills and Labour Market: Implic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9(4),1-9.
- Allison J, Harvey C, Nixon I. (2002). *Enhancing employability: a long-term strategic challenge*.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 Cotton, K. (2001), *Developing Employability Skills, Northwest Regional Educat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 Portland, OR, available at: www.nwrel.org/scpd/sirs/8/c015.html (accessed July 2006).
- Chung-Khain Wye. (2009). Perception Differential between Employers and Undergraduates on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ability Skill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February, 2009
- David J. Finch, Leah K. Hamilton, Riley Baldwin, & Mark Zehner. (2013).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undergraduate employabi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55(7),681-704.
- Ehiyazaryan, E. and Barraclough, N. (2009). Enhancing employability: integrating real world experience in the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Training*,51(4),292-308.
- Esther Ishengoma, & Terje I. Vaaland. (2016). Can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 stimulate student employabi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58(1),18-44.
- Fiona, P, & Bhavik, A. P. (2021).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A Game-Based Learning Activity That Enhances Student Employability. *Chemical Education*,98(1),888-895.
- Fugate M, Kinicki, A.J, & Ashforth, B E. (2004). Employability: A Psycho-Social Construct, Its Dimensions,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5(1), 14-38.
- Joseph, W. Madaus, Lilia, Foley, & Joan M. M. (2003). Attributes Contributing to the Employment Satisfaction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26, 159-169.
- Jaison, R. Abel, Richard, D., & Su. Y. (2014). Are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Finding Good Jobs?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 1-8.
- Jackson, D. (2012). Testing a model of undergraduate competence in employability skill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keholder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Published online on 24th

August, 2012

- Jackson, D. (2013). Student perceptions of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ability skill provision in business undergraduate programs.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88(5), 271-279. Published online on 6th June, 2013.
- Jaison R. Abel, Richard Deitz, & Yaqin Su. (2014). Are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Finding Good Jobs?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 1-8.
- Li. K., Peng Y. P, Du, Li, Ke-Tien Yen and Yu. (2020). Do Specific Pedagogies and Problem-Based Teaching Improve Student Employability?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College Stude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6). 1-12.
- Lysova, E I. (2018). Marketable Selves: Making Sense of Employability as a Liberal Arts Undergraduate.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04(2), 261-272.
- Louise Martin. Julia West and Karen Bill. (2008) Incorporat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Strategies to Develop Learner Autonomy and Employability Skills in Sports Science Undergraduates. *School of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University of Worcester, Vol. 7, No. 1. DOI:10.3794/johlste.71.169
- L.M. (2016). White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Las Cruces, NM. An Applied International Equine Experience Benefits Employability Skills i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NACTA Journal* • May 2016, Vol 60 (1a)
- Mohamad, Hussin, Norman, Saraswathy, Kasavan. (2020). *The employability skills among students of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Malaysia*.
- Margaret C. K. (2019). Employability Skills a Case Study on a Business-Oriented Sport Management Program. *e-Journal of Business Education &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Vol. 13, No. 1, June 2019, pp: 59-68.
- Nick, B, Lerverne, B., Chapman, Charlotte & Kelvin. (2016). Employability and the Use My Ability Online Tool: Raising Sports Students' Awareness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kills and Attributes.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pril 17, 2016. doi:10.5430/jct.v5n1p62
- Peter T, K, & Mantz, Y. (2003). Employability and Goo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8(1), 3-15.
- Dacre, Sewell, P. (2007). The key to employability: developing a practical model of graduate employability. *Education Training*, (3):288-314.
- Vicki Tariq. (2009, June). Enhancing Graduate Employability: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Skills: Centre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https://www.qub.ac.uk/directorates/AcademicStudentAffairs/CentreforEducationalDevelopment/FilestoreDONOTDELETE/Filetoupload,624165,en.pdf>
- Vicente Gonza' lez-Roma', Juan Pablo Gamboa, & Jose' M. Peiro'. (2016).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Employment Status, and Job Quality. *Career Development*, 1-18.

- Xie, Y., Lin, Z., Baranchenko, Y., Lau, C. K., Yukhanaev, A., & Lu, H. (2017). Employability and Job Search Behavior: A Six-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Graduates, *Employee relations*, 39(2), 223-239.
- Zhang, X., & Zou, X. (2013). University Students' Employability Skills Model Based on Chinese Employ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 Sustainability Studies*, 1(3),29-33.
- 喻坚, 王炳华, 杨玲等. (2013). 中小学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社会保障现状调查.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9 (1),109-113.
- 吕化. (2017). 他山之石:美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31 (5),94-97.
- 戴志鹏, 马卫平. (2020).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探索——以湖南城市学院为例. *体育学刊*,27(1),99-103.
- 卢元镇, 于永慧.(2019). 我国体育改革与全民健身: 回顾、展望及应关照的社会事实.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3(1),5-10.
- 董茜. (2010). 社会体育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研究.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4 (3),122-124.
- 陈勇. (2012). *大学生就业能力及其开发路径*. 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学位, 浙江大学.
- 席娟. (2014). “SERVE 模式” 下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9): 19-22.
- 顾晶晶. (2018). 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陕西省高校毕业生的实证分析. *统计与信息论坛*, (9), 123-128.
- 钟云华. (2020). 社会资本分布失衡对贫困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19 (3), 116-124.
- 李永苍, 吴选忠, 陈瑛. (2010). 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调查与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8),67-69.
- 王茜雯, 刘娜, 段茹津. (2019). 文化资本视角下大学生择业观现状研究. *现代职业教育*, (22), 88-90.
- 叶景明, 卢秀颖. (2017). 基于 TOPCARES-CDIO 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 *教育现代化*, (21),112-113.
- 吴宇梦, 丘晓静, 徐超. (2019).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调查分析.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3), 9-11.
- 邹戴唯. (2021). 陕西民办高校大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培养研究. *大众标准化*, (5),3.
- 马永霞, 薛晗. (2016). 学生就业能力 Career EDGE 模型解析:内容体系与实践应用. *外国教育研*

究,(11):109-119.

钟丽萍, 何非凡. (2020). 湖南工业大学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与优化研究. *运动精品*, (2), 1-2, 4.

张皓. (2020). 社会需求视野下体育专业社会体育指导方向人才培养的分析与思考——以湖南工业大学为例.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36(5), 2.

李琼志, 颜学智. (2015). 对湖南省部分高校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教学能力培养研究. *文体用品与科技*, (20), 122-123.

山东省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与对策研究**A STUDY ON ACADEMIC PRESSUR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傅廷真^{1*}, 庄军红², 李瑞³, 王立花⁴Tingzhen Fu¹, Junhong Zhuang², Rui Li³, Lihua Wang⁴^{1 2 3 4} 山东英才学院外国语学院^{1 2 3 4}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tingzhen@sycu.edu.cn

摘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中国民办高校开始出现, 2002年12月《中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由人大常委会通过, 民办教育得到快速发展。30年来, 民办高校已经成为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生力量,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日渐重要。民办高校教师同样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有生力量。因此, 了解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现状, 调整教师心态, 营造良好科研氛围, 提升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能力, 从而推动高校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本文梳理了2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科研压力的研究成果, 并采用方便抽样法和半结构访谈法, 访谈了山东省内6所民办高校的31位教师, 研究结果显示, 36岁-45岁年龄段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高于35岁以下和46岁以上教师年龄组, 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 民办高校教师, 科研压力, 对策。

Abstract: In the late 1980s to early 1990s,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an to appear in China. In December 2002, the "China Private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was pass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rivate education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past 30 years,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 new force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status in my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lso the living force of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essure of teacher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adjust the mentality of teachers,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promo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etter serve the society.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vocational stres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essure of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uses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o interview 31 teachers in 6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pressure faced by teachers in the age group of 36-45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eachers under the age of 35 and over the age of 46, and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Teachers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search Pressure, Copings Strategies.

引言

山东省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其 GDP 多年来一直排在中国的前三位。山东省的民办教育较为发达，依据山东省民办教育发展公报披露的数据，山东省现有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42 所，占山东省高校总数的 27.63%，普通本专科招生 17.19 万人，占山东省高校招生总数的 23.55%；现有在校生 50.52 万人，占全省高校在校生人数的 22.05%。公报显示，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共有教职工 17.20 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12.42 万人。公报没有公布民办高校教师的比重，但是，依据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和教育部规定的师生比测算，山东省民办高校教师大约有 3 万人。上述数据说明，民办高校无论学生人数、教师人数还是办学规模，都已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状况，让民办高校的教师能够更好的做好科研工作，从而不断提示民办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国内研究综述

压力常被界定为“个体意识到外界对其要求超出了其承受能力的反应”，本文所称的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主要指高校教师本人意识到学校提出的科研工作的要求超出了自身的心理承受范围而产生的生理、心理的综合反应（林培锦 李建辉 2018）。

国内较早开始研究的是教师的工作压力。2000 年，陈明丽 徐明在福建师范大学大学学报发文，从社会、学校、教师个人三个纬度，对国外教育学者对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对我国教师职业压力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了初步探讨。邵光华、顾泠沅(2002)研究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发现教师职业压力程度很大，中国青年教师普遍承受着较重的压力，不同类别的教师压力感有所不同，但没有显著性差异。

2005 年，清华大学李虹以《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为测量工具，对北京 2 所高校 337 名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教师的工作压力类型有工作保障压力、教学保障压力、人际关系压力、工作符合压力和工作无乐趣压力。该研究还发现，教师的工作压力强度总体不

高, 84%的教师反映工作压力不大, 工作负荷和人际关系是教师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

2007年, 尹平等学者为深入了解高校教师的压力状况和教师对压力应对方式, 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武汉市3所部属综合性大学中,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519名教师, 进行了问卷调查。该研究的结果显示, 青年教师(40岁以下)的压力较大, 初级职称的助教讲师的工作压力高于高级职称教师。该研究还显示, 多数教师能够调节自身心态, 采调动各种资源来应对压力。

2010年开始, 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引起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鲍威、王嘉颖(2012)提到, 高校教师是教学运行和学术研究的一线实践专业人员, 该研究以2007北京市高校教师调查数据为样本, 从组织环境与个体特质的维度, 分析高校教师职业压力的定义与造成压力的相关变量。研究发现, 各种层次的高校教师都会经历教学压力、科研压力和经济压力。从教师的职业发展来看, 40岁以下青年教师处于高压期, 41~55岁年龄段教师处于进入压力舒缓阶段, 高校教师在56岁以后的压力较为轻微。高校扩招的因素, 高校深入开展绩效评估体系改革, 以及教师个人的婚姻家庭状况、薪资、工作量、自我心理定位、自身职称等多种元素都对教师的科研压力有影响。2013年, 景丽珍采用方便抽样法, 从北京的教育部直属高校中选取样本, 采用《大学教师工作压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 该研究发现教学任务、科研要求、学校制度和角色定位是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

2014年, 谢玉华等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向中国境内对部分高校教师发放问卷进行调查, 研究教师的科研动机。该研究认为, 高校教师缺乏科研动力, 因此, 高校需要采取措施, 激发教师的科研动机, 尤其内部动机。张珣、徐彪、彭纪生、翟纯等人对高校教师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该研究发现, 通过科研投入的中介作用, 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是正相关; 与薪酬满足呈显著负向关系, 并通过薪酬满足的中介作用对科研绩效呈显著负向影响。2016年, 兰继军、徐晶瑜、杜叶婷和杜瑾思等研究人员对陕西师范大学437位在职教师的工作压力状况进行问卷调查。该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大、学历低的中年教师工作压力较大, 同时肩负科研、教学重任的教师工作压力较大; 住房条件差的教师工作压力较大。该研究也指出, 高校教师承受着科研压力与评价体系造成的工作压力。

刘新民以认知评价理论的视角, 考察了科研压力认知对科研动机和绩效的影响(刘新民、俞会新, 2018)。林培锦等以工作满意度、情绪智力为中介, 研究大学教师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的影响(林培锦, 李建辉, 2018), 该研究认为, 大学教师承受较高的科研压力, 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会有一些的负向影响。陈俐以江苏省高校为例, 研究高校教师科研压力与对策, 该研究认为, 科研压力主要来源于科研项目申请、科研经费审计、科研绩效考核、组建科研团队等方面, 而且, 教师压力感知强度与高校层次、教师年龄、教师职称等密切相关。

从上述研究梳理可以看出，近 20 年来，国内学者对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研究始于教师的工作压力，在 2007 年以后，随着国内高校大规模扩招和“双一流”高校建设战略的推广，公办和民办高校更加关注科研绩效，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教师的科研压力，进而影响到教师的工作态度和科研绩效。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Arlene Gray Blix（1994）等人基于对加州大学 400 余人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教师表示，自己有 50%的时间在工作中感受到压力，而且与研究相关的工作压力要大于教学工作和服务工作。该研究建议资深教师和初级老教师建立导师关系，学校提供学术支持等。

Reda Abouserie（1996）通过对威尔士大学 414 名员工的问卷调查的研究显示，学术人员认为工作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压力原因（74%），而从事研究（40.3%）是工作压力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还显示，74.1%和 10.4%的教职员工分别属于中度和重度压力类别，男女之间的压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Carolyn MacCann（2012）等学者对印度南部大学教师的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的一项研究显示，结果显示，大多数（74%）的大学教师正在经历中度和高度的职业压力，86%的教师有职业倦怠，且大学教师的职业压力与职业倦怠正相关。

2015 年 Naina Sabherwal, 等人对印度南部普纳的高等教育机构的 200 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受访者的反应通过工作量、工作条件、与同事的关系、与学生的工作、工作组织、社会认可和地位等来衡量。结果显示，教师管理人员压力的决定因素多种多样，结果汇编、时间压力、基础设施缺乏、学生纪律不严和薪酬前景不佳等。

Faith K. Mwenda（2019）收集了肯尼亚私立大学学校 384 名全职和兼职教师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压力源来自于工作负荷、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而工作绩效是从研究、教学和服务三个方面加以评价，为提高教师绩效，大学应该保持低压力水平。

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山东省内的民办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选取山东省知名度较高的山东英才学院、山东协和学院、山东现代学院、山东工程职业学院、齐鲁理工学院和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等 6 所高校，在每所高校中分别选取年龄在 46 岁-60 岁之间，36 岁-45 岁之间，26 岁-35 岁之间的老中青三代人中的 10 位教师进行半结构访谈，以了解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的来源、结构、类型，依据访谈信息分析对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的来源影响因素，进而分析科研压力对民办高校教师产生的工作和生活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减轻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的

策略和方法，以便为减轻高校教师科研压力，提升民办高校科研管理水平，服务于推动民办高校实现科研创新和跨越式发展。

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群体。依据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小孩子需要满 6 岁才可以上小学，完成小学至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需要 9 年，再经过高中 3 年的紧张学习，18 岁才有可能进入到本科高校，再经过 4 年的本科学习，才有可能进入到硕士阶段学习，获得硕士学位需要 3 年，因此，即使一个人非常优秀，也需要 25 岁才能完成硕士阶段教育。而硕士学历是进入本科高校的条件之一，如果要获得博士学位，最少需要再进行 3 年的研究生阶段学习。因此，35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刚刚从严谨的学习阶段转到教师岗位，面临着恋爱、结婚、成家、买房等一系列的人生大事，还要承担高校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因此该年龄段的教师面临的压力较大。

36 岁至 45 岁的中年教师群体。这个群体教师具有一定的高校工作经验，有的甚至在二级学院的岗位上担任中层领导，是学校科研工作的骨干成分。学校的重大科研任务，往往落在这一群体老师身上。

46 岁至 60 岁的中老年教师群体。该年龄段教师多数具有副高的职称，是学校中专业水平比较高，科研能力比较。本次访谈对象中，发现这一年龄段的多位高职称教师担任了学校中层和高层领导职务。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梳理国内外 20 年来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尤其是科研压力的相关文献分析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的内涵、来源、现状，以及民办高校教师的为应对压力而采取的各种策略等。

方便取样法 选取山东省内建校时间比较长、办学水平比较高、在校生人数比较多、社会美誉度比较高的六所高校，分别选取 26-35 岁，36-45 岁，46-60-岁的多位教师作为访谈对象，以了解民办高校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和学校科研考核机制，以及教师的应对策略等，并做了详细的访谈记录。

半结构访谈法 为深入了解不同民办高校教师科研压力的情况，将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研究人员和调查对象进行充分交谈，以发现不同高校见教师对科研压力的心理感受及应对策略。

研究过程

为了编制切实可行的调查提纲，先后访谈了 1 位 28 岁的青年教师，2 位年满 40 岁和 2

位 50 岁以上的教师，请求这些教师帮忙选定了 15 个问题的的访谈提纲，以次为基础，开始对民办高校教师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确定访谈提纲后，在山东英才学院领导的帮助下，作者联系了六所高校的的分管科研工作领导，请他们推荐各个年龄段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教师，按照文理科均衡分布、各年龄段都有代表的原则，在每所学校里选取了 6 位教师，通过电话、微信、面谈等方式进行了详细交流，并做了详细的访谈笔记。

访谈资料整理与分析

依据访谈提纲，将调查访谈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含调查对象的学校性质（本科或高职院校）、年龄、性别、职称、婚姻状况、担任高校教师工作的年限等，第二部分为访谈主体，将高校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归结为项目申请压力、科研经费申请压力、论文和专著写作压力、专利申请压力、专利申请压力、科研时间压力六大方面，请被访谈对象陈述自己学校在上述 6 个方面面临的压力和应对策略。

结论

访谈内容启示 1 总体来看，35 岁以下青年教师的科研压力低于其他年龄段教师。

本次访谈 35 岁以下教师 10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 24 岁，是本科毕业留校的辅导员。其中男性 4 人，女性 6 人。担任教师岗位的 7 人，辅导员 3 人。一些研究文献认为，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比较大，他们面临组建家庭和评定职称的压力。本次青年教师访谈中有 6 位女性，年龄在 27-33 岁，担任高校教师的年限在 5 年以内，职称均为讲师，表达了晋升副教授的愿望，但感觉晋升副教授的愿望离自己有较大差距。5 位被访谈教师位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从事科研工作，认为自己会专心做一个授课型教师。当被问及评副教授需要有省级以上课题，并且要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时，这几位老师明确表示，那就不评副教授。在后续的交谈中，询问了教师的家庭情况，确认这几位老师是 90 后，家中独生子女，面临相对较小的经济压力，他们对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和目标。有 3 位教师提到，刚刚从研究生的学生生涯中挣脱出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结婚，成家，科研工作暂时还没有列入工作日程。

访谈对象中有 2 位男教师，和同年龄段的女老师有较大差别。2 位教师都表示科研工作对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影响很大，也愿意在科研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两位老师都表示，自己业余时间承担授课任务，很难再抽出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工作。经深入交流，了解到两位老师来自山东省内的某县城，在任教学校所在的城市没有住房，需要在济南等大城市购买住房，因此，在经济压力比较大，有更高的追求和更加繁忙的工作日程，收入也超过一般教师。

访谈内容启示 2 中年教师心理感受到的科研压力明显高于青年教师（35 岁以下）和老

年教师（55 岁以上）群体。

本次访谈中年教师组 15 人，年龄在 36 岁-40 岁之间 9 人，40-45 岁之间 6 人，其中男教师 2 人，女教师 13 人。本年龄段教师教龄在 10 年以上，从各个层面看，该年龄段教师是本单位或本部门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力量。访谈对象中，有副教授 7 人，讲师 8 人，1 人获得省级教学比赛一等奖，2 人担任学校中层副职领导。该组教师有强烈的科研意识，他们在科研工作中投入时间较长，而且学校对副高职称的教师有严格的科研考核任务，对申报科研课题的级别、数目、科研成果的级别、篇幅都有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因此，科研绩效考核也是科研压力的主要来源。

访谈内容启示 3 老年组教师依然是民办高校科研工作的主力军，有较好的科研业绩和强烈的科研意识。

本次访谈老年组教师（46 岁-60 岁）8 人，其中女性 2 人，男性 8 人。本组中有副教授 6 人，教授 2 人，且两位教授均担任校级领导职务，1 位副教授担任中层正职。从年龄来看，50 岁以下 2 人，55 岁以上 4 人。本组教师有强烈的科研意识，一位教授（男，55 岁）担任学校分管科研工作的领导，2021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立项，另一位教授（女，54 岁）也担任校级领导职务，曾多次主持省部级课题。另有 4 人都有主持省级以上科研课题经历，8 人都有参与多项课题研究的经历，均发表过多篇论文。访谈资料显示，本组教师的家庭负担比前两组更轻，一位教师（48 岁）孩子的上高中，不需要父母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其他教师的孩子都已经在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上照顾孩子。本组教师承担了较多的行政科研任务，如担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协助学院评阅、审核各种科研申报材料，帮助青年教师撰写课题申报书等，同时，这些年龄段的教师也积极参与申报省级以上的高层次课题，因此，此年龄段教师的工作压力和科研压力都比 35 岁以下青年组教师为重。

综合来看，民办高校教师的科研压力和国内 985 高校和省属重点大学的科研压力有相同之处，比如，中年教师的科研压力更为沉重，各个年龄段的教师都有较高的科研意识等。相比较而言，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压力比双一流建设高校同类教师的科研压力更轻，公办高校 46-60 年龄段教师的科研成就比民办高校同类教师更高。

建议

在前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也依据各自的研究，对减轻或者调适科研压力，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兰继军（2016）总结了陕西省 437 位在职的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调研状况提出，引入员工援助计划（EAP），改变科研绩效考核机制，调节教学和科研工作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等，以缓解中青年教师的压力。林培锦（2018）调研了江西福建两省的 8 所高校 350 位教师，

提出减少教师的压力源，优化科研考核体系，改善教师的薪酬待遇，培养教师的情绪智力。刘新民（2018）基于对天津 13 所高校 40 岁以下教师的科研压力研究，建议树立青年教师科学发展理念，建立合理的评估考核制度，营造支持性工作环境等。陈俐（2021）等针对江苏省 13 所高校教师科研压力研究，建议明确高校科研定位，要稳定经费投入，鼓励原始创新；提升教师科研综合素质。

上述研究的对象尽管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多位高校，但是这些学校都是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办高校，教师也是国办高校的在职教师，因此，这些建议和对策有别于民办高校。

此次取样的六所高校，山东力明科技学院创建于 1985 年，山东工程职业学院可以追溯到 1990 年，齐鲁理工学院建立于 1992 年，山东现代学院、山东协和学院建立于 1993 年，山东英才学院建立于 1998 年。和国办高校比起来，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考核机制更容易受到学院负责人个人意志的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分析 31 位教师的访谈，多位教师反映学校的科研考核机制不够公平，是科研考核具体细则频繁变动，其次，对高校的科研氛围、考核奖励和工资收入水平不满意。因此，本文的建议是：一要高校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科研考核细则，不因负责人个人喜好随意增加或减少考核细则；二是发挥科研民主，在出台涉及教师职称评聘、评优、外出访学等有关教师切身利益的重大科研举措时，要倾听一线教师的声，回应教师的关注热点；三是尊重教师的科研热情和科研成果，减少人为的干预和成果侵占行为；四是适当提高一线教师的科研工作补贴，以调动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五是拓展教师科研交流和进修的机会和渠道，提示高校教师的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 罗伯特·M·戴尔蒙德.(2005). *课程与课程体系的设计和评价使用指*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 12 页。
- 陈明丽, 许明.(2000). 国外关于教师职业压力的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3), 123-129.
- 邵光华, 顾泠沅.(2002). 关于我国青年教师压力情况的初步研究. *教育研究* (09), 20-24.
- 李虹.(2005). 大学教师的工作压力类型和压力强度研究.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05), 97-102.
- 尹平, 李丽娜, 陆芳, 陶芳芳.(2007). 高校教师压力状况调查及其应对方式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 (01), 101-104.
- 鲍威, 王嘉颖.(2012). 象牙塔里的压力——中国高校教师职业压力与学术产出的实证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2,10(01):124-138+191. DOI: 10.19355/j.cnki.1671-9468.2012.01.010.
- 景丽珍.(2013). 大学教师工作压力模型的比较研究.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6),97-102.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3.06.017.

- 谢玉华, 毛斑斑, 张新燕. (2014). 高校教师科研动机实证研究. *高教探索* (04), 156-159+176.
- 张珣, 徐彪, 彭纪生, 翟纯. (2014). 高校教师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 *科学学研究*, 2014, 32 (04): 549-558. DOI: 10.16192/j.cnki.1003-2053.2014.04.003.
- 兰继军, 徐晶瑜, 杜叶婷, 杜瑾. (2016).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状况及其调适策略. *当代教师教育*, 2016, 9 (01): 65-70. DOI: 10.16222/j.cnki.cte.2016.01.011.
- 刘新民, 俞会新. (2018). 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认知评价视角. *北京社会科学*, 2018 (10): 76-88.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81008.
- 林培锦, 李建辉. (2018). 大学教师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的影响——工作满意度、情绪智力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6): 72-78.
- 陈俐, 张洛, 丁艳锋, 姜东. (2021). 高校教师科研压力分析与对策思考——以江苏高校为例. *高等农业教育*. 2021 (02): 11-16. DOI: 10.13839/j.cnki.hae.2021.2.002.
- Lodahl TM, Kejner M. (1965).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job involv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65, 49 (1), p. 24 – 33.
- Blix, A. G., Cruise, R. J., Mitchell, B. M., & Blix, G. G. (1994). Occupational stress among university teachers. *Educational research*, 36(2), 157-169.
- Abouserie, R. (1996).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university academic staf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6(1), 49-56.
- Reddy, G. L., & Poornima, R. (2012).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professional burnout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South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 Administration*, 2(2), 109-124.
- Sabherwal, N., Ahuja, D., George, M., & Handa, A. (2015). A study on occupational stress among faculty membe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Pune. *SIMS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1(1), 18-23.
- Mwenda, F. K., Kiflemarian, A., & Kimani, S. W. (2019). An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ors and faculty performance in selected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Keny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7(7), 45-56.

A STUDY ON TEACHING MODE REFORM BASED ON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Rui Li^{1*}, Lihua Wang², Tingzhen Fu³, Kun Zhao⁴

^{1 2 4}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³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dong Yingcai Universit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rui@sdycu.edu.cn

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with Montessori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signs and develops a Montessori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system, and carries out teaching mode reform activities.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teaching mode of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is beneficial to students' learning. It is found that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plays a specific role in making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in a physics laboratory. It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realize th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However, although the Montessori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system has apparent advantages in creating the environment, it does not have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operation of complex teaching aids.

Keywords: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eaching Mode Reform, Montessori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System.

Introduction

As one of the world-famou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s, Montessori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century of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round the world, and Montessori kindergartens have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the current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Lillard, 2020). Montessori teachers are trained by Montessori associations, education centers and accredited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As numerous different kinds of teaching aids are essential carriers to fulfil the concept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that Montessori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education must be carried out in the laboratory. In the laboratory, teachers pass on the images and methods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oral explan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eaching aids operation. Hence, teaching aids operation is a vital index that evaluate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s. But constrained by time and spac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teaching aids in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the quantity of teaching aids in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fails to fully cover the number of all students. Thus, it is infeasible for students to fully understand, perceive, and operate the teaching aids i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Man et al., 2020). In addition, nearly 200 sophisticated teaching aids in the physical experiment are easily damaged and lost after use, causing loss of manpower,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In 2020, since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physical laboratory-bas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had had to be suspended, affecting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of teachers in quarantine (Laws & Xun, 2021).

Montessori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system (MVSTS) is a virtual experiment developed by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that can be carried out on the Internet, which simulates real similar experimental objects and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s. With the support of a virtual simul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practical resources can be utilized through the browser and combined with drawing modelling, animation simula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omputer network and other means, to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combined way, a vivid, exciting display of practical steps. With a strong sense of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an interactive mode is adopted to carry out immersive detail operations. It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After clicking into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platform, students seem to enter an authentic Montessori classroom. Everything in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can be equipped in the virtual laboratory. MVSTS includes six modules: Environment creation (Fig1), Teaching aid display (Fig2, Fig3), Demonstration video library, Operation practice (Fig4, Fig5), Test evaluation and Data acquisi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has been proven in a variety of educational settings (Madathil et al., 2017).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VR technology plays a positive effect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i-Lim et al., 2010), such as spatial skills (Gutierrez et al., 2015; Lee & Wong, 2014), social skills (Valmaggia et al., 2016), motivation (Harris & Reid, 2005) and motivational participation (Martín-Gutiérrez et al., 2017). Howev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VR technology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field, the MVST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VR technology has not been applied and tested in teaching practice.



Figure 1: Environment Cre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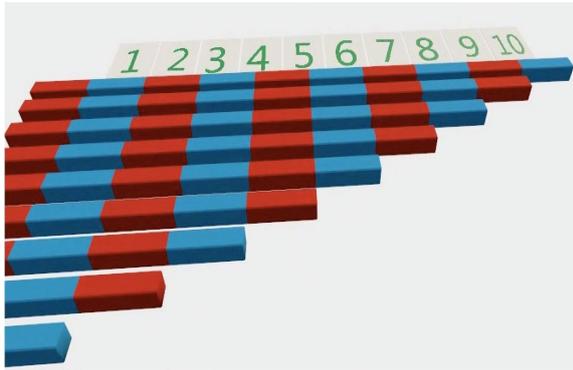


Figure 2: Teaching Aids Displ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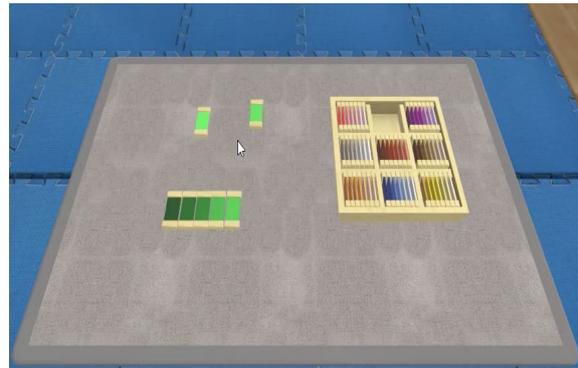


Figure 3: Teaching Aids Display



Figure 4: Classroom Environment Cre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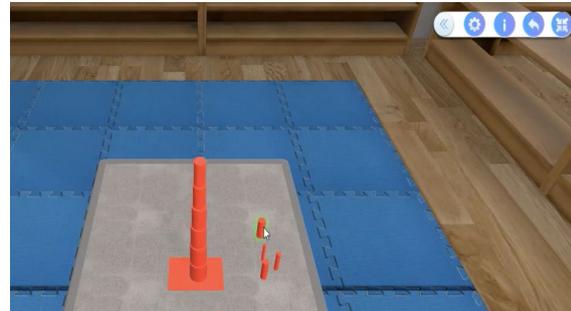


Figure 5: Teaching Aid Operation Exercise

Research Objective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MVSTS aim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performance with the help of immersive, realistic and interactive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virtual and real combination, virtual and real complementatio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ation" constructed based on MVSTS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mode 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objectives.

1. By comparing the data, test the difference in scor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2. Collect students' feelings about using MVST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3.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ome teaching reform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combine virtual with reality and online with offline.

Literature Reviews

VR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VR technology, also known a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spiritual environment technology,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1980s by Lanier from the American VPL

company (Ding & Cheng, 2020).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new type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emerged. Since the early 1990s, it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t has achieved further applica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many fields such as urban construction, commercial operations, art design, tourism, and entertainment (Loureiro et al., 2020). By means of VR technology, the computer generates a man-made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users can obtain various perceptions such as sight, hearing, smell, taste, touch, and movement sensation, thereby perceiving the feeling of being immersed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Huang et al., 2020). The interactivity and fidelity of virtual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make the environment in the system act on people, but people can also control the environment in turn, and this control is almost natural behaviour control (Man et al., 2020). In addition to applying computers to simulate real environments, VR technology can also simulate environments that do not currently exist or may appear in the future in the objective world which can even simulate environments that are only human fantasies (Grassini et al., 2020).

VR technology can provide learn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y are inaccessible to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for learning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ime, space, 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personal inconvenience of learners (Seifan et al., 2020).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pportunities that cannot be realized by this experience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supporting learning (Kim et al., 2020). For instance, VR technology can simulate dangerous people to keep safe learning (Le et al., 2015), and it is extensively applied in the medical field (Groesbeck et al., 2019; Singh et al., 2020) or in the areas of military, law enforcement, fire protection, and other conditions that are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reproduce in the real world (Carruth, 2017).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is quite significant, but problems such as capital investment, teaching funds, venues, and professionals have restric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Lin & Zhang, 2020). For instance, most schools are pretty stingy when it comes to the actual teaching of computer assembly and maintenance, and the hardware equipment provided to students for experiments is poor, which will also cause unnecessary loss when students are operating (Liu & Liu, 2019). The immersive, interactive, and rea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VR technology can indee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physical laboratories (Yang et al., 2020). For instance,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training has made up for the deficiency in training equipment, saved training materials, kept down expenses and training risks, and improved students' job opportunities and training efficiency (Liu et al., 2017).

In terms of design skills, VR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Researche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utilization of VR technology in airport interior design (Kefalidou et al., 2019), marine environment art design (Shi & Niu, 2020), garden landscape design (Li & Xu, 2020), and colour design (Tao & Meng, 2020). In these studies, the purpose of VR is usually to evaluate design prototypes or communicate with customers (Rieuf et al., 2017).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 of VR on the quality of

design outcomes,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VR for early-stage product design is effective for the aesthetics and originality of the final design (Kim et al., 2020). Nevertheless, their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for experienced designers and the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emotional influence of VR activities on design outcome (Kim et al., 2020). How to use the MVSTS to evaluate learners' level of Montessori classroom environment cre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solved, which is the difficulty of this research.

VR technology can play a positive impact on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Cheng et al., 2020; Kapici et al., 2020). However,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troduction to VR technology may increase the burden on learners (Makransky et al., 2019). Since th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cross-domain applications of VR technology is conflicting, further investigation is particularly needed. The operating requirements of computer and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s may becom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sing the MVSTS. This is one of the variables that the research strives to control in the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and the virtual laboratory may achieve complementary effect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forms. The combined use of physical laboratories and virtual laboratories is of great benefit to improv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bstract and complex concepts (Hurtado-Bermúdez & Romero-Abrio, 2020). Combining VR with physical exercis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applying any of them alone (De & Zacharia, 2013). VR and real practice respectively provide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which can be combined to support learning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Ainsworth, 1999). Moreover, in addi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VR and physical laboratory teaching, the order of VR and physical laboratory teaching may also affect the learning results (Ainsworth, 2006). The MVSTS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physical laboratory teaching. The sequence design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proportion of hours are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VR Technology in Montessori Education

Mathematic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disciplines is extensively applied in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and exists in all stages of learn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lighte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hinking (Gravemeijer et al., 2017). Mathematics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ubjects for learners to comprehend (Acharya, 2017). Montessori education covers many fields such as daily life, sensory educati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history, geography, science, and culture, among which sensory education is still essentially mathematics education (Kristiyani, 2018). Visual aids are widely used in Montessori educa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inking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the stage of specific operation (Marshall, 2017). Mathematics education plays a core part in Montessori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ldren's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Basargekar & Lillard, 2021). However, due to the step-by-step operation of visual aids, Montessori education has been criticized as something rigid, mechanical, and uncreative (Duckworth, 2006). Children now spend most

of their week sitting in a chair, while only 2.5 hours of outdoor activity are spent sitting in a chair, playing games, or watching TV (Jarrett, 2020).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technology, it has been shown that complete gadget facilities, so they are more interested in playing games or social media.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facilitated new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new ways of communicating. In 2017, Chandrawati and Widyarto applied VR technology to provi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math with Montessori visual aids, and it is the research in which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Montessori education were closely combined in the literature collected so far, which has similarities with this study but also show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build a Montessori education system to ser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system developed by us, there are six modules, namely classroom environment creation, visual aids display, visual aids operation, demonstration video library, simulation examination, and online examination. This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integrates the student port and the teacher port into one whole, and it serves both th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he teachers' "teaching", which is also the innovation of t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1. Sample Source

From April to May 2022, a total of 484 students from the 2021 undergraduate clas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Montessori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ir wishes. Four hundred eighty-four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of combining virtual and reality, online and offline education cameras; 243 students used MVSTS in their learning proces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offline teaching model, and 241 students did not use the system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None of the 484 students had any previous experience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age and gend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5$).

2. Experimental Method

Both groups were tested on their learning levels before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teaching, the two groups learned the Montessori education theory for eight periods. The teacher provided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defined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xamination plan to the two groups in class. After the theoretical learning, the students entered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to learn the teaching aid operation for 64 hours. After the operation learning, the two groups entered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and MVSTS respectively to carry out practice activities.

Pretes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a pretest before the formal study. The

total score is 100 points, which is divided into five grades on a scale: excellent (91-100), good (81-90), medium (71-80), qualified (60-70), failed (<60 points).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ll provide the same teachers with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lessons, and teaching focus. The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physical laboratory learning combined with MVSTS operation practice, while the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ontrol group is physical laboratory learning combined with physical laboratory operation practice.

Post-test: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mixed and tested in the order of on-site lottery. The evaluation teacher conducted a blind test o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e post-test consists of theory, sensory teaching aid operati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id 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 creation. The operation tests of sensory aids and mathematical aids have been conducted for an on-site assessment simultaneously in the same physical laboratory. Students drew lots to select two sensory aids and two mathematical aids for on-site operation demonstration, and teachers scor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unified scoring standards.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leted the environment creation test in the system. By contrast,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leted the test in the form of drawings, which were evaluated by the teacher one by one. The full score is 25 for sensory operation, 35 for mathematical operation, 40 for environmental creation, and 100 for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Post-test score = theoretical score *50%+ operation score *50%, which is divided into five grades: Excellent (91-100), Good (81-90), Medium (71-80), Qualified (60-70) and Failed (<60 points).

3.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will combine the function of MVSTS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design, investigat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feelings about using MVSTS, collect student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MVST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further improving MVSTS. A total of 243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204 were recovered, 192 were vali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79%.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average pre-tes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he same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able 1), indicating that the previous cognitive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wa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Montessori teaching method, which was qualified for further experiments. After Montessori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scores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able 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able 2). In regard to sensory aid operation and environment crea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hieved higher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especially in environment creation (Table 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xamination content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id operation (Table 2). Th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Montessori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aged in VR technology application can partially improv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In particular,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creating the environment of the early childhood classroom. There wa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total performance of the operation (Table 2).

Table 1: Test Analysis Between Pre - and Post-Test Groups

Group	Average	Mean	SD	SEM	CI		t	Sig.
					Low-L	Up-L		
EG Pre-test – EG Post-test	$\frac{78.3548}{85.7863}$	-7.43145	17.38151	1.10373	9.60537	5.25754	-6.733	0***
CG Pre-test – CG Post-test	$\frac{79.379}{82.8669}$	-3.4879	15.93204	1.01169	5.48053	1.49527	-3.448	0.001***
EG Pre-test – CG Pre-test	$\frac{78.3548}{79.379}$	-1.02419	18.66819	1.18543	3.35904	1.31065	-0.864	0.388
EG Post-test – CG Post-test	$\frac{85.7863}{82.8669}$	2.91935	12.74292	0.80918	1.32559	4.51312	3.608	0***

Note. $n=248$; *** $P<0.001$; EG=Experimental group; CG=Control group;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Groups

	Average	Mean	SD	SEM	CI		t	Sig.
					Low-L	Up-L		
EG-TS CG-TS	$\frac{92.8185}{93.3911}$	-0.57258	6.95582	0.44169	-1.44255	0.29739	1.296	0.196
EG-SMS CG-SMS	$\frac{20.09}{18.25}$	1.839	6.918	0.439	0.973	2.704	4.186	0.000***
EG-MSMS CG-MSMS	$\frac{25.99}{24.88}$	1.117	10.672	0.678	-0.218	2.452	1.648	0.101
EG-ECA CG-ECA	$\frac{32.1}{29.03}$	3.077	12.502	0.794	1.513	4.64	3.876	0***
EG-OTS CG-OTS	$\frac{78.24}{71.81}$	6.429	23.792	1.511	3.454	9.405	4.256	0.000***

Note. $n=248$; *** $P<0.001$; EG= Experimental group; CG= Control group; TS= Theoretical scores; SMS=sensory manipulation score; MMS=Mathematical sensory manipulation score;

ECA=Environmental Creation Achievement; OTS=Operation total score;

Discussions

Thanks to Ms. Montessori for establishing the world's first "Casa Dei Bambini" in 1907 and designing all kinds of teaching aids with rich educational value. The Montessori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ntessori Society of Italy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worldwide have made essential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Montessori education. Based on their efforts, we can use modern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to develop the MVSTS and applied in practice teaching.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undergoing rapid development,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all aspects of society. The advantages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proven in many ways (Ren et al., 2021; Li & Hou, 2021). There have been many explorations in applying VR technology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et al., 2021; Dong, 2021). This research is a bold attempt to apply VR technology to solving colleg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problems.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study has achieved periodical results so far, further efforts are needed in optimizing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and the depth of the research needs to be further enhanced.

Conclusions

The first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whether MVSTS plays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It has been widely demonstrated that VR technology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student performance (Li et al., 2021; Ma & Li, 2021), which is parti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This study shows tha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environment creation and sensory aids operation tests. Still, the significance was not apparent in the trials of mathematical aids operations (Table 3). In Montessori education, the operation of mathematical aids wa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of sensory aids (Lillard, 2018), indicating that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aids did not show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face of complex operational activities, which is an essential supplement to existing research.

The second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how students experience while utilizing MVSTS. Among the reflections on learning experiences brought by VR technology, contradictions occur in existing studies. Literature shows that VR technology can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Huo & Hou, 2021; Luo & Yang, 2021), but there is also literature showing that the introduction to VR technology may increase the burden on learners, and cognitive load may become a key obstacl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VR (Makransky et al., 2019). This study also shows a certain contradiction. Students consider that VR technology increases learning fun, especially in the environment creation module, and they believe it is "fun to solve the practice that cannot be completed in reality." However, the running lag of MVSTS

brings students a terrible experience. Thus, students believe that improving system fluency will be conducive to learning.

The third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new models of MVSTS combined with physical laboratory teaching. To have a better measurement of the role that MVSTS plays in teaching activities, we arranged all the operation and practice activiti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virtual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teaching mode was: physical laboratory learning + MVSTS practice. However, in the face of complex operation content, such as mathematical teaching aids, VR technology does not show obvious advantages (Table 3).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VR technology is suitable for supplementing the shortage of physical laboratories but cannot completely replace it (Ntinda et al., 2019; Darrah et al., 2014). Our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the value of operating physical aids cannot be substituted completely by virtual environment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hysical laboratory learning + physical laboratory practice + MVSTS" is more conducive to learning. Thereby, in the physical laboratory, conditions allow or should let students make full use of authentic teaching aids for operation. In the meantime, MVST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be fully open in class and after class,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class hou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advantages in the creation of a simulated environment, without constraints by time and space, automatic evaluation and other aspects, to truly fulfil the supplementary role of physical laboratory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still present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to be further constructed and improved. Firstly, as the MVSTS has built a large number of 3D teaching aids modell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demonstration video libraries, there is a lag in the loading of system login, which shows specific requirements on computer hardware. Thus, continuously slimming down the system by mean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o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s necessary. Secondly, the MVSTS currently developed can only be a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which fails to be evaluated based on the diversified environment designed by students. Therefore, teachers still need to score points one by one in this module manually, and technical problems need to be further solved. Thirdly, the MVSTS mainly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engage in online learning activities, which is also available to assist teachers in conducting assessment and data collection. Thereby,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survey is mainly students. In the next step, we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surveys on teachers' usage.

References

- Acharya, B. R. (2017). Factors affecting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by mathematics lear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6(2), 8-15.
- Ahir, K., Govani, K., Gajera, R., & Shah, M. (2020). Application on virtual reality for enhanced

- education learning, military training and sports. *Augmented Human Research*, 5(1), 1-9.
- Ai-Lim Lee, E. A. L., Wong, K. W., & Fung, C. C. (2010). How does virtual desktop reality enhance learning outcom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 *Computers & Education*, 55(4), 1424-1442.
- Ainsworth, S. (1999). The functions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Computers & Education*, 33(2-3), 131-52.
- Ainsworth, S. (2006). DeF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onsidering learning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6(3), 183-198.
- Basargekar, A., & Lillard, A. S. (2021). Math achievement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Montessori education.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26(4), 1-12.
- Carruth, D. W. (2017). Virtual reality for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training. In *2017 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erging e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ICETA)*, 13(6), 1-6.
- Chandrawati, B., & Widyarto Nugroho, E. (2017). Designing A Math Game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with Montessori Approach. *Designing A Math Game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with Montessori Approach*. 20(7), 23-29.
- Chen, C. C. (2008). Extended rank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djusting for local correlation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 52(3), 1399 - 1412.
- Cheng, K. H., & Tsai, C. C. (2020). Students' motivational beliefs and strategies, perceived immersi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learning with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A partial least squares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1(6), 2140-2159.
- Darrah, M., Humbert, R., Finstein, J., Simon, M., & Hopkins, J. (2014). Are virtual labs as effective as hands-on labs for undergraduate physics? A comparative study at two major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3 (6), 803-814.
- De Jong, T., Linn, M. C., & Zacharia, Z. C. (2013). Physical and virtual laboratori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Science*, 340(6130), 305-308.
- Ding, Y., Li, Y., & Cheng, L. (2020).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and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EEE Access*, 8(2), 96065-96074.
- Dong, J. (2021).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1915(4), 042048 (5pp).
- Duckworth, C. (2006). Teaching peace: a dialogue on the Montessori method. *Journal of Peace Education*, 3(1), 39-53.
- Grassini, S., Laumann, K., & Skogstad, M. R. (2020). The use of virtual reality alone does not promote training performance (but sense of presence do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7), 1173.

- Gravemeijer, K., Stephan, M., Julie, C., Lin, F. L., & Ohtani, M. (2017). What mathematics education may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society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15(1), 105-123.
- Groesbeck Parham, E. G. B., Cuevas, A., Fisher, B., Skinner, J., Mwanahamuntu, M., & Sullivan, R. (2019). Creating a low-cost virtual reality surgical simulation to increase surgical oncology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Ecancermedical Science*, 13(5), 45-49.
- Gutierrez, J. M., Dominguez, M. G., & Gonzalez, C. R. (2017). Using 3D virtual technologies to train spatial skills in engineer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31(1), 323–334.
- Harris, K., & Reid, D. (2005). The influence of virtual reality play on children's motiv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72(1), 21-29.
- Huang, C. L., Luo, Y. F., Yang, S. C., Lu, C. M., & Chen, A. S. (2020). Influence of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sense of presence, and cognitive load on learning outcomes in an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58(3), 596-615.
- Huo, Y., & Hou, J. (2021). Research on electrical automation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E3S Web of Conferences*, 257(14), 55-62.
- Hurtado-Bermúdez, S., & Romero-Abrio, A. (2020). The effects of combining virtual laborator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research laboratory on university studen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electron microscopy.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50(2)1-16.
- Ren, H., Du, Y., Feng, X., Pu, J., & Xiang, X. (2021). Mitigating psychological trauma on adult burn patients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of smart medical treatment. *Journal of Healthcare Engineering*, 2021(1-2), 1-11.
- Kapici, H. O., Akcay, H., & de Jong, T. (2020). How do different laboratory environments influence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courses and laboratori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52(4), 534-549.
- Kefalidou, G., D'Cruz, M., Castro, A., & Marcelino, R. (2019, May). Designing airport interiors with 3D visualizations. In *Extended Abstracts of the 2019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10(9), 1-8.
- Kim, K. G., Oertel, C., Dobricki, M., Olsen, J. K., Coppi, A. E., Cattaneo, A., & Dillenbourg, P. (2020). Using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to support designing skill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1(6), 2199-2213.
- Kristiyani, C. (2018). Materials and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Montessori concepts. *LLT Journal: A Journal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Teaching*, 21(1), 46-54.
- Laws, K., & Xun, F. (2021).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Whilst in Quarantine: A Case Study from

- China. *IAFOR Journal of Education*, 9(2), 127–144.
- Lee, E. A. L., & Wong, K. W. (2014). Learning with desktop virtual reality: Low spatial ability learners are more positively affected. *Computers & Education*, 79(3), 49-58.
- Le, Q. T., Pedro, A., & Park, C. S. (2015). A social virtual reality-based construction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f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Journal of Intelligent & Robotic Systems*, 79(3–4), 487–506.
- Li, J., & Hou, T. (2021).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analysi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of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21(5), 1-16.
- Lillard, A. S. (2020). Montessori as an alternativ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Eds.), *Child Care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sults from the NICHD Study of Early Child Care and Youth Development*. Guilford Press. 32(4),1-11.
- Lillard, A. S. (2018). Rethinking education: Montessori’s approach.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 (6), 395-400.
- Li, M., Li, Y., & Guo, H. (2020).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situated teaching design for NC machining course based on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28(3), 658-674.
- Lin, J., & Zhang, Y. (2020, May).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1544(1), 012089.
- Li, R., & Xu, D. (2020).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ased on 3D Images and Virtual Reality Rationality Study. *IEEE Access*, 8(4), 140161-140170.
- Liu, Y., & Liu, Y. (2019). Application of the Computer Assembly Virtual Plat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3r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SEIEM 2018)*, 34(7), 545- 548.
- Liu, Y., Rao, G., Chen, J., Hu, H., & Xue, Y. (2021). Teaching Reform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Technology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Contemporary Humanity Development (SSCHD 2020)*.
- Liu, Z. D., LI, X., MA, J., & QU, B. (2017).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engineering training.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Laboratory*, 36(8), 160-163.
- Li, Y., Pan, X., Wang, H., & Wang, G. (2021). Online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sting Technology Course Based on Internet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2021 2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30(12), 314-318.
- Luo, Q., Wu, G., & Yang, L. (2021). Single-Chip Microcomputer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Course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In *202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dvanced Education*. 16(3), 362-365.
- Loureiro, S. M. C., Guerreiro, J., & Ali, F. (2020). 20 years of research on virtual reality and

- augmented reality in tourism context: A text-mining approach. *Tourism Management*, 77, 104028.
- Madathil, K. C., Frady, K., Hartley, R., Bertrand, J., Alfred, M., & Gramopadhye, A. (2017). An empirical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ing virtual reality-based case studies into an online asynchron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Computers in Education Journal*, 8(3), 1-10.
- Ma, C., & Li, M. (2021).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System of Curtain Wall Based on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269(3), 371-378.
- Man, J., Guo, F., & Ma, C. (2020). Innovative Analysi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1533(2), 022097.
- Makransky, G., Terkildsen, T. S., & Mayer, R. E. (2019). Adding 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 to a science lab simulation causes more presence but less learning.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60(4), 225-236.
- Marshall, C. (2017). Montessori education: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base. *Science of Learning*, 2(1), 1-9.
- Martín-Gutiérrez, J., Mora, C. E., Añorbe-Díaz, B., & González-Marrero, A. (2017). Virtual technologies trends in education. *EURAS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13(2), 469-486.
- Ntinda, M. N., Haiduwa, T., & Kamati, W. (2021).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Virtual Laboratory as an Assistive Tool for Teaching Grade 8 Physical Science Classes. In *Intelligent Analytics with Advanced Multi-Industry Applications*, 12(8), 326-349.
- Rieuf, V., Bouchard, C., Meyrueis, V., & Omhover, J.-F. (2017). Emotional activity in early immersive design: Sketches and moodboards in virtual reality. *Design Studies*, 48(17), 43-75.
- Jarrett, O. S. (2020). Let the Children Play: How More Play Will Save Our Schools and Help Children Thr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lay*, 12 (2), 235-237.
- Seifan, M., Robertson, N., & Berenjian, A. (2020). Use of virtual learning to increase key laboratory skills and essential non-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for Chemical Engineers*, 33(9), 66-75.
- Shi, H., & Niu, D. (2020).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Ocea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104(4), 296-301.
- Singh, R. P., Javaid, M., Kataria, R., Tyagi, M., Haleem, A., & Suman, R. (2020). Significant applications of virtual reality for COVID-19 pandemic. *Diabetes & Metabolic Syndrome: Clinical Research & Reviews*, 14(4), 661-664.
- Tao, R., & Meng, Y. (2020, October). Color Design: Stage Research of Rail Car Virtual Simulation

- Project.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587(1), 012001.
- Timovski, R., Koceska, N., & Koceski, S. (2020). The use of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in Education. *101*(3), 123-127.
- Valmaggia, L. R., Latif, L., Kempton, M. J., & Rus-Calafell, M. (2016). Virtual reality in the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cent evidence. *Psychiatry Research*, 236(32), 189-195.
- Wang, S., Zhang, H., & Meng, X. (2021). Design of video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Electronic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7(4), 72.
- Yang, J., Liu, F., Wang, J., Kou, Z., Zhu, A., & Yao, D. (2020). Effec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on the teaching of urban railway vehicle engineering.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29(5), 1163–1175.